

劉少奇與毛澤東

馮治軍 著

內容提要

劉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澤東的第一位接班人。然而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其打倒並置於死地，製造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毛、劉是怎樣結成聯盟，又是怎樣與為甚麼反目成仇？

本書是中外第一部記述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係的巨著。作者通過毛、劉兩人從「旗幟」與「旗手」的親密關係到分裂的過程，揭示了「毛澤東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是中共最大的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建國後的中共党史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業社會主義與以劉少奇為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鬥爭史」，對毛澤東為甚麼與怎樣在建國後由正確蛻化為錯誤、由革命家蛻化為封建專制君王，毛澤東錯誤的性質等一系列當代中國的重大問題，提出了科學的客觀的評述；對毛澤東用甚麼手段與怎樣打倒劉少奇並將其折磨至死，提供了最新的詳盡資料；本書還提出了「改革開放是繼承劉少奇的正確路線」，劉少奇與鄧小平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毛澤東是「異端」等重要內容與觀點。

本書資料豐富、翔實，許多是在海外第一次披露，作者立論新穎，見解獨到，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現代中國的作品。

本書是作者另一著作《林彪與毛澤東》的姐妹篇。這兩本書從政治和理論的高度，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更具價值。


ISBN 962-8195-02-6
9 789628 195008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 120.00

劉少奇與毛澤東

馮治軍 著

皇福圖書

一九九八年 月 三 日

劉少奇與毛澤東•馮治軍　著

出版：皇福圖書
皇福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1802 號
製版：香港新昌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 22-36 號珠城大廈 17/F A6
印刷：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 27 號德景工業大廈 10 字樓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九龍紅磡民裕街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 8 樓 C

ISBN 962-8195-02-6
一九九八年四月•香港



一九五〇年六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



劉少奇在安源。（1922年）



延安時期的劉少奇。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在延安合影。(1938年)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1949年3月)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於五十年代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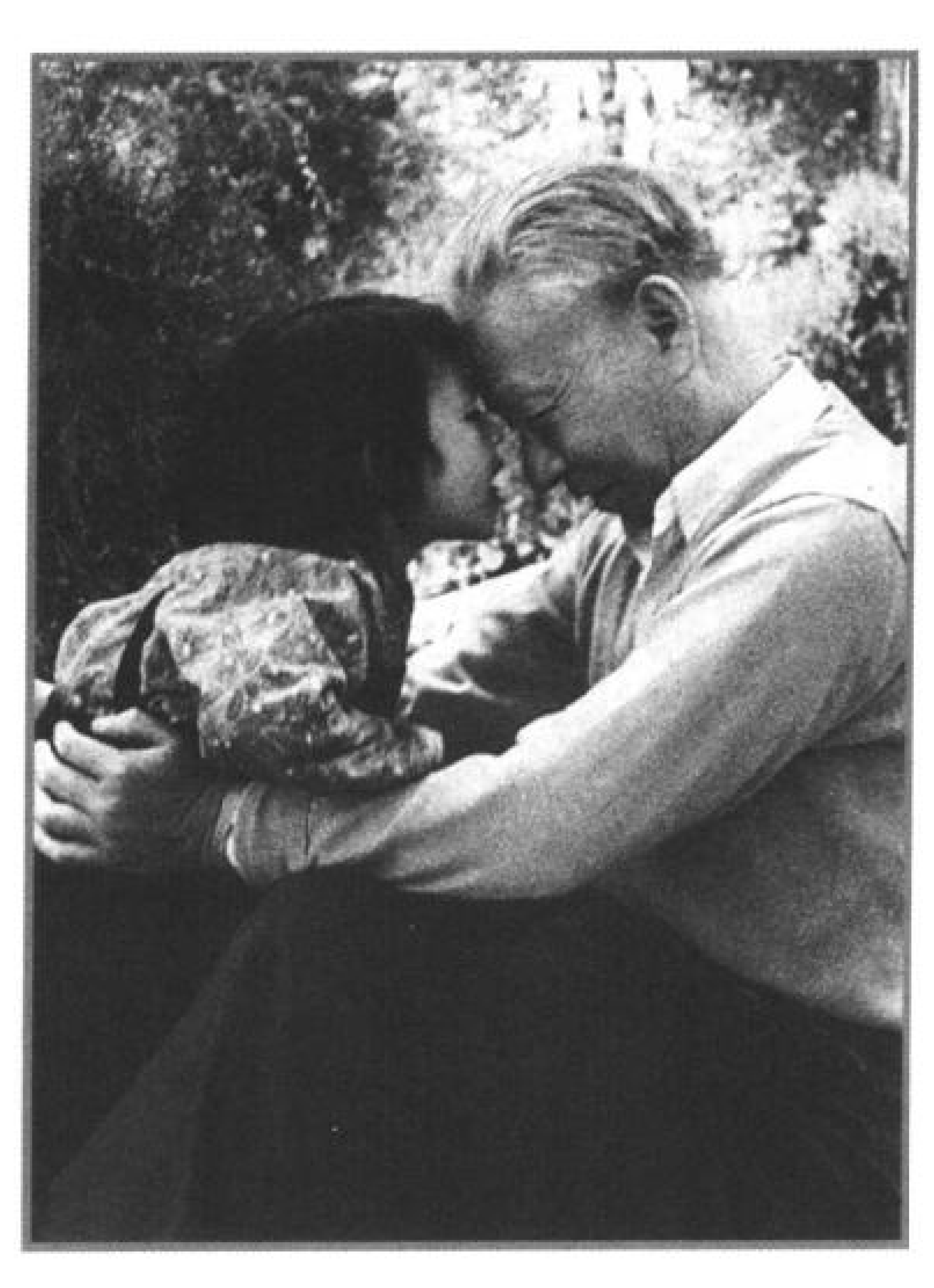


劉少奇乘坐硬席火車從天津去濟南。（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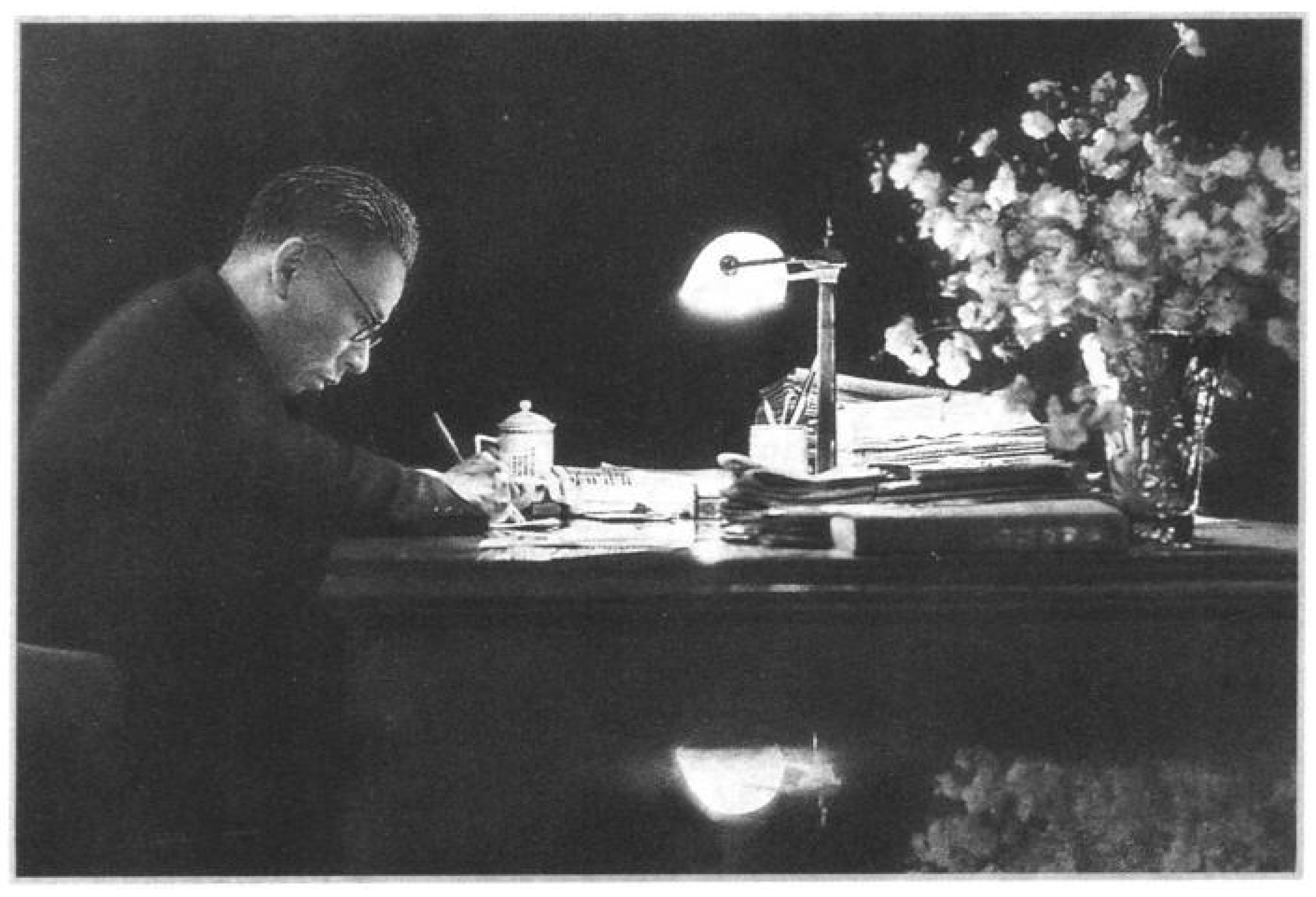
劉少奇與毛澤東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台上，是次會議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時於炭子沖舊居同農民座談。（1961 年 5 月）



劉少奇同小女兒瀟瀟在一起。（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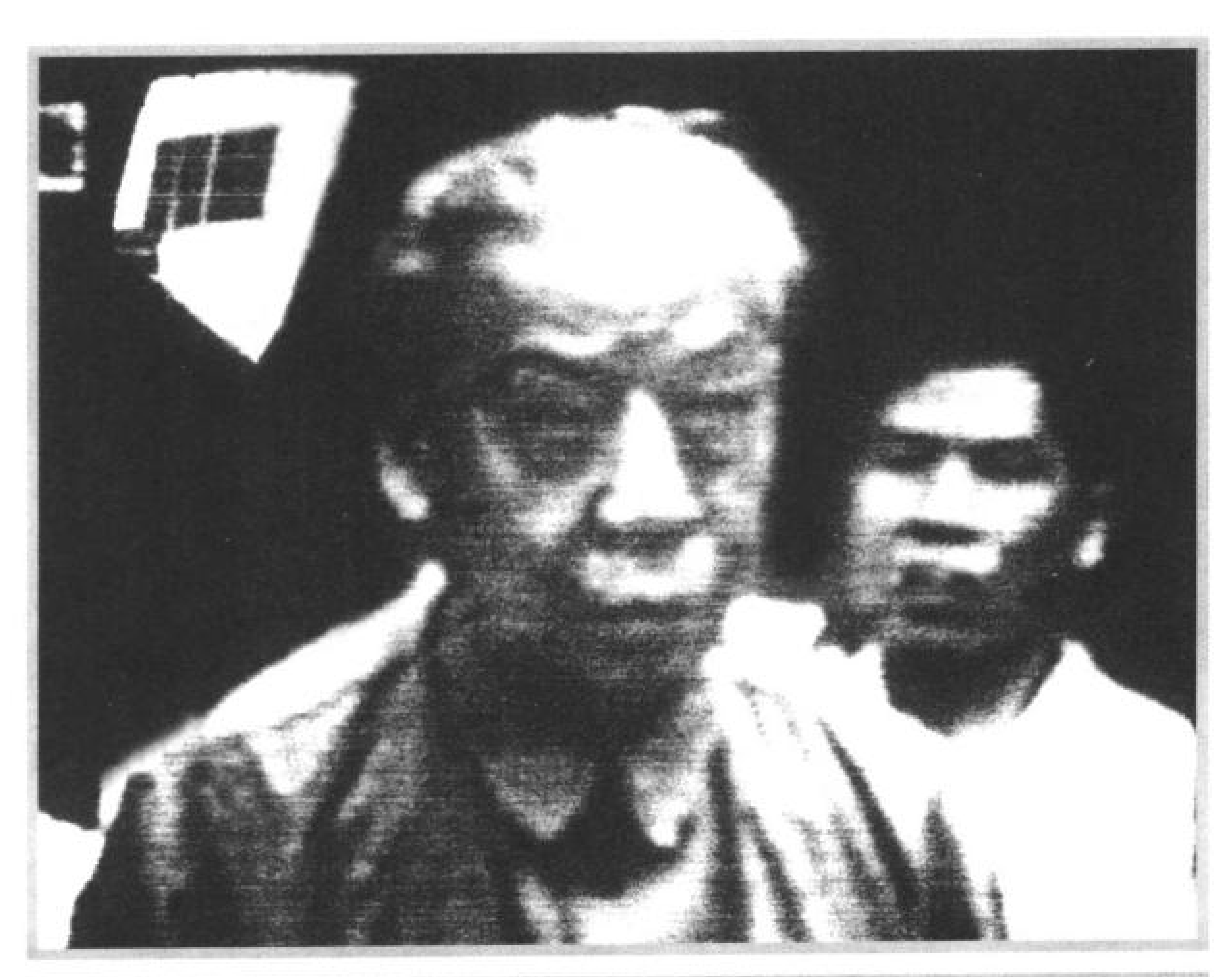


劉少奇在中南海。這是王光美拍的、也是她最喜愛的照片，現仍掛在王光美家中。

劉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一起接見紅衛兵。這時他已從第二跌至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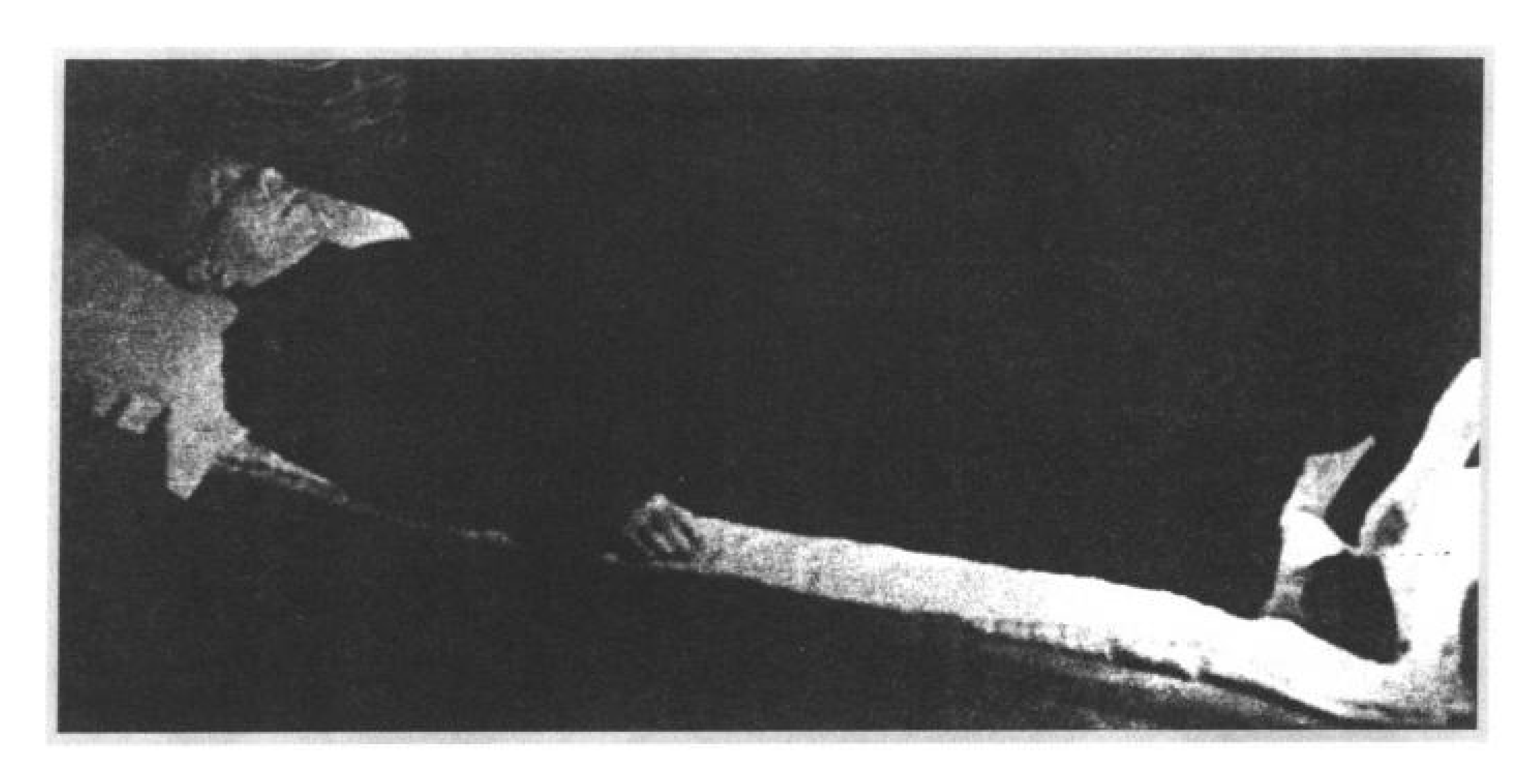


王光美被揪鬥（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夏天劉少奇在中南海被批鬥。



火化前的劉少奇連擔架一起被移放在開封囚禁地走廊的地上。(1971.11.12)

被迫害至死的劉少奇（1971 年 11 月 12 日）。

前言

一九八〇年前後，在爲劉少奇平反的問題上，中共黨內發生了巨大的分歧。鄧小平說：「十一屆五中全會爲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爲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爲，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了毛澤東思想錯了。」（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七四頁）。這種毛劉之間「有你沒我」，「水火不可相容」的狀況，基本上反映了建國後中共黨內鬥爭的概貌。

中共中央在平反時說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與劉少奇鬥爭幷將其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製造了「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的毛澤東又是甚麼呢？毛劉鬥爭的實質是甚麼？毛澤東的錯誤是甚麼性質？這些至今都還是一團霧。現在，在中國，毛澤東仍然是「神」，人們多方爲他隱惡揚善，歌功頌德，彷彿浸透了中國人民血淚的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人們何其健忘如此？

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拋棄了毛澤東的錯誤路線，而繼承了劉少奇的正確路線。毛澤東是阻礙現代中國發展的桎梏。對毛澤東的錯誤批判得越徹底，改革開放的進程就越健康堅定。現在，對毛澤東的神化，是對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的一種反動，是對黑暗的毛澤東時代的眷戀。相反，中國的現代化

進程必然是與毛澤東錯誤路線的徹底決裂。

只要回顧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史，人們不難從中獲得深刻的啓迪。

目錄

第三篇　分歧與矛盾

第一篇

同鄉兼戰友

第一章　炭子沖與韶山沖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鄉炭子沖的一戶姓劉的莊戶人家裏，一名男嬰呱呱出世，父親劉壽生給他起名劉紹選，字渭璜，這就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在湖南，人們將丘陵環抱中的小塊沖積平地叫做「沖」。劉少奇的炭子沖，與毛澤東的韶山沖，同屬於衡山山脈，兩個沖之間僅一嶺之隔，相距不到三十公里。毛、劉兩人堪稱是同鄉近鄰。

有趣的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祖藉又同是江西省吉水縣。

據清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修寫的《韶山毛氏族譜》記載：元朝至正年間，陳友諒在江西起事，吉州龍城（今江西省吉水縣）青年農民毛太華爲了「避亂」，「由吉州城遷雲南之瀾滄衛，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一三八〇年）庚申，以軍功官入楚省，惟長子清一、四子清四兩公，與之偕行，解組時居湘鄉北門緋子橋。十餘年後，清一、清四兩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毛澤東便是這個「毛太華」的後代傳人。①

而據《寧鄉南塘劉氏初修族譜》記載，劉少奇的祖籍原在江西省吉水縣。明朝中葉始祖劉時顯的兒子劉寶在湖南省益陽縣做過知縣，時顯夫婦也跟隨兒子一同來到益陽。劉寶離任後，父子爲湘江楚地的秀麗山川所吸引，沒有再回江西，而帶着一家大小遷到寧鄉縣城南溈水和靳水之間的芳儲鄉芳田灘定居。後來，劉寶的兒子邦益的後代又沿靳水而下，遷居南塘炭子沖一帶。到劉少奇兄弟出世時，已經是第十三代了。②

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韶山出生，比劉少奇大五歲的毛澤東，同是農家子弟出身，兩人走過差不多相同的讀書、追求革命的道路，最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相遇，結成親密的政治盟友。在歷史與命運的安排下，毛澤東成爲中國革命的旗幟，而劉少奇則成爲高舉這面旗幟的旗手。然而，在更加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旗幟」與「旗手」又分崩離析，親密的戰友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旗手」更被「旗幟」折磨而死，成爲「共和國最大的冤案」。而現代中國和中國人民，也隨着這兩個人的起落、鬥爭，飽受了風雨和苦難。

劉少奇的先輩以「耕讀」爲家傳祖訓。康熙年間曾任寧鄉縣知事，後來又當了清廷都察院御史的陳嘉猷，在爲《寧鄉南塘劉氏初修族譜》作序時，曾就此事褒揚說：「南塘劉氏族雖不甚顯，而族之人士俱極老成持重、耕讀傳家，漢書所謂孝弟力田、管子所謂秀民足賴者庶幾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秉承這種「耕讀」的祖訓，劉氏家族知書識禮，子弟忠孝持重，到劉少奇的父親劉壽生，雖仍躬耕田畝，但粗通文墨，思想開明。他對於蓋房買地置家產不大熱心，卻十分重視子女讀書接受教育。雖然家境貧困，但劉壽生卻咬緊牙根，讓他的四個兒子都上私塾讀書。如此熱心於投資知識，在炭子沖的貧苦農民家庭中是極爲罕見的。

劉少奇的母親魯氏，也是附近農家的子女。劉壽生夫婦共育有四子二女，劉少奇是他在中年時得到的最小的兒子，因他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也是最小的一個，所以小時候族中人都叫他「九滿」。

劉壽生身體瘦弱多病，但生性爽直、忠厚、謙和，躬親勞動而又善於指揮；而魯氏則幹練、堅毅，任勞任怨，是家庭的主心骨，加上哥哥姐姐們的互相親愛，勤勉努力，劉少奇自小生活在一個雖然是貧

窮，但卻是勤勞儉樸、和睦可親的家庭環境中。

劉少奇小時候長得瘦弱文靜而聰明伶俐，又是家中的「滿崽」，因此，得到父母親和哥哥姐姐的鍾愛，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受嬌慣。從五、六歲開始，他就跟着哥哥到田邊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或者幫助父親和母親到菜畦稻田裏捉蟲除草……。到了八、九歲以後，他便單獨出門與鄰家的孩子們一道從事各種野外勞動了。炭子沖的山山嶺嶺，靳江兩岸的田塝溪邊，到處都留下了他童年時快樂的足跡。③

與劉家相反，在毛澤東的家庭中，父親毛順生是眞正的主宰。毛順生身材高大、健壯。他讀過幾年私塾，可以記帳和寫信。他勤勞刻苦，精明能幹，善於經營，又種田，又經商，家境逐漸發達。到毛澤東幼年時，已是有田產二十多畝，年收稻谷八十擔，還僱有長工的富裕人家。

毛順生一心想發家致富，光大毛家，一生都在孜孜苦鬥，並將這個願望強加給毛澤東。他治家頗嚴，生活十分儉樸，吃苦耐勞，有時甚至達到吝嗇刻薄的地步。毛順生自己一生中不停地勞動，也嚴格地要求孩子們努力工作。毛順生看不慣遊手好閒，憎惡浪費和糟踏東西。他的脾氣倔強、暴躁，嚴厲而專制，自私而苛刻，他從來不給孩子們零用錢，平日的飲食也很差。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性格善良、溫厚，富於同情心，樂於助人。毛澤東的相貌像母親，但那高大的身材卻像父親。毛澤東盡管對母親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文七妹那善良的性格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影響，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父親那種嚴厲、倔強、專制的成份。

毛澤東自小喜歡讀書，不喜歡勞動和經商。而毛順生則一心要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會種田、能經

商、善於精打細算的接班人。尤其是作爲長子的毛澤東，父親更寄予厚望，能夠繼承家業，將毛家發揚光大。毛澤東與父親的這種截然相反的人生觀，是引起兩父子發生矛盾沖突的根源。性格反逆、任性而倔強的毛澤東，經常與父親爭吵。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顧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着意見分歧。我的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毛澤東一生熱衷於鬥爭，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便是自小與父親鬥爭的積習。

劉少奇家是人口衆多的大家庭，哥哥姐姐，嫂子姪子等，比毛澤東家多得多，然而卻沒有分成黨派，有的只是團結互助、緊張有序的勞動生活。農忙時劉少奇常去田間送茶水、飯粥，提秧苗，拾禾穗。到水田中去除草，是劉少奇能夠做、也做得最多的一種農活。六月天裏，站在水田中不停地彎腰扯草，一下田就一氣幹半天，這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劉少奇和哥哥們站在一排，並不示弱。汗水從眉梢往下淌，禾葉、水草刺疼手腳，他都堅持着很少歇氣，扯的又快又好，時常得到父親和哥哥的讚揚。幼年時的劉少奇，就在這些平常的勞動中，很早就體會到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在劉少奇的童年生活中，六姐的關心和照顧，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六姐劉紹得比劉少奇大八歲，她勤勞善良、性情溫順。因爲母親家務擔子繁重，父親和哥哥出外勞動的多，七姐劉紹意年紀尚小，所以照顧弟弟的擔子就常常落在六姐身上。六姐經常幫助他梳理髮辮，洗刷和縫補衣服，直到劉少奇上學讀書了，六姐還細心地照護他的生活。劉少奇也很尊敬六姐，六姐出嫁時，他高興地去送親。後來到保

定求學和從蘇聯留學回來看望母親、兄嫂時，他也到了六姐家裏看望。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回到離別了將近四十年的家鄉進行農村調查。他與夫人王光美一道從炭子沖步行十多里到趙家沖去看望了六姐。這時六姐已經年過七十，在農村公共食堂吃飯。劉少奇拉着六姐的手久久沒有放開。他安慰六姐：「黨和人民很快就會把困難克服過去的。」臨別時，他給六姐留下的禮物是：水果糖二斤，餅乾二斤，豬油二斤，大米五斤，咸蛋九個。這一點物品，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雖然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但卻表達了劉少奇對姐姐，對養育他的家鄉親人的一片深情。④

一九〇六年，八歲的劉少奇開始入拓木沖私塾讀書，啓蒙老師叫朱熙庭。由於家庭經濟拮據，爲了學費問題，劉少奇不得不每年都轉換學堂。與叛逆、任性的毛澤東相反，劉少奇是個沉靜文弱、行爲端正、品學兼優的少年。他穿着樸素整潔，一根長辮梳理得一絲不亂；有時候頭戴六頁小帽，身穿長袍馬褂，一副斯文樣子。他的小書篋裏，除了裝着筆墨紙硯和書本外，還有小刀、剪子等手工具，在家裏或學校做完功課以後，他喜歡做小工藝。上課時，劉少奇專心聽講，下課後，他不喜歡追追趕趕，打打鬧鬧，而是獨自做手工藝：雕刻、剪紙、做小玩具，或者邀幾個同學下銅錢棋和算盤棋，因此，他的周圍總是圍着一堆小夥伴。

毛澤東在家裏反逆父親，在私塾裏，則經常頂撞老師。

有一天，塾師鄒春培要學生們站起來背書，毛澤東卻不肯站起來，硬要坐下來背。他說：「先生坐着，我也坐着，我聲音大一點，你一樣聽得清楚。」

又有一次，鄒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學生們做功課，等他回來再背書。時令正交三

伏，天氣又悶又熱，毛澤東出主意大家到水塘裏洗澡、游泳。於是，學童們都走出課室，在水塘裏嬉戲。正在這時，鄒春培回來了，見到學生們如此胡鬧，非常生氣，便叫他們到孔夫子的牌位下面罰跪。衆位學童都戰戰競競地跪下了，唯有毛澤東不肯下跪，還說：洗冷水澡是我帶的頭，你要打就打我。鄒春培一聽，越發火冒三丈，舉起那根二指寬的竹篾片，就要打下去。毛澤東急忙閃開，一溜烟便跑了。

毛澤東不敢回家，怕挨父親的痛打。他想到湘潭縣城去，可是又不知道方向，也沒有出過遠門。結果，他在山裏亂跑了三天，終於被家裏的人找了回來。原來他只是在韶山周圍的山裏兜了幾個圈子，離他的家上屋場還不到八里路。⑤

三十四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這次「課堂革命」時說：「回家之後，令我驚喜的是狀況有所改善，我父親開始對我有些體貼，老師也較溫和了一點。這是一次成功的鬥爭」。

這一年，毛澤東只是九歲。

類似毛澤東的這種「課堂革命」，就從未發生在劉少奇的身上。

朱老師家房前屋後有許多桔子樹，一到秋天，枝頭果實纍纍，着實誘人。孩子們哪個不淘氣貪玩，禁不住手痒，摘幾個嚐嚐，自是在所難免。然而劉少奇從不這樣做。他自制力強，自尊自愛，從不亂來。對此朱老師甚是喜歡，有一次，特意摘了幾個大桔子獎勵他。劉少奇恭敬地接過桔子，並不獨吃，而是與在場的同學一塊分享，剛要入口，又來了一位同學，劉少奇便馬上從自己留下的兩瓣桔子中分了一瓣給那位同學。劉少奇的謙讓，與毛澤東的好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與毛澤東一樣，劉少奇自小喜歡讀書。他不僅努力讀課堂上的書，課餘時間還自己去找書讀，養成

了手不釋卷的習慣。劉少奇有位同學叫周祖三，家住在首子沖，與炭子沖一山之隔。其父周瑞仙，曾留學日本東京宏文師範，還是同盟會會員，喜歡購置新書刊，藏書不少。劉少奇便常向周家借閱書籍，並在讀書手册上摘記。周家看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很樂意接待他在家裏與周祖三一起看書學習。在滴水成冰的一個大冷天，看書入了迷的劉少奇，被炭火烤着了棉鞋，發散出焦糊的氣味，卻不知覺。周家因此風趣地叫他「小書櫃」。「劉九書櫃」的雅號便在劉氏族中傳開。⑥

在劉少奇少年時期的求學生涯中，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十一歲時在洪家大屋私塾一年多的讀書生活。

所謂洪家大屋，並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子，而是一戶姓洪的大地主的宅院。這所宅子佔地廣房子多，牆高院深，頗有氣勢，在當地小有名氣。洪家科舉出身，幾代做官，對子女教育十分重視。爲使幼子洪賡揚得到良好教育，洪家專門選聘了一位上過師範學院、擁有新知識的名叫楊毓群的先生，來家開設學堂，並招收功課好的鄰家子弟一起上學。劉少奇和洪賡揚同齡，加上品學兼優，即被錄取。

洪家大屋的教學環境和學習內容使劉少奇耳目一新。洪家是書香門第，又受西方文化影響，日常生活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事物。洪家的女孩子都不裹腳，而且可以同男孩子一起讀書，這在當地是一個標新立異的舉動。教的課程也和劉少奇前幾年學的迴然不同，不是枯燥無味的「子曰詩云」那一套，而是學國文、算術、自然地理常識等，還講寓言、童話，學起來十分生動有趣。

洪家大屋還有不少藏書。這對劉少奇吸引力很大。在自己家裏，父親從不允許他看那些神話故事、傳奇小說之類的雜書，在洪家可以隨便閱讀。劉少奇一有空就拉了洪賡揚一起到書房找書看，往往一坐半天，讀得津津有味。⑦

一九〇七年，在父親的安排下，十四歲的毛澤東被迫輟學，回家務農。

不能讀書，已是一種痛苦；而田間無休無止的繁重的勞動，更令毛澤東感到深惡痛絕。毛澤東對家裏的勞動，抱着僱佣的、應付的態度，時常扔下農活，躲起來看書。毛順生便經常責備他「懶惰」，「懶而無用」，「不孝」。

針對父親的這些指責，毛澤東也經常爭辯、反駁：「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你年紀比我大兩倍以上，應該多做些，等我到你那樣大的年紀時，力氣要比你大得多，做的事也就更多」。毛澤東還向父親宣稱：等他到了父親這樣年紀的時候，他會比父親勤快得多。當父親指責他「不孝」時，他更引經據典來反駁：古書上說，「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毛順生時常被駁得啞口無言，氣不過之下，只好訴諸武力。

毛澤東與父親間的爭執，有時也會暴發成激烈的衝突。有一次，毛順生在家裏開酒席，款待生意場中的客人，叫毛澤東來陪客。然而討厭繁文縟禮的毛澤東不願奉陪這些客人。於是，父子兩人便在客人面前大聲爭吵起來。毛順生當着客人的面大罵毛澤東「懶而無用」，毛澤東便公然與父親頂撞。毛順生於是更加氣憤，要動手打人。毛澤東見機不妙，便憤然出走。母親文七妹急了，連忙出來勸架，要毛澤東回去。而暴躁的毛順生也追了出來，一邊罵，一邊命他回去。毛澤東已經跑到南岸的池塘邊，恫嚇父親說：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池塘自殺。這樣一來，毛順生真的給嚇住了。毛順生不再追來，但堅持要毛澤東下跪，磕頭認錯。毛澤東又討價還價，說：如果父親不再打他，他可以跪下一條腿。結果，在文七妹的講和、勸解之下，父子便終於達成協議，毛澤東單腿跪下向父親磕頭認了錯，而毛順生

也不再打他。毛澤東與父親的一場衝突，在雙方的又堅持又妥協中平息了。⑦

在回家務農期間，毛澤東利用一切機會，扔下農活抽空讀書。每天晚上，在幫父親記完往來帳目後，毛澤東便回到自己的臥室，點起一盞桐油燈，就着微弱的燈光，專心致志地讀書，常常讀到三更半夜。

毛澤東的這些行爲，毛順生當然不喜歡。他覺得兒子看那些閒書、邪書，不但浪費時間，耽誤農活，又費精神又費油。於是，一發現兒子在看閒書，他便大發脾氣，呵斥責罵。這時，母親便出來打圓場，說：「三伢子呀，你就聽話，莫熬夜了，明天還要做工夫哩！」

然而，任性而倔強的毛澤東根本不聽父母親的勸告，他用一牀老藍布被單，把窗戶遮得嚴嚴實實，不讓漏出一點燈光，然後便沉迷在那些雜書、閒書中。

毛澤東後來說：自己「貪婪地閱讀我能夠找到的除經書以外的一切書籍」。毛澤東的弟媳王淑蘭也回憶說：「凡是在韶山沖能夠借到的書，他都借來讀了。連和尚的經書也讀」。爲了借書，毛澤東時常翻過雲盤山，到唐家圫外婆家去，向舅父和表兄們借書，來回幾十里路。

在單調而辛苦的農田勞動中，讀書成了毛澤東唯一的精神享受。書籍中的大千世界，成爲他逃避現實的樂園。閱讀豐富了毛澤東的精神世界，開闊了他的視野。書籍裏展現的燦爛多彩的世界，令毛澤東無限嚮往，而現實就越發顯得俗不可耐、苦不堪言。毛澤東與父親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距離越來越遠了。

隨着年紀增大，毛澤東的反叛也越來越強烈，與父親的爭吵也越來越頻繁、劇烈了。他說：「我越來越恨他」。父親安排的命運，成爲毛澤東走向廣闊世界的束縛。

與毛澤東一樣，劉少奇要走向外面的廣闊社會，也必須沖破家庭的樊籬，擺脫傳統的束縛。在這方面，劉少奇走過了與毛澤東近似的道路。

劉少奇的少年時代，是在快樂，溫馨中渡過的。

一九一〇年，父親的肺療病發作，家中雖然花了不少錢延醫救治，但病勢日見沉重，終於在六月二十五日去世。父親的早逝，對劉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好長的一段時間裏，母親天天以淚洗臉，劉少奇安慰母親，自己也悲痛不已。過度的悲痛與染上痢疾，令劉少奇大病了一場，劉少奇被迫休學。經過這一番波折，劉少奇一下子成長了許多。劉少奇病愈後，便向母親要求而得到複學。當劉少奇離開炭子沖，到二姐家去寄讀時，他感覺到，這是與歡樂的少年時代告別。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成立，不久革命的勝利果實落入北洋軍閥袁世凱手中。這種種時代變遷的激浪，衝擊着中國的每一個角落。

劉少奇的二哥劉雲庭在湖南新軍當兵，參加了辛亥革命的起義。第二年，劉雲庭回家探親，向劉少奇介紹了辛亥革命的經過，還帶回來一本介紹辛亥革命的書，年方十四歲的劉少奇聽聞二哥的介紹和讀了這本書後，興奮不已。爲了響應辛亥革命的成功，他當即要求姐姐爲他剪去辮子，以示同封建主義決裂。

二哥帶來的外界的訊息，令劉少奇對炭子沖以外的廣闊世界嚮往不已。他再三向母親要求離開本鄉到外地上學，經過一番軟磨硬泡，終於得償所願。一九一二年，劉少奇到西沖山芳儲小學念書，一九一三年他又以優異成績考上寧鄉縣的最高學府——玉潭學校。

一九一五年五月，竊國大盜袁世凱公然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玉潭學校的師生們奮起罷課遊行，聲討袁世凱的賣國行徑。劉少奇和幾個同學胸前掛着「勿忘國恥」的標語牌，喊着口號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充滿激情的學生們，行進在寧鄉縣的街道上，使這個平時寧靜的江南小城充滿了熱烈的革命氣氛。遊行之後，劉少奇和同學們又在幾處鬧市街頭向群衆演說，還組成抵制日貨的小組，將商店的日本商品檢查封存。在這些活動中，劉少奇都是骨幹分子。

投身這場討袁鬥爭，使劉少奇第一次經受了革命的洗禮。爲了表示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的決心，他將自己的字「渭璜」改爲「衛黃」。他在自己的書本、作業簿上，都用毛筆重新寫上了劉衛黃這個新名字。在以後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劉少奇用過許多化名和筆名，「劉衛黃」是他爲革命而起的第一個新名字。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倒行逆施的袁世凱覆闢帝制，做起了皇帝。消息傳來，寧鄉縣城再次掀起了抗議的浪潮。劉少奇和同學們重新發動罷課、遊行、演講等活動，一直持續到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後才復課。⑧

一九〇七年，由父母作主，十四歲的毛澤東娶了二十歲的女子羅氏爲妻。毛澤東後來說：「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爲她是我的妻子。」

日耕夜讀的生活並不能令毛澤東滿足，於是他公然向父親提出繼續上學的要求。毛順生當然不會答應。於是父子之間又爆發了新的劇烈的爭吵。這一次，毛順生氣急敗壞，而毛澤東也絲毫不讓。經過曠時日久的僵持，加上妻子文七妹的勸說，毛順生終於讓步了，毛澤東得以繼續讀書，後來又離開韶山

沖，到東山小學念書，並從那裏轉赴長沙求學。

辛亥革命對毛澤東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曾投筆從戎，參加革命新軍。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半年以後，「孫逸仙和袁世凱達成了協議，預計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想革命已經結束，於是就退了伍，決定回去讀我的書。」

經過多方的選擇，一九一三年毛澤東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習，直至一九一八年畢業。毛澤東沒有讀過大學，也沒有出外留學。因此，他始終只是個「小知識分子」。

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毛澤東先後二次來到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在那裏毛澤東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六年夏天，劉少奇以優異的成績從玉潭學校畢業。十八歲的劉少奇面臨着人生道路的選擇。在黑暗的舊中國，百業雕弊，民不聊生。劉少奇感到前路茫茫。在別無出路的情況下，劉少奇只好繼續求學。他持着玉潭學校老師梅治成寫給後來成爲中共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的介紹信，步行幾十里，來到了省城長沙。經過一番周折，劉少奇進入設在長沙的寧鄉駐省中學就讀。

此期間，由於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劉少奇想投筆從戎，「精忠報國」。於是在一九一六年秋報考了湖南軍閥譚延闓開辦的陸軍講武堂。這所講武堂由於找不到校舍，遲遲不能開學。劉少奇等到第二年的三月，才有機會踏入講武堂的課室。可是半年以後，護法戰爭爆發，講武堂在戰火中變成一堆廢墟，劉少奇的從戎報國成了夢想。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時代在呼喊，祖國在召喚，熱血青年劉少奇再也坐不住了，他

放下了身邊的一切，匆匆北上，奔赴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

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令劉少奇耳目一新。劉少奇決定在北京讀大學。然而一打聽，學費貴得嚇人，家庭根本負擔不起。劉少奇四處奔走，多方設法，但在北京讀大學的願望，始終不能如願以償。劉少奇還想參加法國勤工儉學，但同是因爲旅費沒有着落而作罷。

一九一九年八月，山東發生軍閥馬良鎭壓愛國群衆的事件，使已接近尾聲的學生運動再度高漲起來。八月下旬，北京、天津學生幾千人包圍總統府、國會，舉行示威遊行。反動警察將學生強行驅趕到天安門前，打傷學生一百多人，逮捕了天津學生代表馬駿等人。爲了營救馬駿等代表，天津幾百名學生在天安門、總統府連續幾天露宿請願。劉少奇聞訊連忙趕去現場，加入了請願隊伍。當局迫於壓力，不得不於八月三十日釋放了馬駿等人。鬥爭的勝利使劉少奇眞切地感受到五四運動力量的偉大，更加堅定了追求革命的決心。

湊巧的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下旬周恩來也從天津趕來北京，在天安門等地參加了這場營救馬駿的鬥爭。不過，當時他和劉少奇互相都不認識。

在北京上不了大學，生活又無着落，劉少奇備受煎熬。後來，劉少奇輾轉來到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學習，希望過一段時間後有機會去法國。

育德中學在辛亥革命時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河北一帶秘密集會的場所，學校的許多師生都參加五四運動。毛澤東、蔡和森曾先後來這裏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李富春、李維漢從留法預備班第二期畢業後剛剛離校。

九月間，劉少奇進入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第三期學習。這裏採用半工半讀，半天讀書，半天勞動。

學習內容包括法文、機械學和木工、鉗工、鍛工、翻砂等技術。學校裏革命氣氛濃厚。校長王國光和教師劉仙洲等，對新思想很支持。《新青年》、《東方》等進步刊物在這裏公開陳列，廣爲流傳。校刊上還常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情況，評論國內外大事。這一切，對劉少奇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他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青年時在保定育德中學上過一年半工半讀，有一個技師、兩個技術工人教我們。作坊就是三個小房子，一個五馬力的發動機，三部車床。我們一班六十個人，上午上四小時課，下午做四小時工，書也讀了，身體也很好，還能賺錢。現在清華大學的劉仙洲副校長，那個時候教我們機械學。一年的半工半讀，我們就學了打鐵、翻砂、鉗工、車床工、模樣，五樣都學了，還學了一門法文，準備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後來我沒去。⑨

劉少奇「沒去」法國的原因，還是因爲費用沒有着落。爲了籌措留學費用，劉少奇只好由北京返回長沙。正當劉少奇在長沙四處奔走，努力張羅的時候，忽然傳來法國政府停止接受中國留學生，劉少奇長時間苦心籌劃的留學計劃徹底落空了。

劉少奇自從一九一六年背井離鄉外出找尋出路以來，從長沙到北京到保定，又從北京回到長沙，匆匆之間四個年頭過去了。其間劉少奇備盡艱辛，嚐到了人間的酸甜苦辣。儘管出路仍無着落，但劉少奇的眼界開闊了，革命的意識更濃厚了，而人生的意志也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正當「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劉少奇從《大公報》上得知長沙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的消息：「赴俄學習旅費花費較少，到俄國後，俄國政府可以優待，不致凌餒，因此，赴俄比赴法容易。」

原來，長沙俄羅斯研究會，是毛澤東於第二次赴北京期間，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與何叔衡

等湖南革命人士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發起組織的。稍後，他們又開始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

劉少奇和毛澤東此時儘管都在長沙，而且在從事同樣的革命活動，但他們還互不相識。劉少奇在北京期間已知道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事跡，早已對俄國神往，現在聽到可以赴俄留學，劉少奇毫不猶豫地決定報名參加。他通過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介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幫助辦理赴俄勤工儉學手續。與劉少奇前後報名的還有任弼時、蕭勁光、周兆秋、胡士廉等湖南青年，而任、蕭後來都成爲著名的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任弼時更與劉少奇一起成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少奇一行需要先到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在此之前，他抽空回了一次炭子沖，看望母親和哥哥，並說服他們爲他籌措了一筆費用。一九二〇年初冬的一天，劉少奇與幾名同學登上了赴上海的輪船，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

①⑤⑦：引自王以平《走出韶山沖》。
②：引自黃祖琳《劉少奇青少年時代》第二頁。
③④⑦⑧：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
⑥：見朱元石《偉人之初・劉少奇》。
⑨：《劉少奇選集》下卷，三二四頁。

第二章 毛、劉——革命戰友

一、劉少奇：中共最早的留蘇學員

一九二一年四月，劉少奇與十幾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上海黃埔江登上了一艘開往海參崴的貨輪，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赴俄旅程。

貨輪先到日本長崎，住了一星期左右，繼續乘船往海參崴。海參崴到處冰天雪地。因為從上海出發時天已暖和，誰也沒帶棉衣，他們凍得吃不消，住在中國街的一家旅館裏，不敢出外。

當時海參崴還被日本佔領着，伯力由蘇俄紅軍控制，伊曼河成為分界線，這邊白色地段，那邊紅色區域，互相嚴密防範。劉少奇一行剛小心翼翼進入海參崴，就被北洋軍閥政府駐海參崴的總領事館所注意。他們把劉少奇等誤作孫中山派往蘇俄去的人，借故抓了劉少奇等幾個去審問。

刀槍手兩邊站立，殺氣騰騰。審問的人問劉少奇是甚麼地方人，幹甚麼的，要到甚麼地方去，……口氣十分嚴厲。

劉少奇雖然初臨這種場面，但能沉着應付。不管審問者怎樣吹胡子瞪眼，劉少奇不慌不忙，不緊不慢，故意帶着濃重的湖南話音，一一回答。他說自己是湖南人，因家鄉遭災，出來謀口飯吃，做手藝。

審問的人又問會甚麼手藝。

劉少奇連說帶比，說木工、鐵工活都拿得起。

審問者以逼視的眼光把劉少奇上下打量了一會兒，將信將疑，要手下人察看劉少奇的手。還好，劉少奇在留法預備班工廠實習時留下的老繭沒有完全蛻掉。再問別的，劉少奇的一口湖南話眞難聽懂。審問者再沒有耐心，把劉少奇等放了。

劉少奇一行根據原來的安排，迅速與第三國際駐海參崴的代表——海參崴大學的教授伊凡諾夫接上頭，伊要他們馬上去伯力，以防在這裏再發生不測，並給了他們每人一個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證。伊叮囑，千萬妥爲保存，不遇紅軍不暴露。被敵人發現要掉腦袋，丟失了就無法入境。伊安排他們登上了往伯力的列車。①

備受內戰摧殘的俄羅斯，滿目瘡痍。劉少奇乘坐的列車是裝貨的悶罐車，沒有煤，燒的是木柴，路軌多遭破壞，走走停停。一路上饑寒交迫，歷盡艱辛，經過三個月的艱苦跋涉，到達莫斯科時已是初夏的六月。劉少奇後來曾多次回憶這次艱險的歷程。一九六〇年他訪問蘇聯時在莫斯科羣衆大會上說：「爲了學習十月革命的經驗，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幾十個青年團員，第一次來到你們的國家。我們從上海到海參崴，經過赤塔到莫斯科。那時候，海參崴還被日本軍隊佔領着，遠東共和國也還沒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從海參崴到莫斯科走了三個月，火車時開時停。當時火車是燒木柴的，有時候還要乘客從山裏去搬運木柴，火車才能繼續行走。當時你們國家處在革命後最困難的時期，我們看到了並且親身經歷了這些困難。我們當即有部份人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發生了動搖，但是我們另一部份人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卻因此而更加堅定了。」②

劉少奇等人到達莫斯科時，適逢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大禮堂舉行，劉少

奇等人成了大會的編外人員，幫助做些會務工作，因此大會舉行時，他們可以進去旁聽。

克里姆林宮大禮堂的主席台上，坐着以列寧爲首的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列寧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作爲這次大會的名譽主席，他向大會作了關於革命策略的報告。劉少奇第一次參加這樣隆重的世界性大會，能夠眞實地看到了共產主義革命那波瀾壯闊的鬥爭場景，而且能夠一睹列寧這位久已聞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風采，劉少奇心情之興奮，眞是筆墨難以形容。

以記者身份參加大會的瞿秋白，曾在他寫的《赤都心史》中作了生動的記載：「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着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着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徵。……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爲霹靂的鼓掌聲所呑沒。」

大會閉幕後，劉少奇等人被分配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建立起來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這所學校是共產國際創辦的，目的是爲中國、日本、朝鮮等遠東國家培養革命骨幹力量，名譽校長是斯大林。

東方大學首批中國學生有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四十多人。他們住到特維爾斯卡婭大街十五號東方大學的集體宿舍，在學校的食堂就餐。

東方大學開設的課程有《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聯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工會運動等。教材粗糙，學習資料以及工具書都不夠，加上劉少奇等人只在上海補習了幾

個月的俄語，而東方大學的教師幾乎全是俄國人，聽說寫都十分困難。後來，瞿秋白來到東方大學任翻譯，並講授一部分課程，才稍微減輕學員們的學習困難。

這時，蘇聯正處於國內戰爭時期，經濟十分困難，糧食供應嚴重不足，生活用品極爲匱乏。劉少奇等人在東方大學的這一段學習生活是非常艱苦的。蕭勁光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這些外國學生享受紅軍的待遇……紅軍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塊像兩個手掌合起來那麼大的黑面包和幾個土豆。早上切下一塊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則晚上就沒有吃的了。中午吃飯時有一個湯，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時放一點咸魚。開飯時一人一勺，一勺下去有甚麼算甚麼，基本上是清湯，有時碰到一點稠的，算是很幸運了。那時真是餓得難受。我們的課堂在四層樓上，我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本來上個四樓算不了甚麼，可是那個時候上四層真困難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間還得休息幾次，一次是上不到頂的。有時肚子餓得實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鋪上等飯吃，越等越餓……晚上睡覺時，一個挨着一個，大家擠在一起取暖，只蓋一件軍大衣和毯子。③

東方大學學員中有少數人受不了這種艱苦生活，情緒消沉，提出退學。但劉少奇等大部份人始終意志堅定，精神樂觀，把困難環境作爲鍛煉自己的機會。在一九二二年新年晚會上，一向深沉文靜、從沒有演過戲的劉少奇，還和蕭勁光等一起上台，爲大家表演了一出反映中國軍閥鎮壓中國工人罷工的話劇。

二、毛劉初會在長沙

一九二二年春天，劉少奇奉調回國，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是年夏天，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接見了劉少奇，派他到湖南工作，並讓劉少奇將剛剛閉幕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帶給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

湘區執行委員會，即是中共在湖南的領導機構，是一九二二年五月成立的，書記正是毛澤東。毛澤東還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主任。當時在湖南的共產黨人還有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郭亮、夏明翰、李六如等人。

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設在長沙市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那裏有綠油油的菜地和一口清澈的池塘。毛澤東與夫人楊開慧也居住在這棟普通的青磚小平房裏。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大名早有所聞，知道他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位。就在清水塘這所平房裏，劉少奇與毛澤東第一次會見。這是一次平凡的會晤，歷史並沒有給這次會晤留下任何珍貴的鏡頭。然而這卻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見。中國革命的旗幟與高擎這面旗幟的旗手，經過曲折的道路，終於走到一起來了。

三十年後的一九五二年，劉少奇在全國解放後第一次回長沙時，曾和夫人王光美一起專門去尋訪同毛澤東初次會見的清水塘二十二號，可是由於年久變遷，他們竟沒有找到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劉少奇與毛澤東接上聯繫後，告假回寧鄉看望了母親和親人，之後，便匆匆趕回長沙，投入領導長沙土木工會和粵漢鐵路長沙段工人罷工的鬥爭。

九月九日，粵漢鐵路長沙段二千四百名工人全線罷工，成立了工人俱樂部聯合會，高舉「爭自由、爭人格、爭人權」的旗幟，向路局提出六條經濟要求。爲此，劉少奇四處奔走，忙得不可開交。在岳陽，郭亮率領工人臥軌攔車，粵漢鐵路頓時全線癱瘓。

正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劉少奇接到剛從萍鄉趕回來的毛澤東的通知，要他放下長沙的工作，立即趕去安源路礦，領導那裏即將爆發的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三、劉少奇的崛起：安源大罷工

安源路礦，是安源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的全稱，位於湘贛兩省交界處的江西萍鄉境內，擁有礦工一萬二千多人，鐵路工人一千多人，是當時中國南部最大的產業之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與中共湘區委從一開始就把它作爲開展黨的工作及工人運動的重點。一九二一年冬，毛澤東第一次去安源考察，隨後派李立三前往開展工作。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組織：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一九二二年九月，在粵漢鐵路、漢陽鐵廠工人罷工的影響下，安源工人爲了爭取工人俱樂部的合法地位和經濟利益，與路礦當局形成對峙，一場大工潮如箭在弦，一觸即發。爲了加強安源路礦的領導力量，毛澤東決定將劉少奇從岳漢鐵路罷工的火線調往安源，協助李立三全面開展工作。

九月十一日，劉少奇到達安源，同李立三會合。

原來，就在劉少奇到達安源的前一天，路礦當局串通萍鄉縣事和新近調防來的贛西鎭守使，威逼工人俱樂部自行解散。工人們極爲憤慨，針鋒相對地提出要路礦當局承認工人俱樂部、每月發給俱樂部津貼二百元、發淸工人欠餉等三項要求，限九月十二日中午答覆，否則「迫不得已當爲最後之對付」。雙方已成劍拔弩張之勢。

在掌握情況之後，李立三、劉少奇召開緊急會議，進行最後的決策。九月十二日晚，緊急會議在一位老工人家裏秘密舉行。一開始會上出現不同意見，有的提出最近當局新調來軍隊，增加了武裝，弄不好會遭鎭壓。但李立三、劉少奇多數黨員意見一致，認爲罷工時機已經成熟。會議最後決定：成立罷工指揮部，李立三任罷工總指揮，秘密策應；劉少奇任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長住俱樂部應付一切。

爲甚麼要李立三「秘密策應」呢？這是有緣由的。李立三從一九二一年冬起就在安源活動，反動派早已將他視爲眼中釘肉中刺，多次揚言要殺他。爲預防不測，大家一致要李立三在罷工期間躲起來。而劉少奇剛來安源，敵人還不熟悉他，因此決定由劉少奇公開出面，長住在工人俱樂部坐陣指揮。

九月十四日凌晨，籠罩在夜幕中的靜悄悄的安源路礦，忽然響起了一陣響亮的汽笛聲，緊接着，周圍工廠的電笛也高聲長鳴，安源路礦一萬三千多工人的大罷工開始了！偌大個路礦一下子完全停止運作。

工人俱樂部發表了《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還提出十七項要求條件，主要內容是：俱樂部改爲工會，路礦兩局承認工會代表工人向路礦兩局交涉之權；今後路礦兩局開除工人，須得工會之同意；從前積欠工人的存餉，一律發給，罷工期間工錢照發；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資在

四角以下者，須增加一角等。

工人俱樂部將上述條件用公函遞送路礦兩局，並提出：「如協商，請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

罷工鬥爭一開始就進行得堅決而有秩序。工人們聽從統一指揮，一律各歸住房。監察隊員手持俱樂部旗幟，佩戴紅袖章，拿着鐵棍等武器，在街市及工廠附近巡邏，維持秩序。各處牆壁貼滿俱樂部布告，有「俱樂部通告方准開工」及「各歸住房，不得擾亂」等語。

路礦當局施展種種陰謀詭計，企圖破壞和鎭壓罷工。先是工頭出面，以親朋好友關係，出高價誘惑、收買一些工人開工。這一陰謀被監察隊制止，未能得逞。之後，他們又懸賞六百塊大洋，密遣暗探刺殺李立三。工人們嚴加護衛，使敵人無法下手。於是，路礦當局一面請贛西鎭守使將安源劃爲特別戒嚴區，設立戒嚴司令部，任命旅長李鴻程爲戒嚴司令，妄圖實行武力鎭壓；一面又請商會出面調停，欲使罷工自動停止。

九月十四日下午，商會代表謝嵐舫和地方紳士陳盛芳來到工人俱樂部，表示願爲調停人，促請雙方協商解決罷工風潮。劉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十七條要求爲基礎進行協商。

當晚，謝、陳帶來路礦當局的回話：「路礦兩局對於工人所要求各條，皆可承認；但現時做不到，請先邀工人開工，再慢慢磋商條件。」劉少奇當即嚴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於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不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話，事實上恐萬不能解決。」④

路礦當局對工人的罷工又恨又怕，罷工的第三天，路礦當局派人來請俱樂部代表到戒嚴司令部談判，劉少奇毅然前往。工人們擔心劉少奇受到迫害，說：「他們不安好心，你不能去！」「這是入虎

穴，他們會害你！」

劉少奇回答：「不要緊，我爲大家辦事，就是死了也光榮！」

戒嚴司令部設在路礦辦公樓內，台階兩邊，架着機關槍，樓梯口、走廊裏，都有士兵站崗，戒備森嚴，殺氣騰騰。

戒嚴司令李鴻程先是假裝客氣地詢問罷工過程，然後追問：「你們俱樂部爲甚麼要鼓動工人作亂？」劉少奇毫不畏懼，反問道：「你們究竟是談判，還是審問？是要解決問題，還是要把問題越搞越大？」

李鴻程以命令的口氣說：「請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開火車兩次。」

劉少奇斷然回答說：「這不能答應。不從磋商條件入手，無解決的希望。」

李鴻程立刻現出本來面目，威逼說：「如果堅持作亂，就把你這個代表先行正法！」

劉少奇毫不畏懼，斬釘截鐵地回答道：「如不能達到萬餘工人的要求，雖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決！」

戒嚴司令吼叫起來說：「我對萬餘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萬餘軍隊在這兒！」

劉少奇憤然說道：「那就請你下令制裁去！」

這時候，外面喧聲如雷。數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圍了，提出請代表出來，有事請司令和礦長到俱樂部商量。劉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釋說：「工友們！現在正在談判，請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後進戒嚴司令部繼續談判。

最後，李鴻程以調和的口氣說：「請代表下午再來這裏商量。」

劉少奇當即厲聲說：「若不磋商條件，即可以不來；至說用別的方法可以解決，請你們把我斫碎罷！」說時怒不可遏。

劉少奇在談判中臨危不懼，寧死不屈，表現了他的膽識與才幹，也表現了他爲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工人們稱讚劉少奇「渾身都是膽，眞是我們工人的好領袖」。當年安源工人集體創作的歌謠《勞工記》中有這樣幾句：

少奇同志好膽量，我往礦局去一趟。
代表全體衆工人，見機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豈肯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貪生怕死枉爲人。
少奇下了堅決心，特到安源辦工運。
任他把我爲甚難，不畏湯火與刀山。⑤

九月十七日，發電廠抽水機和打風機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機的危險。一旦停機，所有礦井都將報廢。路礦當局迫於工人群衆的威勢，不得不軟了下來，答應繼續與工人代表「從事磋商條件」的談判。

九月十八日，路礦當局全權代表與工人俱樂部代表在達成的十三項協議上簽字。路礦當局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答應了發清拖欠的工資、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少量提高工資等要求。至此，歷時五天的大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

當天，安源路礦工人發表《上工宣言》。宣言說：

「罷工勝利了！氣也出來了！從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萬歲』！我們的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宣告上工。」

「我們這次罷工的『秩序、齊心、勇敢』，要算是我們神聖精神的表現。各界的朋友們！你們不要說工人無知識呵！」

「我們這次罷工，是安源工人出頭的第一日，是衝破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們從今日起，結緊團體，萬衆一心，爲我們自己權利去奮鬥！」

九月十八日下午，一萬多工人涌到大操場，舉行罷工勝利慶祝大會。李立三在宣布勝利成果後發表演說，接着，劉少奇講話，他說：「工友們，這次罷工，我們勝利了，這是大家團結一致，鬥爭堅決的結果。但是，這次勝利，僅僅是個開始。我們要繼續團結，共同戰鬥下去，爭取更大的勝利。」全場掌聲雷動。工人們執帽歡呼：「勞工萬歲！」「罷工勝利萬歲！」口號聲和爆竹聲匯成一片。

會後，由李立三、劉少奇爲前導，工人群衆舉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劉少奇說：「這一次大罷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完全勝利，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而僅有的事」。劉少奇領導安源工人大罷工的勝利，不僅對當時湖南工人運動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對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罷工勝利後，劉少奇乘勝追擊，擴展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整頓內部，健全俱樂部組織機構，設立黨

校、學校，訓練工人幹部，在全路礦開辦了七所工人學校，五個工人讀書處，一個工人圖書館，二個消費合作社，還蓋了一幢工人俱樂部大樓。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後，中國工人運動走向低潮的大形勢下，劉少奇領導下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卻得到蓬勃的發展，被當時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譽爲「碩果僅存」，「是全國工會中組織最好的工會」。

安源罷工顯示了劉少奇在組織工作和對敵鬥爭方面的才幹。劉少奇的聲望日隆，成爲全國知名的工運領袖。一九二四年年底，中共中央將劉少奇調往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這時，劉少奇還不到二十七歲。

就在這年的四月，劉少奇與共產黨員何葆貞結婚。這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四、劉少奇··領導五卅運動

一九三九年五月，劉少奇在延安工人學校演講，題目是《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他說：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資本家鎮壓上海工人罷工，槍殺了上海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引起五卅運動。

那時，我們用一切方法去動員群衆，拿被打傷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學校去做鼓動工作，結果各學校，工廠都決定，五月卅日這一天動員群衆上街，召集群衆開會，號召上

海市各界起來援助工人。學生的一支宣傳隊走到南京路，英國巡捕施行逮捕，結果大家包圍巡捕房，巡捕房下令開槍，打死了許多中國人。當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要求工人罷工自由，要爲顧正紅伸冤，反對交易所等。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慘案。⑥

五月三十日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全市罷工、罷課、罷市，一致反擊帝國主義。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親自領導運動外，又先後緊急抽調李立三、劉少奇、劉華等人加強第一線領導。六月一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

當時劉少奇在青島領導四方機車廠的大罷工。接到通知趕到上海時，已是六月初，全市大罷工已開始。劉少奇被任命爲上海總工會總務主任，相當於秘書長，負責總工會的日常工作。當時，以總工會爲首的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已經成立，李立三以總工會代表的身份參加聯合會的領導，總工會的工作便落在劉少奇的肩上。

七月六日，全總上海辦事處正式成立，由劉少奇負總責，領導長江流域及北方的工會工作。

上海總工會成立的當天，就發表了宣言及告全體工友書，聲討帝國主義的暴行，並宣布全市舉行總同盟罷工。接着，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風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國。劉少奇曾經生動地描述上海「三罷」鬥爭的情景：

此時，上海工廠無人作工，商店罷市，輪渡不通，車馬斷絶，交通爲之梗阻。此時的上海，真的入於荒涼恐怖之境況。同時上海學生也一律罷課，即各教會學校也都加入。那時我們

到上海馬路上一看，只見滿街貼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標語、口號、圖畫，處處都有游行的、演講的、募捐的、演戲的，鬧個不休，個個人都忙着反帝國主義的工作。

正當反帝運動深入發展的時候，六月十九日，上海總商會宣布，將於六月二十六日單獨提前開市。當天晚上，劉少奇主持召開上海總工會代表大會，討論對付上海總商會開市的態度和辦法。大會議決：不管商界開市與否，工界決不依賴，要堅持罷工到底。並發出通告，號召工人堅持罷工。「不得總工會命令，不得（達）完滿目的，則頭可斷，工不可上！」⑦

六月末商界開市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開始集中力量鎮壓工人運動。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許，一批工賊、流氓手持刀槍、鐵棒等凶器，衝入上海總工會，搗毀辦公室，當場打傷職員八人，並圖謀抓捕李立三和劉少奇。他們四處尋找，但沒有找到。原來，劉少奇早有警覺，迅速把文件、帳册收拾好，便離開總工會，去向中央報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護下，從房頂上出去報警了。

從八月初開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商人先後開市，學生因放暑假紛紛離校，工人只能孤軍奮戰。爲了保存力量，鞏固既有成果，上海總工會決定改變策略，以經濟的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爲最低條件，有領導有組織地複工。⑧

九月十八日，奉系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並下令通緝劉少奇。面對敵人的鎮壓、迫害，劉少奇毫不畏懼，依然緊張工作，遂因工作繁重，積勞成疾，患了肺病。十一月間，病情加重，劉少奇不得不離開上海，回湖南養病。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炮制的對劉少奇的《審查報告》中，說劉少奇在五卅運動後「畏懼鬥爭」，「借口養『病』，躲開上海總工會」，「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

事實上，由於劉少奇當時已是上海名人，他的離滬返湘養病，上海報紙亦有報道。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總工會三日刊》發表了題爲《劉少奇的奮鬥》的報道：

「本會總務科正主任劉少奇在本會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緊，寧肯犧牲個人，抱病工作。自本會被封後，因工作過勞，病勢更重。而劉少奇不僅不因病辭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檢閱各種稿件，親往工人群（衆）家中接洽各項事件。日昨劉君與某工友云，如果真正爲工友奮鬥，替工人謀利益的人，並不在平日工人組織公開的時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緊急的時候，看他努力不努力爲斷，而某工友異常欽佩劉君奮鬥的精神。」

另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英國（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英文報紙）刊登的一份情報說：

「昨晚六時約七名罷工鼓動者，包括劉華（當時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引者注）在閘北譚子灣三德里三十一弄三十二號碰頭。劉華說：原總工會成員劉少奇在罷工鬥爭中很積極，現在病的很重。已經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⑨

這些記載證明，江青一伙揑造的，純是陷害劉少奇的謊言。

五、劉少奇第一次被捕

劉少奇回長沙後，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軍閥趙恆惕逮捕。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各地各界團體紛紛通電救援。這樣的通電，有時一天多達四十多份。全總致電趙恆惕說：劉少奇「歷年盡瘁愛國運動，爲工人群衆所愛戴」，在五卅運動中，他「更廢寢忘餐從事奔走，號召國人爲救國運動，以全力爲罷工工人後盾，愛國熱誠，舉國同欽。」電報譴責趙恆惕，要求即速釋放劉少奇。

經多方營救，劉少奇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獲釋出獄，但被趙恆惕驅逐出湖南省。

二月十九日，劉少奇抵達廣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會團體的熱烈歡迎。這時，爲響應上海人民反帝鬥爭而發起的省港大罷工仍在繼續。三月三日下午，中華全國總工會舉行歡迎劉少奇大會，到會群衆有一千五百多人。全總宣傳部主任鄧中夏在會上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介紹了劉少奇爲工人階級英勇奮鬥的歷史，稱讚劉少奇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最奮發最勇敢的一位戰士」。接着，劉少奇講話，對工友及各界的歡迎表示感謝。他着重講了領導工人運動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劉少奇講話後，全場掌聲雷動，高呼口號：「中華全國總工會萬歲！」「省港罷工勝利萬歲！」⑩

在這期間，因全總委員長林偉民身患重病，由劉少奇代理全總委員長職務。他和鄧中夏、蘇兆征等共同擔負起領導省港大罷工的責任。

六、劉少奇第二次被捕

一九二九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任命劉少奇爲滿洲省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中共滿洲省委曾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幹部被捕，中共的地下工作幾乎陷於停頓。加上當時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奉系軍閥的白色統治，滿洲的革命鬥爭處於最艱難的時期。

劉少奇到達奉天（即瀋陽）後，首先致力於恢復和整頓黨組織，建設堅強的省委領導班子。八月二十日，他主持召開省委會議，制訂工作計劃，明確了常委的分工，建立相應的組織措施和鬥爭策略。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到八月底，滿洲的中共組織基本恢復，共有十九個支部，一八二名黨員。不久黨支部又發展到三十八個。

在黨組織基本恢復的基礎上，劉少奇和省委其他領導人分頭到奉天、哈爾濱、大連、撫順等地發動和組織群衆，重點是開展工人運動。劉少奇選擇了奉天紗廠（今沈陽紡織廠）作爲工作重點。這是一個有三千多工人的大廠。工人受到廠方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勞動時間達十二小時，而工資每日只有幾角錢；工頭又隨便打罵工人，廠衛隊也對工人進行嚴密的監管，工人吃、住都在工廠內，不能自由出入工廠。工人群衆中積聚着強烈的不滿情緒。

當時，劉少奇派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孟堅（即孟用潛）和省委組織幹事楊一辰負責聯繫奉天紗廠地下黨組織的工作。

由於劉少奇此次被捕事關一樁「共和國最大冤案」，現將有關詳情轉錄如下：

八月中旬的一天，孟堅、楊一辰和全總代表張昆弟去奉天紗廠，與黨支部書記常寶玉和工人黨員崔風翥、老范等秘密開會，研究發動工人開展「要現洋（銀元），不要奉票」的鬥爭問題。他們研究後提出：工人們不能等着餓死，如果廠方不答應，就在八月二十七日開支的那天舉行罷工。

孟堅向劉少奇匯報了商定的鬥爭方案。孟堅後來在回憶中說：

「一提到罷工，少奇同志一連向我提出了好多個問題，如廠裏情況怎麼樣？工人情緒如何？罷工的條件是甚麼？發動罷工的方法、步驟是甚麼？……少奇同志問得非常詳細，對罷工時可能出現的各種大小問題他都問到了。對少奇同志提出的問題，有的我說不清楚，有的連想也沒想到過。少奇同志細心地聽完我的回答，在屋裏來回踱着步，沉思了很長時間，最後，和藹地問我：『你過去搞過罷工沒有？』我回答說：『沒有。』他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說：『那麼好吧，下一次紗廠支部開會，我同你一道去參加。』我一聽，高興得連連點點頭說：『太好了，太好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天氣悶熱。下午六時許，孟堅陪同劉少奇按約定的時間來到奉天紗廠門外。這時，離工人下班時間還差一刻鐘左右，他們就呆在附近的小樹林裏，等候常寶玉出來接頭談話。

不一會兒，「嗚——嗚——嗚」地響過了汽笛聲，可是工廠大門仍然緊閉着，不見一個工人

出來，只有幾個廠警在廠門外轉來轉去。劉少奇感到奇怪，警惕地問孟堅：「平時也是這樣嗎？」孟堅搖搖頭，說：「不是這樣。」約摸過了一刻鐘，劉少奇迅速站起來，果斷地說：「可能出了甚麼事，我們不能等了。」當他們正要走開時，廠門突然打開，一隊廠警自內沖出，朝他們停留的地方跑步奔來。劉少奇沉着地說了一聲：「分頭走開！」但躲避已經來不及了。「抓住他！」廠警邊跑邊喊。劉少奇和孟堅就這樣被捕了。

他們被押進工廠，關在警衛班。這時，孟堅發現，常寶玉已被關在這裏。原來，由於崔鳳翥向廠方密告工人醞釀罷工，常寶玉於前兩天在廠內召集群衆會時就被當場拘押了。

晚飯後，劉少奇等被押到廠衛隊隊部，廠方開始了對他們的審訊。主審是廠方工人管理員孔令鐸。他先把常寶玉叫上來，然後審問孟堅。接着，孔令鐸審問劉少奇，問：「你叫甚麼名字？」「我叫成秉真。」劉少奇操着濃重的湖南口音，不慌不忙地回答。成秉真確有其人，是劉少奇的表哥，劉少奇對他的經歷很熟悉，所以審問時應對自如。這是劉少奇早已想好的應變對策。

「你是從哪裏來的？」主審官追問道。劉少奇說：「我是從武漢來的。因爲在武漢生活不下去，聽說奉天日子好過，就投奔這裏來找一個同事，想請他幫忙介紹個工作。可是剛到奉天，人生地不熟，同事還沒有找到，連個住的地方也沒有，正上愁呢！」孔令鐸繼續問劉少奇關於鬧工潮的事。劉少奇若無其事地答道：「我根本不曉得。」問認識不認識常寶玉，劉少奇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敵人押上常寶玉來跟劉少奇當面對質。常寶玉看了半天後說：「不認識這個人。」因爲劉少奇剛到奉天不久，在被捕之前常寶玉還沒有見過他的面。在審訊中，任

憑敵人怎樣折騰，劉少奇始終守口如瓶，堅不吐實。

第二天，廠警把劉少奇等押送到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關在臨時看守所。三分局根據奉天紗廠指控劉少奇等煽動工潮的公文，又對他們進行了審訊。劉少奇在審訊中申辯說，我是因爲失業沒有出路才來到奉天的，沒想到在奉天大白天就無辜被人抓來，真不知道這是哪家的王法。警官邊審問邊看廠方的審訊記録，先後口供完全一樣。審訊毫無結果。

隔了一天，劉少奇和孟堅、常寶玉一同被解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看守所。劉少奇被關入一間牢房，孟堅和常寶玉擠在對面的一間牢房中。有一天放風的時候，劉少奇湊到孟堅身邊，悄悄地說：「既然把我們解到地方法院，看來案情並不十分重要，關鍵問題是那個工人（指常寶玉）。你要向那個工人做工作，說明大家都是爲了做好事。如今奉天紗廠把我們送進監獄，但他們只有人證，沒有物證。如果他能翻供，否認有人組織工潮，我們的案子就會比較容易解決。」孟堅經過耐心的工作，終於說服了常寶玉。他表示同意在過堂時，全部否認在紗廠審訊時的口供。

一個多星期後，法庭開庭審訊。法官審問孟堅之後，問劉少奇：「你同奉天紗廠的工潮案有關，你爲甚麼要煽動工潮？」劉少奇還是十分沉着地回答法官提出問題：「我是個外地來找工作的人，甚麼煽動工潮，我根本不曉得。」法官問：「那怎麼把你抓來了？」劉少奇一聽這話，知道敵人沒有抓到甚麼把柄，便作出冤枉的樣子說：「那天，我路過紗廠門口，見吵吵嚷嚷的很熱鬧，就去看了看，誰知正趕上紗廠衛隊抓人，就把我抓來了。我也莫名其妙！」最後被審問的是常寶玉。他說：「先前的口供是他們動刑逼我說的。我不那樣說，他們就打我，我

只好照着他們的要求，讓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常寶玉全部否認了在紗廠審訊時招認的口供，並表示根本不認識劉少奇和孟堅。

沒過幾天，奉天高等法院對劉少奇、孟堅作出判決：「煽動工潮，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

在此之前，劉少奇被捕的情況及經過，已由滿洲省委於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三十一日先後向中共中央做報告。九月一日，中央指示滿洲省委「須用全力去營救」。奉天高等法院做出取保釋放的判決後，經過省委多方努力，劉少奇於九月中旬跨出了監獄的大門，繼續領導滿洲省委工作。

三十年後，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的所謂《審查報告》中，僞造事實，把「叛徒」的帽子強加在劉少奇頭上。報告說劉少奇在奉天紗廠被捕後，「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省委領導成員和所屬黨組織，並且向統治階級「積極出謀獻策」，因而被釋放。他們還進一步誣陷說，由於劉少奇提供了情報，致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事實上，劉少奇的被捕，並未使黨組織遭到破壞和牽連其他同志被捕被殺。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滿洲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少、孟（即劉少奇、孟堅——引者注）被捕事在工作上雖然有很大的打擊，但在同志傾向方面，沒有多大的影響。」當時在滿洲省委組織部工作的楊一辰寫材料證明說：「劉少奇被捕後，省委機關沒遭到破壞。省委機關一直還在原來的地方。」當時任滿洲團委組織部長的王鶴壽也寫材料證明：「劉少奇同志與孟用潛（孟堅）同志

被捕後，他們兩人知道的黨省委與團省委的機關地址及他們知道的一些同志的住址，多數並未遷移，……沒有一處遭到破壞，沒有任何一位同志受到牽連而被捕。」⑪

事實說明，文化大革命中硬按的劉少奇被捕後投敵叛變的問題，純粹是毛澤東與江青一伙爲置劉少奇於死地而揑造的。

---

①：見朱元石《偉人之初・劉少奇》

②：劉少奇在莫斯科蘇中友好群衆大會上的講話，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③：見《蕭勁光回憶錄》，第二八—二九頁。

④⑤⑦⑧⑨⑩⑪：轉引自陳紹疇《劉少奇在白區》。

⑥：見《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二八九—二九〇頁。

第三章 毛劉：同是王明路線受害人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中共黨內連續出現了三次「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它們是：

由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瞿秋白「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由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由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其中，以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黨內統治的時間最長，達四年之久，因而危害也最大。中共在紅區（即革命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區（即國民黨統治地區）損失達百分之百。

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與之進行鬥爭因而受到打擊和迫害的，在紅區是以毛澤東爲代表，在白區則以劉少奇爲代表。

毛澤東是個十分看重路線、派系的人。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結束王明路線在中共的統治以後，毛澤東重返中共權力核心。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清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毛澤東、劉少奇便成了紅區與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聯盟，便是在這個政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一、王明上台　毛澤東受打擊撤職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召開的。會議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和米夫擬定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的名單。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掌握了中共的領導權。這次會議在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的綱領下，接受了王明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王明在會議上所作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發言中指出：立三路線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斷言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中貧農反帝反封反資本主義的、帶有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民主革命；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白區工作上，要最大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鬥爭，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防禦和合法鬥爭的可能。王明的觀點成爲了中共的行動的根本方針。會議打着反「調和路線」的旗號，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實現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在組織上「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奪權企圖，排斥了何孟雄等一批中共的優秀幹部，並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王明上台後，爲了在蘇區（即革命根據地）貫徹執行六屆四中全會路線，中共中央派出了「六屆四中全會代表團」，由於該團成員有三人，即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所以又稱之爲「三人團」。「三

人團」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於四月十七日入駐當時中共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部所在地江西省寧都縣青塘墟。

任弼時是湖南省淮陰人，一九〇四年生，是劉少奇留蘇時在東方大學的同學。劉少奇提前於一九二二年回國，任弼時卻在一九二四年秋天在東方大學畢業後才回國，先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部長，一九二七年春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五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爲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達中央蘇區後，被任命爲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由於任弼時是留蘇出身，因此獲得米夫和王明的信任，被視爲王明路線的代表而被派到中央蘇區來。

當時中央蘇區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即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是項英。雖然項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也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他是作爲貫徹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的代表來到中央蘇區的。而王明和六屆四中全會是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因此項英便首當其沖，成爲第一個受排斥的對象。「三人團」到達中央蘇區不久於一九三一年五月改組蘇區中央局，撤去了項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將這兩個頭銜都送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自從一九二二年擔任中共湘區委書記以來，在中共黨內起伏浮沉，大起大落。他從事過黨務、工運、農運、宣傳等方面的工作，但在每一種崗位上都不能深入地堅持下去，淺嚐即止，沒有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他文不如惲代英、肖楚女、蔡和森等人，武不如周恩來、劉伯承和朱德——毛澤東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後，毛澤東被中共臨時中央任命爲特派員，被派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由

於他執行了攻打長沙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又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因此秋收起義慘敗。為了躲避國民黨兵的追擊，毛澤東不得不率領殘兵敗卒上井岡山。由於兵力薄弱，又不諳軍事指揮，更因為思想上的保守右傾，在井崗山的半年中，毛澤東沒有甚麼作為。是朱德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上井崗山，組成「朱毛紅軍」（即紅四軍）帶來了新的活力，使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得到發展。又是由於朱德的堅持與鬥爭，才迫使毛澤東放棄固守狹小的井崗山，來到廣闊的贛南、閩西，從而創建了舉世矚目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三人團」來到之前，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是中央蘇區紅軍的最高領導人。現在，「三人團」任命毛澤東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使毛澤東成為中央蘇區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中央蘇區黨組織問題的決議》，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朱德組成蘇區中央局，毛澤東為代理書記。這個決議說明王明一伙至此對毛澤東還是信任的，重用的。其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在一九二九年剛由井崗山來到江西，為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所迷惑，曾提出「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口號。這個口號與王明提出的「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同出一脈，只不過王明要爭取的不僅是一省，而是「數省」，比毛澤東更「左」而已。毛澤東的「左」傾口號受到王明的賞識，被認為是「自己人」，因此受到王明一伙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好景不長。上述的決議發出還不到一個月，於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存在嚴重的錯誤，還在執行立三主義的調和路線，是

「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及「富農路線」。指出：「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衆工作，例如你們容許地主殘餘租借土地耕種，對於富農只是抽肥補瘦，抽多補少，而不實行變換富農肥田給他壞田種的辦法」。「紅軍直到現在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的傳統與小團體的觀念，這在紅軍已在進行大規模戰爭與擔負着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是不相稱的。」

這明顯地是在批評毛澤東。在短短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看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根本變化。

根據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的來信，中央「三人團」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指責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實行的土地革命路線是「富農路線」，犯了「向地主豪紳及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是「狹隘的經驗論」，不去建立眞正的工農紅軍，紅軍還「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要求「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大會還改選了蘇區中央局，撤銷了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改選項英爲代理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

這是王明路線對毛澤東排斥打擊的開始。

毛澤東雖然被撤銷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但他仍是總前委書記，仍是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人。然而在粉碎國民黨發動的第四次圍剿的方略等問題上，毛澤東與中央「三人團」又發生嚴重的沖突。

一九三二年初，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發布《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

軍「佔領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為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這一指示，中央「三人團」命令紅一方面軍攻打贛州，準備將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遷到這裏，以實現中央的決議。「三人團」還主張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贛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澤東在會上反對「三人團」的這些主張，指出攻打城牆堅固、地勢又不利的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贛東北方向發展。但蘇區中央局否決了毛澤東的決議，決定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攻打贛州，而毛澤東則到東華山上養病。

贛州，是曆代兵家必爭之地。它三面環水，城高牆固，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原來估計贛州守敵只有八千人，可實際上城內守敵總共一萬八千人，超過原來預計的一倍以上。而擔任攻城的紅三軍團卻只有一萬四千人。敵軍以優勢兵力據險防禦，紅軍不僅在數量上是劣勢，裝備技術又比較差，自然就難以取勝了。

二月三日，紅軍拉開了攻打贛州的序幕。在彭德懷的指揮下，以紅三軍團為主力的攻城部隊，從會昌、安遠、信豐等地直逼贛州城郊。

二月四日，紅軍部隊占領了贛州城東門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門外的白雲山制高點，並在城外構築工事，挖掘坑道，建立火力據點，兵臨贛州城下。

二月十三日戰鬥打響，紅軍第一次攻城。開始，架雲梯上不去；接著，用棺材裝上炸藥引爆，炸塌東門月城的城門洞後，紅軍一擁而進，卻被敵人密集火力阻擊，未能攻入城內。

二月十七日，紅軍第二次攻城。當南門月城施行爆破後，不料城牆向外倒塌，埋伏在城牆下的紅二師二百多名突擊隊員全部犧牲了！待重新組織力量時已失去戰機，攻城未能奏效。

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第三次攻城。爆破後紅軍一度攻占東門城樓，這時適逢敵旅長馬崑巡邏至此，親自死力督戰，組織反撲。紅軍與敵激戰四小時，終因彈藥補給不上而撤退。

三月一日，中革軍委將總部移駐贛州城郊，直接指揮紅軍攻城。並發出火線《告紅軍戰士書》，指令「下最大決心，進行持久戰爭，拿下贛州！」

於是，三月四日，紅軍發起第四次攻城。這次，東門、西門、南門同時組織爆破。但西門、南門因坑道積水，無法引爆。紅軍即在東門城下坑道內安裝了三個大型棺炸藥，引爆後炸開東門城牆二十多米，壓死敵軍二百餘名。紅軍趁着硝烟彌漫，向城內發起猛烈衝鋒。但由於攻城前有兩個叛徒進城向馬崑告密，敵人獲得情報後，一天之內構築了新的防禦工事。當紅軍攻入城內時，敵人憑借新的防禦工事，組織強大火力網負隅頑抗。雙方激戰近四個小時，紅軍強攻不克，不得不撤出戰鬥。

這時，紅軍屯兵城下一月有餘，四次攻城，均未奏效，而敵大批援軍已至。形成對紅軍內外夾攻的勢態。在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中革軍委始下決心，於三月七日撤圍贛州，退至贛縣江口一帶休整集結。

至此，紅軍歷時一個月零三天的攻贛戰役以失敗告終。

三月初的一個清晨，一匹快馬冒着濛濛細雨，向着東華山急匆匆奔馳而來。來人正是項英。與毛澤東握手寒暄後，項英氣喘吁吁地將一封電文交給毛澤東。電文寫道：「我軍攻贛至今，苦戰一月不勝，三軍團反被敵人援軍包圍。請潤之暫停休養，赴前線決策。」

正是「軍情急如火」。毛澤東當即中止休假下山。

毛澤東在江口與周恩來（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

記）、朱德、彭德懷等人會合後，率領紅一、五軍團入閩東征，一舉打下名城漳州，籌資百萬，戰果輝煌，影響巨大，還繳獲了兩架飛機。一時間毛澤東威震閩南，名揚中國。

這時在上海臨時中央坐鎮的是博古。原來王明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行聲等六人組成，指定博古負總責。

博古這時只有二十五歲。這位相貌俊秀、身材修長，戴着一副黑邊眼鏡，溫文爾雅的青年，原名叫秦邦憲，江蘇無錫人，一九二五年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三〇年五月回國，先後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書記，一九三一年九月王明離去前獲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總責」。

博古與毛澤東素未謀面，更談不上了解。然而在王明的影響下，對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卻久有所聞。年輕氣盛的博古，上台伊始便要大幹一場，「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便是他的傑作。博古的「主動出擊」、「進攻路線」受到毛澤東的「透敵深入」的策略的干擾，要貫徹執行王明路線，就要搬開這塊絆腳石。

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鄧穎超在上海裝束停當，準備啓程前往江西瑞金與周恩來會合，臨走前到中共臨時中央辦事處，向博古告辭。博古神情嚴肅地對鄧穎超說：

「你到蘇區後，請轉告伍豪（即周恩來）同志，要抓緊開展反『右』傾鬥爭，同時一定要設法讓毛澤東多管政府的事，少讓他過問軍隊的行動。這兩點都是中央的意見。」①

鄧穎超經秘密交通線到達閩西蘇區，於五月一日在長汀見到周恩來，向他轉告了博古的意見。

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張聞天在第三十七期和第三十八期合刊的《紅旗周報》上，發表一篇題爲《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文，指責毛澤東犯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的錯誤，「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地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作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淸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

五月二十日，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領導召開的蘇區黨大會（即「贛南會議」）提出批評，說黨大會「對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及進攻的路線，缺乏明確的肯定的指出」；批評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錯誤糾正不力。

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批評不得不提高調子。

五月三十日，周恩來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實話》中發表題爲《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的文章，嚴厲批評去年十一月初蘇區黨大會前後犯了「最大的右傾錯誤」。說「在去年三次戰爭中所認爲最好的戰略戰術（如誘敵深入），在今年積極向外發展到白區去出擊敵人時便不能完全適用了」。

六月二十七日，周恩來主持通過了《蘇區中央局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蘇區黨大會前後工作的檢閱及中央蘇區黨的目前中心任務》的決議。這個決議進一步認爲毛澤東領導召開的蘇區黨大會，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②

這時，第四次反圍剿已經開始。儘管有了以上的批評，但周恩來仍希望毛澤東繼續擔任紅軍總政委，留在前線協助指揮作戰。於是與朱德（時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王稼祥（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

部主任）及毛澤東聯名給留在瑞金的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和任弼時等人發了一份電報：

「我們認爲，爲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爲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③

「中央局代表」即是周恩來。經周恩來的反複解釋，任、項等人同意了上述提議。八月八日，中革軍委發出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工作的通令》。

毛澤東是個獨裁擅權的人，在掌握權力上是「要麼不幹，要麼完全按照我的意見辦」，其間甚少折衷妥協與委屈求全。上任後的毛澤東所堅持的「誘敵深入、待機而戰」的方針，再次與上海的臨時中央發生矛盾沖突。任弼時、項英等人根據上海中央的意見，指示紅軍要「出擊」、「進攻」。在戰略策略方面，前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矛盾分歧。爲了消除這些分歧，蘇區中央局便決定在寧都小源村召開全體會議。「全體」，即是全體中央局成員，他們是：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共八人。前、後方的陣壘分明，四比四，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列席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首先由周恩來總結二月攻贛以來中央局八個月的工作。周恩來說：

攻打贛州和發起南雄、宜樂戰役，依據當時情況都是絶對需要的。贛州本來是可以攻克

的，惟因對敵必堅守中心城市的估計不足，所以沒有堅決佈置，解決增援敵人，輕敵麻痹，攻城部隊在技術上也有缺點，所以久攻不克。東路軍入閩，原爲「臨時任務」，後來改爲發起漳州戰役，雖然獲得了重大的勝利，有很大的政治影響，但來往費時兩個多月，延緩了北上攻打撫州、南昌任務的實現。南雄水口戰役中，對敵迅速增援估計不足；特別是戰鬥結束後，部隊分散在信丰、三南籌款，發動群衆，這個錯誤是嚴重的。④

這是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

毛澤東自然不會「妥協」，他據理力爭，說：事實上，過去七個月的軍事行動，從總的戰略方向上來說，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的這一番話，使與會者一片嘩然，從而招來了任弼時等人的更多責難。

會議的高潮在於決定毛澤東的去留。周恩來提出兩個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無論是那種方案，主旨都是要毛澤東留在前線，這是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一片至誠善意。如果會議就周恩來提出的兩種方案表決，無論通過那種方案，毛澤東都可以留在前線。

然而慣於專權而又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毛澤東，不但沒有很好地配合周恩來的提議，反而意氣用事，說了一番負氣的話：

「要說的意見，在會上我都說了。有些事，現在也說不清楚，還是那句話：將來讓事實來

證明，讓歷史作結論吧！至於指揮戰爭，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對恩來同志提出的後一種辦法，我也不能同意！」毛澤東還掀了掀身上穿的毛衣說：「我近來身體不好，需要休息。既然我留在前方會給各位帶來不便，那我還是請病假到後方治病去吧！」

毛澤東的話說得這麼絕，已經沒有絲毫迴旋的餘地，周恩來只好主持表決，通過了由他提出的第一個方案，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⑤

當寧都會議正在舉行時，臨時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開會，討論中央蘇區的問題。會上，張聞天提出調毛澤東回後方做政府工作。這個決定很快地通知了瑞金。毛澤東於是被撤去紅軍總政委一職，改由周恩來擔任。

寧都會議使毛澤東再一次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這對於中共的革命事業來說，無疑地是個巨大損失，其後果也是嚴重的。中共黨史在提到這段歷史時，都將寧都會議視爲王明「左」傾路線對毛澤東的打擊和排斥。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仔細檢討之下，也不難發現，毛澤東那慣於專權的性格和意氣用事的作法，是使事情進一步惡化的因素。周恩來在會上的兩種方案的提議，是對抗王明路線的一種策略，其用心之良苦，毛澤東不會不了解。如果換了別人，以革命大局爲重，在當時的情況下，便肯定不會再說些有礙於實現周恩來策略的話語。但毛澤東卻不是這樣。由於他那種只能領導指揮別人，而不能接受別人的領導指揮，「要麼讓我說了算，要麼我不幹」的思想作風，使得他在政治鬥爭中不夠冷靜沉着，不能夠從革命大局着想，而過多地從自己的感受、個人的得失出發，缺乏理智，意氣用事。毛澤東所說的「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對恩來同志提出的後一種辦法，我也不能同意！」

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上述個性與思想。

毛澤東採取這種方式的抗爭，是不是以革命大局爲重以及是否一個革命家之所爲，頗有商榷之地。對革命事業從個人得失出發，採取意氣用事，在毛澤東已不是第一次。一九二九年，毛澤東與朱德、陳毅等人在黨的領導，紅四軍的政治、軍事方針等問題上發生尖銳的矛盾與鬥爭。那時候，毛澤東在黨內也是處於少數地位。在五月召開的湖雷前委會議上，當討論要不要成立軍委時，毛澤東的「意氣用事」便出現了，他說：

要成立軍委是與前委分權，前委、軍委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領導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前委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⑥

陳毅勸毛澤東不要辭職，但毛澤東執意不聽。陳毅只好代理前委書記。在隨後的中共紅四軍「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前委書記選舉中落選。儘管他還擔任紅四軍政委和前委委員的職務，但他再次提出離開紅四軍，赴蘇聯留學或去養病。由於赴蘇留學需時安排，紅四軍便批准毛澤東離隊去休養。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黨員以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分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最高宗旨，從沒有挑肥揀瘦、自動辭職的。像毛澤東這種合己意就幹，不合就辭職的黨員，實屬絕無僅有。毛澤東自幼養成執拗、反逆的個性，在家裏反逆父親，在學校反逆老師，參加革命後，則反逆上級，反逆中央。對上面的指示、命令，往往採取「取其所需」的態度，對己有利者就執行，對己不利者則不執行；合己意者

就執行，不合者就不執行。爲此毛澤東與朱德、陳毅之間，與地方省委及中共中央之間，均發生過不少的爭執。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名組織性、紀律性很強的模範黨員。毛澤東主政中共後，這種作風便逐步發展爲專橫獨斷，到五十年代更發展爲獨裁、無法無天，給中國和中國人民製造了無數的劫難。

毛澤東離開紅軍後不久，一九三三年年初，中共臨時中央機構由上海遷至江西瑞金。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爲止，毛澤東都沒有能夠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

二、劉少奇被批判撤職

與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沒有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且也在缺席情況下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劉少奇被任命爲中央職工部部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由於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劉少奇至一九三一年秋天才回到上海就職。當時，以博古爲總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過分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不承認革命處於低潮的事實，強調城市工人鬥爭「已經帶有很濃厚的進攻性與政治性」，要求白區「盡量用全力來準備各個企業的總罷工」。

劉少奇上任後，很快就發現工會工作中存在着明顯的「左」傾冒險主義，深知它的危害性極大。根據自己長期從事實際鬥爭的經驗，十月五日，劉少奇給臨時中央寫了題爲《關於工運的意見》的信。

劉少奇在這封信中着重分析了當時工人鬥爭的形勢。他認爲，隨着經濟危機在全國的深入，工人階

級的鬥爭在各地不斷爆發，但總的來說，低潮的形勢並沒有改變，工人鬥爭還屬於防禦的性質。這主要表現在：

中外資本家和國民黨反動派聯合一致向工人階級繼續進攻的情況很嚴重。他們借口「國難」來降低工資，延長工時，加重工人的工作負荷，開除和裁減工人，欠發工資，關廠停業。同時，他們採用禁止罷工，解散和改組工會，強迫調解與仲裁，完全剝奪工人集會、結社的自由，逮捕工人領袖，開除工人活躍分子，廠警搜查和武裝鎮壓等方式破壞工人運動。

工人鬥爭次數減少，規模縮小，多是反對資本家減少工資、增加工時、取消待遇、解僱工人和反對國民黨當局封閉工會的防禦性鬥爭。這些鬥爭大部分都是自發的，散漫的，缺乏組織性，沒有工人階級自己的工會來作領導，以致許多鬥爭都在國民黨黃色工會的武力壓迫和欺騙手段之下被控制起來。還有一些經濟鬥爭是完全在黃色工會領導下進行的。

工人鬥爭大多數是失敗的或無結果的，取得完全勝利的只佔少數。

革命工會數量大幅度減少，工人組織程度較低。據一九三〇年六月統計，白區赤色工會會員有四九八二一人，到一九三一年底，會員僅有一一四八人。在全國估計有三百萬產業工人，其中與中共領導的工會組織有聯繫的大約有三千人。⑦

根據以上事實，劉少奇指出，那種認為中國工人鬥爭「絕不是防禦的，而是反攻的與進攻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但是臨時中央很快否定了劉少奇的意見，並且對他作了一個「總的批評」，認爲他「站在工會系統上，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並派盧福坦兩次同他談話，要他對是否接受中央批評的問題即表示態度。劉少奇「恐言語的傳達或有出入」，遂於十月十日再次給中央寫了《關於工運問題》的信，重申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回來後，的確是提出了許多工作上政治上的意見，這完全是站在積極參加黨的工作的觀點上提出來的；這些意見是否正確被採納，都在黨的組織；但中央對我的這些意見，並沒有個別地具體地指出有何錯誤，錯誤在甚麼地方？要如何才是不錯誤？就對我下了一個總的批評，要我接受，這就使我不能明了我的錯誤之所在；黨組織批評同志，目的是使同志了解錯誤，糾正錯誤；現在中央並沒有個別指出我的錯誤之所在，我就不能明了我這些意見的錯誤，我就無法糾正錯誤，無法接受中央的批評。最後，他請求中央再派人同他談話，具體地指出他的錯誤之所在。

但是，當時的「左」傾領導人卻把劉少奇的主張斥之爲「十足的機會主義」，對他進行了批判鬥爭。

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的《兩條路線》的小册子改名爲《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在莫斯科加以補充後再版。他在「再版書後」的後記中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爲「羅章龍路線的殘餘」，說在白區工作中出現了「以一部分工會工作同志爲代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右傾」。

一九三二年二月開始，臨時中央多次開會批評劉少奇的「右傾」錯誤。三月十四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工會工作問題。會議列舉了劉少奇的所謂八大「錯誤」：對形勢估計不足；在經濟恐慌中不能組織工廠的罷工取得勝利；拒絕參加反帝運動；對黃色工會投降；有合法傾向；充滿工團主義

的領導等。會議認爲劉少奇的「錯誤是一貫的」，「不能再繼續領導工作」，決定撤銷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

三月二十五日，臨時中央發表《中央爲職工運動致同志的一封信》，指責「全總黨團與中央職工部的領導」已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從對於目前革命情緒悲觀失望的估計出發，走到對於赤色工會的取消主義，走到向黃色工會領袖的屈服與投降」，「一直走到純粹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因此，臨時中央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這種「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

在這之後，臨時中央認爲「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還是非常的不充分」，於是又在黨的刊物上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公開批判劉少奇。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就再次批評劉少奇「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不久，劉少奇被調離中央職工部和全總，降職到上海市工會聯合會任黨團書記。

---

①②③：引自舒龍、凌步機《歲歲重陽》，第二五七——二五九頁。

④⑤：同上，二六四、二六九——二七〇頁。

⑥：同上，第十——十一頁；

⑦：見陳紹疇《劉少奇在白區》八八——九〇，一〇一——一〇二頁；

第四章　毛劉成爲紅、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一、毛澤東：紅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毛澤東的厄運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五年。

由於博古一伙實行王明「左」傾路線，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在國民黨一百萬大軍的圍攻之下，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江西蘇區，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實行戰略大轉移，那就是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途上，博古、李德仍然執行錯誤的軍事指揮，在國民黨的圍堵、追擊下，紅軍損失慘重。過了湘江之後，紅軍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減至三萬多人。而且傷病纍纍，士氣低落。蔣介石揚言要叫紅軍做第二個石達開。

毛澤東由於患病，是躺在擔架上隨隊長征的。王稼祥則由於腹部受傷，也躺在擔架上。局勢的嚴重，引起他們的極大的憂慮。在行軍途中，毛澤東與王稼祥交換想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之後，毛澤東又秘密串聯張聞天，也取得了他的支持。毛澤東決定找機會結束博古、李德的領導。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打下貴州的遵義。在休整期間，中共中央舉行會議。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先後發言，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提出了全面的批評與清算。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由張聞天、周

恩來、毛澤東出任最高三人領導，張聞天負總責。自此，毛澤東恢復了在中共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就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遵義會議。

張聞天是「開明君主」，周恩來又不是擔綱的帥才，中共的大權實際落在毛澤東的手裏，大小政令多徵求毛澤東的意見後才能定奪。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率領紅軍四渡赤水，搶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擺脫了國民黨重重追擊，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

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的過人之處，其中的一點是他懂得必須從根基上徹底摧毀對手，並且做起來絕不手軟，堅韌頑強。在陝北站穩腳跟後，毛澤東便開始清算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後來更進而清算自建黨以來的歷次路線的錯誤，包括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也就是說，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歷屆的領導人，都不是正確的，不是犯了「右」傾（陳獨秀）就是犯了「左」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唯有遵義會議後確立的現領導，也就是毛澤東，才是正確的。

爲了證明這一思想，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工作，發表了許多的文章、講話，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高度，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尤其是王明路線，進行深刻的批判，指出了它們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時總結中國革命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闡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見和理論。「毛澤東思想」便是由此發端的。

毛澤東自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後，便領導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因此，他主要是從紅色根據地，革命戰爭等方面來總結經驗，批判機會主義路線在這些方面的錯誤，並論述了自己在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軍隊建設、黨的領導、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等方面的理論。

毛澤東提倡的這股總結歷史經驗的風氣，一時間在中共黨內形成了主流。其結果，一方面是徹底摧

毀了王明、博古等黨內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則樹立起了自己的威望。可謂一箭雙鵰。時至四十年代，不但王明、博古等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俯首貼耳，連與王明路線曾經沾邊的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周恩來等人，也被毛澤東批評得服服貼貼。

在這麼多的錯誤的失敗者的襯托下，毛澤東就顯得更加高大了。於是，毛澤東便自然而然地成爲紅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二、劉少奇出掌北方局與「六十一人自首出獄」事件

劉少奇在被撤銷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後，於一九三二年冬奉派到中央蘇區，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這時候毛澤東已被投閒置散，不是養病便是到農村查田、做調查研究。毛、劉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對毛澤東領導的查田運動，劉少奇曾發表了不少好的意見，予以支持。

劉少奇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先後擔任紅八軍團、紅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籌糧委員會主任等職。也參加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全力支持毛澤東反對王明路線的鬥爭。對此，毛澤東曾回憶說：「在遵義會議上，他（指劉少奇）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是很寶

貴的」。

紅軍到達陝北後，如何清除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白區工作上的影響，盡快恢復中共在白區的組織活動，成爲當務之急。毛澤東將這項重要的任務委託給劉少奇，任命他爲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名城天津還是春寒料峭。在天津日租界的興安路，有一家門面氣派的大飯店，叫北洋飯店。一天上午，一位知識分子模樣的客人，手中拿着一張捲着的報紙，在飯店一個高級包間的房門上輕輕敲了幾下。開門迎客的是一位身材高瘦，穿着綢袍的富商和他的妻子。兩人經過一番暗語問答，那位富商把客人讓進了房間。這位富商，就是剛到天津的劉少奇，化名爲胡服。來客是中共河北省委秘書長王林。劉少奇順利地與天津市的中共地下組織接上頭，隨即聽取王林的工作匯報。而跟在劉少奇身邊的那位女人，名叫謝飛，原在江西蘇維埃政府國家保衛局工作，參加過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後與劉少奇結婚。

此後，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林楓，中共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以及柯慶施、李大章等，也先後與劉少奇見面。不久，劉少奇由北洋飯店遷往黑龍江路隆泰里十九號，那是一家叫「惠興德成衣鋪」，劉少奇便租住在樓上。一年後劉少奇遷居北京。劉少奇不負重托，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北方局的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信河北省委說：我們認爲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後，有了基本上的轉變。主要的表現在：政治領導的加強，糾正了過去河北黨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努力擴大抗日戰線，不僅企圖建立華北各界救國聯合而且能顧及全國，在學生、軍隊、農民等群衆中，均有較好成績。……這些轉變，是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開展着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①

劉少奇在北方局做的一件大事，是營救六十一名中共黨員幹部出獄。

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中共在白區的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一大批從事工人運動、地下工作的黨員，被國民黨逮捕入獄。隨着華北抗日鬥爭形勢的日益發展，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來組織和領導華北地區的鬥爭。見於當時幹部缺乏，人手不足，劉少奇曾說：「一切工作，一切轉變，都依靠我們的幹部，因此幹部問題是黨內的中心問題」。

當時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的共產黨人有六十多人。他們是中共順直省委書記殷鑒和安子文、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周仲英、周啓敦、劉亞雄、胡錫奎、劉錫五、孔祥禎、張友清等。

一九三六年四月，北方局提議，要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共產黨員履行國民黨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將這個提議報告中共共央，並得到批准。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夫人劉英在回憶這件事的處理經過時說：

「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報告，說有一批幹部（六十一人）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只要履行一個不反共的普遍手續就可以釋放。當時華北抗日形勢迅速展開，急需幹部，而獄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領導同志簽字的文件，才願出獄。少奇同志請中央立即決定。事情來得很急（因爲如果日本人侵佔平津後就不能辦了），又是如此重大，聞天當即與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商量，決定予以批准。」②

劉英說的「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

下面是有關此事詳細經過的記述：

一九三六年六月，劉少奇將中共中央批准的要這批同志履行手續出獄的決定交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去貫徹實施。柯慶施找到徐冰，要他把這個決定的精神傳達給獄中黨支部。

柯慶施對徐冰說：「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關押着我們一批黨員同志，他們是一批經過考驗、政治上堅定、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幹部，現在急需讓他們出來爲黨工作。」

徐冰說：「我對獄中的黨員一個也不認識，聯繫有困難。」

柯慶施想了想，說：「在你那裏工作的，有個孔祥禎，他在那裏坐過牢，同他們熟悉，可以叫他寫信到獄中去。」接着柯慶施鄭重地對徐冰說：「這是中央指示叫這樣辦的。」。

那時候，徐冰以北平中國大學教授的公開職業爲掩護，專門從事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孔祥禎在徐冰的單線領導下從事地下活動，每半個月到他家接一次頭。

孔祥禎是一九三〇年從蘇聯回國的同志。回國後，先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後任中共唐山市委軍委書記。一九三一年，他到河北省委軍委匯報工作時不幸被捕，被關入草嵐子監獄。入獄後，曾任秘密黨務書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因病保外就醫。其間，經組織安排，由地下黨員、北平榆林會館館長出面作保獲釋出獄。孔祥禎出獄後，以家庭教師身份爲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孔祥消到北平東城徐冰家接頭，接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孔祥禎後來（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回憶他接受任務的經過時說：

「那是七月裏的一天，氣候燥熱，陽光灼人，孔祥禎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爺』，他一見就曳着孔祥禎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進內屋。

「徐冰突如其來地說：『現在抗日形勢甚好，黨需要一批幹部，但是幹部很少，沒有辦法。聽說你過去呆過的草嵐子監獄裏還有幾十個黨員，你有沒有辦法讓他們出來？』

「孔祥禎聽後先是震驚，後感到毫無可能，回答說：『這怎麼行呢？刑期不滿，敵人怎麼能放他們出來呢？何況刑期滿了，不登《反共啟事》，照樣出不來呀！除了一條，登《反共啟事》，聲明從此不再做政治活動，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裏有數地笑笑，對孔講：「我已經接到上級指示，說中央有決定，可以讓他們用自首方式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來，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對他們的這個指示送去呢？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無論如何要想辦法完成。』

「孔祥禎說：『雖然我在獄中任過支部書記，對他們熟悉，但已幾年和他們沒有聯繫了，他們怎麼會相信我呢？我知道這些同志在獄中立場是堅定的，你說用自首登報方式出來，他們能幹嗎？再說，這對他們是個極其嚴重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上級確實負責才行。』

「徐冰馬上接上說：『這的確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麼敢跟你說呢！你要知道，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會在政治上負責的。』

「孔祥禎的疑慮，在徐冰的解釋下，漸漸地消去了。他說：『既然像你說的這麼絕對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過，我和他們長期沒有聯繫，又怎麼能把信送去呢？同時，獄內的黨組織有無變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內踱了幾步，仔細考慮了一下，說：『你先去想想辦法再說吧。』」③

孔祥禎接受任務後，連日苦思苦想，尋找聯繫線索。說來湊巧，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見也是因病保釋出獄的魏文伯（當時名叫萬曲非），就便問道：「我有一些東西想送到獄中，不知你有認識的人沒有？」魏回答說：「我有個族姪，叫魏茂林，化名叫王伯平，他和獄中看守人員有關係，可以幫忙。」孔忙問：「他可靠嗎？能不能往裏邊送信呢？」魏說：「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幫助送書報、送信。」

孔祥禎馬上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徐冰，徐冰心中大悅，當即口述北方局的指示，讓孔祥禎記錄，並以他的名義寫好信，交給魏茂林轉送獄中。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與家內（意指黨組織）聯繫上了，家裏讓我營救你們；如果平津陷於日本人之手，再辦就困難了。信的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去約半個多月，獄中還沒有回音。孔祥禎十分着急。他去找魏茂林詢問，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這封信沒有失落，已送到獄中了。

原來，獄中黨支部負責人殷鑒、薄一波和劉瀾濤接到信後，有點懷疑，認爲中央和北方局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擔心這是敵人設置的圈套；況且，孔祥禎出獄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現如何，也不清楚。因而他們看信後未予置理，也沒有向獄中的黨員傳達。

孔祥禎將獄中沒有回音的情況報告了徐冰。經過一番分析，徐冰說：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也沒有失落，那麼，幹脆把中央的指示送去好了，並告訴他們，這是黨的決定，要堅決執行。於是，孔祥禎按照徐冰所言寫了第二封信，讓魏茂林轉送獄中。

據孔祥禎回憶，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告訴獄中的同志：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並且考慮到你們都經過長期鬥爭的考驗，黨認爲，爲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爲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的範圍內作鬥爭。信中還說：這是特定的條件下所做的決定；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一律不視爲自首叛變分子，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到信後，仍然拒不執行，那你們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獄中黨支部接到這封信後，經過認真討論，認爲的確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頭向黨員傳達，並組織執行。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第一批九人出獄，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等出獄後，很快和孔祥禎取得了聯繫。當時，獄中同志的警惕性很高，爲慎重起見，要求第一批出獄的同志立刻對上述信件的內容加以證實。如果確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即送一隻燒鷄給獄中同志爲號；要是情況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等出獄後不幾天，即派人給獄中送去了一隻燒鷄，打消了一些同志的疑慮。

從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依照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志分作九批先後履行有關手續出了監獄大門。④

在這「六十一人」中，有黨的組織關係、並且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獄的是五十七人，除高夢九出獄後下落不明，劉克讓成了托派，扶平回家後投靠了國民黨外，其餘五十四人，都很快與中共組織接上了關係，被分配到急需的戰鬥崗位上。如薄一波、楊獻珍、周仲英、董天知、韓鈞等被派去山西，做閻錫山的上層統戰工作，張友淸去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書記，馬輝之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離擔任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黨團書記，劉瀾濤先去綏東，後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等。這批幹部分赴華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強了中共在白區黨的領導力量。

薄一波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去延安，……毛主席找我談話，我向毛主席談了一九三六年履行手續出獄的經過，毛主席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⑤

一九四五年，這批黨員中的薄一波等十三人，當選爲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作審查結論時說：「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登《反共啓事》一類的東西出獄，是北方局提出並經黨中央同意批准的。所以，完全不影響他們的代表資格。」七大會議期間，鑒於有的人不甚了解這十三名代表當年出獄的經過，劉少奇曾在他的辦公室對李富春、彭眞、康生等人說：「這件事，是中央讓他們辦的。」⑥

三、劉少奇··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從工作中，劉少奇了解到由於受王明及歷次「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影響，中共在白區的工作存在的問題極多，急需來一個徹底的轉變。於是，從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四日，劉少奇連續給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等四封長信。在這些信中，他提出了一個長期以來人們不敢正視的問題：中共過去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犯了「左」傾冒險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列舉了這種錯誤在四個問題上的具體表現：

（一）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問題。在秘密工作中，常有地用「怕死」、「害怕」等說法去批評同志，提倡冒險，否認合法；混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把能夠合法公開進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機關來做。十年來由於在這個問題的錯誤，使群衆工作和黨組織受到無法計算的損失。

（二）關於群衆鬥爭的策略問題。在革命的準備時期，發動群衆鬥爭的目的，是聚積力量，準備將來的進攻與決鬥。但過去白區群衆鬥爭常常爲紀念節或爲直接擁護紅軍而罷工遊行，機械要將每一個鬥爭提到最高階段；常常提出過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加在群衆的經濟要求上，忽視經濟鬥爭。這就使鬥爭經常失敗，力量的聚積也就不可能。

（三）關於宣傳鼓動工作問題。白區宣傳工作中的虛浮、誇大、形式、刻板，至今還未糾正過來。常使宣傳口號與行動分別不清，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分別不清，把謾罵當戰鬥。

（四）關於黨內鬥爭問題。過去在黨內思想鬥爭中誇大右傾機會主義，忽視反對「左」傾，甚至以思想鬥爭爲推動工作的唯一方法，不採用教育與說服的方法。在鬥爭中帶了濃厚的宗派主義成分和成見。

劉少奇認爲：這些錯誤就是「『左』傾機會主義的傳統。四中全會後在基本上沒有糾正，還繼續着，在某幾點上還有發展。這些錯誤在黨內影響最久、最深，給黨的損害也最大。」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轉變白區工作的問題。白區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轉變，另一方面還有十年來的傳統要轉變。這個轉變最艱苦。過去遺留下來的惡果，我們都得吃下去。但這個轉變還在開始，甚至有些地方還未開始。」⑦

中共中央對劉少奇的信十分重視，準備召開中共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從北平被召回延安。

中共白區代表會議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在延安城內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央大禮堂開幕。主持會議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受中共中央委託，劉少奇準備了向會議所做的報告，題目是《關於白區的黨和群衆工作》。

劉少奇於五月十六日首先向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報告。報告共分了三個部分：（一）關於白區工作的一般估計；（二）對北方工作的估計；（三）報告的提綱。在第一部分中，他歷數從大革命失敗以後黨的左傾錯誤，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所犯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指出白區方面成績不多的原因在於存在着左傾關門主義、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傳統。「直到現在沒有着重批評白區工作的錯誤，白區工作的轉變，一定要承認這一錯誤」。但是，會議主持人張聞天對劉少奇的報告極爲不滿，當場宣布：詳細的討論以後再召集會議，在白區代表會上第一部分暫不報告。這次政治局會議對劉少奇的報告

沒有展開討論。

五月十七日上午，劉少奇向白區代表會議作了題爲《關於白區的黨與群衆工作》的報告，只講了第三部分的提綱。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大會對劉少奇的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爭論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關於對過去白區工作的估計問題；（二）白區工作轉變的兩重性問題；（三）白區工作的策略方針問題。會上先後有二十四人發言，多數人都對劉少奇的報告提出批評，有的批評十分尖銳；只有少數人不贊成對劉少奇的報告全盤否定，不同意某些過激的批評。

六月一日至四日，張聞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了白區工作的方針路線問題。會議首先由張聞天提出準備提交白區黨代會的報告，以取代劉少奇五月十七日向會議所做的那個報告。張聞天報告第一部分「十年中黨的方針政策路線問題」，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報告和劉少奇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而發的。張聞天批評劉少奇的報告和給中央的信都是錯誤的，認爲過去中央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並取得很大成績。在討論中，多數人發言都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並對劉少奇提出許多批評。

毛澤東密切地注視着會議的進展情況。當會議上出現對劉少奇不利的一面倒的情況時，毛澤東出席了會議，並於六月三日作了長篇發言，即日後整理成文的《群衆工作問題》（該文現存中央檔案館）。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共講了七個問題：（一）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二）這個問題在今天提出是因爲甚麼；（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四）少奇的錯誤；（五）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六）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七）幾個問題——合法非法問題，少奇過去的問題，今後對付這類問題的態度。

毛澤東的講話中最重要的論斷有二：一是對劉少奇的極高評價，二是對劉少奇的論點作強有力的支持。

毛澤東說：少奇同志對於群衆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他在實際工作中，在黨內生活中，在華北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敗。今天我們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少奇寫給中央的幾封信上，……在他具體直接解決這個問題時，他也基本上是對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澤東的這個評價，不僅對當時召開的會議有重大影響，而且對於以後中共的歷史發展和形成新的中央領導核心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還對劉少奇的許多重大意見都表示了同意和強有力的支持。通篇有數處「少奇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對的」，「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少奇寫給中央的幾封信，也基本上是對的」。毛澤東在發言中，還對中央過去處理少奇的問題提出批評，他說：「過去處理少奇的問題，一般是不正確的。」這些都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有力支持。從會議的情況看，當時形勢十分嚴峻，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個長篇發言，旗幟鮮明地表示對劉少奇的保護和支持，劉少奇有可能被徹底否定，中共的歷史可能要重寫。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針對性很強，在他之前已有八位代表發言，對劉少奇提出批評。但毛澤東發表了這篇講話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連帶頭批判劉少奇的會議主持人張聞天，在他六月四日的總結發言裏，也不得不表示「澤東同志的意見，我是同意的」，並承認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

毛澤東的講話，根本扭轉了對劉少奇不利的局面。六月六日，張聞天在向白區黨代會的報告裏，加

進了若干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評價。這樣，雖然張聞天還是取代劉少奇向白區工作會議重新提出報告，但劉少奇並沒有被排除在中央領導之外，六月十日還是由劉少奇作大會結論報告，並被通過。大會也隨即宣布結束。⑧

白區黨代會是毛、劉關係上的重大里程碑，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聯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白區黨代會對劉少奇本人也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這次會議確定了「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代表」，也爲他進入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奠定了基礎。

---

①：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

②：劉英《身處逆境的歲月——憶聞天》，見《回憶張聞天》，河南人民出版社。

③：《孔祥禎同志談「六十一人」出獄》，見張頌甲《草嵐風雨》，群衆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版第九五—九六頁。

④⑤⑥：吳林泉、彭飛《草嵐春秋》，見《黨史文匯》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⑦：同①。

⑧：見路海江、賀明洲《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八三——一八五頁。

第五章 毛劉同仇敵愾鬥王明

一、王明：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城的上空，罕有地傳來了隆隆的飛機聲。在簡陋的機場上，聚集着歡迎的人群，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爲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連同延安各界的群衆，都來到機場迎接——這位大人物，便是王明。

王明，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商業大學學習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爲中共黨員，同年由湖北中共組織選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二七年二月，曾爲蘇共中央派往中國訪問的米夫當翻譯，到廣州、武漢、上海等地參觀，不久返回莫斯科。一九二八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教員，一九二九年回國，先後任中共中央《紅旗報》及《勞動》周刊編輯，中央及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等。一九三〇年冬，以「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爲旗號，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進行以奪取中共中央領導權爲目標的宗派活動，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奪取了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權，成爲中共的新領袖，開始在中共黨內推行一條以教條主義爲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並統治中共達四年之久。同年九月指定博古爲中共中央總負責，自己去了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曾被選爲共產國際執

行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王明此次返延安，便是負有共產國際的重要使命。

飛機終於降落在黃土鋪成的跑道上，從飛機上走出一個人，矮矮的，胖胖的，腳上的高統皮靴，油光錚亮，他舉着雙手，向歡迎的人群頻頻招手致意，十足是大人物的派頭。來人正是王明。

與王明一起下飛機的還有康生與陳雲。穿着灰色粗布棉衣，脖子上圍着一條普通的白毛巾的毛澤東急忙走上前，與王明握手擁抱。在兩雙手握到一起時，毛澤東說：

「歡迎你給我們山溝裏送來馬克思主義！」

這句一語雙關的話，拉開了毛澤東與王明新的鬥爭的序幕。

王明是毛澤東最大的政敵。三十年代，毛澤東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達三年之久。既使撇開這些歷史淵源不說，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反差也是巨大的：在莫斯科養尊處優、住洋樓吃面包的王明，又白又胖，而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毛澤東則又黑又瘦；王明是挾着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不禁趾高氣揚，而毛澤東是受共產國際批評的對象，自然是謙恭氣卑。毛澤東與王明作爲抗日戰爭中兩種不同路線的代表人物，從王明踏上延安的黃土地那一刻開始，兩人便注定要有一番激烈的較量。

在機場上，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爲題，發表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①

當晚，毛澤東宴請王明、康生。飯後，在陝北公學大院召開歡迎大會，毛澤東、張聞天主持會議。

王明講話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斯大林派回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甚麼地方值得歡迎的，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康生、陳雲也講了話。接着是張聞天講話，之後，毛澤東才講話，講得很熱烈、很興奮。像是喝了陳年的醇酒。②

王明此次回國，是負有在中共貫徹共產國際「新政策」的使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共的任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爲了讓中國拖住日本，從而減輕蘇聯的壓力，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認爲，蔣介石政府有美、英和蘇聯的支持與援助，是中國抗日的主要力量，既使不能打敗日本，也能拖住日本。但他擔心中共和毛澤東的獨立自主政策會惹怒蔣介石，造成統一戰線破裂，而拖不住日本，使蘇聯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斯大林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和毛澤東絕不能破壞統一戰線，要聽從蔣介石的指揮。因此，爲了調整中共中央的政策，共產國際特地召開了這次會議。

王明在會上作了報告，認爲中國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國共合作與各黨派的抗日大聯合，進而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並建立包括全中國各種武裝力量在內、統一指揮、統一供給、統一軍事計劃的國家軍隊。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只要進一步轉變政策，中共就準備承認其現有的領導地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認可了王明的報告，他擔心，毛澤東領導下的經過浴血奮戰的中共，能否使黨的政策、策略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眞正地與過去的敵人攜起手來。因此，他認爲「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被共產國際選中的被派回幫助中共中央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欽差大臣」。

十天之後，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

王明、博古、康生、陳雲、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凱豐、林伯渠等出席了會議。

王明在會上按照共產國際的基本精神，作了題爲《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王明在報告中一方面講了要堅持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他的重點是批評中共中央與毛澤東關於洛川會議的精神。

王明回國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陝北洛川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爲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中共中央與毛澤東是希望籍着抗戰這個楔機，使自己獲得合法的地位，並且爭取無限制的發展空間。這是中共與毛澤東的「應有之義」。因而《決定》提出：「今後的抗戰，中間包含着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是由於國民黨還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他們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和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同民衆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爲全民族的國防政府」。

洛川會議通過的毛澤東所寫的《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一文也指出：「國民黨政策在發動民衆和改革政治等問題上依然沒有甚麼轉變，對人民抗日運動基本上依然不肯開放，對政府機構依然不願作原則的改變……對共產黨關係也沒有進到眞誠合作的程度」。「要實現全方面的民族抗戰，必須國民黨政策有全部和徹底的轉變」。

在抗日問題上，毛澤東一方面提出「全面抗戰」（即國民黨政策必須全面徹底的轉變），另一方面又堅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在作戰方針上便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是毛

澤東的兩大原則，其宗旨是仍然將國共兩黨的鬥爭放在首位。

然而，王明在報告中批評：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軍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採取「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他認爲，應該有統一的群衆組織和統一領導的群衆運動，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制，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他不同意公開批評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認爲這種提法太尖銳，使人害怕。他不贊成毛澤東在八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南京國民黨營壘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認爲只能以抗日或親日爲標準；也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提法，認爲不應空喊領導權，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他還批評了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和劉少奇的《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幹基本問題》一文。王明還說：「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者。」③

王明報告完畢，毛澤東起而發言。他沒有正面反駁王明的講話，只是堅持八月洛川會議的精神，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強調抗日戰爭中的山地游擊戰。

劉少奇出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劉少奇也是王明「左」傾路線的受害者，與毛澤東未免有同仇敵愾之感。加上白區黨代會之後，劉少奇對毛澤東有一種知遇的感情。因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劉少奇毫不猶豫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並配合毛澤東的發言，先後三次講了話，向王明作出反擊。他說：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而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去進行工作，發展民衆運動，動員千百萬群衆參加抗日。這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我們要經過統一戰線去進行群衆工作，直接動員群衆，領導

群衆，擴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運動。劉少奇還強調要以共產黨爲領導來團結一切抗日的勢力與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堅持敵後的抗戰。④劉少奇的講話無疑是對王明講話的一種不公開的反駁。

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分歧是很明顯的。彭德懷回憶說：「我認眞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⑤

王明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其原因是，一方面王明代表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意見，而當時中共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下級服從上級」，是天經地義的事。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八月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遭到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多數紅軍將領的反對。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游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勝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林彪與聶榮臻指揮的平型關戰役，就是違抗毛澤東的指示而打的一場運動戰。王明在報告中的觀點，與這些人的主張吻合。因此王明的觀點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會上，許多人還檢查總結過去統一戰線工作，承認過去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會議以後，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也反映了這次會議的結果：「此次政治局一致的接受了國際的指示，檢查了過去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一些經驗教訓，糾正了實際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新的發展。」

會議還進行人事改組，將遵義會議以來的中央五大書記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

改爲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陳雲、康生，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張聞天仍主持黨務等日常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王明負責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還決定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爲籌委會主席，王明爲書記，劉少奇爲委員。

王明的到來以及在中共黨內獲得支持，無疑是對毛澤東的地位的損害與威脅，毛澤東自然不會等閒視之。從鬥爭的第一個回合來看，毛澤東不愧是政治鬥爭的大師，而王明顯得只是幼稚的小學生。由於王明的鋒頭正勁，毛澤東採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在會議上沒有與王明進行正面的交鋒，而在私底下做功夫：

其一是堅持不做會議決議。由於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且又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中共中央打算如何貫徹執行，應該也可以做出會議決議，以供指導全黨行動。然而，由於王明傳達的精神，不合乎毛澤東的「口胃」，毛澤東不打算執行，因而也不想做出束縛自己手腳的決議。精通黨內鬥爭的毛澤東明白，黨的決議一旦做出，不同意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在行動上卻必須無條件地執行，而且決議一旦作出，再要更改就難了。因此，既使是在大多數與會者都贊同王明的情況下，毛澤東也沒有作出決議，王明的意見沒有經過組織手續，沒有獲得法定的地位。對毛澤東來說，這是十分高明而又厲害的招數，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半年多後，當王明不再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時，毛澤東馬上召開六中全會，做出否定王明路線的決議。而對於王明來說，這可是一個重大的失策，因爲如果在當時王明提出及堅持做出決議，會議是會通過的。然而王明卻沒有這樣做。王明後來曾經感嘆地說：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作個結論就好了。

其二是，毛澤東將王明打發去武漢與國民黨談判，而沒有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王明離開延安這個權力中心，是又一大失策。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和長江局書記再重要，與延安的中共中央相比，畢竟是上與下、主與次的關係，按組織原則，武漢必須服從延安，而不是相反。因此，從鬥爭的一開始，毛澤東就令王明處於下風與劣勢。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如果留在延安參與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決策，團結與他一起從蘇聯回來的康生、陳雲（兩人均是書記），強迫毛澤東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並逐步擴大和鞏固自己的權力，那種局面將令毛澤東十分頭疼。然而王明在權力尚未鞏固的情況下，便被毛澤東打發離開延安（王明自己也不願意留在條件艱苦的延安，而願意去大城市的武漢工作），足見在權力鬥爭上毛澤東的高明與王明的笨拙。

其三，是利用王明來打擊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張聞天，毛澤東只是常委（後來改爲書記），其地位在毛澤東之上。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成了替罪羔羊，會議決定採取集體領導，而「集體領導」從來就是權力鬥爭中弱者針對強者的策略手段。於是，張聞天的總書記的職位，便在無形中被取消了，變成與毛澤東平起平坐；而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的寶座也因此而空了出來，等待着毛澤東去就座。毛澤東這一招，既是遷就了共產國際和王明，又打擊了張聞天，可謂是「一箭雙鵰」。

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表現了堅強的意志和嫺熟的鬥爭藝術，沒有向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屈服，將王明帶來的衝擊，減低到最低最小的地步，而沒有出現「陣腳大亂」，更沒有「潰不成軍」，從而爲以後的反擊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後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中共「七大」會議上說：「遵義會議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一個新的

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戰還是運動戰？」⑥

三天之後，王明夫婦、周恩來夫婦及博古一起去武漢。他們就兩黨關係等問題與蔣介石、陳立夫等進行秘密會談。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會談後，蔣介石提出留王明「在漢相助」，王明也表示願意留漢工作。鑒於此種情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決定合並爲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中央局，王明爲書記，周恩來爲副書記。

在延安任命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本是周恩來，現在卻拱手讓於王明擔任。周恩來這一舉動，被毛澤東認爲是向王明屈膝投降。後來在延安整風時，這一條成爲周恩來挨整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

在武漢期間，王明根本沒有將毛澤東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放在眼裏。他經常以中共中央名義，擅自對外發表宣言，甚至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談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發布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公開了他從蘇聯帶回的主張，並在中共中央早已發布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六大綱領，繼續強調要建立一支「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國防軍隊。他還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從延安遷到武漢。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領導的敵後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通電成立，王明致電中央書記處並轉朱、彭、任、劉，

對通電提出指責，說：「通電逼蔣承認，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抗戰形勢和軍事問題，以及爲「七大」召開作準備工作。

會上，王明做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除繼續堅持過去的觀點外，更在軍事上提出「七個統一」和運動戰爲主的方針：「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毛澤東認爲這些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的繼續發展。對於王明的觀點，毛澤東還是沒有給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針對性地着重講了軍事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又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會議表決時，多數人同意王明繼續去武漢，但也規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

會上，王明的主張仍然被大多數與會者贊同與接受，也仍沒有形成決議和文件，但會議決定由王明起草一個會議結論。王明又一次獲得支持，更加令其「智昏」，更加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上，獨斷專行，將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作爲中共中央的路線大肆宣揚。

會後，王明返回武漢，以中央名義寫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不久又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提議》。

政治局會議以後，毛澤東連續就戰略方針等問題，批評和反對王明提出的「統一」的主張，毛澤東說：「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之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含惡意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也指出：應當警惕國民黨「同我黨爭取領導權，孤立我黨的一面」。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針鋒相對地爲中共中央起草了另一封《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不顧王明的反

對，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然而王明扣壓了中共中央電文。

王明於四月一日復電中共中央說：我們起草的致國民黨代表大會「政治建議書已於二十四日送去，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昨夜已開幕，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五月，毛澤東的重要巨著《論持久戰》發表。當毛澤東將《論持久戰》送交武漢的《新華日報》（中共在武漢的機關報）發表時，王明不同意轉載刊登，只同意出小冊子。後來，中共中央特意爲此事去電長江局，要求盡快刊登，但王明又借口文章太長而拒絕，中共中央再次去電說可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刊登。

一九三八年夏，王明還寫了一首詩攻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四億弗憑鬥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得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

王明後來在《中共五十年》中說：「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爲該文的重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相矛盾」，「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王明與毛澤東之間，武漢與延安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已越來越明顯。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他

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回憶說：「我們把華中局（應爲長江局——引者註）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決定並得到共產國際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自己的政策。」

王明的這種做法，毛澤東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三月政治局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反擊。

三、毛澤東召劉少奇回延安參戰

由於中共北方局駐地臨汾在日本侵略軍的攻擊下面臨陷落，劉少奇沒有出席三月的政治局會議。因此，在會議上，除了自己以外，毛澤東聽不到反對王明的聲音。

三月會議以後，毛澤東與王明的鬥爭已公開化了。爲了加強在中央政治局內反對王明的力量，毛澤東採取了一項重要的措施：將劉少奇調回延安。

這時，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陳雲、康生中，王明在武漢，留在延安的陳雲、康生，是與王明一起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而張聞天也與王明頗有淵源。毛澤東顯得勢單力弱。劉少奇回延安工作，無疑爲毛澤東增加了可依靠的力量。

劉少奇是在三月中旬回到延安的。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華北工作問題。毛澤東建議劉少奇留在延安指導華北工作。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爲了適應目前特殊情況及各方面工作起見，書記處決定北方局負責人胡服（即劉少奇）暫時住延安，在中央指導

下，仍舊擔負華北黨的領導工作，楊尙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員在呂梁山脈，就近與華北各地黨部聯絡，直接布置晉西南工作」。「所有華北各地黨與群衆工作及地方武裝情形除向楊尙昆同志報告外，須同時直接向胡服報告」。

劉少奇一回到延安，即與毛澤東一起，參與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日常工作，指導各地，包括八路軍總部、各部隊和各省委的日常工作，成爲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派來的「欽差大臣」，因此儘管王明膽大妄爲，將自己凌駕於延安的中共中央之上，充當太上皇，但毛澤東只有忍耐，而不能動王明的一根毫毛。這時的中共中央內部，不但思想分歧很大，而且指揮也不統一，王明在武漢搞「第二個中央」，自行其是，對延安發出的指示，王明拒不貫徹執行，毛澤東亦無可奈何。同時，中共是共產國際屬下的一個支部，中共黨內的是非爭論，只能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來裁定，而由誰來坐中共的第一把交椅，更必須由共產國際決定。如果由此下去，這第一把手的交椅很可能落到王明的手中。

在這種形勢之下，毛澤東決定先發制人：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情況——當然，這些情況是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講述，對毛澤東有利的。毛澤東的目的在於主動爭取共產國際對自己的抗戰路線的理解和支持。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任弼時，是因爲他與共產國際有比較多的來往，共產國際對他也比較了解。早在二十年代初，任弼時就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來又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這是其一。在洛川會議上，任弼時支持毛澤東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抗日持久戰和敵後游擊戰的方針。他還曾經總結了華北前線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和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取得勝利的實踐經驗，因此他對毛澤東的

抗日戰略路線從理論到實踐，有較深刻的了解。而且任弼時作風正派，工作穩重，爲人誠懇。這是其二。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三月政治局會議結束才四天，任弼時便離開延安赴蘇聯，於三月中旬到達莫斯科。

四月十四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作了題爲《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

五月十七日，任弼時又口頭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關於四月十四日報告大綱的說明和補充。此外，任弼時還單獨向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作了匯報。至此，共產國際加深了對中國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

六月十一日，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了任弼時的報告，作出了《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定》。兩個文件中，前一個是內部的，後一個是公開的。

共產國際在決議中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後，認爲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複雜和困難條件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的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爲紀念中國抗日戰爭一周年，蘇共中央機關報《眞理報》第四版在《中國人民英勇鬥爭一周年》的通欄標題下，刊登了毛澤東與朱德的照片，還有報導文章。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信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已接受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計劃大獲全勝。

任弼時還有一個任務：接替王稼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王稼祥原是王明在一九三一年派往中央蘇區的中央代表「三人團」之一。然而王稼祥早在當年就倒戈，支持毛澤東。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圍剿時腹部受傷，傷口未愈便坐着擔架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他的傷口更加惡化，中共中央即派人護送他經上海赴莫斯科治療。當時王明準備回國，王稼祥便接替他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任弼時接替王稼祥的中共駐共產國際團長的職務後，王稼祥準備回國。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接見了王稼祥和任弼時，他特意請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意見：

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的問題要在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領導下解決。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不要再爭吵了……⑦

四、毛劉聯手鬥王明

王稼祥回到延安後，即刻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有了共產國際的表態，毛澤東可以放心大膽地拿王明開刀了。毛澤東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要王稼祥代表中央向武漢的王明拍去電報，要他回延安開會。

王明似乎已獲悉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拒絕回延安開會，他要王稼祥到武漢來向他個別傳達，還提出把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來開。

王稼祥再次代表中共中央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請按時來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共產國際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共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不得不於九月十五日回到延安。

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王明聽到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頓時黯然失色，他像洩了氣的皮球，再也跳不起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橋兒溝的天主教堂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爲《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總結報告，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還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後來的「整風運動」，在這裏已初露倪端。

劉少奇在六中全會上被選爲十二名主席團成員之一，協助毛澤東主持會議的進行。在全會之前的政治局會議以及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多次發言，批判王明路線，並通過總結華北敵後抗戰的經驗，批判王明的錯誤主張。十一月五日，毛澤東在作全會總結中說：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好，如果所說『一切經過』

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麼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統一戰線』。⑧

針對王明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的行徑，在九月二十六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提出：要在組織上，黨規上保證黨的團結，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過去在莫斯科有人說，只要政治上正確，組織上可以不服從，這是不對的，必須無條件服從組織。會議接納劉少奇的意見決定成立中央規則起草委員會，由康生、劉少奇、王明起草有關決定，準備提交六屆六中全會通過。

這個規則是針對王明的，因此更有必要讓王明參與起草。毛澤東並不擔心，因爲有劉少奇在其中坐鎮，王明掀不起風浪。毛澤東對劉少奇之倚重可想而知。

十一月六日，劉少奇代表起草小組向全會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對提交全會的《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和《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作了具體說明。指出：這些決定規定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及各級黨委的工作任務、職責範圍和紀律，特別強調每個黨員必須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無中央及政治局、書記處之委托，中央委員不能代表全黨發表文件」，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在執行黨規黨法上應表現爲模範。⑨

這三個《決定》全部獲得通過，全會認爲這是「教育全黨同志，爲黨的建設的一課。」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主要從政治思想上向王明施以打擊，劉少奇則從組織紀律上予於打擊。除了毛澤東外，便是劉少奇居功至偉。

六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線，贊同毛澤東一年多

對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形勢的分析。這次中全會正式確認了毛澤東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在中共的領導地位，連王明也在發言中公開承認毛澤東的「領袖作用」，表示要「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如北辰而衆星拱之」。

在這場打擊王明的戰役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結成了親密的戰友。會上，中共中央新成立了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來與劉少奇分別被委任爲這兩個中央局的書記。

在協助毛澤東打敗了王明之後，劉少奇又肩負開闢中原抗日工作的重任，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離開延安，到河南省確山縣履新。

五、劉少奇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一九三九年三月，毛澤東通知劉少奇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劉少奇於三月十八日離開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於三月底回到延安。

劉少奇在延安的住所，位於延河北邊新關的一排窰洞，鄰居就是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吳黎平也住在左近。

抗日戰爭開始後，延安成爲革命聖地，全國各地不少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民主志士，沖破國民黨的封鎖，跋山涉水，紛紛湧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領導下的抗戰事業。抗戰以來，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包括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秘密組織，發展了大

批新黨員。這一方面壯大了中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中共黨內的成份和思想意識複雜起來。便是土地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革命」，也多是農民出身，思想上存在濃厚的小生產者的意識。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改造每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意識，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成爲中共面臨的迫切問題。爲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專門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七月三日開始舉行，斷斷續續到八月二十五日才結束。在延安期間，劉少奇經常到張聞天的窰洞中聊天，吳黎平也經常到劉少奇那裏聊天。劉少奇說，這次回到延安，看到許多革命青年參加了革命的組織，感到極大的高興，因爲這是革命蓬勃發展的一個表現，同時對這大批新黨員加強教育，使之樹立正確思想極其必要。劉少奇把這一想法，同張聞天談了。張聞天便提出要劉少奇去馬列學院爲學員作個關於思想修養的講演，劉少奇欣然同意了。

那時的馬列學院，經常請一些中央的領導人去講課，張聞天講過中國革命問題，陳雲講了黨的建設，而在宣傳部工作的艾思奇主講哲學，吳黎平主講馬列主義。

馬列學院位於延安蘭家坪，沒有大禮堂，平時上課的窰洞又太小，因此重要的演講常常設在窰洞外面的大操場上。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馬列學院的操場上坐滿了前來聽課的師生。劉少奇開始《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第一講。

爲了便於讓大家記錄，劉少奇以濃重的湖南口音，不緊不慢地說道：

「同志們：很對不起！你們很久以前就請我來演講，我直遲至現在才來。我今天所要講的問題是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想，在建設與鞏固黨的基本任務面前，講這個問題，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吧！我想分

作幾次來講，今天講一部分，其餘的只好留待下次。」

這一天，劉少奇講了共產黨員爲甚麼要有修養、修養的內容、修養的方法、思想意識修養同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革命實踐的關係等問題，提出了做一個模範共產黨員的具體標準。他說：

同志們！我們要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忠實最好的學生之一，我們就需要在無產階級與一切群衆的長期而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進行各方面的修養。首先要有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以及在實踐中運用這種理論的修養；要有思想意識與道德品質上的修養；要有黨內團結、黨內鬥爭與紀律上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與工作作風上的修養；要有戰略、戰術、工作方法上的修養；要有善於對待各種人們、處理各種問題，以及各種科學知識與某些專門技術上的修養……

由於內容太多，這天沒有講完。七月十二日，劉少奇又去講了一次。第二次主要講共產黨員在組織紀律方面的自我修養。

劉少奇的演講，受到了馬列學院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演講很重視，認爲是廣大黨員，尤其是新黨員所迫切需要的。他立即請劉少奇把演講整理成文，在《解放》周刊上發表——張聞天還兼任這個周刊的主編。

劉少奇於百忙之中把講稿整理出來，交給了張聞天。張聞天看後認爲很好，便交給吳黎平送毛澤東審閱，以便公開發表。那時候中共中央有個規定，凡公開發表的重要文章，都要送請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拿到稿子後，很快就看完了。他給吳黎平寫了一封短信，說：「少奇同志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應當快登」。通常送毛澤東審閱的稿子，一般要個把星期才能返回來，而這次才二、三天，毛澤東便把稿子退給吳黎平。⑩

劉少奇的講稿很快被送去排版付印，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出版《解放》周刊的八一——八四期上發表。

「共產黨員修養」這一命題的提出論述是這樣的新穎，這樣的切中時弊，使延安的共產黨員們為之一震。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導師對黨的建設雖然有不少論述，他們都是着重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很少專門論述應該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劉少奇在講演中，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豐富經驗，透闢地論述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加強自己的思想意識修養、理論修養和黨性鍛煉，以便有效地為黨的事業奮鬥。因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發表後，在中國共產黨內產生強大的教育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讀者們紛紛給《解放》周刊寫信，希望出版單行本。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共產黨員們的要求，很快安排延安新華書店出書，當年十一月就把單行本印了出來。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也陸續轉載，有的翻印了單行本。沒有多久，《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小書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廣為流傳開來。

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毛澤東親自為這次整風運動規定了二十本必讀文件，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其中的一本。從那時候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二十多年裏，《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中共黨員必讀的經典，人手一冊。劉少奇的這篇主要著作，伴

隨着千百萬中國共產黨人的成長，後來更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傳播到多個國家的共產黨中去。

---

①：引自張志清等著《延安整風前後》，第三〇——三一頁。
②：見張樹軍等著《民族救星》，第二〇三頁。
③：見黃崢《劉少奇一生》
④⑤：《彭德懷自述》二二六頁。
⑥：轉引自《關於王明的評價》，見《文獻與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⑦：同①，第三七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三九頁。
⑨：《劉少奇年譜》上卷。
⑩：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見《懷念劉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第二篇

「旗幟」與「旗手」

第一章　毛劉結成親密戰友

一、延安整風運動與劉少奇的冒起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勝利結束了，但毛澤東對王明的鬥爭並沒有結束。

王明由三十年代初的「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三十年代末期的右傾機會主義，給毛澤東予重要的啓迪：要根除類似王明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分裂行爲對革命事業造成的破壞，要保證自己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全黨得到順利的貫徹和實行，光解決王明的問題是不行的。王明的「左」傾克服了，又來一個右傾，即使王明除掉了，還會出現另一個李明、張明。關鍵還在於必須根除中共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基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洋八股以及認識論上的主觀唯心主義等，必須提高全體幹部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增強全黨辨別正確與錯誤路線的政治思想能力。也就是說，必須在全黨進行一次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和整風運動。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便呼吁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說：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子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生動活潑的新作風：

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其在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

特點去應用它，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還提出了今後全黨的三大任務：

普遍地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

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

在這裏，毛澤東勾勒出了整風運動的輪廓。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王明並沒有死心。他將自己的《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册子加「序」再版。王明在「序」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高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這是對毛澤東明目張膽的挑戰。

與此同時，黨內對王明的錯誤，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以來的錯誤，看法並不一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的《論政策》一文。毛澤東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即江西蘇區）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後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①

然而在會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陳雲、張聞天（其中王明、張聞天、康生、陳雲是中央書

記處五名書記中的四位，另一位是毛澤東）等人相繼發言，不同意毛澤東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黨內思想認識並不統一，王明還有很大的市場。因爲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任弼時、凱豐（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都是執行王明路線的人，王明的影響在他們身上還沒有肅清。

整風運動已不能不進行。

整風運動是從六屆六中全會後開始醞釀的。毛澤東一方面成立中央高幹學習會，學習馬列主義和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則編輯《六大以來》一書，將中共「六大」以來的文件匯編成册。曾參予這一工作的胡喬木（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回憶說：

「當時沒有人提出（六居）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着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麼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六大以來》成了整風的基本武器」。毛澤東也說：「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即《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②

「九月會議」，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召開的一個體現了整風運動前期成果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

九月十日開始，延續了一個多月，這是中共在陝北的一次重要會議。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康生、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凱豐、博古、鄧發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以及李富春、楊尚昆、李維漢、陳伯達、高崗、林伯渠、葉劍英、王若飛、彭眞等重要幹部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的內容，是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路線問題以及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中共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性質的問題。在第一天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報告。指出這一時期中共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是「左」傾「路線錯誤」，會議決定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是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的序幕。

會上，有二十八人發言，結合過去十年的革命歷史，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張聞天、王稼祥、博古、任弼時等人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王明兩次發言，卻拒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將責任推到博古及張聞天的身上，並指責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批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只要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這不好。

在九月十一日的會議上，陳雲發言說：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工作後才開始改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有些幹部位置擺得不適當，要正位，如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③

第二天，任弼時也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夠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④

王稼祥在發言中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

法。」

康生在九月二十九日的發言中檢討了自己在白區工作的政策上與劉少奇的分歧，承認今天看來是劉少奇對的。當時反對劉少奇，一是由於自己的主觀，二是聽國際說劉少奇是機會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路線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時中央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⑤

九月會議上的這些如此一致的對劉少奇的評價，成爲後來關於歷史問題決議的重要觀點，也爲劉少奇進入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奠定了基礎。

九月會議以後，毛澤東寫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和《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兩個重要文件，文中採納了九月會議的意見，多處肯定劉少奇，稱讚「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衆領袖」，「正確的領袖人物」，「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眞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爲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爲之證明了」。⑥毛澤東對中央其他領導人作這樣高的評價，是十分罕見的。

毛澤東的這兩個文件，尤其是《批判》（對王明的九篇代表作所做的九篇批判文章），寫得很尖銳，不但點了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名，而且用詞辛辣、尖刻，甚至有些挖苦，它是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渲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雖幾經修改，但仍顯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這是兩個文件後來沒有發表的原因之一。此兩個文件毛澤東只給任弼時看過。到七十年代毛澤東再次修改此文件時，便將稱讚劉少奇的話全部刪去。

這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延至十月二十二日才結束。然而，在十月三日，會議還在進行的時候，毛澤東就給劉少奇發出電報：

少奇並告陳毅：

（一）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希望你能參加七大。（二）動身時望帶一台電台；（三）何時可以動身盼告。⑦

毛澤東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尤其是經過一九三七年的白區黨代會，一九三八年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鬥爭，以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發表和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認定劉少奇不但是中共黨內除自己以外的另一位正確路線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位甚有才幹和理論修養的領導人。毛澤東環顧周圍，任弼時、王稼祥、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康生等人，都是與王明路線有瓜葛、有牽連的人，這些人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都曾經反對過自己，都曾經犯過「路線錯誤」。在這方面，只有劉少奇是「乾淨」的，是一貫地支持毛澤東的，與毛澤東是眞正的、徹底的「一條戰壕裏的戰友」。在中共日益壯大，抗日戰爭蓬勃發展的新形勢之下，毛澤東急需尋找忠誠可靠的政治伙伴，急需可以信賴、可以依靠的「盟友」，以便鞏固和增強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選擇了劉少奇。

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係合乎邏輯的進一步發展。「旗幟」與「旗手」都在革命的暴風中崛起，並走到一起來了。

二、爲劉少奇牽腸掛肚　毛澤東罕有露深情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一行一百多人的隊伍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出發，進入敵佔區，夜行曉宿，隱隱蔽蔽地向北進發。隊伍中有一位穿便衣的高個子的中年人，形容消瘦，雙眼炯炯，在夜風中捲縮着身子，疾步快行，似乎那單薄的舊棉衣，並不能抵禦淮北平原那料峭的寒風。他就是化名爲胡服的劉少奇，此行是要千里迢迢，橫跨蘇、魯、豫、晉等數省的敵佔區，返回延安。

劉少奇自從一九三八年冬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以來，領導河南、湖北、山東、江蘇數省的中共組織，擴充力量，開展抗日戰爭，建立了多塊抗日根據地，實現了中共中央「重點發展華中」的戰略目標，使得這塊昔日曾是冷冷清清、死氣沉沉的土地，如今抗日鬥爭如火如荼。中原與華北，新四軍與八路軍，形成中共反抗日本侵略的兩個主要力量。

正當劉少奇在蘇北、淮海一帶四處奔走的時候，毛澤東十月三日的電報飛到了蘇北鹽城的新四軍總部。事情雖是突然，但對劉少奇來說，已非第一次了。當時華中確有許多重要工作要處理，劉少奇一時離不開身，於是，劉少奇於十月四日致電毛澤東：「目前華中工作還有些困難，須要進一步解決，請中央考慮我可否暫緩回延安」。⑧

十月十一日，毛澤東發電劉少奇：

來電悉。（一）即來延安，既於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緩期。（二）七大大約還需等半年才開，甚望你能到會。……兩三月後動身來延安參加七大，七大後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三）……華中我軍主要是對敵僞分散作戰，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的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有大益」。⑨

毛澤東同意劉少奇三個月後動身。

中共中央與毛澤東顯然一直記掛着這件事。三個月剛過，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又一次作出決定：致電華中局要劉少奇回延安。第二天，電報通知正式發出，「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而且語氣堅決：「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台，動身回延。」

看來再不走是不行了。劉少奇決定開完華中局擴大會議就動身回延安。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打來電報又給他增加了一項使命，要他代表中央去山東根據地指導工作，解決中共山東分局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問題。

從蘇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難，中間有很多日僞軍和國民黨軍隊的佔領區，光敵人的武裝封鎖線就有一百多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劉少奇回延安途中的安全問題極爲重視。二月十三日毛澤東打電報給陳毅、劉少奇：「少奇返延，須帶電台，並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二月二十日又來電強調：「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爲骨幹，須加挑選與訓練。」⑩

毛澤東可能覺得這樣還不保險，於是又給在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去電報，要他派人調查華中到華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同時於三月十三日去電要劉少奇再等一等：

我們正在調查由華中到華北道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安全保障的程度，俟得復電即行轉告。望你等候這一復電。⑪

一個星期後，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再致電劉少奇：

「兹將彭電轉上，你看此種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⑫

這時劉少奇已於兩天前動身。

四月初，劉少奇一行越過日偽軍嚴密封鎖的隴海鐵路，到達中共山東分局和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駐地山東臨沭縣朱樊村。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副書記黎玉，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已經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正在等待劉少奇的到來。

從蘇北到山東這段旅程，當年護送劉少奇的周長勝（時任新四軍團長）有如下回憶：

當晚，夜色降臨，四周一片漆黑，旅首長們送少奇同志到村外。我帶着四個連隊，跟着他，從南朱集附近的一個莊子出發了。

一路上，我們白天休息，夜晚趕路，少奇同志有時騎馬，有時下來步行。同志們出於對黨

的事業負責，出於對少奇同志的尊敬和愛戴，處處小心，日夜守護。第三天，我們來到了隴海鐵路邊上。少奇同志跨上路基，環顧四周，指着這邊，問是甚麼莊，指着那邊，問有沒有敵人。問了一會，我正想催他快走，他卻轉過身子，返回路那邊，跳進護路溝裏，用手量量溝有多深，用步子數數溝有多寬。這下真把我急壞了。我很清楚，眼前東南和西北角上，就是僞軍的碉堡，夜裏鬼子又常駕着小壓車出來巡邏，一發現甚麼情況就開槍，萬一……。我也顧不得甚麼了，對少奇同志說：「政委，很危險哪，還是快走吧！」「好的，馬上就好的。」他仍在量着。等他量完了，爬上來，到了路這邊，又跳進護路溝裏量起來。我心裏很着急，只好向他說：「政委，你走吧，這裏隨時可能有敵人來。等你過去，我來給你量，保險不會有錯，一分一毫也不差。」

見我實在急得很，少奇同志便安慰說：「好同志，不要緊的。我想具體了解護路溝是怎樣的。自己了解的，總要比聽別人匯報好。你看，耽誤的時間不是不多麼？」

翻過鐵路再走二十多里，就是八路軍的魯南根據地了。這地區情況較好，我們改成白天走路。我發現他的馬沒有我的馬好，就說：「政委，把我的馬送給你吧！」「那麼你呢？」他問道。「我再從敵人手裏繳呀！在鬼子、僞軍那裏，還怕沒有好馬？」「對，應該有這種豪壯氣概！」他高興地讚許着，但又接着說：「馬還是留給你自己騎吧！」⑭

劉少奇不負中共中央所托，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解決了山東根據地的問題，使山東各項工作走上了正軌，劉少奇可以繼續上路了。但沿途的安全沒有保障，出發的時間便一再地拖延下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毛澤東給劉少奇打來一封電報：

胡服同志：

二十六日電悉，因沿途通過無保障，山東又缺乏統籌之人，故你不宜西進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八路軍一一五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全局似較適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復。⑮

過了一個月，交通安全情況仍未好轉，七月九日，毛澤東又拍來長電：

「我們很望你來延並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安全，故不可冒險，仍以在敵後依靠軍隊爲適宜，你的行止，以安全爲第一，工作爲第二，以此標準來決定蹲在山東，還是仍回軍部」。「上述掌握山東任務須請你擔負之。至於執行此任務，自以你在山東爲便利，但如蘇北比山東更安全則在蘇北亦可執行，或在山東一時期再還蘇北，最後再去山東，請你斟酌情形決定。在你確定行止後，中央即通知華中、山東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揮山東、華中全局的權力。」⑯

毛澤東如此殷勤叮嚀，拳拳之心躍然紙上，這在毛澤東是非常罕有的。

關於在山東的這一段生活，劉少奇當年的警衛員魏良彬有以下回憶：

當時，山東地區在日寇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經濟封鎖的同時，又發生了嚴重旱災。那時候，我們經常吃沒有脫殼的高梁米，吃的啥樣，拉的還是啥樣，不消化。有時用地瓜乾放在高梁米裏面熬粥，這兩樣東西都是硬家伙，熬不爛，嚼得腮幫酸痛。沒有油，也沒有菜，我們就把摘來的野菜用開水燙熟了，放點鹽一拌，用來送飯。時間久了，由於營養差，我們警衛班的同志臉上都有些浮腫，但精神卻十分愉快。

少奇同志呢，雖然名義上有個小伙房，但除了從老百姓家裏借來兩個盤子、兩個平底碟子、兩個粗瓷碗、一把菜刀、一個小鍋之外，平時很少看到「保健糧」（指面食）和肉類。少奇同志的炊事員，是安徽合肥人，高瘦個子，綽號「老杆子」。他時常向我們訴苦：「給胡政委作飯真難，他本來吃的就少，又有胃病，有時給他多炒個菜，他就不同意。看他那麼忙，吃得又那麼少，那麼不好，我真擔心他身體會垮下去。」

有一次，記不清是山東軍區還是山東分局，給少奇同志送來一袋面粉和十多斤肉。他不便於退回去，就都給了我們，說：「改善一次生活吧！」

開頭，我們堅決不肯要，少奇同志說：「你們比我更需要。我在北方住久了，吃得慣雜糧。」

推來推去，最後我們只得收下了。當大家高高興興包餃子時，有的同志激動得掉下了眼淚。

每天，到少奇同志這裏匯報情況、請示工作的人來往不斷，羅榮桓、蕭華同志，以及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同志，我們都見過。少奇同志白天參加會議，作報告，夜裏，還忙於搜集材料起

草文件。在暗淡的油燈下，經常熬到二、三更天。他烟癮大，烟的供應又不多，常常夜裏沒有烟抽，沒有東西充饑，我們只有勤給他送開水，並勸他休息。他呢？卻總是說：「好！你們先休息吧！」可是說完，還是繼續伏在桌子上寫東西。有一次，住在夏莊時，因爲房子小，部隊多，少奇同志住在老百姓一間屋子裏。那屋子右邊有一廁所，靠窗口有座石磨。房東經常在半夜三更起來推磨，吵得少奇同志睡不好覺。我們想建議房東改換推磨的時間，少奇同志不同意，幽默地說：「你們不讓老百姓吃飯還行嗎？」少奇同志總是這樣首先想到群衆的方便。

有一回，少奇同志接連幾天給部隊作報告，嗓子都啞了，幾乎講一句話就咳一聲，臉色也不太好。我們勸他：「快找醫生看看吧！」

「不要緊！」少奇同志微笑着搖搖頭說，「上了點火，過兩天就會好的！」

我們勸他注意休息，嘮叨得多了，他就說：「我不累，休息了工作怎麼辦？爲了打鬼子，大家都很緊張呀！有許多工作要做嘛！」說得我們回不上話。⑰

半個多月又過去了。劉少奇決定不再等待，繼續上路。爲了行動方便以應付路上的險情，劉少奇將原先隨行的一百多人精減至十八人，都穿上便衣，化裝成老百姓。劉少奇則打扮成生意人，化名老許。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劉少奇一行在旅長曾國華率領部隊護送下，離開朱樊村，向西北進發。

由山東到晉陝，都是敵佔區。一路上困難重重，險情環生。時任八路軍團長的楊秀山有以下回憶：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晉綏軍區司令部拍來一份絕密電報，要我率領第七團的一部

和七一六團的第一營，到太原——汾陽的公路上迎接胡服同志回延安。我看了電報之後，再也不能成寐了。這裏是晉綏三分區的一部分。這個地區周圍有四十多個敵僞的大小據點，平均每月向我們進行一至二次合擊、反複掃蕩。每次掃蕩都要持續三天至十天，此外，小規模的襲擊就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下，要使我們敬仰的少奇同志不受一點驚恐，沒有絲毫危險地通過敵佔區，其任務之艱巨是可想而知了。我們反複研究了敵情和行動方案，就帶隊出發了。

這一次，由於情況有變，少奇同志沒有出發。

這年冬天，我們又接到軍區命令，按原地點再去迎接少奇同志。我帶領隊伍很快到達了王火莊、西馬村、西河村一帶。偵察員報告：「敵人在上賢村設下了埋伏，我們聯絡不上了。」

第二天，我們正緊張地等待着。這時，軍區拍來了火急電報，說少奇同志在平川過了幾夜，不能再隱蔽下去了。命令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在今晚接到少奇同志。這份電報加重了我們的責任，我們更加焦急。

第二天清晨，看見對面來了人時我急忙問：「誰？」

對面的偵察員好像理解我的心情，他激動而愉快地回答着：「首長來了！」剎那，一種勝利的喜悅像電流一樣溫暖着我的全身。我向前走了不遠，看到了護送少奇同志的便衣隊和我們部隊簇擁着幾個騎馬的同志，緩緩而來。我當時的心情說不出是甚麼滋味，走上前去便冒問一聲：「首長們辛苦了！」

一位騎在馬上的同志，立刻勒住繮繩，要下馬。他和藹地回答：「同志們很辛苦了吧！」從他那慈祥的面龐看來，不難猜出，他是胡服同志，也就是我們敬愛的少奇同志。

我連忙跑過去，扶住了少奇同志，並說：「你不要下馬……」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經下了馬，緊緊的握着我的手……

我激動萬分，目不轉睛的看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穿着一件青布長衫，褲角上還紮了兩條帶子，化裝成商人模樣。雖然面容有些消瘦，但他那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卻隱藏着難以形容的活力，他是那樣沉着冷静，神態自若。儘管經過了長途跋涉，越過了敵人層層封鎖線，披星戴月，奔波千里，而在他的臉上和眼神裏卻看不到絲毫倦意。我看着他那單薄的長衫，急忙脫下大衣，送給少奇同志，說：

「首長，天氣很冷，請你穿上吧！」

少奇同志看了看我，問：

「你怎麼辦？」

「我，穿得很多，我，我年輕些……」我恐怕他不穿，急忙中訴着一切可信的理由。

少奇同志笑着點點頭說：

「哦，比我年輕些好麼！」他並沒有穿上大衣，卻回過身去給了他的一個隨員。他又向我笑着說：「我們走吧！」

本應讓少奇同志很好的休息幾個小時，但爲了保證安全，及早的脫離敵佔區更遠些，我就請示少奇同志，準備繼續前進。他異常和氣地：「好嘛！可以繼續走。」於是我們部隊保衛着少奇同志向晉西北三分區的地方進發了。

隊伍爬上一個高山頭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了。這個山，山頂上沒有樹，到半山腰才有

密密麻麻的樹林，蠶練塔村在我們休息的山底下，是我們下山經過的頭一個村子。到達這個村子要通過彎彎曲曲的林蔭小道，下一座大山。部隊正在休息，突然聽到山下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部隊轉移到山背後隱蔽，並做好戰鬥準備。我用望遠鏡看了看，因爲山下都是樹林，也看不到甚麼情況。停了一會，偵察員報告：從東社鎮出發的敵人，同我們遭遇了，戰鬥中有一個偵察員負傷被俘，敵人的企圖還不明白。

當時廣大指戰員們立刻變得沉靜了，我和同志們一樣，由高興轉爲擔心。恐怕被俘的那個偵察員經不起考驗，暴露了我們的行動，擔心戰鬥打響了會影響少奇同志的安全。的確，以我們的部隊力量，乾淨徹底的消滅敵人是綽綽有餘的。但是任務不是打仗，而是保衛少奇同志的安全。我們應當提高警惕，改變路線和營地，向左方繞行。經過研究，我去請示少奇同志，老實說，我當時的心裏真有點忐忑不安。我將情況向少奇同志報告之後，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少奇同志平静地說：「我完全服從你的指揮！」

這樣我們繞過蠶練塔村，經過寨子村，在下午六點多鐘到達蔡家社住下了。⑱

九月中旬，劉少奇安全抵達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駐地東南的西遼縣。

九月二十一日，一直注視着劉少奇行程的毛澤東拍來電報：

少奇同志：

安抵一二九師無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後來延，並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關於最近時局情

況我有電至總部可索閱，來延路上安全保障，請商劉鄧作周密佈置。⑲

「劉鄧」即是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劉少奇這一漫長的旅途不僅充滿艱難險阻，而且物質生活十分貧苦，因爲一九四二年正是包括延安在內的各抗日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在一二九師師部，劉鄧設宴款待劉少奇，擺上桌來的只有乾羊肉，鄧小平後來說：「那是當時最好的東西了，我們很久沒有吃肉了。」⑳

十月九日，毛澤東在延安爲《解放日報》發表劉少奇《論黨內鬥爭》一文親自寫編者按語：

這是劉少奇同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爲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爲發表，希全黨同志注意研讀。㉑

劉少奇安全抵達晉察冀根據地，離延安已不遠。毛澤東特地在這個時候於《解放日報》發表劉少奇的著作，並親筆作編者按，這明顯地是爲劉少奇即將在中共中央登台亮相作宣傳準備。

十月中旬，劉少奇到達中共太岳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山西沁源閻寨村。時值日軍「掃蕩」，停留了一個多月，十一月下旬，劉少奇繼續上路，要通過敵佔區及同蒲鐵路、汾河。這又是一個敵人嚴密封鎖的危險地帶。毛澤東又特地通知中共晉西北區黨委書記兼晉綏軍區副政委林楓、軍區參謀長周士第、軍局政治部主任甘泗琪，令他們派人小心保護，電文如下：

林、周、甘同志：

少奇同志過路，你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㉒

有毛澤東的電令，林楓等人不敢怠慢，精心組織了得力部隊接送。十二月下旬，劉少奇由晉西北進入陝北米脂、綏德、延川地區，於十二月三十日到達目的地延安。

劉少奇此行費時九個多月，穿越敵人一百零三道封鎖線，行程三千里。劉少奇後來說：「這是一次小長征。」

一九四三年元旦之夜，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舉行盛大慶祝晚會，歡迎劉少奇順利歸來。劉少奇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陪同下走進會場，全場一千多與會者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澤東發表了講話，劉少奇也簡要地匯報了華中、山東的情況，之後是延安平劇院的演出。晚會至午夜方散。第二天，《解放日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盛大新年晚會，並歡迎劉少奇從華中歸來的消息。

從毛澤東對劉少奇西來沿途安全所表示的密切的關注，表現了毛澤東對劉少奇深切的期望。毛澤東對中共黨內的其他幹部，從來沒有表示過如此厚密的情感。

毛澤東已經將劉少奇視作自己的親密戰友。

三、整風運動結果：毛劉共享權力

當劉少奇回到延安時，整風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黨校在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禮堂裏座無虛席。毛澤東在一片掌聲中走上講台，作了題爲《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說：在我們黨內，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股歪風。整風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毛澤東的這次報告，標志着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地正式開展。

劉少奇剛一回到延安，毛澤東便立即安排他參與中共中央日常領導，並繼續指導華中和山東根據地的工作。

隨着整風運動的開展，尤其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對土地革命後期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進行揭發批判以後，對此負有責任的一些領導人已很難在中央書記處繼續工作。張聞天自四二年初便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不在延安；博古也分管《解放日報》，不再參加中央會議；王明自「九月會議」後便稱病，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做工作。而周恩來則在重慶負責南方局。調整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已是勢在必行。劉少奇返回延安後，毛澤東便將此事提到議事日程。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時局與方針的講話，隨後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任弼時在政治局內分管黨群和情報工作，後又兼中央秘書長，主持書

記處的工作。這個報告由任弼時來講，自是合情合理，而調整方案出自毛澤東的主意，亦是在情理之中。任弼時說：現在中央機構比較分散，需要實行統一集中，擬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設組織和宣傳兩個委員會作爲中央的助手。康生也介紹了機構調整的醞釀過程，說：「少奇同志意見，書記處應有一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過去那樣成爲了聯席會議的形式，要能處理和決定日常工作」。㉒

「聯席會議」即是民主議事，毛澤東只是衆多席位中的一位，大家地位平等，凡事常要聯席者研究討論、表決，毛澤東不能獨專。劉少奇的提議打破了這種局面，將大權集於毛澤東一身。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書記處，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會議由主席召集，「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在政治局與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組織兩個委員會，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各部、委、廳、局、社的工作由書記處或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統籌起來。會議還決定劉少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劉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長。㉓

宣傳與組織是中共的主要部門。毛澤東與劉少奇分享中共的最高權力。

這次會議所做的決定，對毛澤東、劉少奇以及中共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擔任中共中央的主席。「毛主席」的稱呼雖然是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澤東擔任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起便有了，但那個「主席」是個「小」主席，象徵的意義多過實質的意義。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雖然成爲中共中央的領導核

心，但職務只是政治局常委，擔任負總責（即總書記）的是張聞天。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第一把手這個職位覬覦已久，也作了精心的部署。其步驟是先把張聞天的總書記職務除去。這一步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辦到。

毛澤東將張聞天的地位與自己拉平後，第二步便是超越張聞天等其他書記，名正言順地登上第一把手的寶座。經過整風運動，這一步也水到渠成地實現了。

至此，毛澤東除了在一九三六年擔任了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外，還擔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共三個主席，開了中共黨史的先河。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規定「書記處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一點是畫龍點睛的最關鍵之處，是權中之權。在這裏沒有任何的條件與時空的限制，不管好與壞，也不分對與錯，毛澤東都可以最後肯定或否決，毛澤東不但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還立於永不失敗之地。這種至尊的、絕對的權力，正是毛澤東所夢寐以求的。

「最後決定之權」，意味着既使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或集體通過的事情是正確的，毛澤東都可以推翻、否決。它的要害是將自己凌駕於集體和黨組織之上，從而根本違背了毛澤東自己倡導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違背了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的組織原則。

本來，「最後決定之權」僅是指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而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並無哪一個人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規定。然而此次會議開了先例之後，使毛澤東超然於其他中央常委之上。久而久之，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不但在毛澤東成了習慣，而且在其他人中也習以為常，不以為怪。漸漸地，毛澤東不但在書記處（即中央常委）有「最後決定之權」，而且在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都搞「最後決定權」，凡是不符合自己胃口的集體決定都一概推翻。毛澤東的家長地位與獨

裁作風，便是由此開始。

毛澤東剛登上主席的寶座，就作出這樣的決定，既表現了他的專制、獨裁的本性，又暴露了他理論脫離實際的虛僞性。一九三八年九月，針對王明在武漢目無組織、獨斷專行、不守紀律的行爲，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然而現在毛澤東卻公然地違背這些原則。說一套與做一套，對別人一套，對自己一套，正是毛澤東的政治品質。

毛澤東的這一錯誤決定，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的禍害與遺患，延續到七十年代，而且越演越烈。在民主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正確，其禍害還不明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執行了一條「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錯誤越來越多，越來越惡劣，因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的危害也就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嚴重，中共、中國以及中國人民，因而飽受苦難。

對毛澤東的這一錯誤決定，劉少奇無疑是積極的支持者。劉少奇可能沒有透徹地了解這個決定的深遠影響和嚴重後果，而且也有爲了樹立毛澤東在黨內威望的良好動機。但不管怎麼說，同意和支持這個決定，無疑是一種喪失原則性的錯誤行爲。

在這次權力再組合當中，劉少奇不但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而且所獲得的權力與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居於第二位。「中共的第二把手」、「毛澤東的繼承人」這種歷史地位，就是從這裏開始形成的。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劉少奇是由於支持了這次會議的決定，才獲得這種地位的。然而，三十年後，也正是由於這次會議決定的影響，劉少奇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機，並且遭受了滅頂之災，還差一點就「永世不得翻身」。

三月十六日政治局會議後，劉少奇積極地加入批判王明的鬥爭中，先後發表了《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等重要講話和文章。前者除肯定自己主持華北、華中工作取得巨大成績外，還批判了王明主持的長江局的錯誤。後者除系統地批判王明路線外，還鮮明地提出中共黨內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以毛澤東爲首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另一條是以陳獨秀、王明爲首的「孟什維克路線」，劉少奇說：在二十二年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劉少奇號召「一切幹部，一切黨員」，「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的環節和部門中去」。

劉少奇不負毛澤東所托，除了在批判王明的鬥爭中發揮重大影響外，還從組織、政治、思想上大樹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爲毛澤東建立全黨的統治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曾說：「在（整風）指導部裏，又出現了另一『特別權威者』，即劉少奇……他左手拿着喇叭，右手是歌頌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專家」。（《王明回想錄》一九六頁）。

①：轉引自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六二七頁。
②：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第四八頁，
③④⑤：同上，一九八頁。
⑥：同上，二七四頁。
⑦：引自《劉少奇年譜》。
⑧⑨⑩⑪⑫：同上。
⑭：引自郭思敏、天羽《我眼中的劉少奇》一四四頁。
⑮⑯：同⑦。
⑰：同⑭一五七頁。
⑱：同上，一七八頁。
⑲㉒：同⑦。
⑳：轉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
㉑：引自《毛澤東年譜》。
㉒：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二七三頁。
㉓：同上。

第二章 中共「七大」:「旗幟」與「旗手」

一、「個人崇拜」始於延安

歷時三年的延安整風的積極意義，是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的馬列主義思想水平，樹立了毛澤東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在中共的統治地位，將中共全黨團結、統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從而帶來了民主革命的勝利。

延安整風又帶有嚴重的不足。最顯著的，是埋下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種籽。

隨着整風運動的深入，對毛澤東的頌揚之風也日漸熾熱起來。延安的報刊上出現了連篇累牘的歌功頌德文章。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不約而同地發表講話頌揚毛澤東。闡述毛澤東的豐功偉蹟，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似乎成了時尚潮流，也似乎成了一種政治表態。

一九四三年，毛澤東下令周恩來從重慶返延安參加整風運動。

回到闊別三年的延安，八月二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周恩來發表演說，他說：

「我這三年在外，做的事實在太少了。可是在這三年中間，國際的國內的變化，我們黨內的進步，卻特別的多，特別的大，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爲錯誤了。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爲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迷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①

一九四二年七月，張聞天在一次會議上說：

中國革命過去的歷史證明，有了毛澤東的領導，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就會逐漸走向勝利，就可以轉危爲安；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即不聽毛澤東的意見，或反對毛澤東的領導，革命就會遭到挫折，就會轉勝爲敗，就會從勝利走向困難。②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們黨已經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理論。他說：

「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下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正確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並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又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且善於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③

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是王稼祥。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他在爲紀念中共二十二周年誕辰而作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鬥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鬥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爲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爲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

爾什維克主義。」

至此，毛澤東思想第一次公開提出。④

連王明也打起吹捧毛澤東的旗號。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作了《學習毛澤東》的報告，他頌揚說：

「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產黨中央和共產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衆望所歸的團結中心」；「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在理論上，毛澤東「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多，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好，真正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真正地善於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是偉大的理論家」；《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於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針，同時也就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王明還說：

「對於青年學生學習問題，我只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既以毛澤東

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

他還從五個方面論述了如何學習毛澤東：

第一，「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始終一貫地忠於革命的精神」。

第二，「學習毛澤東勤於學習的精神」。

第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於創造的精神」。

第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於工作的精神」。

第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於團結的精神」。

王明最後又總結說：

「我們總的意思，還不過是一點，就是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學生以及全國的優秀青年，應該以毛澤東為模範，應該學習毛澤東。」⑤

二、中共「七大」：「旗幟」與「旗手」正式登台

在這種政治大氣候下，中共「七大」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

這次大會的最大特色，也是它的最大功蹟，就在於樹立毛澤東思想爲中共的旗幟，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這是一項偉大的創舉，也是歷史的必然。劉少奇在大會上說：「以毛澤東思想貫串黨章，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

於是，毛澤東作爲中共的「旗幟」，正式樹立起來了。而高舉這面偉大紅旗的「旗手」，也就非劉少奇莫屬。

在大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而劉少奇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兩人都是第一次。

有人統計，劉少奇在《報告》中有一〇五處提到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劉少奇一生》說：劉少奇「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科學的概括和論述，代表全黨肯定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

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從而成爲中共七大最重要的歷史性成就」。劉少奇因此而被載入史冊。

由於這一點，處於第二位的劉少奇的修改黨章報告，其名頭竟比毛澤東的主報告更響亮。

劉少奇在報告中說：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組織者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並爲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⑥

劉少奇提出：「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爲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

在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連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總共有四個「主席」名銜。而劉少奇則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排

名第三，僅在毛澤東與總司令朱德之後。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這種「旗幟」與「旗手」的關係，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在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前來訪華時說：接班人的問題，「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繼承人「很清楚，是劉少奇」。

---

①：引自金冲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版，第五五三頁。

②③④⑤⑥：引自張樹軍等《民族救星》，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第三章、毛劉蜜月

一、毛赴重慶談判　劉首次主政中央

中共「七大」以後至建國初期，是毛、劉關係的「蜜月」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決定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是否去重慶？還是出去。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先派恩來同志出去。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選陳雲、彭眞同志爲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同志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①

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即四個主席）職務。會議還決定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爲副主席，劉少奇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

八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親自爲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向各中央局、各區黨委發出電報通告：「在毛離延期間，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職務，並增選陳雲、彭眞兩同志爲候補書記」。②

毛澤東動身之前，將劉少奇召到他所住的窰洞，仔細地交待方方面面的工作，兩人談了整整一天。

八月二十八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和延安各界代表，到機場爲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送行。

劉少奇目送着毛澤東等人與專程前來迎接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張治中上將一起登上美式飛機，望着飛機徐徐駛上跑道，衝向藍天，直至在白雲深處消失。

二、劉少奇：「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離開延安後，劉少奇第一次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既要及時指導全國各地黨政軍民的日常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鬥爭，還要指揮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軍隊協調行動，與國民黨爭奪日本投降後空出來的戰略地區。這段時間是劉少奇一生中工作最繁重、最勞神、最緊張的一個時期。

在此期間，劉少奇做出的最傑出的功蹟，是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重大戰略決策，指揮中共軍隊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這一英明決策，爲中共在短短的三年內打敗國民黨，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被日本佔領。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東北三省地域遼闊，物產豐富，工業、交通發達，是極具戰略價值的地區。因此中共、國民黨都將之視爲戰後的必爭之地。這是一場具有全局意義的爭奪戰。

與此同時，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敵後建立的根據地，除了華北、華中兩地較具規模外，其餘都零星地散布在各個地區，它們規模不大，力量單薄，孤立無援，很容易被國民黨各個擊破。

而當時蔣介石制定的戰略方針是：搶佔東北，對中共形成南北夾攻的戰略形勢。

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下，在抗戰勝利後的千頭萬緒之中，劉少奇以獨特的戰略眼光，敏銳而又果斷地抓住了當時局勢的主要環節，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提出了力爭東北，「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劉少奇在發給在重慶的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否則我之主力分散，地區太大，處處陷於被動。因此，我們意見，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並調華東新四軍主力十萬人到冀東，或調新四軍主力到山東，再從山東冀魯豫抽調十萬人到冀東、熱河一帶……為了加強冀熱遼地區工作，應即成立冀熱遼中央局，派高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並須組織強有力的軍事指揮機關，以陳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擔任，無此領導機關負責，鞏固熱河是不可能的」。③

毛澤東於當天就發回復電，完全同意「向北推進，向南防禦」以及力爭東北的方針，說：東北及熱河、察哈爾控制在手，全黨團結一致，甚麼也不怕。九月十九日，毛澤東又來電，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劉少奇及延安中共中央確定的方針，並提議：在此工作緊張時期內，政治局人員分散各地的情況下，全權委托中央書記處，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職權。④

劉少奇的戰略部署是：重點放在爭奪和控制東北。為此必須從山東、華北地區抽調大批的軍隊和幹部搶佔東北；與此同時，將散佈在江南各地的力量集中、收縮，向北轉移，填補由山東、華北抽調兵力赴東北所造成的空白。具體方案便是從山東、河北調新四軍與八路軍共十萬人入東北，原華中的新四軍

迅速北上山東，原浙東、蘇南、皖南的新四軍過江北上，佔據原華中新四軍的根據地蘇北、皖北。劉少奇這一戰略目標如果能夠實現，就可以從根本上克制蔣介石的「南北夾攻」的戰略，使中共在戰略上處於主動的地位。

早在九月初，劉少奇就展開了搶佔東北的部署。

九月七日，劉少奇指示中共華中局，要他們抽調一批東北籍幹部，立即分別集中，指定負責人帶隊，經山東分局送往東北。九月十一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義，下令中共山東分局抽調四個師十二個團，共三萬人，由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蕭華統一指揮，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活動。當時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軍第三支隊政委張啓龍，晉察冀軍區第十二軍分區司令員程世才、副政委伍晉南等一批幹部，中共中央原準備派他們南下去新四軍第五師和廣東工作，現在也掉轉方向，改派去東北，即日啓程。

正在劉少奇加速往東北調兵遣將的當口，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延安東關機場突然降落一架蘇式小型軍用飛機。從飛機上下來的，是蘇聯後貝加爾湖前線部隊貝魯羅索夫中校和八路軍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

原來，八月下旬曾克林帶領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部隊奉命開進東北，九月六日進駐沈陽，組成了由曾克林任司令員的沈陽衛戍司令部。他們是第一支進入東北的部隊，又是第一次接管大城市，孤軍深入，缺乏經驗，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可偏偏他們的電台功率低，在出關後便不管用了，怎麼擺弄也同延安聯絡不上。正在犯難之際，他們獲悉蘇聯紅軍派駐東北的前線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也想派代表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談問題。冀熱遼軍區前委便決定曾克林搭乘蘇軍代表的飛機去延安，當面向中共中央請示。就這樣，曾克林同蘇軍代表貝魯羅索夫中校一起飛到了延安。

貝魯羅索夫的使命和曾克林不一樣。他一到延安，就去會見朱德總司令，正式轉達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意見：在蘇聯紅軍退出東北前，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八路軍個別部隊已到沈陽、大連、長春等地，請朱總司令命令這些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區；蘇聯紅軍統帥部轉告朱總司令，紅軍不久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東北應由中國自行解決，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

貝魯羅索夫轉達的意見，顯然就是蘇聯當局的意見，不可等閑視之。朱德立刻把會見情況向劉少奇作了詳細介紹。

下午，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蘇方意見和東北工作。

討論之前，先把曾克林請來介紹情況。劉少奇對曾克林說：「你從前線回來，辛苦了。我們很想了解東北的情況，你來得正好。」

在曾克林作了詳細匯報之後，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政治局委員們一致同意戰略重點放在東北，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對蘇聯方面要求中共軍隊撤出沈陽、大連、長春等地的問題，劉少奇說：可采取三種方法，（一）撤名義；（二）撤小部分到鄉下，主要部分留沈陽；（三）從沈陽至營口、山海關，把撤退鬧得轟轟烈烈。三種撤法都用，公開撤，秘密又去。但冀熱遼軍區所轄的熱、察是抗戰以來八路軍的活動區域，不能撤出。由山東派四個師到東北，還是去，方針還是爭取東北。爲了照顧蘇聯與蔣介石的外交關系，組織武裝名義上不用八路軍，但須使群衆知道是八路軍。

最後，劉少奇又提議，爲加強東北的領導，成立中共東北局，以彭眞爲書記，陳雲、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爲委員，立即前往東北開展工作。這項提議獲得一致通過。

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東北局領導成員彭眞、陳雲、伍修權和增派的中央軍委後勤部長葉季壯，便

同貝魯羅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們來的那架小型軍用飛機，飛赴東北。

九月十五日晚，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各中央局下達指示：目前我黨的任務，就是迅速的堅決的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強大力量。現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軍事幹部到東北，華北、華中應派遣一百個團架子的軍事幹部，從班、排、連、營、團到事務、政治人員都配齊，迅速陸續前去東北。一百個團幹部的分配為華中二十個，山東三十個，晉察冀二十五個，晉冀魯豫二十五個。⑤

緊接着，劉少奇便於九月十七日向毛澤東正式提出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在收到九月十七日毛澤東的復電後，劉少奇當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重慶來電和戰略部署。

劉少奇首先在會上發言說：我們今天的方針，是力求控制熱、察兩省，控制東北。要趕快動作，利用時機，控制張家口、山海關，使蔣介石軍從陸路進入東北不可能。東北海岸只要五萬人在渤海灣一段被我們控制，蔣軍就上不了岸，東北局已去了，再派五萬軍隊去，同時要各地配一百個團的幹部，馬上就去。準備十一、十二月在冀東屯集五萬兵力，在蘇軍撤退時宣佈八路軍進東北。各地不要疏忽，還有兩月多。十五萬兵力，東北內部再組織二十萬武裝，槍支糧食都搞好，我們就能控制東北，這時國共談判就有希望。因此，我們要當作全黨全軍的任務提出，我們應向北發展，南面可采取防禦。⑥

會議結束後，劉少奇顧不上休息，連夜起草了三份電報，發了出去。

第一份是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全黨的指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

……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並爭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鬥

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爲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堅決執行之。

（甲）晉察冀（除冀東外）和晉綏兩區以現有力量對付傅作義、馬佔山向察哈爾張家口之進攻及將來胡宗南由北平向張家口之可能的進攻，堅決打擊傅、馬及其他進攻之頑軍，完全保障察哈爾全境、綏遠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爲以張家口爲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之一。

（乙）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步，由山東調三萬兵力到冀東，協助冀熱遼軍區肅清僞軍，開闢熱河工作，完全控制冀東、錦州、熱河。另由山東調三萬兵力，進入東北發展，並加裝備。

（丙）華東新四軍（除五師外），調八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保障與發展山東根據地及冀熱遼地區。浙東我軍即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熱遼中央局，並擴大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爲書記，林彪爲司令員。羅榮桓到東北工作。將山東局改爲華東局，陳毅、饒漱石到山東工作。現在的華中局改爲分局，受華東局指揮，其人員另行配備。

（戊）晉冀魯豫軍區竭力阻滯並打擊頑軍北上部隊，準備三萬兵力在十一月調到冀東和進入東北。

（己）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⑦

第二份電報是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

「爲了控制熱、察發展東北，必須調兵北上。我們意見長江以及部隊原則上撤退到江北。蘇南、浙東可以撤出軍隊三萬到三萬五千，地方黨政一萬，即可加強江北。皖南、皖中七師部隊在桂軍進攻下勢必撤退，亦可撤出約二萬人。爲了使國冀黨不能很快安定南京、上海，我蘇南力量的撤退可以逐步實行，目前只撤主力。」「新四軍部隊北調後，羅榮桓調東北，林彪調冀熱遼，陳、饒調山東。新四軍地區由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負責，組織分局，歸山東（將來改華東局）陳、饒領導。山東部隊迅速北調，以便爭取時間。」⑧

另一封是向毛澤東建議江南部隊盡快全部往江北轉移。

毛澤東連夜發來復電：完全同意劉少奇及中共中央的部署，並提出部署的實施「越快越好」，「亦以快爲好」。

這是繼長征以來中共軍隊最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方針、規劃定下來後，劉少奇又進一步抓貫徹與實施。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向中共山東分局發出指示：山東的部隊和幹部原則上要以全部力量來完成當前任務，要在兩個半月內在東北組織起二十萬至三十萬的作戰部隊，在冀東屯集五萬至十萬的軍隊，以阻絕蔣介石軍隊進入東北，時機緊迫，越快越好。望羅榮桓、蕭華能很快到東北，林彪很快到冀東。在林彪未到冀東前，中央派程子華到冀東主持。

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接到指示，緊急行動起來，迅速組織山東主力部隊赴東北。本來林彪在中共七大閉幕後被派往山東，已先行到太行山，這時接到中共中央調令，也就更道向山海關進發。

由於陸路遙遠，進展緩慢。劉少奇決定採取斷然措施。九月二十九日，他以中共中央軍委名義指示山東、東北的領導人：山東部隊和幹部，如從陸路進入東北，兩個月也不能到達，那時國民黨軍隊必將進入東北，所以必須不顧美艦巡邏，在膠東和遼東立即釆取確實辦法，用全力迅速組織渡海，再不能容許片刻遲緩。

劉少奇第二天又追發一電，提出更嚴密的部署：（一）望令萬毅、吳克華立即帶電台及工作人員到海岸附近去與膠東密取聯絡，接引部隊和幹部過海，鄒大鵬立即帶電台到莊河貔子窩一帶與膠東聯絡，收集船只，到膠東接運部隊，並籌集糧食。蕭華應立即過海，以便指揮全軍渡海及渡海後的部署。伍修權立即到旅大與蘇軍言明我軍行動，並與萬毅、吳克華、蕭華聯絡。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務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務，並不得擅自離開。（二）膠東指揮機關立即遷至海岸附近，與萬、吳、鄒、蕭密取聯絡，全力組織渡海。必須渡過三至四萬人，方能打開與支持東北局面。（三）美軍於今日在天津一帶登陸，我軍渡海行動不能因此停止，應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達旅大口外蘇軍防線內，再沿遼東海岸東行或北行至適當地點登陸。（四）渡海行動如此遲緩，已是大錯，如不立即補救，將逃不了歷史的懲罰，望堅決完成此任務。

新措施果然見效，部隊移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於東北軍情緊急，十月七日劉少奇又急電林彪，要他率領已到冀東的部隊速開東北。與此同時，其他各解放區、各軍區也在根據延安發出的一道道指

令，進行着相應的調整、佈防。

在延安的機關、單位也刮起一股「東北旋風」。根據統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學校、文藝團體、醫療後勤等單位，紛紛抽調大量人員，編成幹部團開赴前線。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又有一批三百多人的幹部隊伍要出發開往東北，劉少奇親自來爲他們送行。

不到兩個月，控制東北的部署基本實現。陸續開進東北的中共軍隊達十一萬人，其中包括羅榮桓等率領的山東主力部隊六萬餘人，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所屬部三萬五千人。先後派往東北的幹部有兩萬餘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彭眞、張聞天、高崗，中央委員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羅榮桓、林楓和十名候補中央委員。劉少奇在九月二十一日曾電示彭眞、陳雲，提出進入東北的部隊統一用東北人民自治軍名義，以便組織大規模的正規軍。十月三十一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正式成立，林彪任總司令，彭眞、羅榮桓分別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轄十個軍區。

在華東解放區，新四軍蘇浙軍區主力部隊陸續撤到蘇皖邊區和山東，新四軍軍部率第二師、第四師、第七師大部分主力部隊轉移到了山東。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由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陳毅任軍長兼司令員，饒漱石任政委，下轄五個軍區。原中共華中局也移到山東改爲中共華東局，饒漱石任書記，陳毅任副書記。另在蘇皖地區組成華中軍區，張鼎丞任司令員，鄧子恢任政委。原華中地區組成受中共華東局領導的華中分局，鄧子恢任書記，曾山任副書記。

這一前所未有的軍事大調動，爭得了控制熱察和東北的先機，打破了國民黨企圖搶佔東北以便南北夾擊關內解放區的圖謀。同時，又及時將分散在南方國民黨心腹地帶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從全國看，中共軍隊已經擺脫了分散被動局面，處於有利的戰略形勢。⑨

三、劉少奇及時指示林彪「讓開大路，佔領兩廂」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由重慶回到延安，劉少奇率領大批黨政軍幹部前往機場迎接。

毛澤東回到棗園住處稍為休息後，便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匯報了重慶的談判之後，劉少奇也匯報了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方針的情況。

會後毛澤東因為在重慶疲勞過度而病倒了。他感到周身不適，睡不着覺，有時躺在床上全身發抖，手足痙攣，冷汗不止。他用冷水毛巾敷在額頭上以減輕病苦，但無濟於事，最後只好入醫院治療，隨後又離開棗園去柳樹店休養。

在這段時間內，劉少奇繼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在東北方面，為了搶佔這塊戰略要地，蔣介石用飛機、輪船將國民黨的精銳部隊調運東北，這些全部美式機械化部隊共十萬人，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指揮下，憑借其精良的裝備和空中優勢，向中共軍隊控制下的山海關，錦州一帶撲去。林彪指揮的東北自治聯軍，兵力分散，協調聯絡不暢，立足不穩，裝備又差，彈藥缺乏，第一仗便敗北，山海關、錦州於十一月中旬相繼失守。林彪率領部隊在極其

困難的情況下向北撤退。

十一月十九日，駐東北的蘇聯紅軍指揮部通知中共東北局，蘇軍將按照中蘇條約將中長鐵路站線及大城市交給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撤出大城市。

在這種形勢下，劉少奇調整搶佔東北的方針，於十一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去電東北局，指出退出大城市後，你們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並加強熱河、冀東的工作。應在洮南、赤峰建立後方，作長久打算。在業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發動群衆控訴漢奸及開展減租運動。」

劉少奇把這種策略叫做「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十一月二十二日他打電報轉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說：「已去電要彭眞、林彪在蘇軍撤退後，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⑩

十一月二十八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東北局說：蘇聯由於受條約限制，長春鐵路線各大城市將交蔣介石接收，我獨佔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除長春鐵路沿線及東北各大城市我應力求插足之外，東滿、南滿、北滿、西滿的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的控制要作爲工作重心，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東北局應本上述方針速作部署。

然而中共東北局動作遲緩，路子也不大對。十二月七日劉少奇向東北局並林彪、程子華發去一電，告誡說：我們目前不應以爭奪沈陽、長春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利用冬季整訓十五萬野戰軍，建立二十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天的大決戰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這是一個工作方針問題，望你們迅速考慮成熟加以確定，否則，動搖不定，妨害工作，喪失時機。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給彭眞發電強調：「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主力部署在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的態勢，而在東滿、北

滿、西滿的許多戰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並無堅強部隊和有工作能力的黨的領導機關去建立可靠的根據地。」「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

毛澤東對東北形勢很不放心。十二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轉，便要人把一個多月來東北和延安的往來電報統統調來，細細閱讀。一番研究之後，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休養所的病房裏寫了一篇對中共東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東北工作的方針，即後來收入毛選四卷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一文。他寫道：「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的地區，現在應當確定不是在國民黨已佔或將佔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這是在現時條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國民黨佔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附近地區。這是因爲國民黨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幹線，就不會容許我們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區內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因此，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

中共東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動起來，東北形勢逐漸改觀。到十二月底，軍隊已經擴編到二十二萬多人。部隊和幹部分散向東滿、北滿、西滿各戰略要地鋪開，發動群衆開展剿匪、清算漢奸、減租和開展生產，使東北根據地從無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來。⑪

毛澤東休養延續到一九四六年夏天。

劉少奇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所制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以及對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決策，無疑是正確的，這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的最重大的決策之一，爲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劉少奇多次說自己不諳軍事，但他在這個時期所表現的身手，大智大勇，指

揮若定，不失爲戰略家、政治家的風範。

劉少奇經受了領導中共中央工作的考驗，而且表現出色，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

四、陝北分兵 毛劉各率一個「中央」

一九四六年六月，國民黨向中共發動大舉進攻，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調集西安綏靖公署胡宗南屬下三十四個旅共二十五萬人的兵力，出動一百架飛機，向延安發動進攻。當時在陝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彭德懷領導的西北野戰兵團，只有二萬多人，僅胡宗南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與毛澤東決定放棄延安。

三月十六日，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率領一部分中共中央機關人員從延安轉移到瓦窰堡。三月十八日晚，毛澤東與周恩來最後撤離延安，開始了轉戰陝北的戰鬥旅程。

毛澤東、周恩來率領一隊警衛人員乘坐四輛吉普車，在夜幕下離開了延安，他們和警衛人員擠坐在一起，車後面掛着拖斗車，毛澤東的衛士石國瑞、孫振國坐在上面，架着機關槍。毛澤東在車上默默地抽烟，一副沉思的模樣。

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問題是：撤出延安後到那裏去？

第一晚住在劉家渠。第二天車又繼續往前走，不久便來到了黃河邊上。

三月二十五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來到子長縣王家坪，與毛澤東、周恩來會合。第二日向清澗縣的小山村棗林子溝轉移。半夜時分，毛澤東等人的支隊在一個山溝裏停車，大家下了公路，到了河灘，毛澤東在衛士的攙扶下爬上陡峭的河岸，鑽進一條彷彿是裂縫般的山谷。沿着山谷裏的羊腸小道前進，眼前豁然開朗，看見山前的幾孔窰洞，周圍哨兵似地矗立着許多棗樹，光禿禿的枝丫在寒風中不止搖拽。這就是棗林子溝。

住下後，毛澤東召集了書記處書記們開會。燈光如豆，儘管五個人都坐在炕上，但在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的香烟烟霧中，每個人的形象都顯得朦朦朧朧。

毛澤東首先發言：我反複考慮了，我們中央不能離開陝北。留在陝北，我們可牽制胡宗南二十多萬大軍，叫蔣介石這個戰略預備隊失去作用。

任弼時說：一面瀕水，三面臨敵，萬一讓胡宗南把我們一網打盡怎麼辦？

朱德從背靠的牆上欠起身來，說：「主席的心思我曉得，黨中央留在陝北，帥旗不倒，對全黨全國人民是個鼓舞，可弼時的意見值得考慮。」

毛澤東闡述自己的看法：「我們在陝北住了十二年，老百姓供養了我們，一遇險情我們就跑，對不起陝北人民啊！」

「我們不能感情用事，要考慮個萬全之策。」劉少奇慢條斯理地說。

「當然，」周恩來說話了，「留在陝北有留在陝北的道理，這裏地形險要，群衆條件好，回旋地區大，安全也保障，一方面我們可以做陝北軍民的主心骨，當然，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牽制胡宗南的部隊，也是對其他戰場的支援。」

「總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過黃河的。」毛澤東好像賭氣地說，「要過你們過好了。」

朱德說：「我同意留。」

劉少奇也說：「我也同意。」

「不，」毛澤東突然話鋒一轉，「也不是全集中到這裏。弼時的意見有道理，萬一我們叫胡宗南一網打了怎麼辦？因此我們也來個古書上說的，兵分三路，如此如此。」他又說：「我們中央分個工，成立一個中央工作委員會，一個中央前敵委員會，一個中央後方委員會。工委到晉察冀的河北平山縣，任務是處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陝北，代表中央指揮陝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後委進駐晉西北，負責陝北戰場後勤保障和安置中直、軍直機關及家屬的工作。」

「我贊成，」朱德首先響應。

周恩來說：「後委就讓劍英和尙昆負責，我們討論一下我們這幾個人的分工。」

都認爲留在陝北最危險，自然又是一番爭論和謙讓。

「澤東同志過黃河，」朱德手統在袖管裏，好像一個莊稼漢似地屹蹴在炕頭上，背靠着牆壁，「我留在這裏。」

「我也同意毛澤東同志過黃河，我嘛，是書記官，理所當然留在這邊。」任弼時說。

劉少奇說：「你有高血壓，還是你跟主席走，我留下。」

周恩來始終沉住氣不開口。

「這樣吧，總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搭配，我跟參謀長搭配，這樣既是政治班子，又是軍事班子，兩全其美。我和恩來留在陝北，總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時同志是書記官跟我們走。」毛澤東說。

「同意。」任弼時鼓起掌來。

朱德還要爭，毛澤東把他制止了：「就這樣定了，夜深了，該休息了，明天恩來還要趕路過黃河。」周恩來要去山西，協助葉劍英、楊尙昆安排轉移工作。

會議形成了一個文件，這就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

通知告訴全黨和全軍，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將繼續留在陝甘寧邊區，同陝北人民共同擔負起保衛邊區的任務。⑫

毛澤東與劉少奇分開了。毛澤東率領中央縱隊在陝北艱苦地轉戰。劉少奇則率領中央工委到達河北省西柏坡，領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和華北解放區的工作。

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發生戰略性轉折，西北戰場根本改觀，毛澤東才準備離開陝北，前往河北與劉少奇會合。

三月十日，毛澤東去電劉少奇：「我們擬於三月二十日動身東移，約於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處」。四月二十三日，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抵達西柏坡。四月三十日，劉少奇前往距西柏坡不遠的城南莊，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書記處會議，毛、劉兩人才得以會合。

這時解放戰爭已到了戰略反攻階段，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民主革命勝利的曙光已是不遠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劉少奇的五十歲壽辰，十二月一日是朱德的六十二歲壽辰。在勝利的氣氛中，西柏坡的幹部爲劉、朱合辦了一個簡單而熱鬧的祝壽晚會。朱德寫了一首五言詩，以祝劉少奇的五十大壽：

賀少奇五十壽於西柏坡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學馬列，辯證啟新思。
獻身於革命，群運見新姿。
人山人海裏，從容作導師。
真理尋求得，平生能堅持。
爲民作勤務，勞怨均不辭。
黨中作領袖，大公而無私。
群衆欣愛戴，須臾不可離。
修養稱楷模，黨員作範儀。
今年雖半百，勝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親莫共產基。⑬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劉少奇與王光美結婚。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

①②：引自《毛澤東年譜》下卷。

③④：引自《劉少奇年譜》上卷。

⑤⑥：見黃崢《劉少奇一生》。

⑦⑧⑨：同③。

⑩⑪：同⑤。

⑫：見李彥清《黃土地·紅土地》，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第一二一——一二三頁。

⑬：同⑤。

第三篇

分歧與矛盾

第一章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與劉少奇的科學社會主義

一、毛澤東：「李自成」與「進京趕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便提到日程上來。在那些收拾行裝、準備上路的日子裏，毛澤東的心情似乎不大平靜。他多次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提起李自成，說「決不當李自成」。

李自成是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在打入北京，推翻明朝之後，以李自成、劉宗敏爲首的農民起義首領生活腐化，內部發生分裂，後來被滿清軍隊趕出北京，最後全軍覆沒，遭到徹底失敗。

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於一九四四年寫了一篇史學論文《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在同年三月十九日重慶的《新華日報》上，該文對李自成成功地進入北京到後來失敗地退出北京的歷史教訓，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總結。

郭沫若的論文連載完後僅二十天，即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爲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鑒戒，不要重犯勝利

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將《甲申三百年祭》列爲整風學習材料。

八月下旬，在重慶的郭沫若收到了延安印刷的《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他立即給毛澤東等人去信，感謝他們的鼓舞和鞭策。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①

時至一九四九年，全國革命戰爭勝利在望，毛澤東要率領中共進北京了，毛澤東於是想起了李自成。在三月五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毛澤東向全黨提出警告：在勝利面前，要防止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受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

爲了防止李自成的悲劇在中共重演，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還提議：

不做壽；
不送禮；
少敬酒；
少拍掌；

不以名人作地名；

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

毛澤東的提議被全會一致通過。這就是建國初期有名的六條重要規定。

有一天，毛澤東與身邊的工作人員閑聊，問道：「進北平以後幹甚麼，你們想過沒有？你們有沒有進城享福的思想？」

「進城以後，少出門，防止出車禍。」警衛員回答。

「不對，應當多見世面，這樣才能長知識。」毛澤東否定了。

「進城以後，不能看太陽上下班了，要看錶按時間辦事了，要買一塊手錶。」

還有的說：「進城以後，大概不吃小米飯了吧。我吃小米飯實在吃傷了，看到小米飯就飽了。」

毛澤東說，這不是思想問題出來了嗎！有了錢買塊手錶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麼多年，不要忘掉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蔣反動派的。就是革命勝利了，進了大城市，可能在糧食上有些調劑，但中國現在還很落後，在短期內也很難完全做到想吃甚麼就吃甚麼。

這時，毛澤東再一次提到李自成。他說，我們進城後還要建立新中國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裏當官。不管當多麼大的官，做甚麼樣的工作，都是爲人民服務，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奮鬥。可不要以爲進城了，當官了，就不求上進了，不願再過艱苦的生活了。那樣，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如往常一樣，到凌晨三、四點才上床睡覺。

「九點鐘以前叫我起床。」臨睡前，他吩咐值班衛士。

「幾點啦？」毛澤東睜開眼就問。

「快十點了。」值班衛士回答。

「讓你們九點以前叫我，爲甚麼現在才叫呢？」毛澤東有點急了。當得知是周恩來的吩咐時，他也就不再說甚麼了。

「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毛澤東這幾句詼諧的話，把幾個領導人都說笑了。

周恩來笑着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帶着這樣的決心和信念，離開西柏坡，踏上了去北平的道路。②

二、劉代表毛秘密訪蘇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正在開灤煤礦視察的劉少奇，接到毛澤東的緊急通知，要他馬上回北京。

劉少奇於十一日上午回到北京，見了毛澤東，才知道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出訪蘇聯，就建立國家機構、經濟管理等事務，同斯大林及蘇共中央交換意見，代表團的成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和中共中央委員王稼祥。

新中國成立在即，毛澤東非常希望這個新生的共和國能得到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而

且新中國如何運作，確實需要向斯大林和蘇聯師法。早在一九四八年初，毛澤東就想出訪蘇聯，但斯大林認爲當時中國革命正處於緊要關頭，毛澤東最好不要離開中國，改由斯大林派遣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中國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現在，毛澤東決定將出訪蘇聯的重任付予劉少奇，說明毛澤東已將劉少奇視爲自己的副手，亦即中共中央第二把手。

在訪蘇期間，劉少奇與斯大林舉行多次會談，就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此外，還訪問了蘇共中央、蘇聯政府機關，包括國家計劃委員會、外交部、財政部、商業部、國家銀行等，並與這些部門的負責人交談，詳細了解這些機構的組織情況和運作方法。劉少奇還訪問了汽車製造廠等一批大型工廠，以及莫斯科大學、列寧博物館、列寧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工業展覽館等，注意學習蘇聯的管理經驗和工作特點。

劉少奇在訪蘇的一個多月期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蘇兩黨的高層領導第一次進行這樣全面而深入的會談，建立了兩黨兩國合作的基礎。

臨回國前，斯大林在孔策沃別墅設宴爲劉少奇送行。在宴會期間，斯大林想起一件事問道：「你們打算甚麼時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劉少奇根據出國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醞釀的意見，回答道：「我們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決華南各省的問題，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可能是一月一日」。

斯大林想了想說道：「解決重大問題時固然要穩妥，要掌握時機，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機。我想提請你們注意防止敵人可能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這是極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意見。劉少奇回到住處後，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於是，毛澤東便將建國的

時間，提前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在此之前，由於高崗的表現不正常，好出風頭，劉少奇令他於七月三十日提前回國。劉少奇與高崗因此結下了怨恨。

八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到達中國邊境城市滿洲里。隨後，在哈爾濱、瀋陽等地視察工作，對高崗領導下的東北局在城市工作及農村中執行的「左」傾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

三、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在離開西柏坡時，曾將進駐北平稱爲「進京趕考」。

嚴格說來，毛澤東這次「進京考試」，是不及格的。

毛澤東的革命生涯，從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壽終正寢，長達五十五年，其中以一九四九年的建國爲分界線，民主革命時期（一九二一——一九四九年）是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是二十七年，兩者相差無幾。然而，綜觀毛澤東在兩個革命時期的表現，便會發現，前後判若雲泥。如果說，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那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便成爲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民主革命時期，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方面，毛澤東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樹良多，形成了被稱爲「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理論體系。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思想、理論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再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而是脫離實際，脫離群衆，也背離了馬列主義。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發表的著作、講話也不少，但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能示以後人的寥寥可數，只有《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該文有不少地方觀點錯誤）等數篇。而其他的，多是錯誤嚴重，或帶有極大的片面性、局限性。而且，即使是上述那兩篇能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著作，卻與毛澤東的整個政治構想不相符，因而未被重視，自發表後，毛澤東從未實踐過。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共和中國人民，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蹟。然而，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破壞與震蕩，造成了極度的貧窮與落後，以及連綿不斷的痛苦與災難。毛澤東成了「史無前例」的千古罪人。

同是一個毛澤東，爲甚麼前後判若兩人？

爲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們需要回顧一下現代中國革命史。

近代的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長期停滯在封建主義階段，經濟、政治、文化均十分落後。這種與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迥然不同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具有它獨特的、有別於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的發展進程。

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要基於他們所處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環境而提出來的。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在許多方面不適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走甚麼道路，革命勝利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去探索一套適合中國情況的理論。

在這個方面，中共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

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在中共成立的「一大」上提出的「黨綱」規定：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社會主義。這是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一次革命論」。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以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歷屆中共領導人，除了堅持這套「一次革命論」以外，中共黨內還出現了「先建立資本主義，後建立社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無論是「一次革命論」還是「二次革命論」，顯然都是不符合中國獨特的國情的，因此，在他們指導下的第一、二次革命，都失敗了。

延安時代以前的毛澤東，也是「一次革命論」者。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就說：「現在工農民主專政，準備將來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去」，「換句話說，今日社會主義勝利的蘇聯，這是我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向前發展的活榜樣！」

到達延安以後，毛澤東發憤地學習馬列主義，並着手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批判、總結了陳獨秀、王明等「右」、「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失敗教訓之後，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這一歷史命題，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主幹，是貫穿及聯繫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條紅線，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正確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重大的傑出的成果。

在以《新民主主義論》爲核心，包括《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奮鬥的現實目標，是要建立

「新民主主義社會」，將來的奮鬥目標，則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認爲：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產物，是中國社會發展必須經過的一個特有的社會歷史階段。毛澤東指出，因爲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種特殊的形式，所以這是革命的第一步，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如同「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④

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關係亦如此，「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爲甚麼要首先爲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⑤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既區別於照搬俄國革命的「一次革命論」，又區別於「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具有獨特的創意，是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關鍵之處，在於對待資本主義的策略。毛澤東認爲，由於中國經濟十分落後，特別是缺乏現代工業基礎，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因此，中國共產黨不能採取俄國革命一開始就消滅資本主義的經驗，而是需要和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得到保護和發展。對此，毛澤東作了十分精闢的論述。

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具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決定了「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⑥「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爲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

不足爲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雖然不是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和「最後結果」，卻「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⑦

這種不可避免性，反映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之所以不沒收獨佔資本以外的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爲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經濟的十分落後，決定了「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⑧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爲甚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的問題，毛澤東有一個極爲透闢的分析和回答。他鮮明地指出：「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只有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才「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欺騙民衆，「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⑨

毛澤東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進步的客觀需要的角度，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必須借重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基本戰略，反映了毛澤東的清醒認識和尊重客觀規律的現實精神。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從理論和重大原則的高度，再一次精闢地回答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爲甚麼應當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而不應當採取別樣的經濟政策」的問題。他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90%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⑩

因此毛澤東向全黨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閃耀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光芒，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運用的最高境界。

與允許資本主義在革命勝利後存在和發展相關聯的，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戰略，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認爲，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說不上向社會主義轉變。「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爲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毛澤東還說：「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⑪後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只有經過民主主

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的著名論斷，並對一向所說的轉變必須具備的各方面條件，作了十分精闢而深刻的概括，這就是：「在中國，爲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⑫這裏所強調的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觀念形態、精神生活的發展必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夠實現，而不可能在革命勝利的一夜之間就可以實現。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說：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間，大約「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從今天看來，毛澤東這個估計明顯是「左」了——作者註）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爲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了基礎，但卻不能立即可以實行。對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向全黨發出了特別的警告：「如果認爲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爲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很快地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⑬

毛澤東爲中國革命制定的這條道路，無疑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的表述，它集中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精神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不但指導了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民主革命戰爭取得了勝利，也指導了建國初期經濟恢復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而證明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正確性，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可是，在建國後不久，毛澤東便徹底地拋棄了這條由他親手創造，並經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確

的革命道路，五十年代初毛澤東便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即包括農業集體化在內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早地動搖和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將中國改造成單一的「公有制」，奉行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為了強行貫徹這種落後的、倒退的、因而不得人心的農業社會主義，毛澤東制造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從而將新中國引上一條貧窮落後、多災多難的道路，而毛澤東本人，也由正確路線的代表，變成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

四、「農業社會主義」的來龍去脈

農業社會主義——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社會主義」自從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產生以來，出現過形形色色的流派。據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概括，這些流派大致有「反動的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眞正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叫做科學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屬於「空想社會主義」範疇，是毛澤東針對中國小農經濟的特點而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十分準確地概括了小生產者既有進步性，又有落後性和反動性的矛盾的思想面貌。

似乎是由於歷史的必然，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能夠逃脫農業社會主義這個歷史範疇。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魔障，成為農業社會主義的俘虜。追述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政治思想蛻變的軌跡。

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針對當時老解放區土地改革中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提出這是一種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指出：「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的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應當批判這種思想。」⑮

在這次講話的二十多天之後，毛澤東在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寫的一份報告中講到晉冀魯豫邊區的一些人認爲「不鬥工商業，就不能肅淸封建、滿足群衆要求」的話旁邊，加了一條注：「這種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⑯

由於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當時不僅黨外，而且在中共黨內也普遍地存在，於同年的七月二十七日，經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批准，新華社以「信箱」的形式，發表了《關於農業社會主義問答》一文。甚麼是農業社會主義？《問答》說：

> 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爲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爲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這一類思想的。

俄國的民粹派，被列寧稱作「舊時農民社會主義」、「小市民社會主義」、「農奴社會主義」和「反動的社會主義」。民粹派被資本主義在農村造成的兩極分化嚇昏了頭腦。他們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意義，把小生產理想化，把原始的農村公社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油彩，「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已陳舊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農村中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所以，列寧認爲：「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無條件是反動的」。

新華社的文章除了從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出發回答了甚麼是「農業社會主義」之外，還剖析與批判了小農經濟的平均主義，並把問題引伸到如何正確估計土改後農村中將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以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問題。文章明確地指出：

以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平均主義思想，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帶有革命與反動的兩重性。從農民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這方面來説，這是革命的方面，正確的方面。我們僅僅在這個限度內去贊成並幫助農民們實行這種平均主義，超越出這個限度，那就是完全錯誤和極端有害的。這種平均主義的反動方面，就是它不獨是要破壞封建的土地財產關係，而是要破壞非封建的即自由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就是要平均主義地破壞工商業及一部分中農和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並把這一切平分稱爲「共產」或「社會主義」，其結果是打擊了廣大工業和農業生產者的向上積極性，必然使社會生產力大大降低和後退。因此，這種思想和這種做法乃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

文章指出了土地改革以後農村出現新的階級分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經過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文章認爲：

因爲土地改革只是廢除了封建階級的私有財產，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並在客觀上還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因此在土地改革之後，農村中的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發展，並使農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階級分化，而絕不能永遠保持平均的小農經濟。有些農民因爲生產條件比較有利，又努力生產，善於經營，他們的經濟就可能發展，而逐漸地富裕起來，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進行剥削，而成爲新的富農。而另外有些農民，因爲生產條件比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產，或者不善於經營，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擊，他們的經濟就不能發展，而逐漸地窮困下來，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變爲新的貧農或雇農。這種競爭與新的階級分化，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許的。抱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看不見土改以後這種可能的社會變化，看不見這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仍將存在，而以爲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後，就能够造成全體農民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的平等或劃一，否認或者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結果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成爲一種反動的空想。

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而是必須依靠社會化的大生產，首先是工業的大生產來從事建設。爲此，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一個時期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大量地發展公私近代化工業，製造大批供給農民使用的農業機器，並因此將農民的個體經濟逐步

地轉變為集體農場經濟之後，才有可能。沒有工業的大量發展，沒有大量的成千成萬的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並使農民有可能團結於集體農場之中，而要實行社會主義的農業，那只能是反動的幻想。

新華社的這篇經毛澤東審閱和批准的文章，與「新民主主義論」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代表了毛澤東當時的思想認識和政治主張，顯示了毛澤東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而反對中國農民歷來的政治要求——主張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從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發，以毛澤東、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一個長時期的發展，特別是大力發展現代化工業，製造大批供給農民使用的農業機器，並由此把農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轉變為集體農場經濟，才能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毛澤東與劉少奇一致強調與注重的，是農業集體化必須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之上這個重要的物質條件，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工業」，從而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置於堅實的科學的基礎之上，並且與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劃清了界線。

建國前後，在中國革命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與步驟的問題上，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的報告。劉少奇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後，還不能馬上直接采取社會主義

的實際步驟。他說：「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表示贊同他的觀點，插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毛澤東在會議的總結發言中還說：「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很具體，很好，兩個階級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後，對這點可作宣傳」。毛澤東還要求，「對這個問題要作進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請少奇同志作準備，草擬文件，提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討論。」⑲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劉少奇在華北財經委員會作報告曾講道：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競爭的政策，經過經濟競爭，到十年、十五年後，大勢所趨，消滅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一九四九年三月，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發言時說，開始工業化，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單有軍事上、政治上的條件，沒有經濟上的條件，沒有工業的發展，要想轉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劉少奇在天津市工商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私人資本是有他的積極性的，必須充分發揮。將來到中國的工業生產過剩的時候，就是要搞社會主義的時候，到那時候，私人資本和積極性已經用完了。但那將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⑳

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向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團校畢業生的講話中說，二十年後，我們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轉入社會主義。一九四九年九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之所以沒有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這是

「因爲要在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採取這種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要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等進行協商並共同地加以決定。㉑會議期間一些黨外人士向毛澤東詢問，要多少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毛澤東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㉒

一九五〇年四月，周恩來向參加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統戰會議的黨員幹部說，毛主席訪問蘇聯回來，到處都碰到問，到底甚麼時候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要十五年左右。㉓

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共的主要成分是農民，而且長期在農村從事革命鬥爭。因此，在中共黨內存在廣泛而濃厚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點也不奇怪。

建國前後，農業社會主義在農村的表現是土改運動中的平均主義；在城市中的表現則是打擊資本主義工商業，過早地實行社會主義步驟的「左」傾冒險主義。

一九四九年五月，正當劉少奇奔走於天津各工廠期間，中共中央將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鄒大鵬寫來的一封信，轉到劉少奇的手上。鄒信是向中共中央反映高崗主持的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發生許多與中央精神不符的『左』的錯誤。從天津返京後，五月三十一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劉少奇寫道：

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給少奇同志，說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正確解決。我們認爲這一個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

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視，發現我們在天津的負責同志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幹部則認爲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貿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場方面統制，不給資本家的生產以應有的照顧，稅收機關對私人生產亦未給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係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強令資本家開工，但資本家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未幫助資本家去克服。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有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只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產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

我們在批評與反對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路線的時候，又必須堅決地、嚴厲地反對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即過早地或過多地在國民經濟中採取社會主義步驟，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左』的傾向，我們必須嚴格地加以防止。

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

這封電文經毛澤東修改（在一些地方加重語氣）、審批後，於當日發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站在劉少奇一邊，支持對高崗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所進行的批評的。然而，僅僅在兩年之後，情況就完全掉轉過來了。

五、「農業社會主義」第一波：劉少奇天津之行

劉少奇從西柏坡進駐北平還不到半個月，就接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要他馬上前往天津，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解決天津接管後出現的問題：

天津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獲得解放的。共產黨接管天津政權很順利，但接管後恢復經濟的工作卻不那麼順利。新接收來的國營企業一時難於恢復正常生產，私營企業普遍停產關門，全市經濟滑坡，工人大批失業，上百萬人口生活無着落。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左」的政策。

對於中共在接管城市的初期出現「左」的政策，主持中共華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曾有較詳細的記述：

我們黨誕生在城市，但後來長時期生活、戰鬥在鄉村，許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還有些

同志難免用一種小生產者的觀點看待城市。華北最初接管城市，走過一些彎路，這是重要的原因，如收復井陘、陽泉等工業區，曾經發生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現象，使工業受到了很大破壞。收復張家口的時候，不少幹部隨便往城裏跑，亂抓亂買東西，有的甚至貪污腐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攻克石家莊，物管工作雖有所改進，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東西，他們還鼓勵城市貧民去拿。開始是搬取公物，後來就搶私人財產，以致於不得不實行戒嚴，甚至槍決了幾個人來製止亂搶現象。進城後，外地機關紛紛派人前去搶購物資，四鄉農民也準備乘勢湧進來。邯鄲、焦作、運城等幾個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覺不自覺地搬用農村的經驗，混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捐害了工商業的發展。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我曾把這些情況寫成專題報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在這份報告上作了一條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㉖

接管北平、天津後，農業社會主義的「左」傾政策的危害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對此，薄一波十分焦急，他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詳細列舉了平、津工業生產中的問題：

除了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絶、原料匱乏、產品滯銷、通貨膨脹外，工作中沒有處理好公私、勞資等關係，也是存在的突出問題。工人、店員誤認爲我們允許分廠、分店，進行清算鬥爭。資本家腦子裏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後工人管不住，無法

生產。因此，他們抱着消極等待、觀望的態度，甚至跑去香港。據天津統計，當時私營企業開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這種情況必須迅速扭轉。向工人、幹部和資本家闡明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下來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認識，消除民族資本家存在的疑懼心理，已經刻不容緩。㉗

天津是中國北方工商業的中心。解決天津問題，對全國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劉少奇便是肩負這一重要使命，前往天津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劉少奇特意從香山進城，到東城區後圓恩寺中共華北局機關找到薄一波，笑着對他說：「一波，我來向你報到」。

薄一波一時沒反應過來。劉少奇說明原委之後，他高興地答道：「你是中央領導同志，該上哪就上哪，何必來告訴我呢！」劉少奇卻認眞地說，按組織原則，應該這樣做。他還交待薄一波：我在天津的活動，一般情況由中共天津市委向華北局報告，有些重要問題由你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報告，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也由你向我傳達。

四月十日晚，劉少奇離開香山，乘火車去天津。

列車在夜幕中抵達天津站。在車站迎接他們的是天津市的主要領導「三黃」：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黃克誠、天津市市長黃敬、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黃火靑。主人安排劉少奇一行在海河邊小劉莊附近台灣路九號的兩幢小樓住下來。

從第二天上午起，劉少奇開始了一個接一個不間斷的視察、開會、聽匯報、作報告。

四月十一日上午，劉少奇首先來到中紡一廠。這個廠剛剛完成接收，生產還沒有完全正常，工人、職員之間還有矛盾。

劉少奇要軍代表請一些工人、職員來座談，聽聽大家的意見。職工們很想聽聽這位共產黨大幹部的講話，工廠的會議室裏坐滿了人。

劉少奇首先讓大家提問題，反映情況。接着，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釋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工人、職員、接管幹部團結協作，共同把生產搞好。他熱情地提出希望說：天津解放早，現在還有大半個中國沒有解放，天津的工人階級有責任搞好生產，支援大軍南下，爲解放全中國做貢獻。

下午，劉少奇在小劉莊住處聽取黃克誠和黃敬的匯報。黃敬市長在匯報中談到：眼下一些工廠勞資關係緊張，資方財產被凍結或分掉，而我們的幹部卻多是站在工人一邊；再加上工人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分紅利等，使得工廠在資金和管理上出現問題，維持生產有困難，復工復業便成了問題。劉少奇立即表示：這不行，這是「左」的行爲，是自殺政策，要抓緊糾正。

他和黃克誠、黃敬當即商量決定，軍管會成立調解勞資糾紛的勞動局，資本家可以直接到軍管會反映意見，並安排中共基層幹部到工會去做工作。㉘

此後，劉少奇差不多都是上午視察工廠，下午聽取幹部們的匯報，研究解決各項問題。

劉少奇在天津工作的一個重點，是向中共的各級幹部傳達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批判和糾正對待城市工商業和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左」傾錯誤。

與此同時，劉少奇還到工廠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解決勞資關係。劉少奇先後到過中紡一廠、造紙廠、自行車廠、電工器材廠、汽車製配廠、電燈泡廠、永利製碱廠和新港碼頭。每到一處，都召集工

人座談，了解工人情緒，宣傳中共的政策。

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

一、在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過程中，最容易發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鬥爭對象，搞亂敵我陣線。他說，民族資產階級還不是我們今天的鬥爭對象，「如果當作鬥爭對象，則是犯了錯誤，……這錯誤是路線錯誤」。他說，「資本家在生產方面佔很高的地位」，保護他們，「實際上就是保護生產」。「天津的工商業將近有四萬家，光是搞生產的——工業就有上萬家，有好幾十萬工人，……社會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襪子、牙刷、牙粉……要他們供給，他們是社會上的一個很大的生產力，這個生產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沒有他們還不行。」

二、他批評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出現的「左」傾情緒和行為時說，進城了，敵人看不見了，就把眼睛盯準「大肚皮」工商業家，把子彈朝他們打來，像農村分田地一樣，要分工廠、汽車、洋房、機器；或向他們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或強令資本家不準辭退工人；或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的壞，不說他們的好；幹部、工人不敢接觸資本家，否則就是立場不穩。總之，只強調鬥爭的一面；不強調聯合和利用，以利於發展生產的一面。這是一種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行為。

三、私營工商業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所允許的。因為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不是工廠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

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

五月五日劉少奇在天津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反「左」要比反右困難得多。他說：

不要怕說話，怕被人說投降了資本家，該說的話不說，結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業後罵你，我們要早講才對。「左」的東西是常常有一股勁的，反「左」的勁頭一定要比原來的勁頭更大才行。反右的時候，他一聽右傾機會主義就會改。反「左」，他往往會反過來說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資本家很高興，工人有的可能不高興，但是不要緊，我是誠心誠意爲工人打算，工人將來會知道。最近東亞毛織廠的資本家宋棐卿寫信給我，說要擴大生產，再開一個工廠，我也回了他一信，好象我是替資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開了一個新工廠，使原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豈不解決很多工人失業問題？所以只好和資本家搞好一點，不要怕罵投降了資本家。真正替資本家着想，投降了資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場。如果不失立場，鼓勵了資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關係拉好了，弄的立場失了，那就是右了。關係極好，發展生產，又不是失掉立場，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有人說和資本家拉好關係，就是失掉立場，這是錯誤的說法。這種人大概立場不穩，一接頭就投降了資本家。共產黨人不是放在箱子裏不見人的，而是經風霜的，這才能考驗一個人的立場。㉙

劉少奇在天津的另一項任務，是向資本家做工作，解除他們的思想問題。於是，找資本家談話，邀

請工商界人士開座談會，參觀他們的工廠企業，便是劉少奇的日程安排之一。

對這些資本家，劉少奇也向他們認眞解釋共產黨政府的政策，說：政府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從原料到市場，由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

有個資本家說：「現在我們只能在國營工業的空子裏，吃點殘羹餘湯」。劉少奇回答說：「其實不然。今天，中國的工業還不很發展，國營企業還只是些點點滴滴，私營企業的活動範圍很大，可以和國營企業平行發展。」

有的資本家反映很不願意聽「資本家」這個稱號，很怕聽「剝削」這個詞，擔心「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劉少奇笑笑說：「如果你能找出另外的詞來代替也可以。在沒有找出另外的適當的詞之前，我只好仍舊叫你們『資本家』」。「現在，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當中，你們這些資本家可以充分發揮積極性。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怎麼辦呢？上次我對宋棐卿先生說：你現在才只辦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八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你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八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經理，因爲你能幹，再加給你八個廠子，一共十六個廠子交給你辦，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可是你得要辦好啊！你幹不幹呢？宋先生說：『那當然幹』。將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這個工作，從現在起就搞，就是實行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現在有好些人怕說剝削，但剝削是一個事實……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以後，資本主義

剝削是有進步性的。」

東亞公司經理宋棐卿在劉少奇同他談話之後，很快提出了增設新廠、擴大生產的計劃，還寫信向劉少奇作了匯報。爲表示鼓勵，劉少奇給他回了封信：「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爲欣慰。望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復興指日可待也。」㉙

劉少奇在天津的以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爲主旨的活動和講話，起到了良好的積極的作用。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劉少奇的講話，並批准將他的講話向各地傳達。中共中央還發出專門指示，北平、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紛紛按照劉少奇講話的精神，制定出城市管理的條例和暫行辦法。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專題報導說：

> 劉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資本家談話，透闢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發展生產的政策以後，使資本家更明確地認識勞資關係，消除或減少了疑慮，提高了經營情緒。同時，職工會也對工人進行了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使他們認識到目前只有在勞資兩利的方針下，積極發展生產，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由於勞資雙方明確了勞資兩利的方針，並經人民政府和職工會合理地解決了勞資間的一些具體問題，勞資糾紛顯著減少，如在舊曆五月節，即很少發生勞資糾紛事件。這對恢復與發展生產起了推進作用。㉚

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中，也有個別地方用詞不當，比如「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等。當薄

一波將這些不妥當的話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說這些話不一定這麼講。朱德在講述這個問題時，就表達得就比較確切恰當：「爲了工人階級根本的長遠的利益，還必須在現階級自覺地忍受資本家之一定程度以內的剝削。」

毛澤東在當時雖然沒有指責劉少奇的失言，但過後也沒有放過他。不久後，毛、劉之間發生了建國後的第一次分歧與矛盾，從而引發了著名的「高饒事件」。而「剝削有功」這些失言，便成爲鬥爭的內容之一。劉少奇爲此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在「文化大革命」中，「剝削有功」更成爲劉少奇向資產階級投降的證據之一。

六、「農業社會主義」第二波：毛劉關於「富農黨員」的爭論

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制度，是對生產力的一次巨大的解放。獲得土地的農民，迸發出空前的勞動生產積極性，中國的農村，出現了一片生氣勃勃的嶄新景象。

翻身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集中地表現在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的強烈願望上。對於長期遭受封建壓迫和剝削，處於極端貧困的個體農民來說，這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正是以小生產爲主的中國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的最基本和最巨大的動力。同時，這種發展，在農村必然帶來了競爭和貧富差別、兩極分

化。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對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的，也是中國農業向社會化發展的不可避免的階段。

面對着這種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現象，如何正確地看待和處理，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對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曾經有所預計，並通過新華社發表文章，向黨內外作過相應的政策上的解釋和說明。

建國以後，在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村中出現的經濟競爭和貧富分化現象，證實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預計。

面對着農村中出現的這種新形勢，中共黨內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考慮是，農村工作的任務應該是積極幫助農民改良技術，解決供銷困難，加強技術和經濟上的領導，以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引導農民繼續前進。另一部分人對貧富分化，中農普遍願意「單幹」、發家致富表示極大的憂慮，擔心農村中已有的互助組織會因此解體，擔心富裕起來的農民會走向資本主義。

在中共中央東北局農村工作部匯編的一九五一年的一份農村調查中說：「新富農出現後，發展生產兩條道路的競爭，在農民思想上，特別是有了三四匹馬的富裕農民中，走哪條道路，就更加躊躇徘徊（因爲他們有了單幹條件），勞動互助搞不好，他就趨向單幹的路，……所以單幹戶逐年增多，參加換工互助的戶逐年減少，這是嚴重的自流現象。」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一九五二年九月《關於農村資本主義發展情況和對策給毛主席、中央的報告》中說：「農村階級分化之所以如此迅速明顯，從黨的領導作用方面來說，與互助合作開展不力，黨在農村的政治工作不強，有極大關係；但是，其實際社會原因：在於個體農民自發發展着資本主義。具體表現在：農村僱傭勞動，債務剝削，土地買賣，租佃和典當，均有了相當的發展；要求我們採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給以必要的限制。不能放任自流，任其

泛濫。」中共河北省邯鄲地委更是焦慮地指出：「農村資本主義的嚴重滋長，已經是當前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障礙。」㉛

中共黨內對農村新形勢產生的這種分歧，實質上是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分歧與對立。正如毛澤東在《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中所說，土改後農村中出現的經濟競爭和貧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允許的，不可怕的，而且是有益的；相反地，要求土改後農民在經濟生活中的平等或劃一，否認或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空想。上述的中共黨內一部分人在建國後產生的嚴重憂慮，恰恰正是毛澤東所批判的反動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中共的黨員幹部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濃厚，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薄弱，建國後黨內出現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分歧，這本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分歧反映到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班子內部，引起毛、劉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卻是人們始料所不及。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的第一次分歧，發生在一九五〇年關於東北富農黨員的問題上。

東北地區是全國最早完成土改的地區之一。土改後農村出現的各種情況，在這裏都有着充分的反映。因此，以高崗爲首的中共東北局，也較早地存在着種種的憂慮，並考慮解決的辦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召開了大型的座談會，專題討論農村工作問題，十二月十日，中共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作了總結發言，着重對土改後農村的新情況和今後發展方向問題，作了闡述。他說：「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爲豐衣足食的農民。而要做到這點則需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仍是我們農

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基於這一認識，他雖然批評了「各種各樣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着重批評了允許單幹，允許雇工，允許借貸，允許買賣土地，批評「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任其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路線」，他還提出原則上不允許黨員雇工剝削、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等意見。高崗的思想傾向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限制單幹，以國家扶助的形式鼓勵和發展互助合作，以期遏制農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高崗的總結發言表明，他雖然沒有直接否定現行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但實質上是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

東北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精神和高崗的總結發言在東北地區貫徹執行後，很快使東北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出現了嚴重的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傾向。據《東北日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報道，在遼西、遼東兩省新解放區和吉林、松江兩省的一些老解放區，有關部門采取了各種方法排斥單幹農民。如，單幹戶出門不給路條，開荒時不准先佔場子，及不給貸款、貸糧、貸農具，供銷社不賣給任何東西，使單幹農民不僅生產上寸步難行，而且人權上受到歧視。

一九五〇年一月，東北局將高崗總結發言的主要內容報告了中共中央。高崗的主張和東北局的作法在中共黨內引起了不同意見。

首先表示不同看法的是劉少奇，一九四九年秋，他在訪蘇歸來途經東北哈爾濱時，曾調查了解了東北土改後的新情況。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簽發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東北局關於黨員雇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復信。信中指出：「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對黨員變成富農怎麼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

也是錯誤的。」

同一天晚上，劉少奇還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等作了談話，對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百分之七十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爲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爲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爲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爲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現在對富農雇人買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後再限制。黨員成爲富農其黨籍怎麼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要將財產交公也交不出去，將來在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爲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再開除也不要緊。認爲（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

對高崗的主張持不同意見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常委張聞天。一九五〇年五月間，他在給毛澤東的三封信中，分別就土改後農村經濟發展道路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第一，關於農村階級分化問題。他認爲，「這是農村生產力與社會生產力要求向上發展的不同表現」，對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視無睹，也不要過分大誇大它的危險而表現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加以限制」。他主張，凡有利於土地的合理使用、工礦事業和農村副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

分工的租佃，買賣及移居，我們不應反對；

第二，關於互助合作問題。他認爲，要反對強迫命令和急性病，反對那種以爲要農村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須把所有的農民都依照我們的願望組織在生產互助組內的「左」的觀點。

第三，關於富農黨員問題。他認爲，要教育農村黨員堅決爲農村合作化的方向奮鬥，凡農民黨員有向富農轉化趨勢時，給以事前的警告，使其轉變；如不可能，允許自由退黨或開除其黨籍。㉜

除黨員原則上不允許雇工剝削這一點，張聞天的意見與高崗接近外，整個來說他與劉少奇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他們的意見，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也是符合毛澤東《關於農業社會主義問答》中的基本精神的。

對於劉少奇的這次談話，周恩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說：「少奇同志的談話，可能有個別話走了火，但本質上還是對的」。「走了火」的話，是指「富農黨員」這種提法。共產黨員不能有剝削行爲，這是中共黨章所規限的，「本質上對」則是指劉少奇的談話符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然而，毛澤東卻明顯地反對劉少奇這一談話，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據高崗說，他收到少奇同志談話記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㉝

後來，在毛澤東的默許支持下，高崗將這個談話當作反對和打擊劉少奇的一個武器。

七、「農業社會主義」第三波：毛劉關於山西

農業合作化的爭論

建國後，中共黨內除了在農村的貧富分化、農民「單幹」，今後是走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發家致富道路等問題上產生分歧外，還在以手工勞動爲基礎的農業是否可以僅通過組織合作社就能實現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農業，是否僅僅通過改變生產關係（即農業合作化）就可以實現，還是必須依靠發展生產力（即農業的機械化），才能實現。這又是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原則問題。

引起這一爭論的，是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是老解放區之一。土地改革完成得較早，又有組織起來渡過災荒，發展生產的經歷。建國後，與東北，華北地區一樣，山西農村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另一方面農村中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富裕起來的中農熱心於單幹，原來的互助合作組織瀕臨煥散的狀態。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華北局寫了一份題爲《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說：隨着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的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們不是向着我們所

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着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煥散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山西省委提出：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爲此，應該把「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這兩個進步的新因素加以扶植，以逐步戰勝農民的自發趨勢，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共華北局領導人薄一波、劉瀾濤等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爲愼重起見，他們多次請示劉少奇。劉少奇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他指出，現在采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全作社。農村兩極分化不可怕，農村還要繼續向兩極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組織貧雇農向富農鬥爭，待有了機器再實行集體化。在現有的基礎上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空想社會主義。目前應當鞏固和確保私有，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的意見是錯誤的。㉞

根據劉少奇的意見，中共華北局於四月下旬召開了五省互助合作會議。會議上發生激烈的爭論。華北局的幹部認爲土地改革後應當鞏固私有基礎，逐步動搖私有基礎是錯誤的；沒有機械化就不可能實行集體化、合作化。而山西省代表則堅持認爲，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正確的，應當防止農村兩極分化，克服農民自發勢力，積極試辦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長治地委書記在發言中提出，在老區提高互助組的問題，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帶領農民前進的問題。農村中發展生產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一條是農民曾經千百次走過而失敗了的富農道路，一條是共產黨領導的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正確道路。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日益明顯，現在的問題是對農民自發的富農路線持何態度的問題，是任其自由發展呢？還是領導組織起來去戰勝它呢？在共產黨人來說，領導農民生產不僅是爲了發展生產而發展生產，而且在發展生產中還有其遠大的政治目的，要在發展生產中團結與改造小生產者，逐步地把農民帶

向社會主義。㉟

會議未能取得統一的意見。中共華北局於是在五月四日正式批復山西省委四月十七日的報告。明確指出：「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任務只動搖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一般地動搖私有財產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提高與鞏固互助組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以滿足農民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要求，而不是逐漸動搖私有的問題。這一點必須從原則上徹底搞清楚。」批復進一步指示：「農業生產合作社，全省只能試辦幾個作爲研究，展覽和教育農民之用。不能強迫試辦，更不宜推廣。」㊱

劉少奇在接到華北局的批復並聽取了華北局負責人的匯報以後，在多個場合嚴肅地批評了山西省委的意見。

五月七日，他在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說：「現在有人就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多年」，「有的同志現在就想從實際上來提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山西省委在農村裏邊提出要組織農業合作社（蘇聯叫共耕社）；這種合作社也是初步的，十家、八家、三十家、二十家的農民組織起來，土地、牲畜、農具共同使用。當然這種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十家八家組織的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我們中國黨內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要糾正，因爲僅僅依靠農村的條件不能搞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幫助，有了國家的工業化，才能供給農民大量的機器，然後實行土地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才

有可能。」「以爲目前組織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國的農業，使個體的小農經濟走上社會主義的農業去，那是幻想。」

根據劉少奇的上述思想，薄一波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一文，將對山西省委的批評公開化。

七月三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報告作了批語：

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當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爲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㊲

七月五日，劉少奇在中南海給馬列學院學員講課時，介紹了他對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解。並再次指出：「對農民自發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趨勢』，這完全是空想。」「企圖在互助組內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的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

右的，改良主義的。」「目前的互助組或供銷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體農場。集體農場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來組織，而不能『由互助組發展到』，也不能由供銷社發展到。」

七月二十五日，華北局向中央作了《關於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陳述了四月會議及以後的一些情況、爭論和解決的問題，劉少奇在報告上作了多處修改，再次強調了他對山西省委意見的批評和對農業互助合作問題的看法。

劉少奇、中共華北局與中共山西省委之間的爭論，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當即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能支持他們，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是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尙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這符合七屆二中全會和政協《共同綱領》關於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經濟的決定。㊳

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薄一波《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薄文認爲：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到集體化的道路，「是一種完全的空想」。毛澤東批評「這是違反黨的決議的。」㊴無疑的，這也就是對劉少奇山西批語的批評。

就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分歧的重要時候，高崗於十月十四日向毛澤東送上了《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報告說：東北農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經過三年多發展生產的運動，農村經濟獲得了普遍的上升。「東北農村經濟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過土地改革之後，黨就將貫

徹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方針，作爲農村工作的重點，並在組織農民生產與交換方面積極推進了合作互助與供銷合作政策，以便有步聚地改造農業經濟，使之由個體逐步向着集體發展。」報告列舉合作互助組的進步意義，在對合作互助組的指導方針上，報告明確表示：「繼續堅持貫徹毛主席屢次指示的方針，即根據群衆的自願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逐步由低級引向到較高級的形式。」

毛澤東看了高崗的報告以後，於十月十七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眞、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囑楊尚昆「印成一個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毛澤東還同時爲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充分肯定了高崗的報告。批語說：「中央認爲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衆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同時不要輕視和排斥不願參加這個運動的個體農民。」

高崗的報告具有濃厚的機會主義的味道：對毛澤東投其所好，對劉少奇則落井下石。高崗的這一策略無疑是頗爲成功。於是，在政治鬥爭的記分牌上，高崗又得了一分，而劉少奇則又失去了一分。

毛澤東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中國可以在當時的經濟基礎之上，而不是在實現國家工業化之後，實行農業合作化；現在，而不是到遙遠的將來，就可以動搖私有制的基礎，限制和否定資本主義；現在，而不是十年十五年後才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

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戰略思想上的重大改變，是由科學社會主義向農業社會主義的蛻變。

爲了反擊劉少奇的觀點，實行自己的新主張，毛澤東決定召開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起草一份農業生

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並委派他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來主持這件事。

陳伯達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對《共同綱領》關於「凡是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所有權」的規定，一邊保護，一邊也可以動搖。現在保護它，就是爲了逐步動搖它。毛澤東質問：「爲甚麼不能動搖私有？保護之，就不能動搖之？」對於華北局批評山西省委妄想通過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辦法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質問：「爲甚麼不能直接過渡，還要經過甚麼？」㊶

儘管有毛澤東的指示作爲「尚方寶劍」，但會議上還是發生了熱烈的爭論。在談及土改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時，陳伯達一再強調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著名作家趙樹理卻以自己家鄉親友、鄰居爲例說明土改後家民最熱心的是單幹發家，而不願互助勞動和合作經營，認爲現在的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

九月三十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決議》共十三條，主要的精神是要求在土改後的廣大農村立即采取組織起來，通過互助合作的形式，發展農業生產，向社會主義過渡，制止農民向資本主義發展。從文中提出互助合作「也不一定都是整齊劃一地循序而進」，及認爲在有條件的地方立即就可以試辦「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可以體會到毛澤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急切心情。事實上，《決議》的通過，標志着中國農業開始由私有的個體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又批發中共河北省委於十一月十三日給華北局關於農業生產問題的綜合報

告，該報告提出今年河北省互助組已由六十萬個發展到一百萬個，並有二十二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在批語中說：「河北省委這個報告很好，請你們加以研究，吸收其中有益的經驗在各省推廣施行。」㊷

十二月十五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將《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批發全國。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說：「請都照此（草案）在黨內進行解釋，並組織實行。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作一件大事去做。」㊸

毛澤東如此頻繁地發出農業合作化方面的指示，這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對事情的重視，以及急不可待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八、毛澤東由科學社會主義蛻變爲農業社會主義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農業合作化上的爭論，其實質是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鬥爭。

建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都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反對農業社會主義的，到了五十年代發生爭論時，劉少奇的觀點沒有改變，他仍然將山西省委依靠否定私有制基礎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而不是依

靠先進的生產力，來「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的意見，認爲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仍然堅持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革命，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之上。

劉少奇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他堅持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關於農業社會主義問答》的思想原則，堅持了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能照搬理論教條和外國經驗這個基本原則，因此劉少奇是站在正確路線方面。

立場與觀點發生變化的是毛澤東。

在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的思想觀點，發生了以下的蛻變：

一、從小生產者的世界觀出發，過分地害怕農民的發家致富和兩極分化。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表現，就如列寧所批判的俄國的民粹派：他們被資本主義在農村造成的兩極分化嚇昏了頭腦，他們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意義。正是出於這種小生產者的觀念，毛澤東對中國農村中的貧富分化憂心忡忡，他說：「在這幾年中間，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爲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爲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毛澤東還說：「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

毛澤東否定農民的發家致富與兩極分化，不遺餘力地批判農民的「自發勢力」，急於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來「動搖」、「削弱」乃至「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急急忙忙地用「社會主義」去占領農村的陣地，以「共同富裕」為號召，將中國改造成「平均劃一」、「人人平等」的農業社會主義。正如列寧所說：「寧願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舊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農村中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毛澤東的作法，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扼殺先進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的實行，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

二、脫離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空談社會主義

農業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最大的、最本質的區別，就在於農業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小生產經濟基礎之上，因而是落後的、貧窮的、空想的，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反映。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現代化大生產的基礎之上的，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結果。

毛澤東將土改後中國農村出現的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的萌芽掐斷以後，以農業集體化取而代之。毛澤東認為，農業集體化，私有制變為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其實，所有制可以在一夜之間由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但生產力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產生飛躍的發展。農業集體化後，以人力、畜力為主的手工勞動的狀況並沒有改變，中國農村的生產力並沒有得到提高，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是一種放大了的小農經濟。而社會主義是不能建立在這種小生產的基礎之上的。毛澤東否定劉少奇的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為條件的觀點，將社會主義以現代化大工業與公有制相結合為標準，改為以單一的公有制為唯一標準，在大工業極不發達，小生產佔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便急急忙忙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正是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去空談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關於

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根本原則，從而陷入了唯心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泥坑。沒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毛澤東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只能是落後的貧窮的農業社會主義。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定義相去十萬八千里。

三，將農業社會主義當作科學社會主義。

中國是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以「均貧富、等貴賤」爲特色的農民平均主義思想，在中國漫長的歷史和社會生活中有着極爲深厚、廣泛與長久的影響。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和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農民的平均主義的要求。脫胎於農民，又處於小農經濟包圍之中的中共及毛澤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當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傳到中國時，往往出現從平均主義角度去加以理解。毛澤東作爲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不但沒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將這些農業社會主義的要求引導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反而與這種小生產者的訴求產生思想共鳴，同流合污。在毛澤東看來，私有制＝貧富分化＝資本主義，公有制＝平均分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程度越高，產品分配就越平均，因而也就越是社會主義。至於生產力是否高度發展，人民是貧窮還是富裕，社會是否文明進步，這些都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整個社會實現平均劃一便是社會主義了。毛澤東正是由科學社會主義蛻變到「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義。

九、毛澤東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爲甚麼會從科學社會主義蛻化到農業社會主義？

一種說法是，毛澤東「在理論上犯了錯誤」。這種說法在北京政界，學術界相當流行。然而這種說法並不能回答毛澤東爲甚麼要拋棄在延安創造的經實踐証明是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爲甚麼會在理論上犯錯誤。而且，「理論錯誤」只是問題的「流」，而並非是根源之所在。

另一種說法，是說毛澤東「缺乏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這種說法同樣地並不是問題的根源。世界上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東歐的波蘭、匈牙利，亞洲的北朝鮮和蒙古等等，同中國一樣都是第二次大戰後建立起來的，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同樣地經驗不足。但是，他們卻沒有像毛澤東與中共那樣，犯下五八年「大躍進」，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路線性的大錯誤。即使中共內部，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來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同樣地不足，但所犯錯誤的程度，卻有大異。以劉少奇爲首的其他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大問題上，均與毛澤東產生了多次的分歧與矛盾，從而引發了中共自建國以後持續不斷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對此本書稍後將有詳述。因此，「經驗不足」只是次因和外因，而不是內因和主因。

還有一種說法，說建國以後，在勝利面前，毛澤東驕傲了，不謹慎了，聽不得不同的意見，脫離實際，脫離了群衆，所以犯了錯誤。這種說法過於表面化和簡單化，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量，因此它不能

令人滿意地解答上述的問題。

那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爲甚麼會執行農業社會主義，成爲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毛澤東的世界觀是農業社會主義。

中國是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自然也是農業社會主義歷史悠久的王國。在封建主義的壓迫剝削下，中國農村的小生產者早就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從而迸發出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均貧富」、「等貴賤」，成了歷代農民起義的號召和旗幟。

早在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張魯就創立「五斗米教」，結成原始公社式的組織，「設義米」，「置義舍」，吃飯不要錢；唐末的王仙芝，揭竿而起時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的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大聲疾呼：「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

南宋的鍾相、楊么起義，打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旗號；

明末的李自成，用「均田免糧」作爲爭取民衆的號召；

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以平均主義和平等觀念作爲自己的綱領。一八五三年，在太平天國頒布的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裏，洪秀全向人們詳盡地描繪了一幅農業社會主義的模式：根據「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公有原則，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人民二十五家爲一「兩」，組成生產、分配、軍事、宗教、政治、教育等合一的農村公社。在公社裏，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一律歸公，人民生活所需靠「聖庫」平均供給。洪秀全等人認爲，經過「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義，就能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理想社會。

到了近代，以平均主義和平等觀念爲核心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大同世界」，更成了資產階級

革命的仁人志士的思想和口號。康有為作《大同書》，提出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認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國父」孫中山先生亦認為：「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為何？即洪秀全也」。孫中山先生更指出：「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康有為與孫中山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代表了「五四」運動前中國民主思想的最高境界，反映了中國農民反抗封建壓迫、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的政治要求。這種小生產者的政治理想，充斥於中國的歷史、社會，成為中國特有的精神文化及一切反封建的民主鬥士和革命家的思想營養。毛澤東也並不能脫離這種歷史的環境。

毛澤東是個農民的兒子，出生在農村，成長在農村，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自幼就與母親的乳汁一起，鑄成了他的肉體與靈魂。

毛澤東從四歲至十七歲在家鄉韶山的私塾接受啓蒙教育，所讀的書從《三字經》開始，至四書五經，包括《論語》、《孟子》、《詩經》、《中庸》、《大學》等，稍後又讀《禮記》、《左傳》、《公羊傳》等，這些都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孔孟儒學的經典著作。

毛澤東在課堂上接受四書五經教育的同時，還喜歡私下裏偷看一些中國封建時代的小說，如《岳飛傳》、《水滸傳》、《說唐》、《三國演義》、《西游記》等等。從這些古典小說裏，毛澤東既吸取了農民起義造反的精神，同時也接受了濃厚的封建思想意識的熏陶。毛澤東說：我不喜歡讀經，我愛讀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造反的故事。「我認為，我在易受外界影響的年紀讀的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

甚大」。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這番話，意思是要突出自己從小就受到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影響，造就了革命造反的精神。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中國幾千年來農民所要求的平均主義的思想，通過《水滸傳》裏宋江的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生動形象，已經在毛澤東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不可磨滅的烙印。

毛澤東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而且對中國古典的文史知識，具有一種天生的偏好，因而，對封建的小農經濟的思想，毛澤東吸收、接受的特別多，特別快，其影響也就特別嚴重和深刻。

毛澤東自幼生長在韶山冲這個窮山僻鄉，耳聞目睹的，多是農民貧窮悲慘的命運，與地主劣紳的巧取豪奪。對地主壓迫剝削農民，以及農民缺衣少食，粥兒賣女的不平等現象，毛澤東深惡痛絕。

一九〇九年夏，長江發大水，洞庭湖周圍遭了重災，長沙城內的奸商囤積糧食，貧民飽受煎熬。第二年春天，發生了一樁震動全國的慘劇：長沙南門外有一個叫黃貴蓀的窮苦人，以挑水爲生。賣了幾天水，才積到八十文銅錢，叫妻子去買一升米，想讓一家大小喝頓稀粥。妻子到了米店，老板發現銅錢中有幾個是不通用的，拒絕量米。那女人空手回去，向鄰居借了幾文錢，湊足八十文，再去米店，那知米價這時已漲到八十五文，少一文不行，買半升又不肯。黃家女人苦苦求情，米店老板不耐煩，把米價牌子翻轉過來，變成「米已售完」，並叫伙計關板門。這時候一個流氓乘機搶去黃家女人的銅錢，跑去沒影。黃家妻子呼天不應，喊地不靈，就帶着滿腔怨憤，跳了湘江。黃貴蓀聽到噩耗，心如刀割，抱起兩個孩子，也跟着跳進了湘江。

黃家悲劇激起了幾十萬民衆的義憤，他們舉行暴動，這就是聞名全國的「長沙搶米風潮」。暴動後來受到官府的鎮壓，無數飢民被殺，一顆顆頭顱被高掛在官府門口的旗桿上。難民們逃出了長沙，有的

跑到韶山。毛澤東便是從難民的口中了解暴動的詳情。毛澤東說：「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

對中國農民貧困、痛苦生活的深切了解和強烈的同情，是毛澤東的農業空想社會主義世界觀形成的溫床。

稍後，毛澤東「讀資產階級的書，讀七年，學資本主義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信康德『二元論』」。這時的毛澤東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思想，以救國救民爲已任，如飢似渴地吸收反映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和平等觀念的政治思想營養。毛澤東說：「在長沙湖南一師讀書時，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憧憬和熱情」。

這時是一九一八年，毛澤東二十五歲，世界觀與人生觀都基本形成了。

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是當時的普遍的政治要求，問題在於以甚麼目標，甚麼模式去改造。從袁世凱到康有爲、梁啓超，從孫中山到胡適，從李大釗、陳獨秀到毛澤東，他們都有着一套各自不同的理想社會的模式與藍圖，他們正是按照自己的這種模式、藍圖，來改造中國的。而這些理想社會的模式，正是他們的世界觀的集中的、眞實的反映。毛澤東在這時候也建立了自己的以公有制、平均主義爲主要特征的理想社會的模式，這是他自幼便開始萌芽成長，到了一九一八年二十五歲以後，這個理想社會的模式已經成熟了，形成了較爲完整的體系。一九一九年冬毛澤東撰寫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便是明顯的標誌。

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期間，就曾夢想過一種「新社會生活」。一九一八年夏，剛從一師畢業，毛澤東

立即開始「實驗自己的新生活」，他與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周定藩等人，在岳麓山下組織工讀同志會，從事半工半讀，過着一種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的「共產」生活。「新生活」沒有維持多久便夭折了。一九一九年春夏，毛澤東從北京回到湖南，仍然懷念着「新生活」，「乃有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劃」，並籌劃「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的學校入手」。同年冬，毛澤東將縈繞於心中的夢想，寫成《學生之工作》一文，即是「新村」計劃中的一章。

毛澤東設計的「新村」，在經濟分配上是平均主義，在政治上則是獨立平等。毛澤東說：「故勞動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會制度改革之後，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獨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後，不能得到」。「新村」裏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愛，「新村」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銀行、公共消費社。[44]這種大同式的、以公有制和平均主義爲主要特征的新社會，就是毛澤東心中的未來的理想社會。

一九二〇年，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期間，還懷着很大的興趣參觀了「北京工讀互助團」，並立即寫信給陶毅介紹了該團的情況和自己的感想。毛澤東還給周世釗寫信，提出想在長沙「創造一種新生活」，並構思了具體的實行方案：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至於生活費用取得的方法和分配方式，他曾設想一是教課，二是投稿，三是編書，四是勞動。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補助少得的人，以夠消費爲止。毛澤東還與陳獨秀、王光祈、彭璜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工讀互助團」。[45]

毛澤東所孜孜追求的這種「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與歷史上的太平天國以及近代的康有爲等人的主張如出一轍，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小生產者們夢想的天

堂——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信時，正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向斯諾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爲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就在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自認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毛澤東卻在孜孜追求被列寧批判爲「無條件是反動」的農業社會主義，這就正好說明了農業社會主義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強烈與根深蒂固，同時也說明了毛澤東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地膚淺和無力，毛澤東沒有能夠用馬克思主義去改造和克服自己的農業社會主義世界觀——當時沒有，後來也沒有。

後來，所有的這些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等等，都被毛澤東拋棄了。然而，那個農業社會主義卻牢牢地根植在毛澤東的心中，不但沒有被拋棄，沒有被淡忘，反而隨着時間的過去，像醇酒似的，變得更加濃烈了。直到近半個世紀後的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將這個農業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模式提出來進行廣泛的實驗。這種情形就像大浪淘沙一樣，其他的思潮、學說、主義，都被淘汰掉了，只有農業社會主義被毛澤東保留了下來。農業社會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金子」。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項創造，是在政治理論上的一項研究成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毛澤東整個世界觀的概括和集中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毛澤東並沒有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模式，進行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描述。

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的毛澤東，今次為何「疏忽」了呢？無它，在毛澤東的心中，他在一九一九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描述，仍然是存在的，有效的，毛澤東認為那種理想社會的模式是正確的，就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因此毛澤東沒有丟棄它，也沒有改變它——「新村」（也就是農業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佔有神聖的地位。

一方面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堅持小生產者的農業社會主義，這正是毛澤東世界觀的雙重性，矛盾性與復雜性。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代表了中國農民反抗封建主義統治，主張消滅壓迫和剝削的政治理想，在以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主義「三座大山」為目標的民主革命時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與「新民主主義論」的第一步革命目標是一致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因此，毛澤東成為民主革命時期正確路線的代表，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舞台上，導演出威武雄壯的史劇。

民主革命時期，戎馬倥傯，物質條件極其困難，中共及其軍隊內部實行平均分配的戰時共產主義（供給制），官兵一致，上下一致。這種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與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客觀的世界與毛澤東的主觀世界並沒有發生矛盾衝突，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沒有受到挑戰和考驗。相反地，戰時的供給制與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產生強烈的共鳴，給毛澤東予深刻的印象。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中，毛澤東多次提起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不但引起美好的回憶，還給了他許多政治靈感。毛澤東說：「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的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上萬的人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甚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

建國後，通過甚麼道路、建設一個甚麼樣的新中國，用甚麼樣的標准（即世界觀）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信仰到甚麼程度，在毛澤東的世界觀中，究竟是農業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起主導作用，很快地，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便對毛澤東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毛澤東首先遇到的最根本、最重大的問題，是如何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資本主義。允許資本主義在建國後的存在與發展，本是「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核心內容。然而，資本主義是小生產的天生的敵人，當資本主義在土改後的農村中發展，小生產受到分化和淘汰的威脅。這時，毛澤東便退縮了：資本主義遭到毛澤東農業社會主義世界觀的強烈抗拒，保護小生產成爲毛澤東的首要選擇，農業社會主義戰勝了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隨之發生蛻變。

自從與劉少奇發生農業合作化的爭論後，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不斷膨脹。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澤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爲中間階級。」[46]毛澤東不再將資產階級當作朋友，而是列爲主要的敵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他說，我們現在就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後才開始過渡。[47]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黨在建設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

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毛澤東還強調指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開始。㊽

至此，毛澤東完全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完全取消了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以社會主義革命取而代之。毛澤東倒退到陳獨秀、王明的「一次革命論」。

此後，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問題上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綜觀毛澤東建國後的治國方針，其根本的總的出發點，是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視爲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最主要和最危險的敵人，千方百計地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存在和復辟。爲此，毛澤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從農業合作化運動，到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連續不斷的運動，既是實現農業社會主義，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過程，兩者已合而爲一。

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資本主義和私有制，實現了整個社會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實行「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搞「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皀、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喪葬」等的供給制，將整個廣大的農村改造成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慘敗後，毛澤東並不甘心，又重提階級鬥爭，批判「單幹風」等，以維護自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到六十年代中期，環境稍微好轉後，毛澤東又提出「五、七」指示，企圖將全國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消滅分工和商品經濟，分配平均、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社會。這是農業社會主義理想王國改頭換面的再現。爲了再次實現這一理想，掃清前進路上的障礙劉少奇，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然而，「文化大革命」也失敗了。在黃昏歲月中，毛澤東仍念念不忘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王國。一九七四年十月二

十日，毛澤東在接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在這裏，毛澤東仍然堅持他的「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觀念，爲不能消滅「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區別」的不平均現象而深感遺憾。一直到去見馬克思，毛澤東都沒有改變這一觀念。

事實証明，農業社會主義作爲毛澤東世界觀的核心，一直頑固地存在着。毛澤東對它無比向往，執着而又眷戀。它像一條黑線，貫穿着毛澤東的一生，從韶山到長沙，從延安到北京。懷着它，毛澤東渡過了漫長的一生，也爲了使它在中國大地上的實現而奮鬥了一生：從長沙時期岳麓山下的「工讀同志會」及「新村」的計劃，到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運動，到六、七十年代的「五·七指示」及「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但沒有放棄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且還爲其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當作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目標，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八億人口當中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實驗。

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相去何其遙遠。

十、建國後毛劉思想路線比較

建國後，劉少奇與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大政方針上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分歧。有比較才有鑑別。從以下的比較中人們不難發現是非功過的所在。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理論。

新民主主義理論雖然是毛澤東創立的，但堅持和發展這一理論的，卻是劉少奇。在這方面，劉少奇做出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九四八年九月，劉少奇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後來幾年的多次提綱和講話中，勾畫了這樣一幅藍圖：「新中國要有一個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這個階段包括三年五年準備，十年十五年或幾十年建設；在這個階段中，國營經濟、合作社要有大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允許大發展；當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工業化實現），就可以一舉實行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國有化，這可望和平地實現，然後分地區實行農業的集體化。」這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九五一年劉少奇還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對新民主主義理論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精采的表述。

然而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對劉少奇的這一口號提出嚴厲批判，並完全否定和放棄了這一適合中國實際的道路，其結果就必然是照搬馬列主義理論和蘇聯模式，陷入教條主義的泥坑，從而將新中國推向一個錯誤的發展方向。

經過四十年的實踐後，現在，北京的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爲劉少奇的口號，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精華」；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理論」，正是「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在經過四十年實踐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毛澤東對它的批評，是一項重大的錯誤。

二、關於建國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國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毛澤東一直堅持這一理論，並且不斷突出、強化。

其實，第一個提出這一論點的是劉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一文中便提出建國後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經濟及合作經濟的「競爭」，將成爲「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並在稍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毛澤東講了這個問題。然而劉少奇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在莫斯科寫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批評了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後來劉少奇不得不附合毛澤東的觀點，但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鮮明地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而否定了毛澤東的論述。

後來，毛澤東推翻了「八大」路線，並批評劉少奇的提法「馬列沒有講過」。然而劉少奇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在一九五九年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再次重申了「主要的是生產與需要的矛盾」。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觀點是極「左」的，是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照抄馬列主義和蘇聯公式的。而劉少奇的提法才是正確的、科學的。八十年代中共正是肯定和繼承了劉少奇的論點，而否定了毛澤東的觀點，才帶來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三、關於建國後的中心任務問題。

劉少奇歷來把經濟建設作爲中共執政後的中心任務，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在首位。建國前劉少奇強

調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建國後，劉少奇進一步明確提出：「現在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

在這裏，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並強調建國後共產黨的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在《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做兩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推翻三大敵人的反動統治，解放生產力；第二件是發展生產力，「而且要永遠繼續下去，因為生產是更基本的，永遠需要的。如果我們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後，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們的革命就沒有甚麼意義了，我們的革命就不能說已經勝利了，相反，我們還要遭受可恥的失敗」。

然而，在建國後，毛澤東一直將生產資料所有制由私有變革為公有，以及維護這個公有制，即社會主義革命作為中心任務，先後提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命題，「階級鬥爭」成為壓倒一切的主要內容。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上述觀點便被批判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

四、關於資本主義問題。

一九四八年秋，隨着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劉少奇受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委託，對民主革命勝利後的國內形勢、黨的主要任務、工作重點以及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中應採取的基本方針和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思考和研究。先後寫了《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等文章。「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便是劉少奇有關思想

中最光彩奪目和最富創造性的一章。

劉少奇根據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對中國的資本主義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積極的一面，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應該讓私人資本主義得到發展，對民族資本家的政策，重點是聯合而不是鬥爭，注意發揮它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中的進步作用，並提出了利用資本主義的一整套方式和途徑。在農村，保護富農經濟則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一項長期政策，僱工、單干，應該放任自流。

劉少奇指出利用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爲了「借助民族資本，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爲進入社會主義準備必要的物質技術基礎」。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建國前後有關經濟建設的論著、一九五六至五七年有關允許資本家私人開設工廠作爲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論述以及向資本主義學習的講話，到一九五九年有關利用資本主義舊形式發展商品經濟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學習資本主義組織社會化大生產、試辦托拉斯的意見等，可以看到建國後劉少奇一直堅持這一命題。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路線是與劉少奇相反的。建國後不久，毛澤東便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爲中間階級」。在這裏毛澤東斷然否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發展新中國經濟中的積極作用，而將其視爲主要敵人，一九五三年更發起社會主義改造，要讓「資本主義絕種」。此後毛澤東一直將資本主義視爲最主要和最危險的敵人，極力對其「進行全面專政」，千方百計防止其「復辟」。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劉少奇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有關利用資本主義的言論，成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證據，「天津講話」更被誣爲「向資本家屈膝投降」、

「為資本主義奔走呼號」。這一切成為打倒劉少奇的主要罪狀之一。

經過了四十年的曲折發展之後，今天北京全面肯定和高度評價劉少奇的利用資本主義思想，指出它是「寶貴的理論財富」，「閃躍着馬克思主義眞理的光芒」，「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生命力」，「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就是在今天看來，也是無可非難的」，「不僅在當時，而且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是適用的」，也是「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的」。

劉少奇上「天堂」，毛澤東就必然下「地獄」。

五、關於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

劉少奇在這方面的思想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劉少奇以發展生產力作為經濟建設的中心，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便採用，如利用資本主義；而毛澤東是以「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心，例如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敵人，從而斷絕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經濟的途徑；

（二）、劉少奇提出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不考慮國情，不顧客觀條件，急躁、盲動，求快求急，一九五六年的「冒進」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便是惡名昭彰的事例。

（三）、在具體方針上，劉少奇在五十年代初期便提出按「農、輕、重」次序，正確部署經濟建設步驟，注意相互關係和綜合平衡。劉少奇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重工業的發展要與農業的承載力一致，強調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不能搞重工業一馬當先。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獨到見解。而毛澤東在同時期照搬蘇聯的模式，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即「重、輕、農」的方針，並不要綜合平衡，隨心所欲地提

高經濟指標，搞「鋼鐵翻番」。其結果是擠垮了農業，擠傷了輕工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到六十年代才承認「農、輕、重」的方針。

（四）、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因此他提出允許私人資本辦工廠、辦商店，作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補充；在農村則要有自留地、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然而毛澤東強調與追求的，是單一的公有制，將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視爲洪水猛獸，不但私人辦企業屬非法，自留地、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是資本主義，甚至農民養雞養豬出賣，也是「資本主義尾巴」，要通通割掉。很顯然，毛澤東的思想是僵化的、教條的。而劉少奇的思想，北京的學者們現在認爲是「代表了當時認識上的一個進步」，「標誌着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在思想認識上開始突破」，是「試圖改革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早的思想萌芽之一」。

（五）、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不能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不能排斥市場和價值規律，他主張「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而毛澤東恰恰就是忽視商品經濟和市場規律，認爲平均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在五、六十年代大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否定「按勞分配」，把物質獎勵批判爲「物質刺激」。就在這種極「左」思潮籠罩整個中國的時候，劉少奇卻大聲疾呼，堅持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認爲「可以搞物質刺激」，並提出了「計件工資」、「超產獎勵」等具體措施。

六、關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劉少奇認爲，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必須有一定的條件與基礎，必須經過一個相對穩定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使中國實現工業化，然後才能實行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過早地向社會主義轉變是有害的。

與此相反，毛澤東完全不考慮甚麼條件基礎，主張土改後即向社會主義轉變。

（二）、關於土地改革後農村的形勢，劉少奇認為獲得土地的農民有發展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農村的自發勢力與兩極分化，是正常的，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不必害怕。他反對過早地用農業合作社來動搖、削弱私有制，過早的集體化，會傷害個體小生產者的積極性，破壞生產力的發展，是違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認為這種過「左」的思想，正是反動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社會主義。

毛澤東則照搬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和蘇聯的模式，認為土改後要趁熱打鐵，以免發生兩極分化，並擔心農民富了以後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對農民的「發家致富」憂心忡忡，因此急於集體化，急於消滅私有制，搞「窮過渡」，將農村改造成平均劃一的公有制。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一套正是反動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義。

（三）、關於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劉少奇提出「先機械化，後集體化」，將公有制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之上，因而是體現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而毛澤東提出的是「先集體化，後機械化」，完全是空想的、唯心的。

（四）、毛澤東強行實施農業集體化後，不斷地急速提高公有制的程度，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合作化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此，劉少奇認為中國小農經濟依靠手工勞動的條件基本沒有改變，為適應這種低下的生產力，生產、經營、分配的單位應小一點，反對生產關係的改變過快過高。一九五五年他支持鄧子恢「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一九五七年人民公社化的前夕，他反對「拼大社」的作法，認為生產和分配的單位太大了，損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九五九年他再次批評人民公社生產

關係跑到生產力前頭，破壞生產力。

（五）、劉少奇還反對毛澤東將農村改造成單一的公有制，主張必須給個人「有一定範圍的經濟活動自由」，否則就會成爲發展生產力的障碍。因此劉少奇於一九五七年提出包工包產到隊，超產獎勵，固定三年不變，他認爲生產關係不能無限制地變，要有相對的穩定性、固定性。此後他一再表示贊同包產到戶，六十年代初期，劉少奇是最早的疾呼採用這一解放生產力措施的中共領導人之一。

劉少奇與毛澤東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指導思想的分歧，其核心是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實現社會公平（即平均主義）放在第一位，其實質就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對立。現在，北京方面公認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道路是失敗的，而劉少奇的理論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是正確的，如能實行，「就可以走出一條眞正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合作化道路」。而「劉少奇的許多正確主張，對一九七八年以來探索中國農村發展道路，起了先導的作用」。

七、在重大理論上比毛澤東先知先覺。

（一）、劉少奇先於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科學概念。早在四十年代劉少奇便提出了「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到一九五一年，劉少奇在《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一文中，正式地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和「兩類矛盾」的概念，並對兩類矛盾的性質、處理方法等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論述。劉少奇這一創舉，「爲全面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打開了全新的思路」，爲「爲創立完整的系統的兩類矛盾論開了先河，體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遠見卓識」，「爲科學分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內的矛盾奠定了思想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在哲學上的一個重要貢獻」。

（二）、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兩類性質不同的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而劉少奇則進一步指出，在兩類矛盾中，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矛盾，這是毛澤東沒有提及而人們又模糊不清的一個重要問題。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方法和原則上，劉少奇強調利用矛盾的統一性去解決黨內和社會矛盾，反對片面強調鬥爭性，亂搞「鬥爭哲學」；又指出擴大民主、加強民主集中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保證。劉少奇的這些論述，比毛澤東更深刻、更具體、更全面。而且，毛澤東是只說不作，在反右運動、「大躍進」中粗暴地踐踏這些原則，而劉少奇則是努力遵守並大聲疾呼維護這些原則。一九六四年，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派」，將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劉少奇當場提出反對，認爲情況較複雜，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的矛盾，「還是有甚麼矛盾就解決甚麼矛盾爲好」。然而毛澤東將劉少奇的這一科學態度視爲「修正主義」，必欲打倒而後快。

（三）、一九五六年，爲總結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劉少奇最先聽取國務院各部委的匯報，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毛澤東知道後也聽取匯報，並吸取劉少奇的思想精華，才形成《論十大關係》。

（四）、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受到挫折後，爲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劉少奇率先組織讀書會，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與周恩來跟風，形成了一股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熱潮。

（本節所有資料及評論，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出版《劉少奇研究述評》一書二三

八頁——四〇四頁。——作者註)

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數一數二的理論家，建國後毛澤東的思想趨於僵化、遲純，相形之下，劉少奇顯得更加敏銳與活躍，建樹與貢獻良多。在此方面，毛澤東是根本不可比擬的。

儘管劉少奇的思想受到排斥、打擊，但事實證明，建國後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是極「左」的，教條主義的，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而劉少奇則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十一、毛澤東是中共最大的機會主義路線頭子

據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講活中說，中共歷史上大的「機會主義路線」一共有十次之多，他們是：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九二七年瞿秋白的「左」傾機會義義；

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的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一九三五年「張國壽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

一九五三年「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

「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與林彪）的鬥爭。

然而，與毛澤東比起來，他們都是小巫見大巫，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發端於五十年代初期，隨即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起初，這條路線主要表現在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後來不斷發展、膨脹，至一九五八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軍事、思想等各個領域，在全黨、全軍、全國取得了全面的統治地位。此後，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不斷深化、發展，形成既有理論基礎，又有指導具體實踐的方針政策的完整的體系。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對中國的統治，從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足足有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是歷次機會主義路線中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形態也最完備。

在政治上的表現，是「左」傾冒險主義。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建設，其基本特征是狂熱、急躁、盲動、冒險，只講需要性，不講可能性，只講主觀願望，不講客觀條件，求大、求快、求高、求純、求多、求全。於是，原定十五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年便完成了；「兩年超過英國」，「七年超過美國」的口號也從毛澤東的口中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三年進入共產主義似乎也是可行的」，「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等也成爲中共的奮鬥目標。「左」傾冒險主義的另一方面，是大量極「左」的、偏激的思想意識和方針政策。如「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爲

綱」、「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等等。毛澤東將工人和貧下中農以外的社會階層，統統劃為敵對的階級，夸大敵情，擴大打擊面；不但在經濟基礎，而且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既反對資產階級，又反對封建主義、修正主義，既批判文學、藝術、戲劇、電影，又批判歷史、哲學、經濟學、教育、衛生，四面出擊。這些極「左」的彩衣下掩蓋着的，是特別殘酷的法西斯式的封建專制統治。

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由於農業社會主義是空想的、落後的、倒退的，毛澤東的政策脫離實際，脫離羣衆，失去眞理，失去支持，不得人心。因此毛澤東只好乞於封建神靈，大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大搞造神運動。又由於農業社會主義時時處處受抵制和反對，為了強行實施，毛澤東只好依靠封建家長式的專制統治，個人獨裁，專橫獨斷，黨內外都是一言堂。這一套反動、腐朽的東西，成為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掃清道路，保駕護航的唯一工具。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表面上看來確是反對剝削和壓迫、崇尚平等的美麗理想。毛澤東那些極「左」的、激烈的理論、言詞，似乎表達了消滅人間不平等的迫切心情。然而，恰恰是這種落後的手工式的小生產，「按其本質來說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語）。因此，毛澤東既是農業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又是專制統治的暴君，農業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過程，同時就是封建家長統治恢復與確立的過程。毛澤東高喊平等，為「平均劃一」奔走呼號，然而他自己卻對封建特權、個人迷信、專制獨裁甘之若飴。

顯而易見，消滅不平等，將社會改造成平均劃一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旗幟。然而，為了維護這種平均劃一的社會而必需的封建專制統治和家長式的特權，又是對平均主義理想的否定。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不同於十八世紀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它的實質不是對未來的幻想，而是對過去的留戀，

它的反動性不在於它的空想成份不能實現，而在於它的實施過程的本身就是對自己的空想成份的否定」，在於對新的、進步事物的排斥與扼殺，在於他極力維護和保留落後的小生產，將中國拉向封建主義的大倒退。這是中國長期貧窮落後的根源。

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另一特色，是打着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從五十年代初的動搖、否定私有制，到五、六十年代「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時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和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越來越「左」，越來越激烈。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而是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認爲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具有革命的進步作用，將人類的文明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馬克思就曾說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比人類有史以來的總和還要多。資本主義那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那自由競爭、汰弱存強，以及商品經濟和價值律規的法則，都是小生產不可抗拒的剋星。而它所崇尚的平等、民主、自由，又恰恰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對立面　資本主義成爲實現農業社會主義的最大障礙。這就是毛澤東憎恨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反對資本主義的癲狂程度，與他對農業社會主義的狂熱程度是成正比的，不但「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都在於反對之列，連農民養豬養鷄拿到市集上出賣和知識分子鑽研業務，都屬於資本主義而受批判。毛澤東從小生產的觀念出發，不但反對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文明，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也嚴重地打擊和扼殺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就是建國後的毛澤東時代特別黑暗、特別落後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具有特別強烈的破壞性和反動性的原因所在。

打出「反修防修」，賦於現代的色彩，是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政治路線的又一特色。毛澤東將農業社會主義作爲衡量一切政治是非的標準，凡是符合與有利於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的，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革命」，反之便是「修正主義」與「反革命」。在國內，毛澤東將劉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與鄧子恢提倡的「三自一包」都定爲「修正主義」，後來更發展將凡是不同意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人統統打成「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在國際上，毛澤東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所實行的有關利於商品經濟發展的種種經濟、政治改革，也統統視爲「修正主義」，如蘇聯的赫魯曉夫和南斯拉夫的鐵托，便是毛澤東心目中兩大「修正主義頭子」。而國際上的「反修鬥爭」和國內的「反修防修」，便是毛澤東爲捍衛自己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戰略措施」。

在農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毛澤東是孤獨的、虛弱的。面對國內外的「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嚴重估計「階級鬥爭」，誇大「階級敵人」的力量，就既有實際鬥爭的需要，又反映了內心的那種怯弱。而「階級鬥爭」也就成爲毛澤東披荊斬棘的犀利武器和解決各種難題的靈丹妙藥。因此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天天講，年年講」。這是毛澤東政治路線的另一特色。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在組織上的形態，是嚴重的宗派主義。毛澤東不但繼承了中共歷史上機會主義路線的「任人唯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一套，而且還大有發展。

農業社會主義實施的過程，也就是與衆多的反對者鬥爭的過程，爲此，毛澤東發明了「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整套理論，將反對者冠於「資

產階級」、「修正主義」、「走資派」等罪名，將自己的農業社會主義披上「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外衣，因此更具迷惑性和欺騙性。

利用政治運動來打擊反對的聲音，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建國後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連續不斷，一浪接一浪。各個時期的運動，都有各自不同的名堂，所打擊的目標也不同。一九五七年發動的是「反右運動」，打擊的是中共黨外的反對者；一九五九年發動的是「反右傾運動」，打擊的是中共黨內的反對者；到六、七十年代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是打擊中共核心內的另一派領導人：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由於毛澤東缺乏眞理，正常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政治鬥爭，已不能適應毛澤東的需要，因此毛澤東只有「依靠羣衆」：用自己的思想、理論迷惑一部分群衆，去鬥爭另一部分群衆，利用一部分黨員去鬥爭另一部分黨員，利用基層羣衆的力量來「炮打司令部」。毛澤東是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運動的發動者、指揮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由於是「運動」，所打擊的目標就不是以「個」來論數，而是一批批，一茬茬。而且隨着運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受傷害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九五七年抓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多萬人，三年「大躍進」中受鬥爭、批判的升至一千萬人，至「文大革命」更達一億多人。

又由於是「政治運動」，就可以不要法律，就可以「和尙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與江青都說過自己是「和尙打傘，無法無天」）。於是就可以任毛澤東羅織罪名，莫須有地將對手們打倒。長此以往，中國沒有法治，只有人治（實際上是毛澤東個人統治）。人治下的連接不斷的政治運動，是中國社會長期動蕩不安的根源，也是中國廣大人民無窮苦難的根源。毛澤東時代對人民打擊鬥爭的範圍之廣大，受害人數之衆多，其程度之慘烈，是古今中外罕見的。

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在思想上的形態，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是靠反王明的教條主義而崛起的。爲甚麼建國後毛澤東自己反倒陷入教條主義的深淵呢？北京的黨史專家們至今未能有明確的解答。其實原因並不復雜，農業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屬於機會主義的一種，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自然沒有它的合法地位。爲此，毛澤東便要千方百計地從馬列的經典著作中尋找依據，爲農業社會主義建立安身立命的基礎。於是，照抄照搬馬克思、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關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就成了毛澤東的必然之舉。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提出建國後中國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是抄自馬列的有關學說，在這一命題之下，動搖、否定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便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此時此地，毛澤東唯恐照抄照搬馬列主義不眞不確，那裏還想去搞「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呢。這就是毛澤東由反教條主義的英雄變成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原因所在。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畢竟是嶄新的課題，馬列主義不可能都有論述。因此，在照搬照抄之餘，毛澤東還將革命戰爭的經驗，搬抄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例如「大躍進」時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中大搞「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全民大辦鋼鐵」等等，便是採用民主革命的經驗。又如毛澤東欣賞戰時平均主義供給制，企圖取消工資制，提出「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爲甚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爲甚麼要搞工資制？」

不論是教條主義還是經驗主義，毛澤東都表現出脫離實際，脫離羣衆，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毛澤東制定政策、提出計劃，只講主觀需要，主觀願望，而不講客觀條件、客觀規律。在精神與物質、生產

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中，毛澤東片面強調和誇大精神、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作用，而忽視物質、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作用。於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就竟然出現在寫過《實踐論》與《矛盾論》的毛澤東的嘴上。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性，在這裏表現無遺。

鄙視知識，鄙視人類的先進文明，是這條路線在思想形態上的另一特色。毛澤東反對商品經濟與貨幣交換這類先進的生產方式，因爲這些經濟活動擴大人們的視野，豐富人們的思想和社會聯系，而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自然經濟，才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毛澤東鄙視文化，鄙視知識份子，認爲知識份子最無知識，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知識分子要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他把人類歷史上優秀的文化遺產統統冠於「封資修」，全部趕下舞台。這是因爲人類的精神文明可以促使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愚昧與無知，正是農業社會主義最佳的氣候和土壤。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寫的《實踐論》中說：「我們也反對『左』的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眞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實現可能的理想，勉強地在現時來作，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經驗主義。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爲特征」。這段話正是建國後的毛澤東的寫照。

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分裂，還突出地表現在他的政治品質上。建國後，在政治生活中，毛澤東經常表現出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對人一套，對己一套；表面一套，背後一套；他文過飾非，推諉責任；他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以打擊對手；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時常使用封建宮廷鬥爭的權術，搞陰謀詭計，設政治陷阱，爲打倒政敵而無所不用其極。晚年的毛澤東，將維護自己的權勢地位放在首要位

置，而將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福祉置於腦後，七十年代初毛澤東與林彪關於設置國家主席的爭論便是明例（參看拙作《林彪與毛澤東》）。與長沙時期那個以救國救民爲己任的熱血青年相比，晚年的毛澤東已成爲靈魂齷齪、行爲卑劣的「糞土萬戶侯」。實現農業社會主義的過程也是毛澤東由一個革命家墮落爲一個封建君王的過程。

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和經營，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從指導思想的理論，到具體的方針政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並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行業，每個角落，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八億人民，無一不受到其影響。這是歷次機會主義路線中影響最深、最廣的。

因此，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的損失也是最慘重的，僅三年「大躍進」便死了四千萬人，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元，而「文化大革命」的經濟損失更高達五千億元。

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而建國後的中共黨史，也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與劉少奇爲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

---

①：見《毛澤東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②：引自海魯法等《生活中的毛澤東》，華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版，一三〇頁；

③：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版第六三二頁；

④：毛澤東《爲爭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二五四

頁；

⑤：毛澤東《五四運動》，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二三頁；

⑥：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九七五頁；

⑦：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六一三頁。

⑧：同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六三九頁；

⑨：同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九六一—九六二頁；

⑩：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三二〇頁；

⑪：同⑦，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六一四頁；

⑫：同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九六一頁；

⑬：《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轉引自龐松、王東《滑軌與嬗變》第二四頁。

⑭：同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九六一頁。

⑮：《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四卷一三一四頁；

⑯：見《毛澤東年譜》下卷三〇五頁；

⑰⑱：轉引自龐松、王東《滑軌與嬗變》，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第三七——三九頁；

⑲：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四七——四九頁；

⑳：劉少奇《在工商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第六七——六八頁；

㉑：劉少奇《加強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四三五頁。

㉒㉓：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頁。

㉔：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四〇——四一頁。

㉕：見《劉少奇年譜》下卷；

㉖㉗㉙㉚：同⑲第五〇——五六頁。

㉘㉙：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

㉛㉜㉟㊱：轉引自林蘊暉、顧訓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第五〇——六九頁；

㉝：同⑲，一九八頁；

㉞：同㉛，第六三頁；

㊲：引自《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第三——三三頁；

㊳：引自《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九頁；

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九三頁；

㊵：林蘊暉《高崗發難與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五七期。

㊶：同㊳，一九九〇年第六期，第十七頁；

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五一七頁；

㊸：同上，第五七八頁；

㊹㊺：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八五—八七頁。

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册，第四五八頁；

㊼：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二一三—二一五頁；

㊽：毛澤東《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八一頁。

第二章　毛劉鬥爭——高饒事件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深夜，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住處召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大將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大將，毛澤東問他們：

「中央要分一、二線，我如果退到二線，怎麼辦？第一線由誰主持？」

對毛澤東的問題，羅瑞卿感到十分突然，他囁囁嚅嚅地說：「主席如退居二線，那當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線了。不過……。」那「不過」的意思，是指現在有些流言蜚語，使得劉少奇的威信受到了影響。

毛澤東聽出了羅瑞卿的不言之語的意思，說道：

「你鼻子不靈，嗅覺不靈！世界上人睡覺，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裏。我看你就睡在鼓裏。你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為甚麼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眞是假呢？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你認為他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沒有了。他（指高崗）不只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

對毛澤東的批評，羅瑞卿感到很大的震動——既是因為毛澤東的嚴厲責備，也是因為事態的嚴重性，而自己竟然沒有察覺。

毛澤東最後說：「這個人（指高崗）還欺騙了一些幹部，要把這些幹部奪回來！」

毛澤東的這一席訓話，拉開了建國後中共黨內第一次重大政治鬥爭——「高饒事件」的序幕。

一、高崗其人

「高」，是指高崗，「饒」，是指饒漱石。

高崗，原名高崇德，一九〇五年生，陝西省橫山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被派往西北軍從事兵運工作，參與發動多次武裝起義。一九三〇年後任中共陝西省軍委交通員，一度前往甘南作軍事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任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隊委書記。一九三二年七月陝西軍委遭破壞後到陝甘邊區開展游擊戰爭，參與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一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與劉志丹、閻紅彥一起，是陝甘紅軍與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一九三五年二月，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統一領導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前敵總指揮部政委，協助劉志丹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是年九月紅十五軍團組成，任軍團政治部主任。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不久，劉志丹在前線作戰犧牲，高崗便成爲陝北紅軍最高領導人和革命根據地的代表人物。

出於團結地方幹部的政治需要，高崗受到毛澤東的重視，長期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加上高崗善於揣摸和奉迎毛澤東的意旨，遂得到重用，平步青雲。一九三六年獲委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在這些崗位上，高崗表現了良好的組織能力和工作能力，爲建立和鞏固陝甘寧邊

區，為毛澤東與中央紅軍在陝北安家落戶作出了努力。

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八年五月，高崗獲委任中共陝甘寧區委員會書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一九三九年一月，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一九四一年初，獲毛澤東委任為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獲委任為書記。為經營、建設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作出了貢獻。

一九四二年五月，為統一晉綏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兩個區域的軍事指揮和軍事建設，加強陝甘寧邊區的防衛力量，毛澤東主持下的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高崗任副政委，蕭勁光任副司令員，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下轄八路軍一二〇師、留守兵團、晉綏軍區部隊、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等。關向應患肺病入院醫治後，高崗被任命為代政委，晉身於與賀龍、徐向前等人並肩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的行列。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高崗的倚重，從毛澤東處理蕭勁光與高崗的一段矛盾，便可看出一斑。

蕭勁光是個與毛澤東有悠久淵源的紅軍高級將領。蕭勁光是湖南長沙人，一九二〇年加入毛澤東創辦的俄羅斯研究會，與毛澤東有所往來，是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國第一批團員中的一個。一九二一年赴蘇留學，先與劉少奇同在東方大學學習，後入讀列寧格勒軍政學院。一九三〇年回國，不久進入中央蘇區，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閩粵贛軍區司令員兼紅七軍團政治委員。參加中央根據地歷次反圍剿戰爭。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蕭勁光違背李德、博古等「左傾冒險主義」負責人死守黎川的命令，將部隊撤出被敵人重重包圍的黎川，受到撤職、開除黨籍、判處五年監禁的處分。在關押期間，毛澤東派妻子賀子珍到獄中探望蕭勁光，並帶去兩隻鷄。蕭勁光說：「賀子珍轉

達了毛主席的話，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傾』軍事路線錯誤造成的，你應該撤退，做的對。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後來我聽說在決定處罰我時，有人主張殺掉我，毛澤東同志堅決不同意，王稼祥同志幾次拒絕簽字」，「我得到的釋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澤東等同志同『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鬥爭的結果」。

在當時，毛澤東受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打擊、排斥，受牽連的有「四大」，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還有「四小」，即蕭勁光、陳正人、李井泉、余澤鴻。毛澤東是十分重視這種「患難之交」、「同黨同派」的政治關係的。

在遵義會議上，蕭勁光獲得平反。長征到達陝北後，蕭勁光獲毛澤東委任爲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各路兵馬奔赴抗日前線，毛澤東卻將蕭勁光留在身邊，委任爲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陝甘寧留守兵團司令員，擔負起保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任。

蕭勁光在擔任上述職務時，與陝甘寧邊區地方最高領導人高崗發生了矛盾。蕭勁光說：「剛到陝北時，陝北紅軍中『左』的路線正在打擊劉志丹同志，也包括高崗。毛主席了解到這個情況，及時地將他們解救出來。劉志丹是陝北紅軍的創始人之一，是一個以革命利益爲重、很正派的好同志。……不幸，在紅軍東征山西的作戰中，劉志丹英勇犧牲了。志丹同志犧牲後，高崗成爲陝北紅軍中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志對陝北的幹部是非常尊重的，他特別注重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團結，認爲這是保證中央路線順利貫徹執行的重要條件。而我對這一點則認識不足。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我對高崗的印象並不佳，感到這個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卻很高，計較個人得失，品質也不好。在我當軍委參謀長的時候，高崗從三邊剿匪回來，中央決定讓他暫留在軍委一局代理局長，高崗得知後大爲不滿，認爲這個安排太低。後來，他當了邊區保安司令部的司令。成立留守兵團時，保安司令部隸屬於留守兵團。因而，在一個時期

裏，我把對高崗的關係僅處理成一般的隸屬關係。有一次飛機場正在修理，有飛機要降落，我讓高崗去督促快些把機場修好，結果任務沒完成，我還對他發了火。以後，高崗成了西北局的領導，我當時認爲，留守兵團屬於中央軍委直接領導，與西北局沒有直接隸屬關係，所以也沒有經常向西北局報告工作。對此，毛澤東同志多次教育我，批評我，要我尊重高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軍政關係。毛主席說，軍隊和地方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做檢討。軍隊和地方鬧了矛盾，軍隊首先做了自我批評，事情就比較好辦了。這作爲一個原則定下來。毛主席還推心置腹地對我說，要尊重西北局的領導，連我們中央決定的事都通過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團決定的事怎麼能不通過一下西北局呢？部隊在哪裏住，也就應當尊重哪裏的地方政府。」①

在延安「整風」時，蕭勁光這些「錯誤」被提出來，成爲整風對象之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親自到會作報告，指出要聯繫當前邊區的工作實際，特別就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進行整風。蕭勁光在會上受到了批評，也做了多次的自我批評。蕭勁光說：

「再一個問題是軍政、軍民關係問題。在軍政關係上，留守兵團有不尊重地方政府的現象，對西北局的領導，沒有經常向他們匯報，請示工作，部隊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鬧糾紛的事情。下面有些部隊政策觀念不強，在生產上有的與民爭利，有的做違反政府法令的事，影響了軍民關係。高幹會議上批評留守兵團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有鬧獨立性、本位主義、個人主義、違反群衆紀律等缺點錯誤，這些批評是中肯的，我做爲留守兵團的主要負責人，對這些問題要負主要責任」。②

在這次會議上，高崗是作爲中共中央的代表，來向蕭勁光和留守兵團整風的。高崗嚴厲地批評了蕭

勁光和留守兵團，連蕭勁光在內，共有團以上幹部七十多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蕭勁光說：「在會議後期，對留守兵團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擴大化了，上綱過高，例如說是路線錯誤，是軍閥主義，甚至與張國燾的『軍黨論』相提並論，對留守兵團的幹部打擊面過寬，挫傷了一部分同志的積極性。」

很顯然，在蕭勁光與高崗之間，毛澤東是全力支持高崗的。同鄉與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淵源關係，也敵不過高崗在毛澤東心中的魅力。

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高崗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眞、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共十三人，高崗排名第八。在中共領導層中，高崗冒升之快，堪稱是「火箭式」。

抗日戰爭勝利後，高崗被派往東北地區參與領導創建東北根據地的鬥爭，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北滿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東北地區解放戰爭的輝煌勝利中，有高崗的一份功勞。

林彪率領第四野戰軍入關南下後，高崗獲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甚稱地道的「東北王」。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抗美援朝期間，他領導東北人民政府給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巨大的支援。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說：志願軍能打勝仗，全靠兩個「麻子」，一個是「高麻子」（高崗），一個是「洪麻子」（志願軍主管後勤副司令員洪學智。）

高崗身材高大，彭德懷喜歡稱他「高大麻」。其實他皮膚很白，臉上麻子淺而白，遠一點便看不出

來。他的頭髮梳成大背頭，顯得精神利落，濃眉毛，高鼻梁，眼睛不大卻目光灼灼，戴一副近視眼鏡，喜歡從鏡框上面閃着兩道銳利的目光打量人。他那一身粗大骨骼，再配上一口粗獷高亢的陝西腔，顯得威風凜凜。高崗的作風不拘小節，講話時常配合身體、雙手的大動作，感情外露，是個頗具特色的人物。

在高崗的管治下，東北地區成了「獨立王國」，高崗被稱爲「主席」，大庭廣衆之下，還要喊「萬歲」。在東北人的心眼中「高主席」的份量比「毛主席」還要重一些。在東北的一些會議上，高崗批評下屬時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像個雞巴，動不動就硬了起來！」會場上有男有女，高崗就這麼講，一本正經，面不改色。高崗其人，可見一斑。

一九五二年，中國即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展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各方面需要充實領導幹部。在該年十一月，高崗被任命爲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三年正式調往北京工作。當時被調往北京的各路諸侯中，還有鄧小平（第二野戰軍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區第二政委，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習仲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秘書長；饒漱石（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五位調進北京工作的要員中，數高崗最爲位高權重，一時間，北京政壇上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要準備茶水和香煙。從毛澤東到劉少奇、高崗，每人都有自己專用的茶杯，編上號碼，不能亂用。而政治局委員以外的幹部，則不入「號」，茶杯可以混用。

政治局委員們喝的是龍井茶，毛澤東、彭德懷、高崗三人喜歡喝濃茶，所以茶葉要多放；而陳雲喜歡喝淡茶，茶葉要少放，幾片就行，有個色就可以，晚上十一點以後就要改喝白開水——陳雲神經不好，夜裏喝茶影響睡眠。而林彪是不喝茶的，只喝白開水。

毛澤東有吃茶葉的習慣，彭德懷也好此道，並且吃得更厲害。彭德懷不抽煙，因此喝茶很快，常常是第一個喝光，然後伸出一根手指，將茶葉撥出來，放進嘴裏，津津有味地嚼着。

建國初期，毛澤東喜歡抽濃烈的「三五」牌香煙，劉少奇則喜歡抽「中華」牌，但平時只抽「前門」牌，因爲「中華」牌太貴，抽不起。高崗煙癮最大，抽的是「中華」牌，每次開會要放一筒香煙，五十支，有時一筒也不夠，還要再添。朱德、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都不抽煙。

據曾任中南海勤務員的李維信回憶：高崗來中南海頤年堂參加中央會議，他坐下來不動茶杯，先抓那個「中華」煙筒，有時不等坐下便抓過煙筒揭蓋，隨即抽出一支煙，點火吸燃，每次都抽得又凶又狠，像是直接用肺往裏吸。一筒「中華」五十支，他經常不夠吸。因爲那時的會議多數是在夜裏，一開一夜，高崗的煙不會停。服務員背地裏悄悄說他是「一次火」，每次開會吸煙只劃一次火柴，吸燃香煙之後便不會停，一支接一支地續燃下去，煙缸一會兒就冒了尖。會議結束後，他坐的位置最難打掃衛生。桌面上、桌下、椅子四周，到處是煙頭和煙灰，又被坐久了而不停移動的雙腳踩牢在地板上，踩出各種煙灰構成的畫面，掃不淨，必須用抹布連擦幾遍。

那時不講甚麼尼古丁致癌，只講抽煙多了嗓子和氣管容易發炎，幾位抽煙凶的中央領導身邊常離不開痰盂；不抽煙的坐久了這種煙霧騰騰的環境，氣管也就跟着發炎，身邊也就免不了要擺痰盂。經醫生一再努力，中央領導們開始採取措施，改變會議環境和「生存條件」。

人多的會議搬到了西樓大廳，那裏採光和通風條件都要好一些，空間也大些。更重要的是開展了「瓜子代煙」的運動。

這場「戒煙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會議桌上不擺煙了，也不擺糖果，因爲吃糖不影響吸煙。首長們常常是嘴裏含了糖，又叼上煙，服務組便「賠了夫人又折兵」，何況，糖進了嘴，不知是膩喉還是潤喉，那煙反而越抽越凶。

於是，決定擺瓜子。

毛澤東喜歡吃黑瓜子（西瓜子），劉少奇喜歡吃葵花子，高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裏放。

毛澤東吃瓜子是有一檔沒一檔，不經心地嗑幾顆；但是這樣嗑一夜，那瓜子皮也就積不少。他是嗑一顆，將瓜子皮擺在桌上，擺到香煙盒那麼大一片時，就不再擴張面積，而是將皮在原基礎朝上疊放。越往上放，越仔細，散會時，形成一座瓜子皮構成的「寶塔山」，服務員打掃衛生時，常常不忍心破壞，總是留待最後清掃。最後也遲遲下不得手，總是看了又看，只是想到明夜還會建起這座「塔」，才小心翼翼將那塔盡量維護着抹進撮箕裏。

劉少奇吃瓜子很細心，嗑開後，有時還要看一眼裏面的瓜子仁兒，怕嗑出「臭蟲」來（人們常把霉變了的瓜子仁兒叫臭蟲）。他也很注意衛生，不亂丟瓜子皮，認眞放在桌子上。但是葵花子是炒出來的，不象西瓜子有粘性，所以建不成「塔」，只能堆成「蒙古包」，並且時不時要用手歸置歸置，不讓瓜子皮散落開。

高崗又不同，服務員們形容他是「抽煙像逮住鬼子漢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軍攻城，又快又

猛。」他吸煙不誤吃瓜子，吃瓜子不誤吸煙，手嘴一道忙碌，像進行一項甚麼偉大的事業一般。不過，這項「事業」進行得既轟轟烈烈，又很粗糙；煙灰隨意撣向周圍，瓜子皮吐得到處都是。會議進行的越緊張，氣氛越熱烈，他的動作也跟着越緊張，越熱烈，絲絲吸煙聲和劈叭的嗑裂瓜子皮的聲音給整個會議增添了不少聲色；一道道煙柱從他嘴裏噴出，射上天，衝向前，有時還左右橫掃，瓜子皮更是飛舞一片，不時落在其他中央首長的身上，他自己卻毫無感覺，心思顯然都在會議討論的問題上。直到散會，周恩來或李富春驚訝一聲：「咦，我身上哪來這麼多瓜子皮？」他才恍然道：「怎麼，吐你身上了？糟糕呢……」

服務員打掃衛生，最難打掃的仍然是高崗的座位。煙頭煙灰和過去一樣多，還增加一撮箕瓜子皮。他嗑的瓜子皮，有時一撮箕都裝不下，要分兩次戳。這和高崗正當年富力強，心高氣盛，精力充沛，身體強健又生性不拘小節有關，也和體力消耗大而又沒夜餐有關。

那時，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幾乎沒有一天不是整夜開會。這個會剛完又開那個會，大會完了開小會，有時是個別談話，從來不曾吃夜餐。有幾次會議開了十幾個小時，仍然沒吃一口飯。這就難怪年富力強的要沒完沒了大嗑瓜子，像八路軍攻城一樣。

李維信在中南海服務到第五個年頭，只見首長們吃過兩次夜餐。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撈糟，沒菜，咸菜疙瘩也沒一塊。另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掛麵，一兩麵左右，沒肉沒菜的清水麵。

唯一例外的是朱德總司令。五大書記開會，他常常是開到晚上十點就回去休息了。毛澤東照顧他年紀大了，不勉強他熬夜。就是白天開會，毛澤東也照顧他例外。別人開多長時間也不吃飯，只有朱德不吃不行，到鐘點就一定要吃飯，再重要再緊張的會議也不能影響。頤年堂旁邊有個廂房，衛士把飯用飯

盒送去。朱德一到鐘點便獨自退席，到廂房裏吃飯，並且痛快地呼吸一番，指着會議室小聲嘀咕：「裏邊煙氣太大，嗆得受不了。」

瓜子吃了一年，不抽煙的還是不抽煙，吸煙的也還是吸煙，並且多了一個嗑瓜子的習慣。轟轟烈烈的戒煙運動就這麼夭折了。

既然戒不了煙，擺瓜子的積極性就沒了。高崗不習慣桌子上沒瓜子，大聲問：「瓜子呢？」服務員聰明地說：「首長戒煙我們就擺瓜子。」高崗怔了怔，說「不擺拉倒，我回家再嗑。」

從此，瓜子就在會議桌上絕跡了。③

二、饒漱石其人

饒漱石，江西臨川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期曾在江西、浙江一帶從事青年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一度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一九二九年七月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後，饒漱石成為劉少奇的直屬部下。一九三二年劉少奇受王明路線批判，被調離上海後，饒漱石接替其職位，任上海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一九三五年赴蘇聯，任中華全總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一九四〇年夏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一九四一年一月隨新四軍軍部轉移，皖南事變發生後，與新四軍軍長葉挺等一起突出重圍，遂以中共東南局副書記身份強令葉挺與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談判交

涉，致使葉挺被國民黨扣押、監禁。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饒漱石被任命為華中局副書記，是為劉少奇的副手。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將劉少奇召回延安，劉少奇推薦饒漱石任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其間，饒漱石為了將軍長陳毅擠走，製造了「黃花塘事件」，誣陷陳毅召集二十多名幹部攻擊「華中局及我個人」，又聯繫陳毅在土地革命時期曾「反毛主席」，策劃對陳毅批判鬥爭，並同時去電延安，向毛澤東、劉少奇誣告。在延安的劉少奇支持饒漱石，而反對陳毅，毛澤東遂以「來延安參加七大」為名，將陳毅調離新四軍。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饒漱石當選為中央委員，是年底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一九四八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治委員，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在建國後各大區的軍政委員會主席均由各野戰軍司令員擔任，唯獨在華東是由饒漱石而不是陳毅擔任。

饒漱石為人陰險，手段毒辣，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當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師政委的鄧子恢說：「當時我有這樣一個印象，饒漱石對陳毅很厲害，彭雪楓、黃克誠、譚震林都覺得他手段狠辣。黃花塘事件後，饒漱石確實樹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級幹部中造成戒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亂扯亂談的，但在饒面前就不敢隨便講話，覺得他很嚴肅。今天看來，他善耍權術，手段很毒辣，故意使問題擴大，然後把你打下去。陳毅雖然沒有被一棍打死，卻被打傷了。」

在中共黨內，饒漱石本是個名不經傳的、資歷淺薄的無名小卒，只是靠拍劉少奇的馬屁，才得到冒升。一九四一年任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旅旅長和政委、建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葉飛將軍曾說：「一九四一年三月，我接到鹽城新四軍軍部來電，要我派部隊將經過上海來蘇北的饒漱石護送去鹽城。

饒漱石是誰？我和旅裏的幹部都不知道，地方上的領導同志也不清楚，饒漱石來後，只見他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長袍，好像基督教的牧師。以後聽說他在蘇聯赤色工會國際、美國、法國工作過一段時間。」一九五四年高、饒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時，「劉少奇親自到陳毅住處，誠懇地向陳毅道歉：過去我看錯了人，信任了饒漱石，使你受委屈了。這使陳毅十分感動和振奮。」④

三、毛澤東「左」傾再批劉少奇

如上所述，建國初期劉少奇與毛澤東、高崗之間，就農村、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問題發生分歧、爭論。劉少奇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高崗則落井下石，從旁推波助瀾。

時至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發起社會主義革命，便又批判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之說。

「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職工組織工作會議上說的。劉少奇說：「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其精神是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完全相符的，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及《共同綱領》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提法，是對中共在建國後政治戰略的一種科學的概括，對全黨、全國的實際工作具有指導的意義。

然而，在毛澤東由科學社會主義向農業社會主義蛻化之後，毛澤東認爲建國後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動搖、消滅私有制，而不應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因此，毛澤東對「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提法提出嚴厲的批評。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毛澤東還說：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對劉少奇提出了批評，他說：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犯右傾的錯誤。

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周恩來語——作者注）。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

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確保私有財產」。因爲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⑤

毛澤東在稍後的一次會議上還對山西發展農業合作社問題批評了薄一波，實際上是批評劉少奇。

四、毛澤東批判「新稅制」

在劉少奇與毛澤東、高崗發生分歧、爭論的同時，周恩來領導下的政務院也發生了「紕漏」，那就是財政部長薄一波提出的「新稅制」。

毛澤東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和薄一波：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

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⑥

接着，毛澤東對薄一波及「新稅制」提出尖銳、嚴厲的批評：

「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⑦

毛澤東還說：

對於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從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按照黨的總路線，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要經過相當長期的鬥爭的。新稅制的錯誤跟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居二中全會的決議。

爲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爲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⑧

「反對分散主義」，是指周恩來領導下的政務院。

一九五三年六月，周恩來主持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高崗利用這次會議，會上會下串聯，要「批薄（一波）射劉（少奇）」。據陶鑄（後任中共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揭發，在會議初期，高崗請他到家裏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並要陶鑄放頭炮，但陶鑄沒有答應。

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薄一波受到猛烈的攻擊和批評。薄一波回憶說：

他（指高崗）在批判我的發言中，無限上綱，甚麽「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甚麽「品質不良」等大帽子不斷向我扣來。他這樣做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薄」是爲了「射劉」，爲了進而達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他在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少奇同志曾經說過的一些話，比如一九四七年土改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户户冒煙」，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一九五〇年有關東北富農黨員問題談話中的觀點，一九五一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我的頭上加以批判。這種明裏攻我，暗中攻劉的「批薄射劉」詭計，明眼人一看便知。高崗調到中央工作後，政治野心越來越膨脹。他把劉少

奇同志視爲實現其野心的最大障礙，因此他首先把矛頭集中指向少奇同志。先推倒少奇同志，再推倒周總理，這就是他篡黨奪權的如意算盤。⑨

毛澤東在八月十二日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再次對薄一波及「新稅制」提出尖銳的批評。

五、改組政務院　毛澤東貶周捧高

毛澤東認爲，在「新稅制」的問題上，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事先沒有向中共中央和他本人匯報，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並非就此一端，亦並非由此開始。早在一九五〇年，毛澤東就對周恩來控制下的政務院不向他請示匯報而不滿。據羅瑞卿的女兒點點在《非凡的年代》一書中寫道：

同年（指一九五〇年）九月，李克農同志告訴父親，他同主席談話時主席對他說了一些話，那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寫報告，主席很生氣。父親立即去見毛主席。主席先問父親爲甚麼不給他寫報告。父親說寫了報告呀。主席說，寫了，拿我的收條來看。還說，你的黨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們××部，××委買茶葉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主席這樣一說，父親就緊張了，趕快向主席說明，報告確實是寫了的，只是沒有直接

送達毛主席。以後，總理知道了，就向主席報告說，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裏壓了，沒能及時送達主席。這是總理替父親分擔責任。毛主席以後又在一個場合裏和父親說：報告要直接送給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們這裏是有倉庫的。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溢於言表。

「新稅制」問題的發生，給了毛澤東向周恩來及政務院開刀的機會。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尖銳地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准。為此決定：

第一，政府各部門對於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須定期地和及時地向中央報告或請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

第二，為了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以及便於政府各部門中的黨的領導人員能夠有組織地，統一地領導其所在部門的黨員，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決議和指示的執行，今後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並應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建立，是統一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中共黨組的總黨委，由周恩來擔任書記——引者注）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

第三，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別向中央請示報

告，如屬兩個部門以上而又不同隸於一委的事項，則經由政務院負責同志向中央請示報告。如係主席直接交辦的事項，應直接向主席請示報告。

如應向中央請示報告的事項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則最後經手的政府負責同志應負主要責任。

爲了更好地作到現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領導同志直接向中央負責，並加重其責任，特規定明確的分工如下：

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眞、羅瑞卿負責；

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

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

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

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⑨

對周恩來和政務院的組織處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手。在同年的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再次下令改組政務院，對其屬下各部門的工作領導，重新作了分工：

（一）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二）所屬的鐵路、交通和郵電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

（三）所屬的農業、林業和水利部，劃歸財委副主任鄧子恢領導；

（四）所屬的勞動部，劃歸計委委員饒漱石領導；

（五）所屬的財政、糧食、商業、對外貿易和人民銀行，仍屬財委主任陳雲領導，在陳雲養病期間，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⑩

至此，作爲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失去了領導整個政務院、統籌政府各部門工作的權力，而只剩下領導外交工作的權力，亦即外交部長的權力，周恩來實際上由總理下降爲主管外交口的一位副總理。

在這兩次大改組中，獲得大冒升的是高崗，除了原來負責的國家計劃工作外，政府的經濟部門，即政務院二十個部中的八個主要的工業部，都劃歸了高崗領導，包括工業、燃料、地質、輕工等。當時北京政壇上就有人說高崗組成了「經濟內閣」。政務院的重心轉移到高崗的身上。

毛澤東的「貶周捧高」及「以高代周」的思想暴露無遺。

六、高、饒向劉、周發難

在劉少奇與高崗的爭論中，毛澤東鮮明地支持高崗而批評劉少奇，在政務院的改組中又明顯地捧高而壓周，不能不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大力支持高崗的明確訊號。

一九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爲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中共和國家的組織形式應該隨着任務的變化而有所改變。爲此，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召開第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並具體考慮中共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和總書記，政府體制是否採用蘇聯的部長會議體制。毛澤東還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線、二線的主張。對此，高崗、饒漱石從爭奪權

力的角度來看，認爲這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極好機會。

高崗將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機會，與毛澤東表示政治上對自己的強有力支持聯繫起來，與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周恩來的事實聯繫起來，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將「確立新民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問題提到「離開總路線」的高度進行批評，證明劉少奇、周恩來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而根據毛澤東對政務院的兩次大開刀，亦證明劉少奇、周恩來已經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高崗卻是備受毛澤東信任與重用的一顆在中國政壇上迅速冒升的「政治明星」，在這次權力再分配中，毛澤東有意讓他取代劉少奇、周恩來。而毛澤東的這種意圖，自然是不會明說。於是，高崗與饒漱石便展開了實際的行動，對劉少奇、周恩來進行攻擊。高饒的這些陰謀活動，後來被中共中央稱之爲「反黨活動」。

高、饒反黨活動的第一波，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

正如上文所述，高崗在財經會上大搞串聯，掀起「批薄射劉」的狂風惡浪。高崗除了點名猛烈攻擊薄一波外，還將劉少奇歷次講話中的「錯誤」摘錄成文件，四處散發。高崗曾直言不諱地對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劉少奇的老底」。高崗除了採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將劉少奇的講話加在薄一波頭上橫加批判外，還把劉少奇幾年來的言行「錯誤」，集中起來編成資料，以製造劉少奇的錯誤是一貫的，系統的，是路線錯誤的假象。

高崗還散布說：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

高崗還汚蔑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子」，指名道姓地說某某人是這個圈子裏的人物。他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人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指

白區工作系統——作者注），周恩來有一個圈圈（指南昌起義系統——作者注），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

爲了推倒劉少奇，高崗公然散布「軍黨論」（即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他說，黨的歷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從新作出結論。他把中共黨的幹部分成兩部分，說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們手裏，應當徹底改組。並煽動說現在白區幹部要篡奪黨了。

彭德懷後來也揭發說，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裏，軍委準備召開一次軍隊系統的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討論軍委準備的報告草稿時，高崗說這個報告草稿沒有思想性。毛澤東當即指示：「以彭爲主，請高加以修改。」當彭（即彭德懷）爲修改報告草稿去找高時，高就指着桌上的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華北土改工作會議的講話和在延安的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等講話記錄，問彭看過這些文件沒有？彭說，沒有看過，現在的文件實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處。彭德懷說：他在這裏又提起少奇同志來，高說：「劉少奇這個攤攤在七大時就安排好了，說甚麼劉爲白區的領袖，這就是說毛主席只是蘇區和紅軍的領袖，你看這樣還像話嗎？他把某某某安在華北，某某某安在華東，某某安在東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黨，取毛而代之。」彭說：不會的，有毛主席在，誰也篡不了黨。高說：毛主席去重慶談判回延安後，身體很不好，那時眞危險啊！彭駁斥說：少奇同志對毛主席是絕對忠誠的。並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崗卻說：此一時，彼一時，難道「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也是主席的意思嗎？彭說那次講話，少奇同志是「走了一點火」。高崗又繼續說：天津講話站在

資本家那邊去了，難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嗎？也是「走了一點火」嗎？妄圖煽動彭跟他反劉。⑫

「高饒事件」的另一名幹將饒漱石，原是劉少奇的老部下，在新四軍時期甚得劉少奇的信任，在中共黨內，饒漱石被公認是劉少奇的親信。然而，在毛澤東批劉捧高的政治形勢下，饒漱石認爲劉少奇面臨失勢、倒台的命運，因而決定棄劉而事高，與高崗結爲「反黨聯盟」。

饒漱石就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首先對劉少奇的親信、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進行批評鬥爭，據薄一波回憶：

「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饒漱石是個謹愼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可是，他一當上組織部部長，就一反常態，同高崗串通一氣，反對少奇同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到職才幾個月，就對組織部原有的領導幹部進行打擊和排斥，發動了對安子文同志的無理鬥爭。之後，在全國財經會議、中央組織工作會議期間，又配合高崗反對少奇同志，陰謀篡黨奪權。正像毛主席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新官上任，剛來即鬥。』小平同志也指出，饒漱石同高崗是『這邊一炮，那邊一鬥』。他們互相呼應，配合得十分默契。

「安子文同志未經中央授權草擬的那份政治局人選名單，饒漱石得知後，私下裏在許多人中間進行傳播。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揑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一個『圈圈』，劉少奇是他們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同志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處分後，饒卻抓住把柄不放。並散布說：財經會議上鬥了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果然，他未經中央同意，就製造各種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安子文同志的鬥爭。他指責安子文同志起草的組織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眞實，

說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同志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少奇同志作了匯報。少奇同志找饒談話，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冷靜從事，不要再在組織部內部繼續爭吵。但他根本聽不進去，在組織部召開的再次部務會議上，繼續向安子文同志開火，斥責他向少奇同志反映問題是『膽大妄爲』。

「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間，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可是，饒漱石卻在會上興風作浪，扭偏會議的方向。在討論安子文同志作的工作報告時，他和一些人故意誇大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大批安子文同志，並進而把矛頭指向少奇同志。中央發覺了饒漱石的分裂活動，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不顧大局，繼續誣陷安子文同志，破壞團結。當他受到批評後，又一反常態地對安子文同志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抵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劉少奇。這就透露了他『討安伐劉』的政治詭計。後來他在檢討中承認在中組部鬥爭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對劉少奇，以取得高崗的信任，進行政治投機。」⑬

高饒反黨活動的第三波，發生在全國財經會議之後，據薄一波回憶：

財經會議結束後，黨中央提出了我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高崗認爲謀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已經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開活動起來。他打着擁護毛主席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先對着少奇同

志，捏造説劉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視。還説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場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林彪來擔任。他還要陳雲同志去向毛主席轉達他的意見，遭到了陳雲同志的拒絕。

後來，他南下杭州、廣州進行遊説。在杭州對陳正人同志説：毛主席説過「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一九五三年十月間，他對設立總書記表示不贊成，而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並反對少奇同志當總書記或者副主席。後來他聽説書記處要開會把這個問題定下來，唯恐自己當不上副主席，曾對陳雲同志説：「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幾個，你一個，我一個」。意思是將劉、周、陳、高都包括在內。遭到陳雲同志斷然拒絕後，他又反咬一口，誣陷陳雲同志。毛主席生病，羅瑞卿同志對高崗説，我們大家都要勸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崗卻幸災樂禍。他告訴秘書：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們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爲現在黨内没有一個人能夠撑得起來。毛主席十二月要休假，提議由少奇同志臨時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實際上，過去毛主席離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爲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贊成輪流。唯獨高崗表示反對，他一再堅持説：「輪流吧，搞輪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崗陰謀活動的本質，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總理，而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他後來在《我的反省》等書面檢討中，承認他的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爲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

袖。」⑭

鄧小平後來（一九八〇年）說：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⑮

七、毛澤東轉棄高饒

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批評「高饒的反黨活動」，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批

人。」毛澤東還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當日，毛澤東率領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南下到杭州起草憲法，委託劉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駐華大使尤金時，在談話中暗示了高崗錯誤的反黨性質。據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說着，毛澤東又用手指了指師哲），楚就是湖南（說着，毛澤東又用手指了指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麼樣？還要等等看。⑯

毛澤東在杭州直接指揮北京的批判高、饒的鬥爭。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信中說：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些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在這裏的幾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愼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志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爲宜。報告請劉少奇同志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報發給我一看，如定於一月廿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

毛澤東還交待說：全會應發一個簡單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關於第三項議程（指加強黨的團結），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

同日，毛澤東另外又專門寫了一封給劉少奇個人的信。毛澤東說：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着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爲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

高崗得知中央決定召開四中全會的信息後，當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杭州面見。爲此，毛澤東於一月二十二日，專就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致電劉少奇。電稱：楊尙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並收到高崗同志一信。高崗同志在信裏說完全擁護和贊成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於會前來這裏和我商量這件事。我認爲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待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此電請送高崗同志一閱，我就不另復信了。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找高崗談話，當面批評他，希望他悔過自新。二月五日又談了一次。二月三日與饒漱石也談了一次。但高、饒百般抵賴，企圖蒙混過關。

八、「高饒事件」的背後

處理高饒反黨事件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由劉少奇主持在北京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向全會作了工作報告。針對高、饒的反黨活動，劉少奇說：「只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全會上，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四十四位高級幹部發了言，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完全支持劉少奇的工作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沒有公開高饒問題，與會者的所有發言，都沒有點明高、饒的名字，只是冠於「某些人」、「這種人」，就如打啞謎一樣。這是十分罕見的奇怪現象。

會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高崗的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饒漱石的座談會由鄧小平主持，進一步揭發和批判了高、饒的罪行。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高崗在家裏觸電自殺未逞，於同年八月十七日在東交民巷八號的住所再次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而饒漱石則被中共中央逮捕、監禁，於一九七五年病死在獄中。兩人都在一九五五年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開除黨籍。

在一九五三年秋冬之前，毛澤東全力支持高崗，利用高崗來打擊劉少奇、周恩來，這是不爭的事

實。在高饒事件的背後，是中共黨內更高層次的毛、劉之間的分歧與鬥爭，是以毛澤東爲首的農業社會主義與劉少奇爲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以毛澤東爲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與以劉少奇爲首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利用高崗去打擊劉少奇，而高崗則利用毛澤東的信任與重用，企圖奪取更大的權力。

在整個事件的始終，毛澤東都抱着壓抑劉少奇的態度。事件的前期，高崗對劉少奇進行了許多非組織性的、自由主義式的攻擊。鄧小平在七屆四中全會上說：

「我們常常聞到這樣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誇大到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稱的地步……尤其嚴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毛澤東同志提倡對黨的任何負責同志（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必需根據黨的原則在一定場合下進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但是不能允許這樣的議論發展到黨的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爲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⑱

高崗對劉少奇的攻擊，已到了「黨的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劉少奇是中共的第二把手，書記處書記（相當於後來的中央常委），地位比高崗高。按常理，出現高崗非正常地攻擊劉少奇（有許多是採用散布流言蜚語的方式）的情況，毛澤東應當出面制止，並批評高崗。然而毛澤東卻沒有這樣做，只是

要高崗去找劉少奇談話。毛澤東的做法，實際上是默許高崗對劉少奇的攻擊。當高崗踞傲而沒有去找劉少奇，毛澤東也沒有批評高崗的不是，反而是劉少奇主動找高崗談話，檢討了自己在某些問題的錯誤。毛澤東的這種做法，無形之中助長和縱容了高崗的氣燄，而打擊和滅了劉少奇的威風。毛澤東的「捧高抑劉」的心態，表露無遺。

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高、饒進行一系列非組織活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毛澤東不但不給予批評，反而對薄一波及其背後的劉少奇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就更加助長了高崗的氣燄。正是毛澤東的支持和縱容，使到高崗的野心得到急劇膨脹。

毛澤東利用高崗打擊劉少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伸手要權要官。因爲毛澤東最厭惡、最忌恨那種居功要權的人，毛澤東認爲這種人是「個人野心家」，將這種人扶植在身邊，最終會威脅到毛澤東本人的權勢，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正是在這一點上，高崗利令智昏，觸犯「功高震主」的禁忌，於是毛澤東便放棄了對高崗的支持。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會議上那番「兩個司令部」的講話，就清楚地表露了這種心態：在毛澤東看來，高崗的錯誤不在於對劉少奇的攻擊，而在於組織另一個司令部，從而威脅毛澤東那個司令部。

高崗在暴露了個人野心之後，毛澤東不得不放棄高崗。在這種形勢下，重新承認和接納劉少奇，成爲毛澤東不得不採取的選擇。既使如此，毛澤東仍然對高崗保持一種依依不捨，而對劉少奇保持壓迫的姿勢。毛澤東在杭州對七屆四中全會方針的指示，就規定劉少奇不得在全會上提名批評高、饒，明確指示「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相反，卻要劉少奇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毛澤東的是非傾向十分清楚：高崗對劉少奇的攻擊的正確的，而劉少奇的思想、觀點、立場則是錯誤的，因此高、饒在全會上沒有做

自我批評，反而是劉少奇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就是在這種奇怪的安排下召開的，連劉少奇在內的四十多位發言者中，沒有一人指名道姓地批評高、饒，他們都像鄧小平那樣，以「某些人」，「一些同志」來稱呼高、饒，整個會議就象在猜啞謎，難怪高、饒在全會上拒不承認錯誤。

相反地，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劉少奇於全會的最後一天做了自我檢討。劉少奇說：

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我曾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因此，我主張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在目前要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和供銷合作社，要限制富農經濟，對將來要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和消滅富農經濟，對於這些，我的觀點都是明確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法，就是我以爲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而沒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由此逐步地發展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同時，在目前的勞動互助組與將來的集體農場之間沒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組織形式，作爲由互助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十分重要的中間過渡形式，因而，就以爲互助組不能過渡到集體農場，而把二者看成在組織上是沒有多少聯繫的兩回事。因爲有了這種想法，所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與東北個別同志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贊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贊成推廣。同年七月間我批評

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討論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後，由於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拋棄了這種想法。

（二）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確定了實行分配土地的原則，制定了土地法大綱，並提出了整黨的方針。這個土地法大綱和整黨方針，是經過黨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國土地會議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這個會議有重大的缺點，這就是沒有對於農村的階級分析做出恰當的決定和沒有能够制定一個正確的切實可行的詳細的沒收分配土地的辦法，同時對於錯誤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會議上着重批評了黨內反對地主不堅決以及同情、可憐、庇護地主的右傾錯誤，這是完全必要的，並從此結束了這方面的錯誤。對於當時已經發生的一些「左」傾錯誤，雖然做了批評，但這種批評是不充分的，沒有系統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認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傾錯誤的發生和發展。……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發表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志的文章後，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納入正軌。我在當時沒有能够把指導土地改革這樣一個嚴重的任務完全正確地擔當起來。

（三）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舊政協會議開過會，中央發出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會付諸實施，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階段。同時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解放區提出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並指出「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萬一被破壞。」在這個指示中所謂「和

平民主階段」是屬於一種對時局的估計。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的規定，則是對於我們的革命起實際作用性質的東西。對於和平可能性的估計只是一方面，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則在於我們可和可戰，使我們在任何時局變化的場合下，都能夠有恃而無恐。對於這個文件，我想是應該作這樣的分析的。……中央通過的這個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經根據這個指示在幹部會上作過一個報告，在報告中有些話講得不妥當，應當糾正。

（四）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幫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對天津當時的工作說過許多話，曾經批評了當時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雖原則上沒有錯誤，但其中有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⑲

從劉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評，不難看出：關於農業合作化等幾個問題，劉少奇並不存在甚麼錯誤。然而，毛澤東卻認爲是錯誤，在其壓力下，劉少奇不得不做檢討。

對於毛澤東的壓迫劉少奇而寬容高崗的作法，鄧小平深感不平，就在劉少奇自我檢討後，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言說：

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没有見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爲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

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採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⑳

在毛澤東的控制下，中共七屆四中和五中全會儘管給高饒事件做了結論，開除了高饒的黨籍，高饒兩人最後以身敗名裂而告終。可是，在政治問題上，毛澤東的傾向性卻是十分鮮明的，從頭至尾完全沒有批評高崗在政治上對劉少奇的誣蔑，也根本沒有為劉少奇所受的誣蔑進行平反。那是因為高崗的思想代表了毛澤東的思想，而毛澤東認為那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是錯誤的，是「右傾思想」。因此，在中共關於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社會等一系列重大的帶根本性的政治問題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意見，維持了「原判」。

至此，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的第一個回合的鬥爭中，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壓倒了劉少奇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開始走上一條落後的、倒退的苦難之路。

而自此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業社會主義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就貫穿着建國後的整個中國現代史，斷斷續續、時起時伏地繼續下去，一直延續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

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事隔十幾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過去高崗攻擊劉少奇的「炮彈」又被重新搬了出來。一九六七年三月，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擊劉少奇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是「爲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把劉少奇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和天津講話作爲「修正主義」的罪行，寫進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

①②：見《蕭勁光回憶錄》三一六——三一八頁。
③：見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④：引自《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第四九六頁。
⑤：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八一——八二頁。
⑥⑦⑨⑪⑬⑭：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⑧：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九〇——九七頁。
⑨⑩⑫⑮⑯⑰⑱⑲⑳：引自林蘊暉《高崗發難與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

第三章 中共「八大」：劉少奇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下的歷史奇跡

一、毛澤東：「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即中共「八大」閉幕後的兩個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向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常委說：

「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①

毛澤東的話清楚地反映了兩個事實：

其一、是毛澤東對中共「八大」通過的路線，方針是不滿意的，有保留的；「八大」的路線、方針沒有反映毛澤東的思想。

其二、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大多數領導人在國內外的大政方針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雙方的對立中，以劉少奇爲首的一方是多數，是「大家」；而毛澤東是少數，是不受「擁護」，處於孤立

地位的「小家」。

這是自一九四九年建國後，毛澤東再一次與中央集體領導發生分歧，處於對立的狀態，也是以劉少奇爲代表的正確路線第一次在中共黨內處於主導地位。

二十六年後的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說：「一九五六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

實際上，中共「八大」通過的決議，在一年後便被否定推翻了。能夠將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推翻的人，當然只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二、毛澤東：「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傾

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同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證十五年同時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

七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提出的「八大」的中心思想，被寫進決議之中。這是毛澤東爲中共「八大」規定的帶有濃厚的「左」傾色彩的基調。

時至一九五五年，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如脫韁的野馬，難以抑制。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雖然毛澤東已一再提前，超速發展，但毛澤東猶嫌慢，認爲劉少奇爲首的中央領導人制訂農業合作社的發展規劃是保守的、右傾的，尤其對劉少奇伙同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整頓」爲名，砍掉「二十萬」個農業合作社的事件大爲惱火。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繞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獨自主持召開了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猛烈而尖銳地批判鄧子恢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被勝利「嚇昏了頭腦」，像「小腳女人，搖搖擺擺地走路」。毛澤東當時認爲，不僅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右傾」，更嚴重的是以劉少奇爲首的中央領導層「右傾保守」，拖慢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

毛澤東的「急迫」、「超速」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與劉少奇爲首的平穩、健康發展的正確路線，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毛澤東認爲，當前的主要「傾向」和主要「危險」，是「右傾保守」，不徹底掃蕩這股障礙，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就不能得到順利的貫徹。因此，毛澤東將反對「右傾保守」定爲「八大」的主題思想，希望通過這次全國代表大會，反掉劉少奇等人的「右傾保守」路線，使自己的路線在全黨佔統治地位，成爲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執行，不可違抗的指導思想。

這是毛澤東爲「八大」立下的既定方針。然而事情發展的結果，令毛澤東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三、「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步劉少奇後塵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鄧小平草擬的「八大」主要文件起草委員會名單。

「八大」的政治報告由劉少奇主講，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陳伯達、陸定一等七人組成。

修改黨章報告由鄧小平主講，起草委員會由鄧小平、楊尙昆、安子文、劉瀾濤、宋任窮、李雪峰、胡喬木、馬明方、譚震林等九人組成。

經濟工作報告是由周恩來主講。起草委員會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組成。

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會上，劉少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傾保守」的指示，並提出：要全黨準備「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爲起草「八大」的報告，準備找各部門的同志談話，請各部門同志預作準備。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是要總結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尤其是建國以來黨的工作經驗，提出今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要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要制訂出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

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是一項嶄新的課題，劉少奇必須首先佔有大量的實際的材料，才能加以概括、總結。

從十二月七日開始，劉少奇依次把中央各部、委、局的負責人約請到自己住處會議室，聽取他們匯報本部門、本系統的基本情況和存在問題，尤其是帶全局性的問題，同他們一起研究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劉少奇一面聽一面記，還不時地提出問題、插話，說出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匯報會經常從白天一直延續到第二天凌晨。

劉少奇在半年之內總共與三十六個部門的負責人進行了座談。劉少奇的這一系列的座談會，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國家經濟建設的調查研究，也是中共第一次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少奇此次「開先河式」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它的成果至今對中共仍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劉少奇的探索，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和啓迪。正當劉少奇忙於召開座談會的時候，毛澤東正在杭州修改《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一九五六年二月，毛澤東回到北京。一天，薄一波到毛澤東那裏匯報工作，偶然講到劉少奇正在逐個聽取部委的匯報。毛澤東聽後大感興趣，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薄一波說：「我當然樂意承擔。」沒多久，匯報就開始了。

毛澤東是從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聽取匯報的，其形式也是採取座談會，邊聽邊記邊議。只是在順序上與劉少奇的有所不同，是按照「口」的順序進行。所謂「口」，是指國務院的某一系統，如「重工業口」，包括了電力部、石油部、各個機械工業部、地質部、煤炭部等，而「農業

口」則包括了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等。毛澤東先聽取每個「口」即國務院主管該「口」的辦公室作綜合匯報，然後才由各部匯報。與劉少奇不同的還有一點，即毛澤東只聽取政府經濟部門的匯報，而不包括「文教口」和中央直屬機關，這些部門——文化部，教育部、高教部、衛生部、中國科學院、新華社，廣播事業局等，只向中共中央送了書面的匯報提綱。很顯然，毛澤東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方面。

與此同時，毛澤東於三月三十日親自起草中央通知，發給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他們立即着手準備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時間來京匯報。各地的匯報是從四月下旬開始的，除了叫一些毛澤東感興趣的省、市負責人親來北京匯報外，其他多是採用書面匯報。

在中央各部門的匯報開始不久後，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還向毛澤東建議：讓一些重要工廠、建設工地也向黨中央寫書面匯報。不久，幾百份書面匯報，便像雪片似地飛向中南海。

中共其他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有時也參加了這些匯報座談。

在這些匯報的基礎之上，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經與會者討論和提出意見後，毛澤東於五月二日召集最高國務會議，作了第二次的講話。後來發表的版本，主要是根據第二次講話的記錄整理的。

《論十大關係》分爲十個部分（即十大關係）：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黨和非黨的關係；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是非關係；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前五個是經濟方面的關係，後五個是政治方面的關係。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的主要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劉少奇的思想成果。例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要適當地調整我國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關係，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得具體分析」等，這些觀點劉少奇在聽取匯報中已經提出了：「要重視發展輕工業和農業」，「要重視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要重視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學習蘇聯要有所學有所不學」。劉少奇的這些思想、觀點，給毛澤東提供了啓發和參考，並作爲精華被毛澤東吸收了。

毛澤東把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和這次聽取工業戰線三十四個部委匯報，看成是他建國後的兩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後來的事實證明，前者是一大敗筆，而後者卻是一大成功，

《論十大關係》被中共稱爲毛澤東「建國後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是「最重要」，是其中錯誤最少，因而最有生命力，至今仍對實踐有指導的作用。

這兩次調查，先後相隔才幾個月的時間，爲甚麼會出現農劣而工優的結果呢？原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建國後就親自抓了。幾年來，毛澤東的思想越來越「左」，要求改造的速度越來越急，越來越快，公有制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在「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已先入爲主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選中的都是能入毛澤東「左眼」的東西，加上毛澤東親自編寫的按語，全書充斥「左」傾思想，「左話」、「大話」、「空話」觸目皆是。事實證明它已被扔進了歷史的博物館。

對於工業，毛澤東不懂，建國後也基本上不親自抓。因此除了所知甚少以外，也沒有先入爲主的框框；並且當初的用意也在於批判現行的蘇聯模式，摸索一條有別於蘇聯的「中國之路」。因此調查的過程中比較客觀，而調查的結果也就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客觀的規律。

從毛澤東對自己的這篇「建國以來最重要的著作」的態度，也可以看出問題之所在。正由於《論十大關係》較正確地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建設規律，不「左」不急，因此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及其他文件都多方面地引用了其中的精神。然而不久後毛澤東便全盤否定了「八大」路線，並說了「你們擁護『八大』，不擁護我」的話。而《十大關係》的主要精神也被擱置了。到了一九六五年底，經過三年災難和經濟的調整、鞏固之後，在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的時候，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將《論十大關係》作爲中央文件印發給各級黨委學習。然而毛澤東看了整理稿後，批示說：「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徵求意見，以爲將來修改之助」。②當時毛澤東正「左」

得厲害，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對當年的客觀、平實之作，自然是「不大滿意」了。

一九七五年，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期間，出於整頓文化大革命爛攤子的需要，鄧小平又向毛澤東提議將《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並作爲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鄧小平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們在讀稿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但毛澤東似乎並不覺得「那篇東西太重要了」，也並不認爲具有多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於是批示道：「可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③直到一九七六年離開這個世界，毛澤東對這篇「建國以來最重要的著作」始終存在保留的態度，並沒有「青眼相看」，相反地卻是異常的冷淡，與他所鍾愛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相比，猶如「正宮娘娘」與被打入冷宮的嬪妃。

四、一九五六年：「多事之秋」

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來說，一九五六年是「一則喜，一則憂」，「先喜後憂」的一年。所謂「喜」，是指在毛澤東發動凌厲的「反右傾」攻勢之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鄧子恢，以及他背後的支持者劉少奇等人所組成的陣線紛紛土崩瓦解。在全國上下如十號強台風的「左」傾政治空氣下，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相繼進入了高潮。只經過短短

的幾個月，一九五六年元旦剛過去，北京、上海等城市就敲鑼打鼓，慶祝三大改造勝利完成，超高速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一統江山終於實現了。

面對着全國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毛澤東說：一九四九年那樣大的勝利，並沒有使我高興。到一九五五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我開始高興了。

毛澤東的高興並沒有維持多久。自一九五六年春天開始，國內外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逆轉。

首先是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題爲《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當時，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是團長朱德，團員有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赫魯曉夫是在「二十大」閉幕後才向中共代表團通報秘密報告的內容，還派了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北京向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通報解釋。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晚年所犯下的肅反擴大化、個人迷信等一系列的錯誤，暴露了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大量的陰暗面，在全世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對崇尚蘇聯、以蘇聯爲榜樣的毛澤東和中共來說，這是猶如原子彈般的巨大衝擊。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抓住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作文章，掀起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一時間，烏雲亂滾，陰霾滿天。

蘇聯共產黨公開揭露和糾正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在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引起連鎖反應，這些國家政局動蕩不安，先後發生了波蘭的「波茲南事件」、「華沙學生上街遊行事件」、「匈牙利暴動事件」。這是波、匈兩國經濟、政治危機長期積累，廣大人民群衆心懷不滿，最後釀成騷動和流血的結果。

「反斯大林」的連鎖反應也影響到中國。由於「三大改造」的超高速完成而造成的急劇社會大

變動，以及在經濟建設上「大冒進」所造成的各方面的緊張，引發了一些城市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上街遊行示威；各地農村則發生農民鬧退社、分社、哄搶集體財產物資、摳打幹部、進京上訪告狀等事件。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全國罷工請願事件達幾十起，參加者共萬餘人；幾十個城市的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遊行示威，參加人數有一萬多人；而各地農村的「退社」風潮，遍佈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僅廣東省退社的農民達十三萬戶，二百多個合作社垮台。

毛澤東與中共向來以「爲人民謀福利」、深得人民群衆擁戴而自詡，自稱與人民群衆的關係是「魚水之情」。而在一九五六年竟發生這種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和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才可能發生的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事件。廣東省某縣發生群衆示威時，縣公安局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場開槍打死五人，打傷九人。中共作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毛澤東一手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權，竟與無產階級大衆發生這樣激烈的矛盾衝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既感到極大的震驚，又感到困惑不解。這種情況，是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黨以來從未遇到的。

國內外政局的動蕩不安，使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感到很大的壓力。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

五、毛澤東的「冒進」受壓抑

在毛澤東掀起的「反右傾」的強台風下，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超高速完成了。在一片勝利的凱歌聲中，毛澤東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問題，並轉而批判在這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座談會，向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說：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一條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這條保守的路線。工業部門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面而主體跟不上的現象。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

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④

原來，毛澤東對國務院制訂的計劃指標不滿，認爲偏低了，發展的速度慢了，尤其是一九五五年的計劃指標，認爲太過保守。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說：「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在毛澤東的鞭策下，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紛紛修改一九五六年的工業經濟指標，加快速度，擴大規模，全國出現一窩蜂的「大幹快上」，基本建設項目一再增加，到了國民經濟不勝負荷的地步，引起資金、物資、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緊張，財政出現了三十億元的赤字。

是周恩來首先起來「反冒進」，他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即一九五五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又說：「（如果）不適當收縮會影響貨幣、物資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兹南事件。」⑤

周恩來的「反冒進」，得到以劉少奇、陳雲等中共中央集體的支持，劉少奇率領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決議。並指示中宣部起草題爲《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於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指出「急躁冒進」已成爲當前的嚴重問題，冒進不但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的領導幹部中，將矛頭指向了毛澤東。

毛澤東對「反冒進」是不滿的。然而，在蘇共二十大後，「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獨

裁」，「尊重集體領導」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已成為主流，加上當時國內外政局的動蕩不安，壓力很大，毛澤東只好按奈自己的不滿，壓抑自己那膨脹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暫時容忍與接受中共中央的「反冒進」的決議。

中共「八大」就是在這種國內外形勢對毛澤東的不利、「左傾冒險主義」受到壓抑的政治氣候下召開的。

六、劉少奇佔上風：「八大路線」

中共「八大」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會上，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的報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和新的黨章。

「八大」的主要內容有以下方面：

一、正確規定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

間的矛盾」，因而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成爲整個「八大」路線的基礎和核心。

二、正確規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這是反冒進的直接成果。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各自的報告中還吸取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中的主要思想，如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處理好經濟和財政、積累和消費的關係等，作爲具體的經濟政策。

三、初步提出了打破傳統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模式，強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和計劃經濟爲主，以商品經濟爲輔的新的經濟模式。

四、鄧小平在報告中強調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鄧小平說：「列寧主義要求黨在一切重大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而不由個人作出決定。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繫群衆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要正確理解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係，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的功績，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眞正鞏固領導者同群衆的聯繫，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衆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和執行。」

五、大會還規定了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政治戰略。

「八大」的重頭戲，自然就是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按中共的不成文的慣例，能夠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的人，都是黨內地位最高的人。「七大」時，政治報告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聯合政府》一文便是。「八大」時，由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那個明顯的含義便是：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說：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的「八大」政治報告。美國的一些報章便說：「中國現代史要重寫。」其實李志綏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李志綏是個醫生，而不是學者，他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了解得不深、不細，才出現上述的失誤，並因此授人以把柄，北京組織毛澤東的秘書林克等人，對其進行批判。

中共「八大」的主要思想內容，之所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至今仍有生命力，是由於對毛澤東的思想進行了揚棄，吸收其正確的部分（《論十大關係》），而拋棄其錯誤的部分（「左傾冒險主義」）。在報告起草的過程中，毛澤與劉少奇之間，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既不是完全的統一，也不是徹底的對立。那時候，《論十大關係》新鮮出爐，毛澤東還是滿意的，「不滿意」是以後的事。正如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處理十大關係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對此毛澤東是滿意的、贊成的，毛、劉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在「反冒進」的問題上，正如上文所說，毛澤東雖然不是「心悅誠服」，但他是屈服於中央的集體決議，因此在表面上也沒有出現公開的矛盾和對抗。並且，基於當時的國內外緊張的局勢，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有所收斂，因而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在起草過程中並沒有發生重大的、公開的衝突。中共元老之一的王首道在《追念劉少奇同志》一文

中說：「在起草（八大）報告的過程中，他（指劉少奇）和毛主席一塊，反複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據毛主席提的意見作了認眞的修改。毛主席說他修改得很好，並親筆在樣稿的扉頁上寫了題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又在下邊寫了『劉少奇』三個大字，毛澤東同志在八屆一中全會上解釋這個報告『是一個很好的提綱』」。

關於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有以下回憶：

他在着手起草報告期間，那本來就没有規律的生活更被打亂了。他博覽了各種有關的資料，找了許多有關的人士談話，徵求意見，進行調查研究。據我們的工作日記記載，他約請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談話先後達幾十人次。動筆以後，他的身心簡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機器，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連軸轉。那時，我們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開動了腦筋，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寫作中去的時候，即使熱騰騰香噴噴的飯菜早已擺好，甚至熱了又熱；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長時間没有合一下眼皮，該休息片刻了，但誰也不敢去打擾他。因爲大家都知道，這個時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於筆端，全部傾注於政治報告的起草之中。我們誰還敢、而且誰還忍心去打斷他那像黃河一瀉千里、奔騰不息的思緒！每當這時，我們只能把對他身體的擔心變成一種祈禱，由衷地祝願他身心永遠那樣健康，精力永遠那樣充沛！

在這期間，我們工作人員的精神也很緊張，只要少奇同志在辦公室裏，我們就不能離開。吃飯時，互相從食堂帶點來，解手時，得來回小跑。他寫出幾頁，就叫我馬上送到機要室打印。他習慣隨寫、隨修改、隨打印，然後再作修改。一個問題或一個章節寫完後，還要隨時送給毛主席審閱。

當時，少奇同志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周總理負責起草《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同志負責起草《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所以在此期間，他們互相來往較多。他們經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時碰頭開個小會，有時通電話談個問題，通報情況。

特別是周總理，他的作息時間和少奇同志比較一致，所以經常午夜兩三點鐘以後還打來電話，問我們少奇同志休息沒有。有一次兩點多鐘，總理打電話問：「少奇同志還在辦公室嗎？」我回答：「他剛進臥室。」總理知道少奇同志進臥室後有坐在床上繼續看東西的習慣，便對我說：「我和富春同志馬上去一下。」我立即報告了少奇同志，他說：「就請總理他們到這裏（指臥室）來吧。」

總理下車後，一邊疾步走着，一邊還借着燈光拿着材料看。在上樓梯時，跟在總理後面的富春同志看見總理還那樣專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總理：「你要看樓梯，不要看文件了。」總理回頭朝富春同志一笑：「沒關係，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還好。」我把總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領到了少奇同志的臥室。這時，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着看東西。他們見面後。沒說半句客套話。直接開門見山地談問題。我急忙要去搬椅子，衛士也準備去沏茶，但總理一伸手，攔住我們說：「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說完了。」說着總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功夫不大，總理他們談話結束了，先後下到一樓。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該向右拐，出大門，可他向左走，卻進了衛士值班室。衛士以為去找他們，馬上立正問富春同志有甚麼

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對，笑着說：「啊，我走錯門了。」這時，總理也下來了，富春同志回頭一本正經地對總理說：「糟糕，我迷失方向了。」總理聽後哈哈大笑，並風趣地說：「今天打破你的常規了，通常這時正是你做夢的時候，來，我做你的向導。」

總理和富春同志的汽車沙沙的飛馳聲劃破中南海寧靜的夜空遠去了，而少奇同志和總理親密無間的友情及總理那爽朗的笑聲卻永遠珍藏在我的記憶裏。

有一個星期天，少奇同志要約一位部長談政治報告的事。我請電話局總機的話務員幫助找那位部長，話務員回答我：「他家裏說他去看戲了。」我將此事報告少奇同志，他說：「那也得請他來一下。」時間不長，那位部長急匆匆趕到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少奇同志看見那位部長神色緊張，便親切地說：「對不起，今天沒有讓你看完戲。」那位部長也連聲道歉：「讓少奇同志久等了。」

一九五六年的盛夏，北京酷熱難熬。《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也進入了關鍵階段。爲了更加集中精力把報告寫好，我們隨少奇同志來到了北戴河海濱。

夏日的北戴河，風景迷人，氣温涼爽。帶着咸味的習習海風，使我們心曠神怡，湛藍的海水更令我們無限向往。但我們卻無暇領略這美麗的海濱風光，更無暇享受大海的温柔撫慰。因爲少奇同志還是那樣廢寢忘食地工作着。

少奇同志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別認真仔細，一直到離開會時間很近了，他還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對每一個標點符號，他都要反複琢磨。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的楊尚昆同志曾幾次打電話對我說：「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請他盡快定稿。因爲他不定稿，我們大會秘書處的許多工作就無法進行。」我將尚昆同志的意見報告後，少奇同志才說：「那就這樣定稿吧！」⑥

毛澤東不滿意的，是「八大」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的一些提法。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劉少奇在回答中南海造反派的提問中說：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在報告的另一處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⑦

「八大」決議是在九月二十七日大會通過的，而毛澤東是在十月一日國慶慶典上提出「不妥當」的。然而在決議通過時毛澤東舉了手，那是毫無疑義的。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黨員可保留個人的意見，但必須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毛澤東不僅對「八大」的決議不滿意，而且還要改變它：一年後便

全盤推翻了。

「八大」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從黨章中刪除了「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後來，到「文化大革命」時，這成為劉少奇「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罪證。

在新黨章中不必提「毛澤東思想」的建議，最初是彭德懷提出的，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時承認：

「五六年開『八大』時是我提出（從黨章中）劃掉毛澤東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劉少奇的同意，他說：『還是劃掉的好吧！』我是反對個人迷信的」。

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說：「劉少奇在黨的『八大』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他犯下的許多罪行之一。但這個報告是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我參加了那次會議。」

陳毅所說的「那次會議」，是指一九五六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其主要議題是討論通過「八大」的幾個報告。事實上，劃掉「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劉少奇個人的主張，而是北戴河政治局會議集體通過的決議，毛澤東本人也是舉了手同意的。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劉少奇時，似乎這個「同意」就不算數了，正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八大」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在人事安排上。其主要的傾向是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加強了集體領導的體制，具體的措施有三項：

其一，是增設多名中央副主席。「七大」一中全會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為毛澤東，沒有副主席，下設書記處（相當於中央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為書記。很顯然，毛澤東將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的大權集於一身，位重權亦

重。到了「八大」，毛澤東原先設想一名主席（毛澤東），一名副主席（劉少奇）。但後來改爲除毛澤東仍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外，增設四個副主席，是爲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九五八年五月又增加了林彪，共五個副主席。對此事，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曾說：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着，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⑧

毛澤東還說：「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爲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中心的目的就是爲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

其二，是改變書記處的性質，並增加總書記的職位。「七大」時的書記處，相當於「中央常委」。而「八大」後的書記處，則是中共中央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並作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決策的參謀部。而總書記的人選是鄧小平。據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回憶，在推舉鄧小平時，還有一段小插曲：

在大會期間，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我怕少奇同志找我要文件，就坐在會議室

的門口，常委們裏面說話，我都聽得清楚，那天碰頭會的內容是動員鄧小平同志出任黨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當時小平同志的聲音比較大，一再推辭說：「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難以勝任，還是讓別人當吧！」小平同志態度誠懇而堅決。「我們是醫生，書記處是護士，你是護士長，還是我們的助手嘛。」毛主席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傳到了門外。緊接着是周總理的聲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主席又補充說：「其實，還是你那個秘書長的差事！」其他幾位常委也幫着動員小平同志。這時，我聽見少奇同志說話了：「主席，我看就這樣定了吧！」「好，定了！」毛主席一錘定音，其他常委也異口同聲地說：「定了！」小平同志再也沒有推辭。⑨

毛澤東在向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介紹鄧小平和陳雲時說：

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陳雲同志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

看陳雲同志行，他是工人階級出身。⑩

其三，是在黨章中增設名譽主席。這是毛澤東提議的。毛澤東說：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作「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爲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爲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我們準備好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够幹的都幹。⑪

毛澤東講這番話時，是眞心實意，還是半心半意、虛情假意，現在已很難考究。就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澤東重提「朱毛」，說「朱毛、朱毛，沒有朱那有毛，朱在先嘛」，是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政治上表現得如此的謙虛一樣，毛澤東在「八大」期間的這段講話，是他在權力方面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表現得如此的謙讓和超脫。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並不重視，也沒有實踐自己的這個諾言，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壽終正寢，毛澤東都在眷戀着「中央主席」這個實權職位，絲毫沒有「不當主席」的意思，因而「八大」新黨

章上那個「名譽主席」，也就成了名符其實的「紙上虛名」。

中共「八大」，是在一種十分特殊的國內外的歷史環境下，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受到壓抑，劉少奇的正確路線佔了上風而取得的一項積極的成果。由於這種歷史環境千載難逢，「八大」也就成爲中共在建國後的毛澤東時代中僅有的一次正確路線佔統治地位的「絕唱」。

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繼承劉少奇的思想——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義思想與「八大」路線，中國在繞了三十年的大圈子後，才回到了原來的起點。現在中外都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爲毛澤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而鄧小平是非馬克思主義（即熱衷於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顚倒了黑白的誤解。從本質上來說，從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說，毛澤東恰恰是背離者，是異端；而鄧小平是堅持者，是正統。對此，世人切勿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八大」的正確路線，像緊箍咒一樣，令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難以伸展。毛澤東必然要千方百計除去這個「緊箍咒」，否則，毛澤東就不成爲其毛澤東了。

七、墨汁未乾　毛澤東推翻「八大」路線

在中共「八大」上，毛澤東向世人展示了開明、開放、民主的面孔。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通通是

假的，毛澤東既不尊重、也不遵守「八大」通過的決議，而且在一年之後，這些毛澤東當時舉手贊同的決議，就被他統統推翻、否定了。

毛澤東最先是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修改「八大」的決議。「八大」閉幕後一個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腦子中潛伏的階級鬥爭之魂就又伺機而動了。毛澤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衆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開始，受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黨內外刮起一股歪風，「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⑫

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新認識，造成了「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之後，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認識便又更上一層樓。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發表時加入了這樣的一段話：「被推翻的地主階級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眞正解決」。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就提出：對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會議過程中，儘管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不少人堅持「八大」的觀點，但毛澤東最後仍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

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還批評「八大」的提法是不對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否定了「八大」通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的方針，開始批判「反冒進」。

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毛澤東更將《論十大關係》及以此爲主要思想的「八大」決議的精神，如處理好綜合平衡，處理好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處理好積纍和消費的關係等等，全都拋到九霄雲外，並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實際上是「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來取而代之。政治上則大搞階級鬥爭，批「白專道路」，「拔白旗，插紅旗」，「反右傾」，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至此，「八大」路線被破壞殆盡。

「八大」正確路線被全面推翻的同時，是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全面復闢。此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路線全面統治了中共和中國整整二十二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八大」的正確路線才開始得到貫徹執行。

中國現代發展史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白白浪費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爲甚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北京官方以及中國出版的各種書刊，都幾乎一致地說：是當時的國際環境（即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和國內環境（反右運動）使毛澤東在階級鬥爭理論上發生失誤。例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就說：

> 毛主席和我們黨爲甚麼修改「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有國內原因，也有國際原因。從國際方面講，波匈事件，對毛主席和我們黨的影響和震動太大了，彷彿中國也存在着這種現

實的危險，再加上國內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就更加重了這種危機感。由於偏重於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於是就認爲「八大」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斷不妥當了，重新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受國際事件和國內暫時情況的影響而修改黨的基本理論和實踐的做法，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實踐證明，八屆三中全會修改黨的「八大」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論斷，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從此開始了對「八大」路線的偏離，助長了「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它將問題表面化，從而將源流顚倒，本末倒置。

中共「八大」是毛澤東的「左」傾路線受壓抑，劉少奇的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的結果，它雖然取得了不少積極的成果，但也存在許多局限性。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批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左傾冒險主義」，更沒有觸動它的根源——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雖然在「反冒進」中講了一些「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主要應該批『左』」一類的話，但多是就事論事，就具體政策議論，沒有將問題提高到「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高度去認識、對待，沒有從理論上、思想上眞正進行批判，更沒有刨根追源，徹底地清算這條路線，就像中共歷史上對待王明、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樣。

因此，在「反冒進」及後來的「八大」中，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沒有受到觸動，更沒有得到清除，它在毛澤東的腦海中潛伏着，伺機待動。這是「八大」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點，「八大」路

線這麼快就被毛澤東輕易地推翻，其根源亦在於此。

毛澤東是個人意志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他的「左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八大」會議雖然吸收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思想，但在經濟建設的路線上卻沒有採納毛澤東的超高速的「左」傾思想，而主張「穩步發展」。這不但意味着毛澤東的有關思想不正確，也使他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壓制，對此，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必然要反擊。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合的時機。

毛澤東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爲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

而一九五七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便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的「匈牙利事件」。

八、「反右運動」：毛澤東製造「中國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該國執行「斯大林主義」，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造成的危機長期積累而發生

的。毛澤東沒有從積極的方面，如怎樣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改善人民的生活，改進共產黨的領導來考慮避免類似事件在中國出現，而是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來「吸取教訓。」毛澤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開始，少數社員鬧退社，黨內外刮起一股合作化沒有優越性、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的歪風；受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在一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中有各種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怪議論，有些人想復闢。他還認爲，黨內幹部中少數人也是動搖的，過不了社會主義關，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事件把黨內的螞蟻引出了洞。他提出，要準備出大事，準備出全國性的大亂子，甚至準備再回到延安去。「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爲了避免出大事，他認爲必須反擊歪風。⑬

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反右運動」是毛澤東有目的、有計劃地製造出來的。

據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的許全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說：

> 他（指毛澤東）又採用對敵鬥爭的「引蛇出洞」和「放長線、釣大魚」的策略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前所述，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就認爲，社會上、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要打退這股逆流。但他並沒有打。他明白，經過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一定的氣候是不輕易鳴放的。所以毛澤東在二至四月間的講話，談話中雖然

也有講階級鬥爭沒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評，雖然也有批右的言論，但總的基調是輕鬆的，階級鬥爭氣息不濃，是鼓勵大家鳴放，認爲現在是放的不够。他這樣做，用他後來的話說，是「有意識要緩和一下」。爲了讓人們把大量的「毒素」吐出來。他一再向幹部打招呼：要硬着頭皮聽，讓人把話講完，統統倒出來，而不要急於批評。他認爲，共產黨整風，就是主動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一九五七年大量的「右派」就是這樣主動引出的。⑭

爲了將「匈牙利事件」引出來，毛澤東於是不顧中共黨內其他黨員幹部的反對，大力鼓吹「大鳴大放」，「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爲了製造空氣，毛澤東還離京巡游，四處演說、講話，鼓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學生「幫助黨整風」。他說：「需要造成空氣，沒有這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

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統戰部在五月召開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而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一些高等院校的黨委也相繼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這些人在座談會上的發言，便被記錄下來，發表在《人民日報》和各地的報刊上，成爲「白紙黑字」的「罪狀」。

毛澤東向來是只聽歌功頌德，聽不得批評意見的。一九五三年，著名的民主人士，與毛澤東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因向毛澤東及中共提了一點微不足道的不同意見，被毛澤東當衆斥責，並因此而導致兩人絕交。今次，毛澤東花言巧語，四處遊說「鳴放」，不禁令民主人士滿懷狐疑。著名

民主人士龍雲說：「過去幾個大運動都是共產黨整人，現在是不是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後整人？」「現在時機不同了，大家知道，共產黨想辦法改正錯誤，共產黨是執政黨，怎麼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整風！」⑮這些民主人士太天眞，太幼稚了，他們不曉得毛澤東手段的厲害，輕信毛澤東的花言巧語，「幫助共產黨整風」，結果紛紛落入毛澤東的羅網中。

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各種座談會的同時，毛澤東於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學習。毛澤東在文章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甚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不論是民主黨派內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毛澤東還說：在整風運動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這些話淸楚地表明了毛澤東的「陰謀」。

許全興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和黨中央下了反擊右派的決心。但這篇文章黨外人士並不知道，所以許多人在五月十五日以後繼續大膽鳴放」。

如民主人士張奚若批評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旣往」、「迷信將來」的名言，就是在五月十五日這一天說的。

許全興還說：「這裏應當指出，從《人民日報》的報導中雖然可看出有些言論是錯誤的，甚至的確有懷疑，擺脫共產黨領導的傾向，但從整個報導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甚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

許全興又說：「還應說明，在反右派運動中一些當作典型的右派言論不是在五月十五日以前『放』出來的，而是在五月十五日以後『放』出來的」。如「民盟副主席章伯均的『政治設計院』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放』的」，「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放出的」，又如，「《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黨天下』是在六月一日會上放的。」⑯

全國性的反右運動，是從六月八日開始的。那一天，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也同時發表《這是爲甚麼》的社論，北京一聲令下，「右派分子頓時成爲過街老鼠」。

許全興還說：「毛澤東在爲《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七月一日）中把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提意見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人民的』，認爲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伯鈞）、羅（隆基）同盟』。毛澤東對形勢的這種估計和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應當說，當時中國的春季總的來講並沒有形成黑雲亂翻的局面。有沒有陰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沒有黑雲？肯定也是有的，但並非毛澤東估計的黑雲亂翻，不過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飄過幾團烏雲而已。章伯鈞、羅隆基兩人長期有隔閡、矛盾，很難說有『同盟』。至於把兩個民主黨派向黨提意見打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質更是錯誤的」。⑰

據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回憶：

對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某些負責人在一開始就表示不滿，提出

不同意見。黃炎培六月十五日表示，不要樹敵過多，要把可能拉過來的人拉過來，而不要把這樣的人推到反黨這一派那裏去。陳叔通六月中旬說：不能因爲對黨提了意見就作爲右派。黨的某些領導人沒有掌握好這一點，現在問題很嚴重。邵力子說，現在有許多問題處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難，失人心很易，表示對民革中央的反右派鬥爭要來個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贊成把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報上，擔心這樣做運動搞得很大。六月下旬，李濟深表示他要在人代會上發言，提出不要驕傲自滿，困難很多，還要努力。這表明，反右運動一開始就受到黨外的愛國民主人士的抵制、反對。不過，對這些逆耳忠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並沒有聽進去，反右鬥爭繼續升温。⑱

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黨內幹部會議上說：「右派只有極少數，大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此話一出，各地機械地執行，按百分比計算，沒有右派的單位也要抓出「右派」來，結果全國共劃右派五十五萬餘人。

抓到這麼多右派分子後，毛澤東可以理直氣壯地推翻中共「八大」的決議了。首當其衝的是改變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毛澤東說：「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還認爲，對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應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即無產階

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說：「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着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他批評「八大」決議上關於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對的，「『八大』決議這句話，馬、恩、列沒講過」。⑲

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批判「反冒進」。薄一波說：「毛主席認爲，反冒進在前，右派進攻在後。反冒進的人說一九五六年是冒進，右派攻擊一九五六年是『全面冒進』，二者之間是相關聯的」。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說：「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衆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毛澤東還將「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說成「距右派只有五十米」。

在「反右運動」這個大題目下，毛澤東順理成章地批判「反冒進」。於是「八大」通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也就被毛澤東輕而易舉地掃蕩了。

至此，「八大」路線只剩下一個空殼。

在否定了「八大」正確路線後，毛澤東便提出自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取而代之。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國內外形勢，製造了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既清除了黨外的不同聲音，又順利地實現了他的復闢，一箭雙鵰。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完成了正式的立法程序，確立了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全黨的統治地位。

北京方面在總結這段歷史時，都一致地認爲：反右運動的擴大化，使毛澤東動搖和修改了「八大」路線。這種說法將反右運動放在前，修改「八大」路線放在後，兩者是因果關係。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實際情況是：毛澤東圖謀推翻「八大」路線在先，「反右運動」僅是手段。據最新公佈資料顯示，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即「八大」剛剛閉幕，大會通過的決議墨跡未乾，毛澤東便明目張膽地修改「八大」路線了。

「反對個人崇拜」是「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之一。一九五六年四月，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寫成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對個人崇拜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認爲「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期歷史中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不只在剝削階級中間存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的中間有它的基礎」。「八大」決議便是吸收和反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一集體的思想成果。然而，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起草《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澤東便將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內容否定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負責起草《再論》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幹部介紹《再論》時說：《再論》和《一論》基本相同，但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⑳康生的講話清楚地表明，在寫《再論》時，毛澤東已經不主張反對個人崇拜了，也就是說，僅僅兩個月後，毛澤東便公開地否定了「八大」的路線精神。

另一個破綻是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被中共譽爲「劃時代的偉大文獻」，「對馬列主義理論重大發展」的文章，是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爲醞釀「整風運動」，即「引蛇出洞」而發表的講話，經過十四次修改，於六月十九日公開發表。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重申了「八大」路線的精神，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我們

的任務已變成發展生產力；當前的矛盾可分爲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對兩類矛盾應正確處理。薄一波說：「然而，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理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三十年實踐中，並沒有得到認眞貫徹，甚至遭到嚴重違反」，「就在提出這個理論的一九五七年，發生了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㉑

事實上，就在這篇文章修改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動了反右鬥爭。在以後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對這種理論的嚴重踐踏。在毛澤東生前，這種理論從提出後就從未得到貫徹執行。而且，自從公開發表後，毛澤東也再沒有提過這篇文章。

事實證明，毛澤東自己從來不想，也根本不打算實踐這篇文章提出的理論（即「八大」路線精神），更不打算運用這種理論去武裝、指導全黨、全國的工作。但由於宣傳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巨大影響，引起廣泛的注目，毛澤東騎虎難下，一拖再拖，到反右運動發起後才不得不發表。

毛澤東獨自推翻中共「八大」路線，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此後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嚴重的災難，便是由此起源的。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既表明了毛澤東的專橫獨斷、飛揚跋扈的家長作風，也表現了劉少奇政治上的軟弱性，不堅定性。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一種罪過，對劉少奇來說則是一種失責，他不但沒有領導全黨起來捍衛「八大」路線，反而亦步亦趨，拱手相讓。這正是「旗手」的可悲之處。

①：引自黃象品、熊呂茂《建國後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離合》，見《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第四三六頁。

②③：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四八六頁。

④：同上書。

⑤：引自江明武《周恩來的歷程》下册。

⑥⑦⑨：見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

⑧：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見《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⑩：轉引自楊勝群、田松年《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第二二二頁。

⑪：轉引自鄭謙、韓綱《晚年歲月》，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第二九頁。

⑫：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七五頁。

⑬：同上三五三

⑭：該書九七頁。

⑮⑯⑰⑱⑲：同⑭八七頁，九〇頁，九三頁，九八頁。

⑳：同⑭，四〇二頁。

㉑：同②下卷，第六〇一頁。

第四篇

對抗與分裂

第一章「左傾冒險主義」大泛濫：「大躍進」

一、毛澤東發動「大躍進」

「大躍進」是從「十五年趕超英國」開始啓動的，而這個口號是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提出的。

進入一九五八年後，毛澤東召開一系列的會議，嚴厲批判「反冒進」，鼓動大躍進。到了該年五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標誌着「大躍進」正式展開和毛澤東的「左」傾路線全面地佔了統治地位。

「大躍進」的標誌之一，是全面提高各項經濟指標。一九五七年通過的一九五八年的經濟計劃指標是：

鋼：六一〇萬吨；

糧食：三八八八億斤；

棉花：三五〇〇萬擔。

「大躍進」開始後，經多次提高調整，到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將各項指標調高爲：

鋼：一〇七〇萬吨；

糧食：六〇〇〇——七〇〇〇億斤；

棉花：七〇〇〇萬擔。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這些指標分別高出：

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糧食：增加百分之七十～九十；

棉花：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三。

這些天方夜譚式的數字，充分地表現了毛澤東令人驚訝的熱昏、唯心主義的空想性、隨意性，已經發展到忘記了工農業生產最起碼常識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荒謬絕倫的地步。

二、熱昏的日子：農業「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首先從農業開始的。

農業與農村，向來是毛澤東鍾情的所在。建國以來，農業與農村不但是毛澤東的「寵兒」，而且也是他在政治上的「試驗室」。

一九五六年，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合作化）以超高速完成以後，毛澤東率先發動農業的「大躍

進」。一九五七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便成了農業「大躍進」的綱領。這年冬天，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發動下，各地農村以「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批判「右傾保守」，全國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吹響了農業「大躍進」的號角。

在這種「熱潮」之下，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提出了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問題，時間由十二年提前到五——八年，毛澤東說：「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正是「上面心急，下面只爭朝夕」，「偉大領袖」一聲令下，各地紛紛響應。河南省提出一年內實現綱要規定的主要指標；連重工業集中，歷來糧食、副食品、蔬菜靠外省調撥的遼寧省，也提出一年實現糧食、豬肉、蔬菜三自給。

毛澤東聽說山東省有個大山農業合作社，因爲深翻土地增產，「不多不少，增產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毛澤東向湖南省的領導人說：「深翻換土，大有味道，寧可一畝地花一百個工、幾百個工也要幹」；又對陝西省的領導人說：「訂個五年計劃，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①

毛澤東還聽說南方某些高產地區水稻每畝種植三萬蔸禾苗，於是又向全國農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所謂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廣東，就是三萬蔸禾苗」。並說北方的谷子、麥子、高粱、玉米、蕃薯都可以密植。②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深翻」變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結果，熟地變成了生地，好地變成了鹽碱地。而「合理密植」變成了越密越好，一畝地下種幾百斤，收獲的是一堆秕子。

「八大二次會議」後，在總路線精神的鼓舞下，全國各地相競放高產衛星，《人民日報》等全國報刊相競報導。從六月八日報紙報導河南省遂平縣放出畝產小麥二一〇五斤的「衛星」後，各地的「衛星」越來越多，也越放越大：

小麥「衛星」最大的，是《人民日報》九月二十二日報導的青海省賽什克農場畝產八五八五斤；

水稻「衛星」最大的，是《人民日報》九月十八日報導的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畝產一三〇四三四斤；

玉米，是河南省商丘王樓人民公社第八生產隊放的三五三九三斤（《人民日報》九月十七日）；

高粱，是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莊大隊第六生產隊放的二二七二〇斤（《人民日報》九月二十二日）；

谷子，是河南商丘宋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隊王橋小隊放的二七七三三斤（《人民日報》九月二十日；）

馬鈴薯，是甘肅康縣窖坪鄉和平農業社放的一〇六三七八斤（《人民日報》八月二十六日；）

此外，花生的最大「衛星」是二六九六八斤；甘薯是二三〇〇〇斤，南瓜達到二〇二七三五斤。③從今天看來，這些天方夜譚式的「高產衛星」，自然是虛誇的，是明顯的弄虛作假。然而以毛澤東劉少奇爲首的中共中央相信，各地的領導機關和新聞媒界也深信不疑，以《人民日報》爲首的報刊進行着力的宣傳，推波助瀾。

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宣傳自己在廣東番禺縣親眼看到畝產一百萬斤番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的「事實」；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題為《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的文章，說廣東的糧食畝產是可以達到一萬斤的；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撰文，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麥的畝產量就有可能達到四萬斤。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發表大量的社論，大肆批判「條件論」，「機械論」，「悲觀論」，「農業有限論」，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宣稱：「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我國農業發展的速度已經進入了一個「由漸進到躍進的階段」。

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八月四日視察河北省徐水縣的文章中寫道：

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毛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三十五萬畝。毛澤東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裏的人，說道：

「要收那麼多糧食呀！」這時候，毛主席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本縣情況，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堅強的巴掌，算帳一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

啊？」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麽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跟着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麽多打糧食！」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

很多人都在私下裏互相小聲說着：「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④

一九五八年，在武漢，毛澤東與著名的哲學家，中共「一大」的參加者之一李達之間，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發生了一場爭吵。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梅白回憶道：

李達要我陪他去找「潤之」。當時毛澤東在陳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羅談話。我請陳毅轉告毛澤東，說李達求見。不料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起火來：「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通不通？」我趕緊說標語是武大學生在調查中發現的。毛澤東要我寫出這個口號

來。我說：「我也收到群衆來信，請求公開批判這個口號，我以『龔同文』名義寫了《論口號不能亂提》。」毛澤東看後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講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並且又用紅軍長征等歷史來加以說明。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你的時間有限，我時間也有限，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毛澤東當即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達氣衝衝地說：「肯定就是認爲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條件。我雖然沒有當過兵，沒有長征，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要拚命，可以『以一擋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作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現在人的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我見李達越講越激動，未等他把話說完，我便碰了李達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講了，恰好被毛澤東發覺了，他也生氣地說：「小梅，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李達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三十九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毛澤東聽到這話就坐不住了……

我見天氣已晚，就叫李銀橋（衛士長）準備飯菜。李達執意要走，說：「我不吃飯，我是校長，大躍進餓不了飯……」毛澤東只好說：「小梅，你送老校長回家。今天他火氣很大。」⑤

三、「超英趕美」：工業「大躍進」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用農業的「大躍進」，來促進、推動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把持的像「蝸牛一樣爬行」的工業。毛澤東曾說：「我現在就是要拿農業來壓工業，農業問題解決了，你們工業怎麼辦？」

工業方面的「大躍進」，是以毛澤東提出的「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為綱領的。

在一九五八年那種「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年代裏，毛澤東不斷地將趕超的時間提前。六月，毛澤東在一個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到了九月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明年是基本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

趕超的主要項目是鋼鐵。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薄一波代表國家經委黨組向政治局報告的《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到三年，「這裏主要是鋼。只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毛澤東還將薄一波的《匯報提要》的標題改為《兩年超過英國》。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一九五八年鋼鐵產量的計劃指標，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上調。開始時，周恩來等人還考慮到國民經濟的全局，計算要生產這麼多鋼鐵，需要增加多少電力、運輸、機械設備……，因此，只敢一點點，一、二百萬噸地往上加，到了六月份，毛澤東有些不耐煩了，說：「去年

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爲甚麼不能翻一番？」於是，一九五八年的鋼產量便确定爲一〇七〇萬噸，是一九五七年五三五萬噸的一倍。並決定到一九五九年鋼產量要達到三千萬噸，到一九六二年則要達到九千萬噸以上。（以上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對於這種工、農業一齊「大躍進」的形勢，毛澤東感到十分振奮。他說：

「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番，明年還可能翻一番。這樣我們的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是這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九月五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更滿懷信心地說）「今年糧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即有可能從去年的三千七百億斤，增到七千幾百億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萬擔，今年大概有七千萬擔，可以超過一倍。」⑥

毛澤東還說：「看來，我們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的。」「沿途一望，生氣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⑦

爲了實現一九五八年產鋼一〇七〇萬噸的目標，在八月十六日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這便是「全民大煉鋼鐵」的由來。

方針提出後，毛澤東身體力行，親自掛帥抓鋼鐵生產。毛澤東向陳雲下達了八條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

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⑧，毛澤東還下令將各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生產的黨委書記找來北戴河開會，專門研究鋼鐵生產問題，並在會上宣佈了毛澤東定下的紀律。這種架勢，嚴嚴然是革命戰爭時期那種「立下軍令狀」、「以軍法從處」的翻版。

由於產量翻番，而煉鐵煉鋼的高爐、平爐（洋爐子）卻沒有翻番。因此光靠洋爐子是完不成任務的。陳雲便在工業書記會議上提出「依靠黨委，發動群衆搞土爐子」的對策。對此，毛澤東指示：「對土爐子要有信心」，「即使在一百個土爐子中，只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紅旗」。毛澤東還強調要大搞羣衆運動，這不是「游擊習气」，「農村作風」，而「正是正規的馬克思主義作風」，要按紀律辦事，「不要『豆腐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毛澤東再次呼籲：「鋼鐵尙未完成，同志仍得努力！」

爲了確保鋼產任務完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用了層層攤派的辦法，硬性強令完成指標。鋼鐵工業基礎薄弱的山西省要完成六十八萬噸鐵，五十五萬噸鋼，幾乎沒有甚麼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出二十萬噸鐵。並下令由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再次強調各地承擔的指標只能超額，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缺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

爲了完成毛澤東的「翻番」目標，全國上陣大煉鋼鐵的有九千萬人，加上其他的間接的行業如運輸等，全國投入大煉鋼鐵運動的勞動力超過一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辦起來的小土爐達到幾百萬座，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僅爲收購這些成本高而質量差的土鐵土鋼，國家虧損了五十億元。至於過量地開採煤碳和礦石，濫砍濫伐樹木等等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就無法計算了。

四、人民公社：毛澤東「如獲至寶」

「人民公社」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高舉的「三面紅旗」之一，因而也是導致「三年災難」的禍根之一。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面對着彭德懷等人尖銳而實事求是的批評，毛澤東窮於招架，不得不進行多番的辯解：

「一個是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呵，是我建議的，下的決心，其結果幾千萬人上陣，『得不償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北戴河決議是我建議寫的。碴岈山的章程，如獲至寶。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一報。」⑨

其實，事情的眞相並不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無發明權，有建議之權」，毛澤東是在文過飾非。事實是：「人民公社本是毛澤東想象中的農村烏托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語）這個烏托邦，早在長沙時代便在毛澤東的腦海中形成了。建國後，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毛澤東逐步將中國的農村，改造成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在不斷的小社並大社後，時至一九五八年，農村中的生產合作社規模達到數百戶，上千戶，已經夠大的了，而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也越來越高，農民們除了自家飼養的鷄鴨豬狗外，已是身無長物。至此，毛澤東覺得實現他的那個理想王國的時機成熟了。隨着「大躍進」、「總路線」、「趕超英國」的口號響徹雲霄，那個在毛澤東心中孕育了近半個世紀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開始胎動了，如「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

船」，如「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如「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引起「胎動」的第一個因素，是「鄉社合一」（亦即政社合一）。

鄉社合一，一鄉辦一社的主張最早是由陳伯達提出來的。一九五七年一月，陳伯達從福建省蓮塘鄉搞農村調查回來後，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提出了這一建議。但是，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後認爲，此事「牽扯較大，必須愼重考慮」，因而未獲採納。

到了一九五八年，理想王國的夢想使毛澤東想起陳伯達的「鄉社合一」，於是在二、三月間將他找來談話，肯定了陳伯達提出的「鄉社合一」，認爲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型，甚麼都管，工農商學兵。

於是，陳伯達於七月十六日在《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文章，公開了辦公社乃是毛澤東的構想：「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程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公社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經驗所得出的結論」。

最先摸到毛澤東的思想脈搏的地方領導人，是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人，他們是從劉少奇口中得知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分管農業口的譚震林在鄭州向河南的領導幹部又講了毛澤東關於辦包括「工農商學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他們回去後便將合並了的大社叫「公社」，中共河南省委在八月二日上送的《關於建立人民公社情況的報告》說：「這一運動，首先從農村開始。小社並大社，自留地歸集體，大搞公共食堂，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組織生產、辦工廠、搞集體生活福利事業。這在實質上已經形成了公社的雛型，但還沒有肯定的統一名稱。有的農村叫

集體農莊，有的叫農場；在城市有的叫社會主義大院，有的叫社會主義大家庭等，直至《紅旗》第四期陳伯達同志所寫《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一文引證毛主席關於人民公社的指示後，才明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⑩

據中共河南省委八月十三日向中共中央的電話匯報稱：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一四六三個，估計劃數的百分之五十二，其中七月十八日成立的修武縣人民公社是一縣一社，近三萬戶人家。

與此同時，河北省、山東省也陸續建立了「人民公社」。

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滋潤下，「人民公社」破土出世的消息傳到了北京。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中南海接待到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商討蘇方提出的「建立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等問題。毛澤東將赫魯曉夫頂回去後，便迫不及待地於八月四日離開北京，頂着炎炎烈日，南下巡視「人民公社」。第一站，毛澤東到達河北省的徐水、安國。

在徐水，毛澤東稱讚「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指示要推廣；還稱讚農民上山煉鐵，問糧食多了怎麼辦？可考慮讓農民一天幹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人民公社」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以及毛澤東迫不及待地前往視察的消息，也吸引了劉少奇的極大的注意。毛澤東走後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劉少奇派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來到徐水，傳達了劉少奇關於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指示。幾天之內，全縣成立了人民公社。⑪

八月二十二日，徐水縣制定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規定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一九六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八月二十三

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道，宣稱：「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時光。」

八月六日，毛澤東到達河南省新鄉七里營視察。在公社辦公室門口，看到「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牌子赫然掛在牆上，便說：

「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衆喜歡的名字。」他同時指出，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⑫

八月九日，毛澤東到達山東。當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啓龍匯報說歷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毛澤東的講話於八月十三日見報，「人民公社好」於是傳遍全國，各地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

另一個捉摸到毛澤東的政治脈搏的人，是上海的柯慶施。爲了增加「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因素，「消除資產階級法權」，柯慶施提出在農村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各地紛紛仿照推行。

譚震林在四月提到的碴岈山衛星農業社，回去後立即改名爲衛星人民公社。《紅旗》雜誌編輯李友九與河南省委共同搞了一份《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由陳伯達送交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對《簡章》作了修改，批示：「請各同志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說：「我在河南調查過後，叫河南同志跟紅旗雜誌合作，搞了一個衛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個東西，如獲至寶。你說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不然我爲甚麼如獲至寶呢？」⑬

「如獲至寶」四字，可圈可點，毛澤東那種喜出望外之情，溢於言表。

既然是「至寶」，就要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於是，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於八月十七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北戴河會議）。中心議題之一，便是正式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普遍建立「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爲一體」的人民公社。毛澤東八月九日才說「人民公社好」，八月十七日便召開北戴河會議，其情意之急切，其行動之雷厲風行實屬罕見。

在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闡述。毛澤東說：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那時道德大爲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都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萌芽，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

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爲甚麼不可以這樣幹呢？如果做到吃飯不要錢，這是一個變化，大概幾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大，了不起，人多勢衆。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掉，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每個男人，每個女人，每個老年，每個青年，都有工資，發給每一個人，和以前分配給家長不同，直接領取工資，青年、婦女非常歡迎，破除了家長制度，破除了資產階

級法權制度，還有一個公的特點，是勞動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⑭

在北戴河，人熱天也熱，曾在中南海中共中央辦公廳接待處任職的李維信，在回憶錄中記下了北戴河會議中的珍貴的鏡頭：

這年夏天，北戴河群星燦爛，集中了中華民族一大批出類拔萃的優秀人物。那時條件艱苦，但是「群星」都是從艱苦的黑暗中閃爍出來，也就不覺甚麼艱苦，反而其樂融融。

道路泥濘，部隊來墊石子，那場面能使人嗅到過去戰鬥生活的氣息，禮堂小，悶不通風，搖破紙扇也禁不住汗流如注，便索性搬出禮堂開會。臨時搭個席棚子，擺開藤椅藤桌，不够了就用木椅木桌替代，一百多號中央委員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就在席棚下開這種最高級會議。隨着太陽的移動，總有不少人要經受陽光灼燙的考驗。

每人面前能保證一個茶杯，但是不能完全保證水。那麼大那麼高級的會議，全會場只有韓樹元和李維信兩名服務員。茶杯裏的水泡茶不泡茶分不太清，因爲水本身就是黃的。

李維信回憶說：那條件已經算改善很多了。早二年，周恩來在北戴河主持會議，條件更差，喝不上開水，從北戴河的西山那邊拉水來，水質糟糕，全是黃水，没有鍋爐，只有兩把鐵穿壺，就是壺中間空，可以直接在裏邊燃火燒水的那種壺。我和張寶忠兩個燒水供大家喝；没

有煤，用木柴燒，忙暈了，張寶忠没灌水就燒，燒化了壺裏的焊錫。一把壺報廢了，只剩一個壺，再燒也供不上那麽多人喝開水呀……

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有鍋爐燒開水，但是人多，出汗多，喝水多，供水仍然緊張。

天氣熱，會議氣氛也熱，毛澤東在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是坐在藤椅上講。講到激動處，身體不斷前傾，藤椅後腿翹起來，很高，隨着毛澤東抑揚頓挫的話音上下晃動。

葉子龍在旁邊看着擔心，朝李維信招招手。「你去，弄塊毛巾墊到主席的藤椅腿上，小心别摔了。」

李維信弄兩塊破毛巾，貓腰蹲到毛澤東椅後，將毛巾綁到藤椅後腿上。毛澤東發覺有動静，藤椅腿落下來。回頭望望，李維信小聲説：「墊塊毛巾，怕主席椅子不穩摔着，」

毛澤東笑了，一語雙關：「總有人怕我們跌跤喲。」他向中央委員和書記們宣佈：「休息一刻鐘。」

條件比過去好的一個標誌是這次會議還搞來了西瓜。水不够，瓜來代。雖然只吃了這麽一次瓜，那樂趣卻比十次還濃。

有好瓜没有好刀，李維信找來一把剛擦去鐵鏽的鈍刀，刀把也活動殘缺，先切瓜皮蹭蹭刀，再去切瓜。中央委員們一擁而上笑着、嚷着、駡着，圍住李維信搶瓜吃。李維信運動着大笨刀盡力而又匆匆地切，周圍晃動着那麽熟悉的令人尊敬的面孔：李井泉、陶鑄、葉飛、江渭清、王恩茂……這一刀剛下，三、四只手已經伸過來。「手，小心手！」李維信一邊切，一邊

喊，「切着手啊……」。

這一撥人搶了瓜鑽出去吃，那一撥人早又擠到前邊，仍然是熟悉而親切的面孔：柯慶施、楊尚昆、周小舟、曾希聖、閻紅彥、陶魯笳、吴芝圃……

李維信大汗淋漓，手痛得厲害，知道磨破了，但不能停，而且心裏很熱，這場面就像當年八路軍打了勝仗，年輕的戰士們生龍活虎打牙祭。

這次切瓜，李維信手磨破四個泡，流了血。毛澤東看着「搶瓜」的場面，一邊笑，一邊感慨：「有當年那股勁喲……要趁我們還不老……。」⑮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熱潮中，毛澤東是「熱源」。下面摘錄的便是熱昏了頭的毛澤東，在那些熱昏的日子裏所說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熱昏的話：

——「糧食多了怎麼辦？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那裏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廠，大學、街道都辦公社，如鞍鋼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廠」；

——「大城市要分散，鄉村就是小城市，每個公社都將路修寬一點，可以落飛機，每個省都搞一、二百架飛機，每個公社平均兩架，大省自己搞飛機工廠」；

——「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要考慮取消薪水，恢復供給制，人活着只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共產主義，有甚麼意思呢？」

——「過去不少的人認爲工業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業，對工業也是一竅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幾個管工業的談過，開始不懂，過幾年，也就懂了，有甚麼了不起！」

——「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

——「爲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七億人口搞七億噸鋼」。「三至七年之內建成一個工業大國」。「設想十年可以搞四億噸鋼、二千萬台機器，二十億噸煤，三億噸石油」。

——「（由於群衆的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一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召開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撤消了司法部，人大常委會也撤消了法制局。中國完全進入了「人治」的社會）；

——（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提出准備十二年後過度到共產主義。對此毛澤東解釋說）：「我們一定要蘇聯先過渡，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我們先過渡，蘇聯臉上無光，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無光，形勢逼人，逼他快些過渡。如果我們先入共產主義怎麼辦?還是掛社會主義招牌，行共產主義實質，有實無名」。

——「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前人的烏托邦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⑯

五、劉少奇緊跟毛澤東「大躍進」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年代裏，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的「旗手」與「旗幟」之間的關係，有着突出的表現。

除了對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劉少奇以「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形式，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進行詳細而又全面的解釋，從而令毛澤東感到十分滿意之外，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每一部署，劉少奇都亦步亦趨地緊跟。

在中國建立「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爲一體」的「人民公社」的構想，劉少奇就是毛澤東首先透露的對象之一。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劉少奇與周恩來、陸定一等人一起到達廣州，同毛澤東討論準備向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報告》草稿。當時，毛澤東向劉少奇說起幾十年後中國的情景：

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

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爲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我們的教育方針和其他教育事業，也將朝這個目標發展。⑰

受到毛澤東的感染，在由廣州回北京（四月下旬）的火車上，便發生了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一起大吹「共產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那一幕。當火車到達河南省省會鄭州時，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到車站迎送，劉少奇便將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構想向他透露，並說他「可以試驗一下」。劉少奇稍後回憶說：

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裏（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同志談過。在廣州開會，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時任劉少奇政治秘書），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爲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爲後一個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爲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爲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

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採

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兵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拼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後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爲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作者注）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裏邊講了這個東西。⑱

河南省最先得知「天機」。於是「人民公社」便首先在河南省興起。

在一九五八年中，劉少奇是宣傳「人民公社」最積極、最熱心的其中的一個。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爲《大同書》中寫的。康有爲二十七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主席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爲的《大同書》，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兩次，家庭要消滅。（劉少奇把辦托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爲「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的事業，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甚麼地方，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

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社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作工的淨作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開始辦工廠、商業、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後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後可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⑲

七月五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幹」。

七月十九日，劉少奇到達天津視察，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商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裏，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七月十四至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視察，再一次講了「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

對於「大躍進」，「十五年趕超英國」，劉少奇也十分熱心而着力地宣傳。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劉少奇在視察北京石景山發電廠時對工人說：你們談的很好，我聽了很高興。這樣做下去，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麼窮，那麼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

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數算，有這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了。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幹，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⑳

一九五八年九月，劉少奇在江蘇省視察時問一個鄉黨委書記：試驗田的水稻每畝能打多少？這書記回答：可以打一萬斤，劉少奇笑着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當地方負責人向他匯報勞動力緊張情況時，劉少奇說：「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劉少奇還對各地從人民公社裏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煉鋼鐵的做法給予讚揚。他說：「現在各地方煉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衆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或者是半供給半工資，這個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他們搭一個棚子睡在爐子旁邊，生活雖很苦，幹勁卻很大，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㉑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發動「人民公社」運動，是向《三國志・張魯傳》和康有爲的《大同書》「取經」的，從這些農業原始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先人的身上，毛澤東爲自己的「理想王國」吸取思想養料。早在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談到將來家庭的命運時，就提到康有爲的《大同書》。他說：「家庭是原始公社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爲的《大同書》曾提到此點」。在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吃飯不要錢時就提到東漢的「五斗米教」，他說：「張道陵的每人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飯吃，傳到江蘇的張天師就變壞了，吃糧食是有規律的，大大小小一年三石六斗，就開量叫他吃。薛仁貴一天吃一斗米，總是少數。我們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

十二月三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再次談到吃飯不要錢時，又講了張陵的孫子張魯的故事。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裏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裏搞。他統治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

十二月七日，毛澤東再次閱讀「三國志·張魯傳」，寫下了長篇的批語：

這裏（指《張魯傳》——引者）所說的群衆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衆多的農民革命鬥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在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急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

表現互助關係上。第三方面，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制、上層建築的封建制——從天公將軍張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楊么，鍾相，元末的明教，紅巾軍，明朝的徐鴻儒，唐賽兒，李自成，清朝的白蓮教，上帝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最著者。我對我國歷史沒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觸。對上述性質的分析，可能有錯誤。但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就最貧苦的群衆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領袖們（張角、張魯、黃巢、方腊、劉福通、韓林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㉒

十二月十日，毛澤東又再寫了另一條批語，並將《張魯傳》及批語印發給參加會議的中共各級領導人。批語寫道：

我國從漢末到今一千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漢末……張修，張魯祖孫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受群衆歡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是招來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以說教爲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經祭酒爲治」，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爲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衆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

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没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㉓

從這些講話、批示中，可看到毛澤東對《大同書》，《張魯傳》的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贊賞和認同，毛澤東與之產生思想共鳴，並將它們攝入自己的「理想王國」的藍圖之中。劉少奇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這方面的思想影響，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與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曾經組織新村，日本也有個人組織新村，我在入黨以前看過組織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裏激動了」。八月六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到徐水縣傳達劉少奇關於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指示時，除了號召大家學習《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主義著作外，還把從北京帶來的康有爲的《大同書》送給徐水的領導人。據北京的黨史專家考證，送《大同書》既不是陳正人，也不是劉少奇的意思，而是與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講話中（指一九五八年四月在廣州的談話），談到《大同書》有直接關聯。

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的支持，無疑是眞誠的、熱心的。然而劉少奇不是「三面紅旗」的始作俑者，他能以「旁觀者」的客觀的心態，不帶主觀意志，不帶感情色彩地去觀察事物。因此，當「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禍端百出之後，劉少奇就更願意、更容易去接觸實際，揭發錯誤，從而對「三面紅旗」的檢討、反思也就更深刻一些。正是這一點，使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聯盟出現裂紋，並由此而釀成殺身之禍。

六、毛澤東不甘心讓位　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

在「大躍進」的高潮中，發生了毛澤東忍痛讓出「國家主席」的插曲。

「國家主席」是一九五四年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而第一任國家主席也是毛澤東。

其實，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成立時，毛澤東便擔任了「主席」，但那時是叫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到一九五四年第一屆人大時，才正名爲「國家主席」。那時候，毛澤東還擔任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一身兼任六個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開了歷史的先河。

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後，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獨裁一時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氣候。中共中央順應這個歷史潮流，在「八大」會議上也提出了「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迷信」等政策。在這種大勢所趨之下，加上中國對外交往日益擴大，涉外國務活動日漸繁多，一向討厭繁文縟禮的毛澤東不勝其煩。於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並說最遲不超過一九五八年底之前實踐。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城樓談話時，透露了此意向。當時這些黨外人士頗多不通。五月一日，陳叔通，黃炎培聯名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提出不

同意見，認爲在十五、二十年內，「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變爲好」，「集體領導中的個人威信，仍是維繫着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五月五日，毛澤東看了信後批示：「可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但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淸楚可以不連選：(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以不連選；(二)按憲法制定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

辭去國家主席意味着退居二線。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自到台前「掛帥」指揮「大躍進」(在此之前毛澤東甚少涉足國民經濟)，已經不願退居二線了。然而說出的話如潑出的水，於是只好在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辭職。然而，在討論國家主席的繼任人時，毛澤東竟然一聲不出。按常規，毛澤東作爲中共第一把手，應當提出繼任人選，供全會討論，可是毛澤東卻像事不關己似地沉默着。由於毛澤東的沉默，其他人也不便開口，會場上一時出現冷場。是鄧小平打破這個沉默，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話剛落音，會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於是劉少奇的任命便順利通過。㉔

國家主席的繼任人選不是由毛澤東提出，而是由鄧小平提出，這是十分不尋常的。在毛澤東的統治權術中，有一條叫做「權力平衡」。毛澤東作爲「掌門人」，在權力的分配中，必須注意不可讓某人或某一集團所獲得的權力過多過大。否則就會坐大，威脅到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中共的核心領導中論資歷、水平、威望，除了毛澤東便是劉少奇了，劉少奇當時已擔任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再擔任國家主席，其權力就太多太重了，權力架構的平衡就會打破，毛澤東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脅。毛澤東不希望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但不能，也沒有理由出面反對。這就是毛澤東矛盾的心理狀態，也是他沉默的原因所在。

與一九四二年對劉少奇的安危牽腸掛肚相比，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情誼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當年的那份純眞已不復再。現在，在毛澤東的心中，劉少奇是戰友，但更大的程度上是潛在的、具有巨大威脅的對手。

---

①②⑧⑪：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③：謝春濤《大躍進狂瀾》六〇——六四頁。
④：引自林蘊暉、顧訓中《人民公社狂想曲》。
⑤：引自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
⑥⑦⑨⑩：同④三二九、三二五、三〇五頁。
⑫：見《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
⑬：引自蘇曉康等《烏托邦祭》。
⑭：同④
⑮：見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⑯：引自蘇曉康等《烏托邦祭》、林蘊暉、顧訓中《人民公社狂想曲》、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⑰⑱：同①

⑲：引自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七四——一七五頁。

⑳㉑：引自《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六三——六六頁。

㉒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六二七——六三〇頁。

㉔：見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二〇二頁。

第二章 廬山會議：毛挾劉肅整彭德懷

一、「大躍進」緊急刹車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高潮是在九、十月。然而，剛進入高潮不久，毛澤東便看出問題了。

問題一，是一九五八年係「大豐收之年」，然而奇怪的是，在這樣的好年景下，城市里竟然缺糧、缺菜、缺肉、缺蛋，總之是能夠吃的都缺。

問題二，是由於「大躍進」，基建項目「大幹快上」，又「大煉鋼鐵」，將資金、原材料、電力、交通運輸等都額外佔用了，擠了輕工業。致使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輕工用品十分緊缺，商店裏的貨架空空如也。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亦說：「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頭髮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以致搞得人心緊張。」毛澤東在彭德懷面前是打腫臉充胖子，「大躍進」後豈只頭髮卡子、肥皂太少，人民吃穿用的，如牙膏牙刷，毛巾手絹、衣帽鞋子，連鍋碗瓢盆，所有的東西都一下子不見了。

問題三，是「大躍進」還擠掉了外貿出口，大批工廠停工待料，出口商品信譽掃地，出口瑞士的煤炭，三分之一是石頭，外貿逆差達七個億。

此外，由於財政結餘用光，出現大量赤字，銀行只好增發鈔票，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騰貴，國民經

濟出現了建國以來罕見的危機。

一方面是「千軍鼓足幹勁，萬馬力爭上游」的熱氣騰騰的局面，另一方面卻是困窘處處可見，危機重重迫人。毛澤東心知不妙，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離開北京，外出視察，以求弄清眞實情況。就所了解到的情況，毛澤東開始情急似火，心憂如焚。

十一月二日，毛澤東親自在鄭州主持召開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部分省、市的領導人，大家廣泛地討論了人民公社運動出現的種種問題。這就是開始刹車糾「左」的第一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開始向各路諸侯發出「降溫」的指示。

十一月五日，柯慶施向毛澤東匯報上海市人心浮動、思想混亂的情況。

其他省市領導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東省委書記舒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等均不約而同地反映人民怕廢除鈔票，怕歸公，因而發生了擠提和搶購。

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也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

毛澤東在會上還說：「現在開的支票（指經濟指標）太大了」，「眞是逼死人，腦筋裏頭就是鋼，農業沒有人抓了」。他勸各地諸侯「還是社會主義爲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不去趕美，只趕英國」。幾個月前那種「兩年超過英國，七年趕上美國」的干雲豪氣，一改盡洗。

毛澤東在華北平原一帶視察的同時，劉少奇也在十月十五日離京到華東視察。毛澤東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等問題上。而劉少奇似乎是注意工業、文教等諸方面。在杭州，劉少奇視察了浙江大學，還與省委書記江華等人談話，說：

要大力發展生產，使群衆有足夠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辦好公共福利事業。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不要濫用，馬克思、列寧說的共產主義是高標準的。虛報浮誇當然不好，有些地方一下摸不準確是難免的，但是故意假報就不好，現在許多地方的產量都要打折扣。報紙登的不符合實際，不能全怪報紙，是你們地委縣委自己報的，地委縣委書記簽過字的。問題是幹部作風問題，對於這種作風要批評。要反對說假話，要反對這種虛報浮誇的作風，要踏實一點。①

劉少奇談話的調子，與幾個月前的「空想主義的理想，我們也要實現」相比，顯然也低調了許多。劉少奇在浙江接到通知，於十一月七日趕到鄭州，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至此，劉少奇才知道毛澤東開始「糾左」。

入冬以後，「人民公社」的弊端進一步暴露。不少農村開始缺糧，公共食堂斷炊，農民外出逃荒。爲了盡快扭轉形勢，毛澤東接連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武昌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一九五九年一月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二月二十七日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短短的時間內頻頻地召開這麼多的大型會議，這在中共黨史上還是第一次。「大躍進」、「人民公社」所造成的危機之嚴重、情況之緊迫，以及毛澤東心情之急切，由此可見一斑。

二、毛劉的分歧

毛澤東是「三面紅旗」的始作俑者，它們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集大成者。而劉少奇雖然也說了一些大話、空話、昏話，但他只是個追隨者。

因此，如何看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毛、劉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自己與「三面紅旗」牢牢地拴在一起。爲了自己的聲譽、威望，毛澤東要千方百計地爲它們辯護，要不惜代價地捍衛它們。因此毛澤東的立場是不自由的，思想是不客觀的，對一九五八年闖下的大禍，他不可能有實事求是的，徹底的認識，而且不認錯，不服輸，從而製造了更多的錯誤和更大的災難。「三面紅旗」成爲毛澤東沉重的政治包袱，負着它，毛澤東艱難地走完了最後的二十年。

劉少奇的處境完全不一樣，他沒有毛澤東的那些束縛和包袱，他是自由的、客觀的，他對局勢看得更深更透。他唯一的束縛是「旗手」的角色。可是，當他在眞理與謬誤，人民與領袖，革命與個人之間作出正確的抉擇之後，他就能夠擺脫這種束縛，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了。

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矛盾、鬥爭，以至最後的決裂，便是由此而引起。

首先，毛澤東認爲「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正確的，一九五八年成績是主要的，是九個指頭，而缺點和錯誤只是一個指頭，這是大原則、大前提；

其次，一九五八年的缺點錯誤的性質，毛澤東認爲只是缺乏經驗，具體措施不完善，尤其是下面各級官員執行不力、貫徹不好而造成的。毛澤東說：「去年情況本來很好，但帶來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沒想到困難的一面」；

毛澤東並沒有認爲自己是「左傾冒險主義」，他要糾正的，是下面各級官員比他還要「左」的「超左」，和各個方面的混亂，稍加整頓，以便更好地「大躍進」。因此，毛澤東說人民在一九五八年表現出來的熱情與積極性很寶貴，不可潑冷水，「氣可鼓不可洩」，不能打擊群衆的積極性，否則就是原則性的錯誤；

對一九五八年的缺點錯誤，在毛澤東來說，就事論事可以，但絕不能「上綱上線」，不可以牽涉「路線」、「主義」這些重要問題，也不可以聯繫到「思想意識」、「政治作風」（如驕傲自滿）等敏感部位。而且，對缺點和錯誤，毛澤東自己講可以，別人的批評，尤其是那些毛澤東不喜歡的人的批評，毛澤東就感到特別刺耳，難以接受，從而認爲是「別有用心」。

因此，毛澤東一方面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大講「壓縮空氣」，「反冒進」，「當一點右派」，不要「務虛名而受實禍」。另一方面，在十一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看到山東範縣提出的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鷄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十一月六日，毛澤東當即批示：「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②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十一月三日的會議上大讚三國時候張魯的五斗米道。在十二月的武昌會議上，

毛澤東更批印了《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發給與會的各級官員。

在大災大難臨頭，在開始糾正錯誤的時候，毛澤東還如此崇尚古人的原始社會主義，毛澤東對那個「平均、公有」的農業社會主義社會之迷戀、執着，可見一斑；而毛澤東對一九五八年的缺點錯誤的認識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天，毛澤東認爲經過八個月緊張而艱苦的「糾左」工作，情況已經清楚，問題也得到或正在解決，形勢已開始好轉，緊張而沉重的心情可以放松。下一步是讓全黨總結經驗，統一思想，部署好今後的工作，以便繼續「大躍進」。在這種思想之下，毛澤東認爲在炎炎仲夏中上廬山開會，既可以避暑，又可以遠離塵囂，鬆馳精神，過一陣「閒雲野鶴」的生活。而廬山是天下名山，歷史古跡多，神仙故事多，於是便將初期的廬山會議稱爲「神仙會」。

三、毛澤東的「釣魚」與彭德懷的「爲民鼓胡嚨」

在廬山上，最敢講缺點錯誤的是彭德懷，那沙啞、厚重的湖南口音，不時地從西北組傳來：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

「褲子要自己脫，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十七多。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一次脫光，省得被動！」

「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廠，限額以下搞了一萬三千多個，現在怎麼辦？每個協作區、省都要搞個工業系統，不是一、兩個計劃的事情。」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容易犯右的錯誤，與資產階級決裂容易犯『左』的錯誤。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發生的，從去年九月到十一月，而影響不只三個月，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

「甚麼算賬派、觀潮派……帽子一大堆，對廣開言路很不利。有些人就不說眞話，摸領導人的心理。周小舟那天對我說，去年的糧食造了假！我不敢相信，他說，數字是壓出來的，報一次數字上去，上面說不落實，第二次報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假，下面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

「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也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的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衆性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之下，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③

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上的發言，並沒有如實地傳達到毛澤東那裏。會議印發的《簡報》中，把彭德

懷意見中那些言詞最尖鋭的部分，特別是涉及到毛澤東的一些話，都删去了。發現這種情況，令彭德懷很不滿意。

在這種形勢下，彭德懷決定給毛澤東寫信，系統提出自己的意見，並說明「給你作參考」。

薄一波在回顧廬山會議這段歷史時，說自己有兩點不明之處：

其一，是他（指毛澤東）曾不知多少次地講過，在黨內要暢所欲言，敢於講真話，領導者要善於傾聽不同意見，並總結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處理黨內矛盾必須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然而，在廬山上這些優良傳統卻遭到了破壞。如前所說，彭德懷同志作爲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這是完全正常的。按黨章規定，這是每個黨員都有的權利。怎麽彭德懷同志寫信就成了「下戰書」？他的信上明明寫着「供參考」，怎麽能說他的目的是「爭取市場，組織隊伍」？這樣的政治判斷，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毛主席雖然一再表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的身上」，並講：「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而廬山會議的事實表明，毛主席有錯誤自己講可以，別人講，就聽不大進去了，特別是過去有些積怨的同志講就更聽不進去了，這應該說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個重要表現。在廬山會議期間，七月四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同王任重等同志談話時，念起明代楊繼盛（號椒山）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並說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且照此去做。遺憾的是，在廬山會議上，他卻没有做到這一點。共產黨人有了缺點、錯誤，自己講出來，作自我批評，誠然可貴，

同時也應讓別人講，歡迎別人進行批評，應該有讓人「面折其過」的政治雅量。當然，這是需要有很高的黨性修養的，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黨性原則、黨性修養不可謂不高，大家對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廬山會議上，卻未能實踐「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究竟還有些甚麽思想原因和社會歷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滿意的答案。大家還可以繼續研究。

毛主席歷來提倡尊重實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比如，據周谷城同志回憶，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邊他和毛主席進行交談中，毛主席談到西漢的趙充國時說：趙充國主張在西北邊疆實行屯田，這個人能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他的主張在開始，贊成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反對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到後來，他的主張逐漸被人接受，贊成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反對的卻只有十分之二。真理要人接受，總要有個過程，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又比如，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給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議他讀一讀《漢書·賈誼傳》，並說，賈誼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讀」。賈誼給漢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它爲國家長治久安提出一些謀策，雖措詞激烈，但切中時弊，毛主席稱它爲「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足見他是很讚賞賈誼的居安思危、痛陳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的。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幾乎就在他讚揚這些古人，推崇他們上書的同時，當彭德懷同志把他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和流弊寫成信件，並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居安思危的憂慮和意見，送給毛主席後，毛主席卻没有稱讚彭德懷同志「能堅持真理」，像看待趙充國那樣，也没有稱讚他的「上書」是

「切中當時事理」的「政論」，像看待賈誼的上書那樣，反而把彭德懷同志的信看成是「反黨的意見書」，並給他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評古人的話和評彭德懷的信兩相比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這中間是何緣故？大家也還可以繼續研究。④

薄一波的問題誰也解答不了，恐怕只有毛澤東自己才能回答。然而，據李銳說：「按照黃克誠後來同我談過的，他們兩人（指毛澤東與彭德懷）相互成見很深，有許多歷史上的疙瘩沒有解開。上海會議上主席做報告批評了一些人的時候，講過一句話：『彭德懷是把我恨得要死的』，以此作爲印證，黃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和一九五九年四月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都呼吁「團結」，講到要警惕黨發生分裂問題。後來毛澤東自認那是針對彭德懷而講的。毛澤東已經預料到，「大躍進」出了大紕漏後，在黨內彭德懷一類的人要出來罵娘。於是先打個「招呼」。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還大講海瑞，提倡學習海瑞，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但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

「剛直不阿」，人們首先便會想到彭德懷。對此，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梅白曾有一段回憶：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了八屆七中全會。會前，我到毛澤東那裏去，他便問我：「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我希望中國能多出幾個海瑞」。我問：「是不是『釣魚』？」他說：「不是」。第二天，毛澤東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他對我說：「講海瑞，我

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他還說：「我把問題交給少奇、恩來他們辦，自己退到二線。但過一段後又『不安分』，實際上還是一線。張文伯先生在湖北時建議我少過問具體事，多考慮方向性的問題，不要以個人意志代替大多數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⑤

毛澤東說不是「釣魚」，但李銳說：「後來也曾聽有的老同志談到，上海會議時講海瑞問題，就是『釣魚』，就是『引蛇出洞』。我認爲，『五九年的夏季形勢』是否可以套用『五七年的夏季形勢』，這個問題有待史學家研究」。

確實的情況是，上海會議結束後，彭德懷找來了有《海瑞傳》的那一卷《明史》，有半個月的時間，這本線裝書常置彭德懷的案頭。彭德懷是上鈎的魚。

對彭德懷的信，毛澤東很快就作出反應：於七月十六日，批示印發給大會，並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在中央常委會上還說「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毛澤東還指示：讓彭眞、陳毅、黃克誠、薄一波、安子文同志也上山來，參加會議。「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可以，也請他來」《

薄一波、安子文是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華北會議上整彭德懷的主要人物。將他們召上山，是糾集反彭的政治力量。而黃克誠後來說：「當時毛主席臨時通知我上廬山參加會議，是爲彭德懷『反黨集團』湊班子的。既叫『反黨集團』，總不能只有一個人。你們想想，彭德懷搞『反黨集團』，要是沒有黃克誠參加，誰會相信?!」⑥

四、廬山上的劉少奇

當時在廬山上的中央常委除毛澤東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人。林彪與陳雲均因病請假。到這時候，劉少奇還摸不清毛澤東的底細。他說：

「主席，下面的討論，如何進行呢？」這既是試探，又是請示，因為劉少奇是大會的主持者。

「你說呢？」毛澤東反問道。

「我看還是按照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這個精神，再用一周時間，讓大家把各種意見都講出來。」劉少奇說道。

「好的，就按少奇說的辦」。毛澤東並沒有透露他的計劃。

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對廬山會議的前半段，有以下的回憶：

少奇同志在廬山的住處是一幢非常漂亮別致的小洋樓。據說是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別墅。

七月十六日，我收到會務組送來的題目是「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打印件，即彭德懷同志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

「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我失聲念了出來。「甚麼內容？」當時在場的吳振英、李福坤

等同志都想知道其內容。

我念完之後，馬上送給了少奇同志。回到辦公室時，大家正在議論這封信。「作爲總結經驗教訓的東西，彭老總的信是開會以來講的比較具體比較深刻的一個，和我們平時議論的內容一樣，句句都是事實，也代表了我們的想法。」「彭老總不愧是個武將，敢於提意見，敢於承認錯誤，正如他在信中所說『類似張飛』。」……

大家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很快，會務組又印發了張聞天同志在華東小組會上的發言。他的發言也肯定了成績，批評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批評了指導思想上的主觀主義片面性，特別強調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

大家又議論了一番。認爲「同彭老總的意見書講的基本一致，但分析得更透徹更深刻，更有說服力。」衆口稱贊張聞天同志「不愧是個秀才，是個理論家。」

光美同志是個熱情健談的人。她在工作和學習方面很願意和同志交流思想。我和她談思想講認識，也很隨便，沒有甚麼顧慮。有一天，我把大家議論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和張聞天同志的發言的情況向她談了以後，她說：「大家有甚麼想法，還是講出來好。少奇同志不是說成績講夠，缺點講透嘛。當面不讓人家講，人家就會背後講，我們雖然不參加會，但也會有想法和看法。彭德懷的意見書和張聞天的發言，雖然尖銳了一點，也是符合組織原則的，黨的會議嘛，而且他們講的一些具體事情也是符合事實的。」⑦

王光美的這一番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少奇的意見。

而彭德懷的秘書在回憶錄中說了彭德懷準備寫信時，秘書勸他不要寫：「少奇、總理他們了解的情況很多，你沒有管經濟，沒有他們了解得多，你能不能同他們談談，請他們去同主席講會更方便些吧！」

提到少奇同志，彭搖了搖頭說：「他的處境也很難。恩來受了好幾次批評了，哪裏還敢再講話！」

實際上，自從一九五七年以後，中共中央常委中，是有人不敢講，有人不多講，有人不想講。毛澤東與他們之間，就像老子與兒子一樣。

毛澤東上廬山後住在「美廬」（那是蔣介石、宋美齡的避暑別墅），開始時只是一個人悶在房裏看書；午後，美廬的工作人員常見他或坐在陽台上對着斜陽抽烟，或在後面的竹林裏獨自徘徊，或是繞着院子裏的長方形水池踱步，有時，還看見他坐在樓梯上發呆，垂着頭，敞着襯衫，神情恍惚。

批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美廬熱鬧起來，毛澤東傳召的一些人，如柯慶施、羅瑞卿、譚震林、康生、李井泉等等，頻頻出入美廬。

李銳說：「七月十九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時，我坐在總理的旁邊，我有意問道：你看彭總的信怎麼樣？總理說：那沒有甚麼吧。意思指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總理一直在主持國務院會議，在抓計委，急着安排好今明兩年計劃。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政治局還開會修改《議定記錄》草稿。」《議定記錄》全名是《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那是在「神仙會」階段的安排，將會議對毛澤東提出的十九個問題的討論總結一下，作為「會議紀要」，會議通過後便結束，大家下山，各奔前程。負責起草的是胡喬

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和李銳。

二十二日晚上，政治局又開會討論了《議定紀錄》。劉少奇有些着急，他希望盡早定稿，因爲會議延長一周的期限已到，時間不多了。

七月二十二日晚發生的事情，有如下的記述：

晚上，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一直開到深夜。

十二點鐘，劉少奇別墅「一二四」號樓下警衛值班室響起了急促的電話鈴聲。

值班警衛接了電話，連忙告訴秘書：

「毛主席的秘書來電話，說請劉少奇同志立即到他那兒去。主席一定要這邊回話，少奇同志人在不在？去不去？都要告訴主席。」

上廬山來二十多天，毛澤東處來的電話，頭一次這樣囑咐。

「哦？」秘書心裏一沉，剛轉身想上樓，護士攔住了：

「哎呀，劉主席睡前吃了安眠藥，有四十分鐘了，藥性剛起作用！」

「是不是告訴主席，少奇同志吃了安眠藥，早就睡了。」保健醫生建議：「不要告訴少奇同志吧？」

秘書垂着頭，在遲疑。他懂得這樣晚來電話是不一般的，不能不報告。他腳步輕輕地上樓。站在門口他又遲疑了片刻，終於抬手按了門鈴。輕柔的鈴聲透過木質的門板。他退幾步，身子倚着走廊的牆。

一會兒，王光美開門出來，順手把門掩上，輕聲說：

「有事找劉少奇？」

秘書說了。

「可是他……他吃了安眠藥，已經睡熟了。」王光美兩個手掌下意識地搓着：「這兩天他太累了。你也知道，那天他從床上摔下來了……。」

是的，那天晚上，王光美忽然在樓上喊醫生。原來，劉少奇上床，一陣目眩，從床上栽下來。王光美哭了。可是，此刻她揣摸了一番美盧電話的口吻：「人在不在?來不來?都要告訴我一聲。」這顯然是命令。她猛地清醒了。

「哦，我還是叫醒他！你立刻給美盧回電話，說少奇同志就來。」

「藥正在起作用，可不要摔倒了！」保健醫生也來了。說道。在這裏的江西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也上樓了。

門敞開了。已經穿好制服的劉少奇，被王光美攙扶着，拖着腳往外移步，雙目極力欲睜，卻又深重地瞌上。副廳長和秘書立即上前，讓王光美慢慢閃開，一左一右一攙扶着下樓。出門。秋涼的夜風吹起他那一綹綹或灰或白的薄髮，他打了個寒噤。王光美急忙給他披上風衣。

從「一二四」號到美盧，不到二百米，下坡路。那位副廳長和秘書架着昏昏沉沉的劉少奇，配合他的步子，踉踉蹌蹌往前挪着。王光美站在門口看着他們的背影。

……他被夜風吹醒了些。到美盧門口他說：

「你們回去吧。」

「等會兒來電話，我們來接你。」

……

約摸三點鐘，他們去接了。

來接的還有其它中央常委的警衛、秘書。

據當年此夜在美廬值班的一位燒鍋爐的工人後來回憶道：「我在鍋爐房守夜，忽然發現後院竹林有個亮點，晃來晃去，不知是甚麼東西？再仔細看了一會，這麼晚了？好一陣子，那人才從竹林裏出來，我一看，媽呀，是毛主席！天亮後我去那裏轉了轉，見林子裏扔了一地的烟屁股……」⑧

文中有一點不正確的，是說劉少奇從床上栽下來的時間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其實，應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後發生的，據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回憶：

七月二十三日，振英跟少奇同志從會場回來，一進辦公室就壓低聲音對我說：「不得了啦，毛主席發火啦！毛主席在會上對彭老總的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他『右』傾動搖，同黨外的右派一樣，向黨進攻，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看吧，熱鬧還在後頭哩。我們議論了半天，竟然一點問題也沒看出來。」

果然如此，會議簡報上的批判言詞一天比一天尖銳，扣給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帽子也一

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大。神仙會的氣氛早已蕩然無存了。

隨着對彭、張等人批判的升級，大家的心情越來越沉重了，面孔的表情也嚴肅起來了。

有一天，光美同志問我：「大家有甚麼新的議論？」我說：「我們對目前的局勢都感到很突然，開始時誰也沒有看出問題，更沒有看到彭、張的言論會引出這麼大的亂子。」「這次盧山會議，由糾『左』發展到反右，確實出乎預料。彭、張的意見也是想反『左』的。大家都有個認識過程。我們黨有個規矩，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要服從中央的決議」。光美同志說話時表情嚴肅，而且我感到她也不像以前那樣直爽了。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毛主席的衛士打來的電話，說毛主席邀請光美同志到蘆林水庫去游泳。我告訴光美同志後，她感到有些驚奇：「毛主席怎麼約我去游泳？」既像問我，又像問她自己。我說：「毛主席可能還有別的事吧。」她迅速找出游泳衣趕到毛主席那裏去了。

大約兩個小時後，光美同志游泳回來了。我看到她興高采烈的樣子，便急匆匆地問：「游得怎樣？」「毛主席說我游得及格！」她笑着回答我。

過了一會兒，她對我說：「毛主席約我去游泳，沒有說別的事，只是關切地問我少奇同志的身體怎麼樣，我告訴他，少奇同志的肩周炎還沒有好，最近工作繁忙，很疲勞，也沒有參加甚麼活動。毛主席聽完後，認真地說：『請你轉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嘛！開完會後讓他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光美同志雖然說得很輕鬆，但我們心裏都很清楚，自從彭、黃、張、周問題出來後，少奇同志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除了開會就是看文件、與找來的同志談話或者是長時間地思索，

在吞雲吐霧中，他沉浸於思想的海洋裏。他拒絕參加一切娛樂活動，誰勸也不去。我們工作人員和光美同志一樣只能看在眼裏，急在心裏，誰對他也無可奈何。

一次，在我們住處工作的江西籍的工作人員想同少奇同志照張相，留個紀念。當振英向少奇同志報告時，他很不耐煩地說：「會議不是延長了嘛，走的時候再說。」振英討了個沒趣後，對我們說：「少奇同志最近心情不好，可能是與會議有關，請大家注意點。」

一天凌晨四點多鐘，一陣急促的電鈴把我從夢中驚醒。我立即跑到了少奇同志的臥室，一看，光美同志正神情緊張地扶着倒在地板上已睡香了的少奇同志，我也被驚呆了，片刻後我才叫來衛士和醫生，我們一起把他抬到床上。醫生迅速地爲少奇同志量了血壓、摸了脈，並對光美同志和大家說：「不必緊張，血壓和脈搏都比較正常。」然後他從少奇同志床邊的小柜上拿起安眠藥瓶看後說：「問題就出在這上面，藥吃多了。」這時大家才松了一口氣。

「少奇同志服過安眠藥後，又看了一會兒文件，他站起來準備上廁所時突然摔倒了。」光美同志向醫生解釋說。

醫生安慰光美同志幾句後說：「少奇同志疲勞過度，加上又吃多了安眠藥，這種情況誰也受不了的。讓他好好睡一覺就好了。」

這天下午，少奇同志起床後，光美向他敘述了凌晨發生的可怕的事情，少奇同志笑了一下，說：「我不知道。」然後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⑨

毛澤東邀請王光美去游泳，是有意拉攏劉少奇。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急需劉少奇的支持，以打倒彭德懷。

五、毛澤東收起羅網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終於向彭德懷發出攻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落入毛澤東預設的羅網中。廬山上的政治風向逆轉，由「糾左」轉向「反右傾」，而中國也就滑入災難的深淵。

打倒彭德懷，對毛澤東來說是蓄謀已久，但對劉少奇來說，卻是晴天霹靂。劉少奇不得不再次附和毛澤東的決定。

此後，廬山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鬥爭。從八月二日起，更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作出組織處分。

毛澤東一開始就決心要將彭德懷置於死地。毛澤東說：「對事，也要對人」，「要算歷史總帳」。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對彭德懷的結論。會上，周恩來說：「對彭的問題還要三七開，不要全盤否定」。劉少奇、朱德等均表示同意。

「看來我只好再上井崗山了。」毛澤東克制着憤怒，意味深長地說。⑩

至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才明白，對彭德懷，毛澤東並不想「治病救人」，而是要一棍子打死。朱德嘆息道：「怎麼能想象，當年是在一個鍋裏吃飯的呵！」

在毛澤東的威迫下，劉少奇不得不執行毛澤東的意旨，批判彭德懷。毛澤東親自主持，兩次召集中央常委會，給彭德懷算歷史總帳，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眞、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旁聽。主講者是毛澤東，其他人間有揷話。毛澤東對彭德懷作的結論是：「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於是從歷史上數落彭德懷屢次的「不合作」，由平江起義講到抗美援朝，從井崗山講到延安，從攻打長沙講到百團大戰，從軍事講到哲學，從馬克思講到列寧，以此證明彭德懷歷來反對自己，這就是彭德懷三頂大帽子之一「反對毛主席」的根據和由來。

在第二次的常委會上，朱德先發言，態度比較溫和，沒有擊中要害，毛澤東便用「隔靴搔痒」的動作當衆奚落朱德，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接着是林彪發言，他言簡意賅，可謂「擊中要害」。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毛澤東便將林彪的話作爲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和批鬥彭德懷的基調。

劉少奇是在第二次常委會上發言批判彭德懷的。劉少奇說：

我們長征中認識，認爲你爽直，對同志、友鄰部隊都照顧，感覺政治開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並不勇敢。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主席：電報張飛會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見向下講，不向上講。組織原則問題。）以後想極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別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主席：交不親的朋友。）一下冒犯了。

打擊時，是敵對態度；當然也不總是採取敵對。（主席：對抗性有幾種：橫直不合作，敵視，有意見不講；另一種即敵我階級鬥爭。前者意識形態不同，觀點不同，談不來，客客氣氣敷衍，談的來無所不談。）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指一九四五年延安召開的整彭德懷的會議——作者注）。（主席：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做報告，怕做不好，對他不利。小範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爲好。有人要求彭去黨校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會，也勢必做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麼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帳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着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主席：關向應講中了，你這人是搞派別活動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滿並沒有講出來，延安整風審幹，也不滿意我。（主席：這是我的責任，好、壞都負責，九條方針沒有照辦，相當長時期下面未執行。北京後來審幹反右，自殺也幾十個。還是犯左的錯誤，羅瑞卿他們負責的。）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當面講這些話。⑪

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發動對彭德懷的攻擊後，散會時劉少奇將毛澤東的秘書、負責

起草「會議紀要」的胡喬木邀進自己的住處，並留他一起吃午飯。發生了這樣大的逆轉，那個「糾左」的「會議紀要」還要不要繼續寫下去呢？「糾左」還要不要搞下去呢？兩人在飯桌上談論了這個問題。最後，劉少奇明確地向胡喬木說：文件你們還是接着寫。⑫

對此事胡喬木事後有如下回憶：「廬山會議在毛主席講話以後，少奇同志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發一個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寫。我對他說，是不是同主席談一下。少奇同志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我請彭眞同志找少奇同志談，決定不寫了。現在看來，如果寫出來，少奇同志也要牽進去。（一九六一年）從廣州回來時，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說少奇同志在廬山會議時曾經想提出寫個反『左』文件的建議，毛主席聽後沒有表示甚麼，只是說：『呵，有這回事！』後來開工作會議，少奇同志在這件事上對我批評得很厲害。」⑬

然而，在八屆八中全會上通過的文件卻是《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糾左」的《議定記錄》作廢。在全會召開期間，劉少奇又曾找過胡喬木，提出把反右傾的決議只發到省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左」的決議發到縣以下單位。但胡喬木回答：「在目前的形勢下，已是辦不到了」。劉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對黨的工作有建議，卻不敢向毛澤東提，而是向毛澤東的秘書提。劉少奇是希望胡喬木能把他的意見向毛澤東轉達。然而，劉少奇怕毛澤東，胡喬木就更怕毛澤東。胡喬木沒有轉達劉少奇的意見。

從廬山回到北京後，彭德懷與張聞天曾分別找劉少奇談話。下面是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的有關回憶：

從廬山開會回來不久，一天上午十點鐘，彭德懷同志獨自一人散步時，來到了少奇同志家的大門口。哨兵按了門鈴，我出去一看是彭老總，便趕快把他領進我們辦公室裏。

我一邊請彭老總坐，一邊說：「少奇同志還沒有起床，你要現在找他，我可以把他叫起來。」

彭老總擺擺手說：「不，不，不要叫。」

「少奇同志甚麼時候可以起床？」他問。

「通常要到下午兩點鐘左右」。我答。

「想匯報匯報思想。」彭老總像是對我說，又像是在自言自語，聲音很輕。

我馬上對他說：「那等少奇同志起床後，我就立即通知你。」

「不用通知我，中午我也要休息一會兒，看情況自己再來吧。」說罷，他站起來，轉身看着我們的書架子，並問：「有甚麼好書呀？」

「你覺得哪本書有用就拿去看吧！」我順水推舟。

「我現在要研究經濟囉。」大概那一架子書中沒有他需要的書，他說完就向外走去。

我跟在他後面，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出大門，看到他邁着方步，用右手背拍着左手掌，邁一步拍一下，慢慢悠悠，顯得悠閒自在。

看着他慢慢遠去的身影，突然一股酸楚涌上了我的心頭，這就是那位被毛主席稱贊爲「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彭德懷元帥嗎？

少奇同志起床後，我把彭老總來的事向他報告了，並說：「下午，他可能還會來。」「那好哇！」少奇同志說。

下午三點多鐘，彭老總果然又來了，我把他直接領到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少奇同志看到彭老總進來了，趕忙站起來，伸出雙手熱情地同彭老總握手問候。我馬上退了出來，他們談了些甚麼我當然不知道。

過了幾天，張聞天同志來電話說，想來同少奇同志談談，並用擔心的口氣問我：「不知道行不行？」我馬上報告了少奇同志。他說：「哪有不行之理？他甚麼時間來都可以，如果方便的話，請他現在就來吧！」

我打完電話後，張聞天同志很快就來了。這次，他們也談了很長時間。張聞天同志告辭時，少奇同志還下樓把他送出了大門口。

這兩件本來並不複雜的事情到了一九六七年的春天，似乎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陰謀。當時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下，中央文革的專案組抄了少奇同志的家，把我們秘書的值班日記也統統抄走了。他們發現了少奇同志同彭老總、張聞天談話的記載後，便派人到中央辦公廳學習班找我，追問：「劉少奇同彭德懷、張聞天談話的詳細記錄在哪裏？」我說：「少奇同志約人談話，秘書是不參加的，包括王光美在內。他們的談話也不會有甚麼記錄。」對我的回答，專案組當然大爲不滿。

後來，在批判少奇同志時，說他在廬山會議之後還繼續勾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搞陰謀活動，就是說的這件事。其實，即使少奇同志對彭德懷、張聞天同志有同情之心，當時他也不會

背離中央的決議精神去談問題，更不會搞甚麼陰謀。然而，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誰會去澄清這些事實呢？⑭

六、毛授意劉搞個人崇拜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獲得了勝利，但他知道這只是表面的，他的地位受到了挑戰與威脅，急需個人崇拜，以便繼續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於是，在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給劉少奇出了個題目：「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羣衆運動的態度問題」和「關於所謂個人崇拜問題」。對此，劉少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及九月九日在北京的批鬥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共講了兩次。劉少奇說：

「第二個問題，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蘇聯共產黨二十次大會以後，在我們黨裏面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或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一次又講了甚麼『斯大林後期』，甚麼没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這些問題。」

「要在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中間建立威信，被六億五千萬人口所承認，這是很不容易的一個事情，這是經過了幾十年的鬥爭考驗才建立起來的。一個有威信的黨，這個黨又是由多少固定的、被稱爲領袖的、最有威信的、最有經驗、最有影響的那樣的集團來主持，這是幾十年

形成起來，才有可能把六億五千萬人民團結起來。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才能够戰勝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且戰勝資產階級、動員幾億人口來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沒有這種威信，特別是沒有多少個人的威信，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破壞這種威信，就等於破壞革命和建設，爲反動派效勞。」

「……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黨裏面一要有領袖，要有領袖，就要有威信。在那個時期，彭德懷同志是反對在黨章寫那一條的。在二十次大會後他是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的。但是在不久以後，在北戴河討論『八大』的黨章的時候，以毛澤東思想爲指導思想那一條沒寫上去，彭德懷同志提議要加上那一條。當時我的答覆是這樣。我說：『七大』那個時候有必要寫這一條，『八大』這個黨章沒有必要了，可以不寫，就是這麼簡單答覆的。我想，我是積極搞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

劉少奇又說：「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麼搞。有人借着蘇聯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要在中國反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完全錯誤的，是一種破壞活動，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破壞活動。」⑮

從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需要個人崇拜，到廬山會議和軍委會議上劉少奇說要搞個

人崇拜，個人崇拜就在中共全黨明確地樹立起來了。個人崇拜這個惡魔一旦放出去，就很難收回來。只經過短短的八年，要搞毛澤東和林彪的個人崇拜的劉少奇，就被毛澤東和林彪打倒了，並被折磨至死。這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和悲劇。

---

①：見黃崢《劉少奇一生》。
②④：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③：引自蘇曉康的《烏托邦祭》
⑤：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一六五頁。
⑥：《一個眞正的人——彭德懷》二五五頁，人民出版社。
⑦⑨：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八三頁
⑧⑩：同⑤二〇九頁。
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五頁。
⑫⑭：同⑦
⑮：引自蘇曉康《烏托邦祭》及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三章 「繼續大躍進」與史無前例大災難

一、繼續「大躍進」

打倒彭德懷的反動，便是繼續「大躍進」和「更大的躍進」。

爲了反擊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議」，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被認爲是協調、正常；得不償失的大煉鋼鐵，被認爲是取得巨大的成就；全面緊張的市場供應，被說成是「供應情況良好」；供給制等平均主義的做法，被當作共產主義的萌芽；不得人心的農村公共食堂，被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陣地」。毛澤東不惜將謬誤說成是眞理，將失敗說成成就，將國民經濟這輛不勝負荷的車子，繼續向更「左」的道路上駛去。

廬山會議以後，喊得最多最響的口號是：「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國民經濟的大躍進」。爲了反擊國內外「敵人」對「大躍進」的「誣蔑、攻擊」，爲了表明反「右傾」對革命幹勁的鼓舞和對經濟建設的促進，各地區、各部門又對生產建設的各項指標進行不斷的加碼。

在基本建設方面，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國家計委和國家建委確定新上限額以外的基本建設項目二百三十個；十一月二十二日又追加基建投資十三·六億元。然而由於層層加碼，到年底，全國基本建設投資達到三四九·七億元，比基建急劇膨脹的一九五八年還多八十·七億元，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農業方面，中共中央提出「力爭在原定的農副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的計劃之外，再增加三十三．五億元以上的產值，使一九五九年的農副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仍能實現大躍進」。

工業生產方面，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召開的全國工業生產會議上又制定了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的新的「躍進」計劃，將鋼等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全面提高。經過全力的拼搏，到一九五九年年底，鋼產量達到一三三五萬噸，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七，工業總產值達到一六三〇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九。

與此同時，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農業書記會議，提出由基本隊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過渡的問題。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過渡的計劃。這是毛澤東的新的戰略部署，也是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新發展。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末至一九六〇年春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再次論述了關於中國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見解。他說：「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的第五段，現在證明是正確的。首先社有化，然後國有化，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我們提出首先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然後使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前一種過渡，就是要把農業生產資料統統變爲國有，把農民統統變爲國家的農業工人，由國家發工資，主要的步驟，將是在社有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社有經濟佔到了全社經濟的一半以上，實現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的轉變。這樣，再變爲國有就好辦多了。」他指出：「將來我們的農村，不只是土地國有

化，而是一切國有化」。

在這裏，毛澤東描繪了一幅中國農業生產發展的道路：通過生產資料從私有－隊有－社有－國有的轉變，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後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毛澤東用以指導農業集體化的一貫思想，即通過不斷的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不斷提高其公有化程度，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毛澤東的這種脫離生產力發展的物質基礎，單純依靠不斷改變所有制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即生產關係），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正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的、反動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新戰略部署，導致了一場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程度更爲嚴重的「共產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人民公社爭相將所有制由基本隊所有向公社所有過渡。

爲了盡快發展社有經濟，各地普遍地掀起大辦社有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文教事業，大辦水利建設的熱潮（據後來統計，「大躍進」中曾提出過五十多個「全民大辦」的口號—見謝春濤：《毛澤東和中國的一九五八年》）。這些大辦，都是靠無償抽調各生產隊及個人的資金、財物、勞動促成的。例如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人民公社在大辦社有工廠時，沒有廠房，便讓社員騰出住宅五百多間；缺少資金，便由社員湊了四萬多元，沒有機器設備，也在社員身上打主意。僅建服裝廠，就動員社員個人交出了五十多台縫紉機。因此，在當時發展社辦經濟的過程，就是刮共產風的過程，就是侵犯社員個人利益的過程。越是「大辦」，「共產風」就刮得越烈，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官僚主義風也伴隨而來。

第二項措施是扶持幫助窮隊趕富隊，在資金，勞力，生產資料等方面搞「共產主義大協作」，「一平二調」。平調的範圍上至土地、房屋、糧食、生產工具、勞力，下至家具、磚瓦、木料、筷子、夜壺，甚麼都包括，生產隊以下的「共產風」，更是一陣接一陣，幹一件事，搞一個運動，就刮一次，就

是一次大破壞，在糧食供應不上時，就沒收社員的小雜糧，蔬菜，或去別的隊刮「共產風」。（見王延春：《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還有大辦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問題，是廬山會議鬥爭中突出的內容之一。彭德懷、周小舟等都提出了批評，張聞天說得更直截了當：「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①作爲針鋒相對的反擊，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接連對公共食堂問題寫批語，批評解散食堂是「悲觀主義思潮」，「是腐蝕黨的，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說解散無爲縣食堂的張愷帆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此後，各地在「反右傾」中，把是否堅持參加公共食堂，當作是否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繼續「大躍進」的重要標誌之一。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貴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公共食堂問題。會後向中央報告了全省十三萬個食堂百分之八十是鞏固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不鞏固的情況，以及整頓食堂的措施。省委的報告提出：「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教育之後，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所以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批示道：貴州省委的報告寫得很好，這篇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②

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壓力下，到一九六〇年四月，據十四個省市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

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點六。這個「社會主義陣地」，毛澤東一直堅持到一九六一年，才被迫放棄。

公共食堂是毛澤東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派生出來的一項政策，完全脫離實際，脫離群衆，給五億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痛苦與災難。在當時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公共食堂猶如雪上加霜，使無數農民餓病而死。公共食堂是「大躍進」中最令毛澤東得意和喜愛的政策之一，堅守的時間也最長久；但卻是危害性最大、最不得人心，最令群衆憎惡的政策之一。晚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人民大衆的意願完全背道而馳，公共食堂便是一個極典型的事例。

重新刮起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生活造成了更加嚴重的破壞。史無前例的災難降臨了。

然而，被表面的勝利所鼓舞的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又策劃了更大規模的「大躍進」。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會議上說：「在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統治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資產階級能夠實現『大躍進』，無產階級爲甚麼不能夠實現『大躍進』？」會議確定一九六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是：鋼一八四〇萬噸，糧食六〇〇億斤，基本建設投資三四五·一四億元，這是自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之後的第三年「大躍進」。③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望六十年代》，說：「我們不但對於一九六〇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信心，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一月二日，又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到底》，說：「我們努力的目標不但是開門紅，而且還是滿堂紅、紅到底。」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上述的躍進計劃。然而，會議後不久，便對已通過的高指標計劃不滿足了，於五月又提出了一套新的「大躍進」計劃，工業總產值年增長速度要由原來的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四七·六；鋼產量要由原來計劃的一八四〇萬噸提高到二〇四〇萬噸，基本建設也要再增加五十七億元。④

然而，脆弱的中國國民經濟根本經受不起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折騰。工業的高指標，是靠擠掉農業來完成的，而鋼鐵等高指標，又是靠擠掉輕工業來完成的；基本建設上的高指標，是靠擠掉改善人民生活來完成的。這一切嚴重地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加上農村中熾熱的「共產風」，農業首當其衝，成爲受破壞最慘重的領域；與農業相關連的輕工業，也遭受嚴重破壞。而它們正是關乎全國人民生活的吃穿用。違背客觀規律所遭受的懲罰不可避免地降臨了。

早在一九五九年冬，災荒便在河南、山東、安徽一帶的農村出現。由於農業歉收，包括糧食在內的農作物嚴重減產。然而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嚴峻形勢下，各地幹部浮誇成風，均以「大豐收」、「大躍進」上報。各省、市、自治區便按浮誇上報的數字搞「高徵購」。饑荒開始了，農民大量外流逃荒，許多人患上浮腫病，並且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正陽縣就死人八萬多，新蔡縣死人近十萬。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死亡近四千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村）竟高達百分之三十。一九六〇年全國總人口爲六·六三二億人，比一九五九年的六·七二億人淨減了一千萬。加上正常的淨增率千分之二十，即一千三百萬，一九六〇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二千三百萬。（見謝春濤著《大躍進狂瀾》及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

在城市，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副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便緊缺了。到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後，各城

鎮普遍出現缺糧斷糧。據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當時，這些地區的庫存糧所維持銷售的時間，北京為七天，天津為十天，上海幾乎已無大米庫存，遼寧八、九天。京、津、滬等直轄市尚且如此，各地的中小城市的困難情況可想而知。

在全國農業「大豐收」、「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全國城鄉竟普遍缺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經濟計劃部門核實糧食生產數字。據薛暮橋重新核實，一九五八年的實際糧食產量，並非是八屆八中全會「核實」的五千億斤，而是只有四千億斤。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也不是五四〇一億斤，而是只有三四〇〇億斤，即比公布的數字要少二〇〇〇億斤，虛誇數達百分之三十七，跌到一九五四年(三三九〇億斤)的水平。棉花油料等產量同樣虛誇不實。基於高估產，中央及各地政府搞了高征購。一九五九年度征購糧食一〇二四億斤，佔年產量近百分之四十，而一九六〇年度征購數也高達百分之三十六，使得農村留糧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按人口平均數，由一九五七年的四〇九斤降到一九六〇年的二六四斤，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見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由於上述原因，農村中的飢荒很快漫延到全國，至於山東、河南、山西、安徽、江蘇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剛過就出現了偷青、吃青和外流逃荒的情況。

至此，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才了解到問題的眞相。可是，為時已晚，災難已鑄成了。

在農業繼續減產的同時，工業也開始全面下跌，各種指標難以完成。外貿收購和出口，「計劃完成得很差，」「國家外匯收支出現了很大的逆差」。財政收入也出現赤字。全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人

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糧食緊缺，副食品緊缺，日用品緊缺，市場上沒有禽、肉、蛋等食品供應，就連鍋、碗、盒、筷、火柴、肥皂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難買到。

二、三年「大躍進」的代價

「大躍進」從一九五八年初發動、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宣布停止，歷時三年。

「大躍進」的實際效果，是大破壞，大滑坡，大倒退。實際上，從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起，國民經濟就每況日下。

一九六〇年，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嚴厲督戰之下，以「鋼鐵元帥」爲首的重工業雖然完成了指標，但其他方面都垮了下來。

農業方面，繼一九五九年下降後，一九六〇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六；

經核實該年糧食產量爲二八七〇億斤，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的三九〇〇億斤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六，降到一九五一年二八七四億斤的水平；

棉花該年產量爲二一二六萬擔，比一九五七年的三二八〇萬擔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五，也降到一九五一年二〇六二萬擔的水平；

油料作物該年產量爲三四〇五萬擔，比一九五七年的八三九二萬擔下降百分之六十，跌到建國時的水平以下。

輕工業下跌得更厲害。與一九五九年相比：下降百分之二十八——六十。

鋼產量雖然達到一八六六萬噸，比五九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四，但這是靠大上基本建設項目，擠傷農業和輕工業換來的。⑤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基本建設投資合計九九六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五年的總和五五〇億元還要多百分之八十一。由於各地盲目上項目，許多項目未經科學的論證，成本高，效率低，質量差，到了一九六二年調整、鞏固時期，不少企業被撤、停、關、拼，造成很大的浪費。而且擠垮了農業，擠傷了輕工業，重工業自身到一九六〇年底後，也立不住而掉了下來。

到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達到二九五〇億斤，略有回升，但其他方面都垮了下來，整個國民經濟表現出全面的大幅度的衰退。

建國以來，中國每年均有出口糧食三十億斤左右。但自從一九六一年起，中國需進口糧食一〇五億斤（五百二十多萬噸），一九六二年進口四百萬噸（八十億斤）。直到一九六四年以後才逐漸減少。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這兩年進口糧食，共需外匯六億六千萬美元。這筆外匯，可以購買相當於建設四十個洛陽拖拉機廠所需要的進口設備」。

由於浮誇和浪費，國家財政連年出現赤字。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三年合計赤字一六九·四億元。一九六一年仍有十·九億元赤字。

爲彌補赤字，便大量印發鈔票，造成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商品價格高漲。

這一切所組成的痛苦和災難，都落在中國六億老百姓的身上。饑餓、營養嚴重不良，加上連年艱苦緊張的勞動，以及惡劣的政治環境，人民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據統計，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三年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人。八年抗戰期間，全中國死亡人數是三千五百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蘇德戰爭中，蘇聯的死亡人數二千萬人。三年災難比戰爭還要殘酷。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天災人禍」，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天災人禍」。

大躍進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之慘烈，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毛澤東的錯誤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禍害，超過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朝代的帝王將相。

據另一項估算，因爲三年「大躍進」，中國國民經濟損失達一千二佰億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建設投資才五百五十億元。「大躍進」損失了兩個五年計劃的資金。

而且，後來還用了五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才使之恢復到「大躍進」前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中國經濟發展走了一個大大的彎路，浪費了八年寶貴的時間。而恰恰在這段時間裏，一些國家如日本等，經濟與科技得到迅速的發展。中國與他們的差距拉大了。這又是一個長時間內彌補不了，從而也無法估算的重大的損失。

三、毛澤東的反思

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也是中共中央內較早發覺出了紕漏的一個。早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即頭腦最發熱的北戴河會議後兩個月，毛澤東已經覺察到如火如荼的運動中的亂子：高指標、共產

風、浮誇風，指示要壓縮空氣，提出糾「左」。然而，在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卻變本加厲發動更加猛烈的「大躍進」，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這就是廬山會議以後的「大躍進」更加轟轟烈烈，災難也更加慘重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對於農村中發生的災難情況，是否不了解呢？不是的。毛澤東身邊的衛士長李銀橋在回憶錄中寫道：

「不久（時指一九五九年九月）又有兩名警衛戰士探家歸來，並且都帶了窩窩頭回來，鄭重向毛澤東匯報：『俺們村裏，這樣的窩窩頭，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兩個。』

毛澤東怔怔望着那窩窩頭，恍若夢醒一樣。他接過窩窩頭，掰開來望着裏面摻的各種說不清名堂的植物纖維，眼裏漸漸溢出了淚花。

他將窩窩頭掰一塊交給身邊一名工作人員，再掰一塊，分給一名工作人員……。

他沒說甚麼，自己率先拿了一個整窩窩頭啃起來。他慢慢咀嚼着呑咽下去。於是，大顆大顆的淚珠順着他的臉頰淌了下來。」

一九五九年十月，衛士長李銀橋陪同毛澤東南下視察：

「專列開入山東時，沿途土地龜裂，到處是白花花鹽碱。進入安徽後，情況更糟糕，大田裏看不到豐收的莊稼，卻插着一堆一堆的紅旗。毛澤東一路凝視默想，吸煙不斷。

車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見燈火，不聞笑語。地方黨政負責人匯報，合肥地區還是水利發電，由於長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點水，已經無法發電。

毛澤東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沒完沒了吸煙。後來他望着我們，慢條斯理講了歷史上幾次有名的大災

荒……

回到北京，毛澤東向我們鄭重宣布兩條：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他說：『全國人民都在定量，我也應該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們願意不願意和我一起帶這個頭呵？』

我們回答：『願意！』

毛澤東莊嚴宣布：『那好。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⑥

毛澤東第一次表現出覺醒，是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把質量提到第一位，恐怕到時候了。五八、五九年講數量，今年要講質量、規格、品種。要把品種、質量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公布數字的時候，總是要少一點。要做的多一點，說的少一點。

六月十八日，毛澤東把他近來考慮的一些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問題，結合歷史的回顧，寫了一篇《十年總結》的文章。毛澤東回顧說：

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八年五月黨代表大會制定一個較爲完整的總路線，並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前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

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亂子就更多了。於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

議，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但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鋼。……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了一個一千六百五十萬噸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始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爲一千三百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

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馬鞍形。七、八兩月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面仍然被動，直至於今。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擊勝利。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千六百五十。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帳可以不算。到四月，因浙

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如此等類。

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長時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不少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對於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儘管是輕描淡寫，但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極其罕有的主動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在言語上也謙虛，溫和了好多。與五八年初「大躍進」發動時的那種信心十足、咄咄逼人，顯然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六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國民經濟中的種種問題以及全國各地的災難更多地暴露出來了。七月五日開始，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主要研究國內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問題。在會議進行過程中，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突然知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並撕毀經援合同，停止向中國供應重要設備。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嚴重地打擊了中國的經濟建設，令處於經濟危機中的中國「雪上加霜」。

面對嚴酷的事實，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對一九六一年的經濟計劃安排，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以便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改善人民生活。周恩來聽了匯報後說：對方針的提法，與其講整頓，不如提調整，並建議增加「充實」二字。這就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來歷。其後的五年內，中國正是執行這「八字方針」，才使國家走出災難的深淵。

與此同時，農村中的災難如同洪水猛獸，餓病、餓死人的報告，不斷地出現在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在甘肅省委的一份報告上代中央草擬的批示中寫道：

「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發表講話，進一步

總結「三年躍進」遭到慘重失敗的沉痛教訓，說：

這幾年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且是擠了農業、擠了農業的人力、物力，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廣。這三年都是指標過高了後來退不下來了。一九五八年北戴河會議後從九月份開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後又大搞，一九六〇年又一年，這三年大煉鋼鐵，擠了農業。⑧

毛澤東又說：

做工作要有三條，一要情況明，二是決心大，三是方法對。這裏情況明是第一條，這是一切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就要搞調查研究。

我們黨有實事求是的傳統，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跟中國實際相結合。過去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調查研究比較認真。這些年來，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們的同志不作調查研究工作，沒有基礎，沒有底，憑感想和估計辦事。鄭州會議講不能一平二調，方針是對的，說不算帳，不退賠，這點不對。上海會議十八條講了要退賠。緊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經驗報告。一九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兩萬多字的東西，現在看來，光打筆墨官司，不那麼頂用。他封鎖你，你情況不明，有甚麼辦法。那時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麼認識共産風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講鄭州會議是壓服，不是說服，思想還有距離，所以決心不大，搞的不够徹底。

近幾年來不大了解情況，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少了。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調查研究這種事極爲重要，要教會許多人。一九六一年要成爲調查研究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麽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進。明後年，搞幾年慢騰騰，搞扎實一些，然後再上去，指標不要搞那麽高，把質量搞上去。不要務虛名而受實禍，要提高質量、規格、品種，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要縮短工業戰線，重工業戰線，特別是基本建設戰線。要延長農業戰線，輕工業要發展。重工業除煤炭、礦山、木材、運輸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設。⑨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中的一九六〇年冬天是這樣的：

到了一九六〇年年冬，饑餓的盲流一股股在中國大地上流竄……

毛澤東躺在他那張過於簡樸，但又很適合國情的木板牀上，身上搭了三條補丁連綴的毛巾被，靠在牀欄上看文件。

他老了，眼角發散出細密密的皺紋，頭髮不知不覺便白了許多。我還時常爲他梳頭，想起三大戰役勝利後，他説「白了一根頭髮，勝了三大戰役，值得」。那情景彷彿就是昨天發生的事，而現在他的白髮已經不能一根根去數清了。我的心有些酸。

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雖然眼望文件，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其實是在想心事。後來，他將文件放在床上的書籍堆上，小聲招呼值班衛士：「小封啊，我起來吧。」

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顧毛澤東穿衣起床。毛澤東沒有出去散步，直接走到沙發那裏坐下來，仍然心事重重地在那裏沉思默想，不時呼出一口沉悶的粗氣。

「主席，給你煮一缸麥片粥吧？」封耀松小聲請示。

毛澤東搖頭，靠在沙發上，只用手朝辦公桌上的煙盒指了指。封耀松幫他取來煙，劃燃火柴。

毛澤東吸燃香煙，吸得很深，然後重新靠在沙發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團彌漫的青煙籠罩了。

煙霧中，傳出毛澤東一字一板的聲音：「小封，你去把子龍、銀橋、高智、敬先、林克和東興同志叫來。今天在我這裏吃飯。」

下午，我們七個人同毛澤東圍在一張飯桌上吃飯。沒有酒，沒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澤東的竹筷子伸向菜盤，沒等夾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掃視我們七個人。於是，我們也放下了筷子。

「現在老百姓遭了災。你們都去搞些調查研究。那裏到底有些甚麼問題啊？把情況反映上來。」毛澤東的聲音沉重緩慢，停頓一下又說：「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到底好不好？群衆有甚麼意見？告訴我。要講實話。」

我們都無聲地點頭，神情肅穆。

毛澤東用手指指葉子龍，又指指我：「子龍、銀橋，你們下去，不去山東改去河南，廣泛調查研究，把真實情況反映給我。」

我和葉子龍說：「是，主席。」

毛澤東轉臉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說：「去。」

毛澤東點頭：「那好，那好。」

毛澤東重新環顧飯桌上的七個人，目光忽然變得銳利，聲音變得嚴厲：「要講實話，不許說假話，不許隱瞞欺騙！」

這一頓飯，毛澤東沒吃幾口便放下筷子。他吃不下去。我們也吃不下去，紛紛放了筷子。

夜裏，封耀松用電爐子替毛澤東煮一茶缸麥片粥，勸說毛澤東喝下去。然後勸毛澤東睡一覺。

「睡不着啊！」毛澤東聲音悲涼，「全國人民遭了災，我哪裏睡得着啊？」他又講起歷史上一些大災荒，講了當年紅軍吃樹皮，啃草根的鬥爭生活，說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毛澤東睡不着覺，下床走到辦公桌前，坐下來給我們七個人寫了一封信。是用鉛筆寫的，寫了三頁：

「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閱：

除汪東興外，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裏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講一次，如何用藥

法。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汪東與同志作準備。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

信陽報告一件，認真一閱。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爲」。⑩

這是毛澤東思想最沉重，情緒最低落的時刻。

與此同時，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寫信給秘書田家英，令田家英與陳伯達、胡喬木（三人均是毛澤東的秘書）各率領一個調查組，分別赴浙江、廣東、湖南農村作調查研究，每組組員六人，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調查最壞及最好的生產隊，「時間十天至十五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後，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業又要一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⑪

毛澤東似乎眞的想要了解農村中的實際情況，來個「實事求是」。然而後來的情況表明，事情並非是這樣。

毛澤東信中說的《調查工作》，是指毛澤東在三十年代江西蘇區時寫的一篇文章，早已失去。正當一九六一年毛澤東高喊「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時候，竟然失而復得，令毛澤東非常高興。原來這篇文章的石印本，是一九五九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時，在福建省龍岩發現的。一九六〇年中央政治研究室從革命博物館借來，被田家英見到，便馬上送到毛澤東的桌面上。

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廣州會議上說：

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春季寫的，總結那個時期的經驗。這篇文章之前，還有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別的東西找出來我不記得，這篇文章我總是記得就是了。忽然找出來了，我是高興的。⑫

在毛澤東那浩繁的著作中，《調查工作》一文其實並不顯得如何突出，也不佔有怎樣重要的地位。然而這篇文章恰恰在一九六一年那樣一個艱難的年代失而復得，這無疑令處於困境中的毛澤東感到振奮。而在那樣一個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的年代裏，當六億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毛澤東是多麼渴望有一種解救危難的仙丹妙藥。而《調查工作》的內容，正是毛澤東所大聲疾呼的「調查研究」，因此這篇不起眼的小文章一出現，就被毛澤東視爲拯國救民的良方。

廣州會議是中共中央在南方召集的專門研究人民公社條例的會議，主持者是毛澤東。而同樣的會議，也同時在北京舉行，主持人是劉少奇。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彭眞。信中說：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叫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

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調動群衆的積極性的」。「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建議研究一下一九三〇年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那裏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自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⑬

在給劉少奇等人寫信的當天下午，毛澤東又在「三南」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要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其他書記的調查研究工作由第一書記抓。他說：「醫生看病叫診病，中醫叫望、聞、問、切，先搞清楚病情，然後開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下決心，然後布置部隊，後勤等。歷來打敗仗都是情況不明。過去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就是因爲情況不明。」

毛澤東還要胡喬木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眞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從現在起，縣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認眞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親手進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在大會討論這封指示信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邊念信稿，毛澤東邊插話解釋。信稿不過八百字，而毛澤東的解釋記錄卻有上萬字。毛澤東說：

「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也很大」；

「情況不明，政策就不對，決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對頭」；

「爲補課起見，我現在提倡調查研究……第一書記親身調查很重要，足以影響全局。」「聽李雪峰同志（時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講，河北省原有一五二個縣，現在併爲六十三個縣，沒有一個縣委書記做典型調查。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⑭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通過批示，頻頻向全黨發出警告。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報告上毛澤東批示：

「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衆商量，關在房子裏作出害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⑮

毛澤東還在田家英推薦的戚本禹寫的《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一文上批示：不許「採用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透頂的那種調查法」，「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⑯

毛澤東的信以及一系列的批語，如同「聖旨」，引發了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高幹紛紛下鄉「調查研究」。其中，最突出，也最具影響力，後果也最悲壯的，是劉少奇的湖南調查。本書稍後再述。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之所以遭到慘敗，從思想方法來說，固然是脫離實際、脫離群衆、不調查研究、浮誇風、瞎指揮，犯了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然而，在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背後，還隱藏着一個巨大的核心，那就是農業社會主義，用彭德懷的話來說，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才是毛澤東以及中共絕大多數高幹何以犯了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抓「調查研究」，只是清流，而沒有正源。

毛澤東對「大躍進」失敗的反思，僅停留在主觀主義和調查研究，即思想方法這一層面，再深挖掘

思想意識的層面，毛澤東是絕不允許的。「左傾冒險主義」，「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都成了不可觸及的「禁區」。在具體問題上，毛澤東相應地也設下了「底線」。比如「單幹」、「四大自由」、「包產到戶」、對「反右傾」的否定等等，儘管經過「調查研究」後，都「符合實際」，符合群衆的意願，對恢復生產力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都遭到毛澤東的否決。

毛澤東雖然也檢討了自己犯了錯誤，但更多是批評與責難地方官員，指他們搞封鎖，令中央情況不明；又是他們瞎來亂搞，使運動中出現了衆多的亂子。毛澤東將主要的責任推卸到地方官員的身上。既使是自己的錯誤，毛澤東也是籠統地講，具體內容欠奉；在枝節問題上承認有錯，在方針、路線以及重大關節問題上，卻堅持沒錯。

毛澤東對「大躍進」失敗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徹底的。然而，毛澤東開出來的「調查研究」的藥方，給予人們了解事情眞相的機會。因此，在兩個月以後，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帶着豐碩的調查研究的果實回到北京，他們立即對「大躍進」的失敗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從而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劉少奇等人的深入檢討，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毛澤東不悅了。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聯盟的裂紋，就是由此而產生的。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反思，顯然存在着巨大的差異。爲甚麼一個不徹底，另一個徹底，一個勉強，另一個卻心甘情願呢？毛、劉的差異，主要存在於政治品質上。「實事求是」是需要勇氣的，無私才能無畏。劉少奇以大智大勇的姿態，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大躍進」的慘敗，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包括他自己）的「人禍」，表現了他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無私無畏的崇高品格。相反地，毛澤東出於維護自己的聲望、地位，不想徹底地檢討「大躍進」的失敗。在這裏，毛澤東將一己私利置於國家和人民的

利益之上，這是毛澤東的可鄙和可悲。

代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失敗所做的結論——錯誤與成績是三七開（而不是毛澤東說的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造成錯誤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不是毛澤東說的主要是天災），是由劉少奇說出，而不是由毛澤東說出，這是值得深思的。是毛澤東的理論水平不夠高嗎？不是。毛澤東是中共黨內頭號理論家，「大躍進」又是他發動和領導的，對「大躍進」的總結，毛澤東應該更深刻，更徹底才是。是毛澤東沒有進行調查研究，而掌握的資料不夠嗎？也不是。毛澤東雖然沒有親身去農村做調查研究，但他派出了身邊的秘書、衛士組成多個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他們都將在農村的調查所得和所見所聞，不分巨細地向毛澤東匯報。並且劉少奇等人的調查所得，也要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還可以看到中共的各種材料。因此，毛澤東對實際材料的佔有是豐富的、全面的。然而毛澤東刻意文過飾非，因此沒有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做出一個較為「實事求是」的，能夠為人們所接受的結論。對毛澤東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極大的不幸，他對國家、對人民沒有盡到自己應負的責任，對歷史也欠下了一筆巨大的、永遠也無法還清的債帳。

在全黨大搞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到了一九六一年夏天，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方針政策進行了大幅的調整：

在工業領域，正式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降下來。計委主任李富春說：「重工業這樣下降，是一個懲罰，是沒有按規律辦事。重工業速度發展過快，基本建設拉長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農業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應該的。你不退，有甚麼辦法？」毛澤東

說：「去年（指一九六〇年）一八五〇萬噸鋼，現在（指一九六一年）一一〇〇萬噸，降下來七五〇萬噸，我看可以。無非是外國人罵中國人不行。」

在農業方面，制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三十年不變；

在公共食堂問題上，劉少奇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而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眞以及田家英、葉子龍等人的調查所得，食堂沒有優越性。周恩來曾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朱德於五月九日寫信給毛澤東說，他在四川看到的是：社員吃飯「兩道煙」（食堂打飯，自己回家做菜），浪費人力物力。到陝西，反映更強烈，說食堂有五點不好：社員口糧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動力；浪費時間；下雨天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胡喬木於四月二十六日寫信給毛澤東，報告韶山公社食堂的問題，認爲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的一個疙瘩。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部長）於四月十九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投票的結果，百分之九十的群衆贊成停辦食堂，贊成辦的僅百分之十。胡耀邦在五月六日的報告中寫道：青壯年、婦女、老年人，基層幹部，沒有一個說食堂的好話。⑰

在全黨全民反對辦公共食堂的呼聲如排山倒海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放棄這個被視爲是「共產主義萌芽」，社會主義陣地的至愛的「寵兒」，於六月同意解散食堂。

關於供給制（即吃飯不要錢），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也是一項「共產主義因素」，是體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然而，經過調查研究之後，劉少奇說：他不同意實行供給制，只同意對「五保戶」（即老病殘軍烈屬戶）實行「部分供給制」，並說這部分供給制「實際上是社會保險」。還有的

報告指出：供給制耗費了公社大部分的收益，剩下可供按勞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浙江省桐廬縣的一個大隊，一九六〇年的一個勞動日只值〇•〇三元，社員勞動一年僅得工資二•五三元。因此，當時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一個勞動力還不如一隻母鷄，一隻母鷄下個蛋可賣五角錢。由於工分不值錢，農民不積極出工，不願意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是破壞農業生產力的一大害。⑱

在鐵的事實面前，毛澤東還是戀戀不捨，以致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廣州會議時，毛澤東還堅持供給制與工資制七三開，有所退步，但還留下一部分。到了六月，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絕大多數的一致意見之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全部取消供給制。

至此，人民公社在分配方面的兩項「共產主義因素」（也就是「優越性」）都被否定了。

這一切方針政策上的改正，得到了廣大農民群衆的響應，收到良好的效果，農業很快開始復蘇。至此，毛澤東認爲國內的困難形勢已到了「鍋底」，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後形勢會逐步好轉、回升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澤東二上廬山，八月二十三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主要研究經濟與教育的調整問題。

兩年之前，毛澤東在廬山上打倒了彭德懷。當時，彭德懷曾寫下了這樣的一段筆記：

我七月十四日寫給毛主席的信（即意見書——引者），七月十六日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會同志，至七月二十二日，各小組經過六天的討論，對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個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個同志。其餘在發言中的大多數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還有一部分同志，還

没有發表意見。至於我寫這封信，是在西北小組會議上，一些不便講的問題，要點式的寫給主席作參考的，希望主席考慮信中的一些問題，主席竟把問題提到如此十分嚴重，如此十分尖銳，提到離開現實情況的原則高度。因此，國内在經濟建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在左傾急躁冒進的基礎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它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它將要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引起更加嚴重的比例失調，甚至引起黨内外一段時間的混亂，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後果！

二十三日晚彭注

兩年來的實踐表明，彭德懷的話應驗了。但毛澤東是不能承認這個錯誤的。然而彭德懷那高大的身影已與「大躍進」連在一起，沉重地壓在毛澤東的心上，令他難以忘懷。毛澤東多次爲自己辯護。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八月廬山會議原來糾「左」的情況還沒有搞清楚，黨内又從右邊刮來一股風，彭德懷強迫與我們爭論。那時非反右不可，右傾機會主義和國際修正主義相呼應，和國内右派呼應，向黨進攻，不反不成。但是廬山會議的反右打亂了原來的糾「左」的步驟。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北京會議上，毛澤東又説：廬山會議，彭、黃起而攻之，搞派別，他們實際是高饒的漏網分子，想乘機整我們，應該反。我們的錯誤是不該傳達到縣以下，如果傳到縣級以上就好了，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精神，繼續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個假象，以爲工農業生產大發展了，其實不是那樣。

一方面堅持反右傾正確，一方面又認爲應該繼續反「左」。這就是毛澤東的矛盾的、不能自圓其說

的思想狀態，也是他既要堅持「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又不能不承認「大躍進」慘敗的嚴酷事實，既要堅持自己的正確、英明、偉大，又不得不承認犯了嚴重錯誤，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在「反思」問題上的遮遮掩掩，不願意脫下褲子割尾巴的心理狀態。

對於這第二次上廬山，逄先知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有如下的回憶：

> 上山之前，毛曾對田家英說：「這次要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
>
> 召開第二次廬山會議，不能不聯想到第一次廬山會議。第一次廬山會議引起的災難性後果，毛的感受不會比別人的少。從一九六〇年夏天起，農村中的嚴重情況逐漸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澤東那裏。他的心情沉重起來。在那些日子裏，他常常悶悶不樂，沉默寡言，有時長時間地呆坐在那裏，凝視不動。這種情況在過去是少有的。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他親自主持起草中央「十二條」指示信，首先下決心解決農業問題。
>
> ……對於錯誤地批判彭德懷，毛澤東這時並無後悔之意（「反右是正確的」），但對於因反彭德懷而打斷糾「左」過程、從而遭受更大的「共產風」的破壞，則是痛定思痛，心情確實很不舒暢。他決定二上廬山，想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呢？
>
> 果然，這一次會議沒有緊張的氣氛，沒有批判的場面，大家的心情平靜而舒坦，比較地敢於批評和議論工作中的問題和失誤，又產生了幾個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田家英在第一次廬山會議後期是受壓的，參加

這次會議卻是另一種心情。

繼《農業六十條》之後，這次廬山會議又搞出《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再加上前不久通過的《科研四十條》，還有《文藝八條》，在毛澤東看來，事情已經比較清楚，並在好轉。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說：「問題暴露出來了，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這個上升與過去不同，認識接近實際，可以穩步上升了。」

毛澤東還說：「這幾年來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甚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⑲

事實上，當毛澤東講這番話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不但沒有上升，反而還在繼續滑落，危機還十分嚴重地存在着。毛澤東的不切實際的說法，令他的秘書田家英非常不安：

> 當時毛澤東對國內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已經到了「鍋底」。田認爲，在農業方面可以這樣說；在工業方面就不能這樣說，因爲工業生產仍在繼續下降。他半夜裏睡不着覺，便到梅行（當時參加起草《工業七十條》）的卧室去討論這個問題，直至天亮。⑳

不能把毛澤東的這一番講話，看作是簡單的「盲目樂觀」。毛澤東的講話，是他頑固地堅持「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再次大暴露，說明了經過三年「大躍進」的慘敗後，毛澤東的主導思想一點也沒有觸動，一點也沒有改變。從而也表明了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反思，是多麼地膚淺，不徹底，多麼地虛假

和不可靠。在「左」傾的道路上，毛澤東已迷途而不知返，無可救藥的了。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還說：「總路線是正確的」，「人民公社只要在退賠問題上改了，就能成爲紅旗」。㉑

第二次廬山會議標誌着毛澤東對「大躍進」慘敗的反思進程已經終止了：無論是從深度（「退到山谷」）還是廣度（「錯誤就那麼一點」），都是到此爲止了。

毛澤東在政治上置人民的利益於不顧而極力掩飾「大躍進」的錯誤的同時，在生活上極其荒淫。據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透露，正當六億人民餓飯的時候，毛澤東卻亂搞女人，從文工團的演員到幼兒園的教師及女機要員，從黃花閨女到有夫之婦，毛澤東都大搞特搞，極盡驕佚淫逸。這些情況表明，在農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毛澤東已由量變到質變，由一個革命家蛻化爲封建君主。

廬山會議快要結束時，毛澤東爲江青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片，題了一首詩：

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云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峯。

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久經考驗的革命家那種面對艱難而從容不迫的風度，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冥頑不

化，堅持錯誤的宣言。

一九六一年冬天，在「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毛澤東擺脫了一年前的那種心情沉重，顯得輕鬆和愉悅。他對劉少奇等人說：去年的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很高興，因爲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首先見效在農村，《六十條》一搞，最近把隊爲基礎更進一步解決了，現在反映農村見效了。

毛澤東興致盎然，詩興大發，找來了陸游當反面教員，寫下了《卜算子·詠梅》，詩前有語：「讀陸游詠梅詞，反其意而用之」。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浪漫時，
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自比「傲霜雪」、「只報春」的梅花，等待着春天的到來。冰消雪化，春暖花開。春天降臨神州大地。然而，毛澤東發覺到，那個春天並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樣「山花爛漫」。一場更大的紛爭和災難，又在醞釀之中。

四、劉少奇的反思——湖南調查

劉少奇對「大躍進」的反思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至一九六一年三月。

在這一階段，劉少奇對「大躍進」的問題，已經覺察到了，但看到的還不多。由於還沒下到農村，還沒有與農民群衆直接見面，因此看到的也不深刻。見於彭德懷的前車之鑒，講出口的也就更不多。

從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會議後，劉少奇先後到天津、石家莊、鄭州、洛陽、西安、寶鷄、成都、重慶、武漢、長沙、南昌等地視察。由於這些視察，多如往常那樣聽地方領導報喜不報憂的匯報，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去參觀，與事先安排好的人見面，聽到的都是事先準備好的說話。而且這一路上多是在大中城市裏，參觀的也都是國家級的大型企業，如洛陽拖拉機廠、西安機械製造廠、慶安機器製造廠、寶鷄東風儀表廠、成都量具刃具廠、重慶鋼鐵公司等等，在這些先進的、現代化的企業裏，廠房高大，機器隆隆，從資金到原材料，都是國家保證提供的，不僅看不到「大躍進」的亂子，相反是一派熱氣騰騰的，你追我趕的「躍進」景象。

因此，劉少奇在這一階段，既表示贊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的「躍進」計劃，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發出一些注意防止和克服「大躍進」亂子的言論。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聽取中共河北省委匯報工作時說：

要以農業爲基礎，各方面都要支援農業。馬克思說過，任何一個社會的生產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飯吃，還剩下多少人去搞工業、運輸、教育、文藝、科學等等。說社會分工，實際上首先是農業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我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搞飯吃。所以，農業技術革命要搞好。一平二調，刮「共產風」，也就是人家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這是不好的。馬克思早就說過，平均主義對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共產主義去，光要不斷革命論，忘記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生產關係的改變，要使生產積極性更高，能爲生產力的發展開闢道路。過渡早了，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妨礙、破壞生產力的發展。要和公社的同志們講清楚，這是不能胡來的。過渡的遲早，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過渡，要有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一是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們的覺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你搞平調，人家不願讓你平調，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過渡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主觀條件都不够。㉒

很明顯，劉少奇堅持的是科學社會主義，而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是典型的農業社會主義。劉少奇只是不敢如建國初對山西省委那樣明言批評而已。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劉少奇在主持各大區和各省、市、自治區以及中央一些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說：

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許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面。一方面，我們應該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切實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經過試驗，實事求是，冷熱結合。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後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後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丢到後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的教訓很少。計劃偏大，有些事情不那麼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麼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面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就是今天會議的意思。㉓

此後，劉少奇在一些大小會議上都發表了一些類似的不痛不癢的講話。

毛澤東是「大躍進」的發動者兼直接領導者，作爲第二把手的劉少奇，不便於對「大躍進」說三道

四，最好還是讓毛澤東自己總結，自己檢討。因此，劉少奇在中央的一系列會議上說話不多，有時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也是委婉的、表面的，只就事論事，不刨根問底。劉少奇似乎在等待。

另一個因素是，一九六〇年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公開破裂，中、蘇兩黨展開公開的爭論。劉少奇親自領導了這場對蘇鬥爭，在此方面花費了許多的時間與精力。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更率領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慶祝大會。除了與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等人舉行多次會談，以圖解決中、蘇兩黨的紛爭外，還到列寧格勒、明斯克等地參觀，歷時一個多月，使得他關注國內問題相對地減少了。

第二階段是從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七千人會議」。

在這段時間，「大躍進」的禍害已表露無遺，全國各地災難如洪水猛獸，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毛澤東雖然已開始承認錯誤，進行檢討，但不痛不癢，沒有切中要害。因此，在毛澤東指導下的中共中央雖然已採取了諸如「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等措施，但見效不大，災難繼續擴大，危機進一步惡化。局勢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促使劉少奇走到台前，取代毛澤東親自主持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工作，收拾「大躍進」的爛攤子的楔機，在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寫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那封信。毛澤東的信上文已引述。在信中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毛澤東的信，除了表達他的不滿之外，似乎還包含有推脫責任的意味。毛澤東向全黨批發他在一九三〇年寫的那篇《調查工作》，是向全黨表示：大家看吧，我向來是注重調查研究，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毛澤東在信中批評劉少奇等人不作調查研究，只滿

足於聽匯報、看文件，才將「大躍進」搞成如此樣子。在這裏，頗有「衆人皆昏，唯我獨醒」之意。

毛澤東的信對劉少奇是一記沉重的「將軍」，也爲劉少奇揷手糾偏工作，從而打破毛澤東一統局面啓開了方便之門。劉少奇決心深入農村，找出「大躍進」慘敗的眞正原因所在。劉少奇師出有名了。

毛澤東主持的廣州會議於三月二十三日結束。四月一日，劉少奇便率領王光美以及秘書吳振英等幾個工作人員，到了湖南長沙。劉少奇對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負責人說：「這次去湖南鄉下，採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旣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衆。人要少，一切輕裝從簡，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據王光美回憶：「他這次穿的是一套藍布制服，戴一頂藍布帽，着一雙靑布鞋，到了寧鄉縣委的大院裏，大白天同縣委負責同志走了個照面都未被認出來，錯了過去。有位同志發現了我，才又轉回來說：『劉主席呢？』我指着旁邊的少奇同志說：『這不是！』」。㉔

第二天，四月二日，劉少奇一行冒着綿綿細雨，來到湖南省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劉少奇一行乘坐的兩輛草綠色的帆布吉普車，在凸凹不平的鄉村路上緩緩地，晃晃蕩蕩地行走。南方的四月，應是禾靑水綠，春意盎然。然而一路上，劉少奇看到的卻是荒山禿嶺，莊稼稀落，一片衰敗的景象。車子開到一塊寫着「寧鄉縣東湖塘人民公社萬頭豬場」的木牌跟前停下來了。劉少奇走進「萬頭豬場」，環顧一看，豬圈又髒又亂，豬卻見不到幾頭，而且疲弱得皮包骨頭，走路搖搖晃晃。劉少奇沒有入住寧鄉縣委爲他準備的招待所，吩咐隨行人員：「就在這個豬場住下來，調查研究就從這裏開始！」於是，劉少奇入住了養豬場的一間破爛的飼料房裏，其他隨從人員便住到了旁邊一間空豬舍裏。秘書們借來了門板，爲劉少奇架床，但卻找不到稻草鋪床。一個過去是魚米之鄉的地方，現在卻找不到一把稻

草，劉少奇不禁陷入沉思。

劉少奇信步走到屋後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見田地荒蕪，雜草叢生，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在挖野菜。路邊有一堆已經風乾了的人糞。劉少奇走過去，用腳搓開，仔細看了看，不禁搖頭嘆息，對秘書說：「你們看，這裏面多是粗纖維，是糧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緣故，農民吃飯已經成了問題。」劉少奇的心靈初次受到衝擊。

豬場飼料房成了劉少奇的臨時辦公室。他在這裏逐一召見先期到達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組匯報情況，同時挿空子找老百姓談話。所見所聞使劉少奇得到的印象非常強烈。他對一起聽匯報的張平化說：「寧鄉縣問題那樣嚴重，如果說天災是主要的，恐怕說服不了人。沒有調查研究，這個教訓很大。」

是不是湖南的農村都是這個樣子？劉少奇決定多看幾個地方再作判斷。

經同中共湖南省委商量，劉少奇又選擇去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這是一個全省出名的先進單位。他要去看看這個「紅旗大隊」的情況究竟怎樣？

從四月十二日起，劉少奇在天華大隊一間陰濕的土磚房裏住了十八天。他除了召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外，還走村串戶，到田頭地邊、農民家中查看，找老人、婦女、青年個別交談。每到一處，他總是鼓勵群衆如實反映情況，講眞話。他一再對這裏的幹部、社員說：「願意講的話都講，講錯了也不要緊。」

眞實情況越來越淸楚。原來這個「紅旗大隊」的情況也和王家灣差不多，虛報浮誇嚴重，群衆生活困苦。這裏的幹部還多了一個「先進」的包袱，不願揭露問題。

五月二日，劉少奇一行來到寧鄉縣。劉少奇早在一九二〇年，二十二歲時便只身離家，投身革命。打那以後，他除了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因回湖南養病在長沙同母親見了一面以外，在漫長的歲月裏，他轉戰南北，國事倥傯，再也沒有機會回過家鄉，算來已四十年了。

中共寧鄉縣委本來在花明樓區政府所在地準備了十二間房子，作爲劉少奇和隨行人員的居住、工作用房。可他連看也沒去看，晚上不聲不響地進了炭子沖他家的舊宅，還是住在他小時候住的那間屋子裏。

舊居的堂屋權充接待室。劉少奇在這裏連續召集各種座談會，找人個別談話，了解這幾年農村的眞實情況。這裏畢竟是他的故鄉，甚麼事情要瞞過他，就不那麼容易了。

許多匯報材料說，湖南去年遭受大旱，農村經濟困難是因爲天災。

劉少奇找來小時候一塊放牛的農民朋友李桂生，同他一起回憶童年往事，然後問他：「人們說去年乾旱很厲害，安湖塘的水車乾了吧？」

「沒乾，還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還有半塘水，這說明乾旱並不厲害嘛！你還記得嗎？小時候那一年，塘底乾得晒得谷，那樣天旱，每畝田還收得兩三擔谷呀！」

「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有一點影響，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五風』刮得咯樣！」李桂生直話直說，一語驚人。

李桂生帶劉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指着胡亂堆在地上灶上的炊具碗筷和一小堆萵筍葉，說：「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鹽，不放油，吃不飽呀！」

劉少奇後來又到一些農民家裏，揭開鍋蓋，打開碗櫃，看到油鹽罐子裏只有鹽，沒有油，鍋裏炒的是野菜。來見面的親戚、熟人當中，有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他步行到趙家沖看望親姐姐劉紹德，他的外甥女魯新秀告訴他，她家所在的食堂這兩個月就死了十一人，她的父親「吃糠粑粑屙屎不出來閉死了」。七十歲的老姐姐顫巍巍地對他說：「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給人家飯吃囉！」父老鄉親的生活這樣困苦，劉少奇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一再向鄉親們道歉，表示他的工作沒做好，對不起大家。

在長沙縣天華大隊調查時，劉少奇就發現公共食堂是農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指示當地停辦。可寧鄉縣的公共食堂，這時仍普遍存在着。反右傾鬥爭把人們搞怕了，誰也不敢挑頭解散食堂。

劉少奇找來擔任過大隊書記的農民朋友王升平，問他：「你說說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咯到底是講得還是講不得呢？」王升平已經因爲「右傾」被撤了職，心有餘悸。

「怎麼講不得呢？」劉少奇鼓勵他，「把你請來就是要你講心裏話。實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講得我就講。」王升平壯了壯膽說，「要是叫我和群衆說心裏話，食堂還是早點散伙的好。再辦下去會人死絕。拿柘木沖食堂說吧，開伙時一百二十人，眼下不到八十人，死了十多個，跑了十多個，還有幾個得水腫病住在大隊臨時醫院。過去家家戶戶養豬養鷄，入了食堂沒得吃，養不成。如今二十戶人家，只剩下集體的一頭母豬，叫鳴的鷄公子都沒有……」。

聽到的，看到的，都表明這裏的食堂也不受群衆歡迎。劉少奇當機立斷，要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柘木沖食堂停掉。㉕

劉少奇這次湖南調查的收穫，集中地表現在五月七日他與炭子沖農民的談話中。

這一天，在炭子沖劉少奇舊居的堂屋裏，坐滿了男女老少。他們都是當地的農民，還有幾個基層幹部。

劉少奇把鄉親們迎進屋，給他們讓坐、遞煙。王光美為大家沏上茶水。劉少奇說：

我將近四十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得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

鄉親們談談看，社員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是好了還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產比以前降低了！是這樣，就承認這個現實。（群衆：生產是降低了，生活差了。）甚麼原因呢？為甚麼生產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說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做得不好。我問過幾個人，門前塘裏的水是不是車乾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車乾了？他們說都還有半塘水。看來旱的影響不是那麼重。我記得過去有兩年遭受旱災，安湖塘和門前塘裏的水都車乾了。所以主要是這裏的工作犯了錯誤。這是不是完全怪大隊幹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上邊要負主要責任。當然，大隊幹部不是沒有責任，要負一小部分責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辦食堂。因此根子還在中央，不過到了下邊就加油添醋了。

這次回來，看到這裏工作搞成這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人沒有不犯錯誤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犯了錯誤不要緊，要緊的是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你們食堂散沒有散？（群衆：散的多。）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麼回事，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專人舂米，一個食堂佔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甚至半數的人都去做飯了。燒硬柴砍樹，不砍茅草，砍了山林。還有其他毛病。好處也可以講個一兩條，說是出工齊。出工齊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嘛！

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

關於將農民們害苦了的「共產風」，劉少奇說：

關於退賠問題，「十二條」講了。到底退賠得怎樣？我看一般是差得很遠。聽說你們有一條規定，丟失的東西要有證明才准登記。搞亂了，哪裏去找證明呢？這個帳要一戶一戶地結。這個帳要記住。賠清以後，立塊碑，或者寫一個大單子，用鏡框子鑲起來，掛在公社裏。不這樣搞，老百姓下不得地。不要半途而廢，馬馬虎虎了事。要扎扎實實算一回帳，算得疼一點，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算疼了，社員也要疼一下，疼幾年。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㉖

五月十一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系統地報告了他在湖南農村調查的情況，對解決公共食堂、社

員住房、退賠社員財物，鞏固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制，一系列在農村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五月十五日，劉少奇結束歷時四十四天的農村調查，帶着豐碩的成果離開長沙、返回北京，準備出席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農村造成的災難是那麼的怵目驚心，只要不是別有用心便都會看到。劉少奇能夠實事求是地反映廣大群衆的呼聲，發現「三面紅旗」所造成的災禍，在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下，這一點雖然不易，但並不是難得。劉少奇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將這些現象，加以歸納總結，深化爲「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而得出造成災難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實際上是毛澤東）工作中的錯誤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而且還敢冒毛澤東的大不韙，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安危，挺身而出，大聲疾呼，道出眞相，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劉少奇不退縮，不跟風奉承，不顧個人的安危，勇於承擔歷史賦予的使命。對此，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歷史也會公平地爲他記下這光輝的一頁。

五月二十一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其情況與過往沒有多大的差別，基本上彌漫着兩種風氣：其一是以毛澤東爲首的，認爲產生災難的原因是自然災害和蘇聯的背信棄義，也就是「天災人禍」。另一種則是明知道毛澤東講的不是事實，但也不敢道明眞相，正是明哲保身，少說爲佳。面對着湖南農民生活的那種淒慘景象，劉少奇不再猶豫了，就在這次會上，他針對以上的種種說法和推諉責任的風氣，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講話。劉少奇說：

爲甚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我看，在農村裏面，我們的工作有缺點錯誤，也有天災；在城市裏面，在工業方面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錯誤。農業方面是高指標、高征購等等。工業方面也是高指標，橫直要搞那麼多鋼材，那麼多煤，那麼多交通運輸。文教也是這樣。結果，把原材料和各種東西都搞到這些方面來，其他方面就沒有了，勢必擠了農業和輕工業。這是從中央起要負責的。

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湖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有成績就是有成績，有一分成績就是一分成績，有十分成績就是十分成績。成績只有七分就說七分，不要多說。我們這幾年確實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見效的事情。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爲甚麼會這樣減產？爲甚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

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現在要下決心。

我們的這些缺點錯誤，從一方面來講，由於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夠，有些是不能避免的；從另一方面來講，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轉，這是可能的。我們轉慢了一點，問題發現得遲了一點，所以，損失比較大。但是，現在轉過來還不遲。我看在座的同志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里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還捨不得關廠嗎？還捨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麼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㉗

劉少奇的觀點鮮明尖銳，一針見血，揭示了問題的本質，獲得了中共中央大多數人的贊同和接受，成爲中共中央的主導思想，而毛澤東那些模糊籠統，作樣子走過場式的檢討，很快地爲人們所厭惡和拋棄。從此之後，毛澤東再不講「大躍進」慘敗的原因之類的話，變得緘口寡言了。同時，毛澤東開始眞正地退居二線，不再掛帥攬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當了徐霞客，而調整國民經濟的重任，則落在劉少奇的肩上。

在劉少奇的影響下，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眞爲了具體總結經驗教訓，組織了幾個人，集中在

北京動物園內的暢觀樓，查閱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共中央下發的文件，看其中提過哪些「左」的口號，制定過哪些「左」的政策規定，彭眞說：「要冷靜地研究三面紅旗是紅旗？灰旗？白旗？」與此同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在一些場合下說：

我們現在的政治空氣怎麼樣？誰要實事求是，就給誰扣帽子，甚麼「三論」：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甚麼「五派」：伸手派，算帳派，觀潮派，搖頭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這是主觀精神，總要建立在客觀的基礎上吧！沒有客觀基礎，就只剩下一個主觀精神了……

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錯誤，如果不改，連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翻掉。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但一個指頭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

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幾年還不夠，可是這幾年「左」傾錯誤的經驗夠了。㉘

毛澤東爲維護「三面紅旗」所設置的種種「禁區」，被劉少奇率先打破。從此，對「大躍進」的檢討，才眞正進入實質階段。

在此後半年中，劉少奇對「大躍進」失敗的反思，不斷有所深化。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劉少奇在會見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時說：

農村人民公社對發展農業生產是有利還是不利？我們已經試驗了三年，還存在一些問題，

也出了一些毛病。現在只試驗了三年，至少可試驗十年，再作總結。我們辦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很大的進步。本來也可以繼續辦它好幾年而不進入公社。但是農民群衆已經在高級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織公社，想對發展農業生產創造更好的條件。農民要這樣做，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贊成還是反對。當時，我們也曾考慮到將來也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也許不完全適合，但對不對，這要由歷史來做結論。㉙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劉少奇在瀋陽聽取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匯報工作時指出：

現在，有些人有懷疑、抱怨、牢騷，講出來好。不要人家一懷疑就不讓講話。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要切實讓人家講話，這樣黨內就生動了，就可以討論問題了。人民公社是有優越性，問題是丟掉了高級社的一套東西，搞了平均主義、供給制、食堂等等。可以設想，如果保存高級社的一切優越性，在此基礎上聯合組織人民公社，優越性就可能更多一些。現在看不出優越性，難於說服人家，農民就說服不了。等三五年後，經濟恢復了，人民公社顯示出更多的優越性來，有了事實，才能說服人。㉚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劉少奇在哈爾濱聽取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和省長李範五匯報工農業生產情況時指出：

你們三級幹部中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客觀上存在一些現象。「大躍進」現在有些躍退了，公社的優越性不那麼明顯，減低了，於是出現三面紅旗是否正確的問題。高級社的優越性不要吹掉，沒有更好的辦法時不要動它，要保留。㉛

很顯然，劉少奇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在中國是否需要這麼早就辦人民公社，以及「三面紅旗」是否正確，都已產生深深的懷疑了。劉少奇與毛澤東在政治思想上產生了巨大的鴻溝。

劉少奇的言論，與當年的彭德懷相比，要嚴重得多，尖銳得多，大大地超出了毛澤東可以容忍的程度。毛澤東的不滿意是很明顯的。在八月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便說：「現在已退到谷底。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而且還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甚麼了不得！人那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

毛澤東不但在爲自己辯護，而且在向劉少奇等人反擊。那些話已不是擺事實、講道理，已不是正常的討論和交換意見，而是帶有強烈的意氣和感情的色彩，帶有強烈的不滿和慍怒。毛澤東的話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僅僅幾個月之前，毛澤東還在大聲疾呼：「要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一九六一年要成爲調查研究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毛澤東的話語猶在耳邊，現在，對調查研究反映出來的事實，毛澤東卻不能接受，也不願意接受，反而歪曲事實，掩飾眞相，意氣用事，遷怒於實事求是的人。毛澤東的這種作法，充分表明了他晚年的那種理論與實踐脫離，說一套作一套，「馬列主義尖朝外」，只對別人，不對自己的惡劣作風。

第三階段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反思進一步深化，得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過去」，「經濟調整要傷筋動骨」的結論。詳情本書將後述。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大躍進」的反思上的這種天差地別，中共的廣大黨員幹部不會看不到。相形之下，毛澤東那文過飾非，對國家對人民沒有責任心，虛僞等等的惡劣性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在全黨、全國人民的面前。毛澤東惱怒了。

五、劉少奇：毛澤東不滿意的接班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於是，便發生了「毛澤東夜談接班人」的這一幕。

伯納·勞蒙哥馬利是世界著名的軍事家，一九六〇年五月，他首次訪華，歷時五天，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外交部長）的接見。後來他感到該次在華時間太短，遂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再度訪華，歷時二十日。在華期間，除了會見中國領導人外，蒙哥馬利還指名到幾個不向西方開放的城市參觀，在國防體育協會主任李達上將陪同下，訪問了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回到北京後又會見周恩來，還準備會見毛澤東。

蒙哥馬利此行的一個目的，是對中國進行戰略考察，尤其是毛澤東身後的接班人問題，他甚有興趣，在各地訪問時，他曾多次設法探問。因爲，根據蘇聯和斯大林的經驗，接班人的問題涉及到中國的將來是否穩定，西方國家對此十分注意。蒙哥馬利在鄭州時便說：斯大林是一位有權威的政治領袖，但缺少遠見，生前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繼承人，死後出現了「三駕馬車」，局勢混亂，貝利亞被殺掉，結

果讓只會用皮鞋敲桌的赫魯曉夫取得權力，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毛澤東得知蒙哥馬利的情況後，決定九月二十三日在武昌會見這位英國元帥。

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夜談接班人問題，熊向暉有如下的回憶：

這天下午，我和浦壽昌（周恩來的秘書）飛抵武昌。機場上停着一輛汽車，把我們送到東湖毛主席的住處。

在向主席匯報時，我先提到蒙哥馬利對主席很欽佩，對中國很友好，但也在對我們進行戰略觀察。然後講了我向總理講過的情況和跡象。

主席連續抽煙，有時插幾句。我講完後，他問，英文裏「繼承人」是甚麽？我說：「SUCCESSOR」。主席叫我在一張紙上寫出來。他看了一會兒說：「SUCCESS」這個詞他知道，意思是「成功」，怎麽加上「OR」就變成「繼承人」了？

浦壽昌作了解釋。主席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裏也沒有存款，繼承我甚麽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浦壽昌說，英文裏沒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譯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爲繼承人。

主席說，這個元帥講英語，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

主席說，這個元帥過去打仗很勇敢，打敗了隆美爾。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講了三原則。

誰是我的繼承人，爲甚麼他不敢問呀？是不是也像中國人那樣怕犯忌諱。我說也許是。

主席說，你講他是來搞戰略觀察的。我看，他對我們的觀察不敏銳。這也難怪，他是英國元帥，是子爵，不是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事情不那麼清楚。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嗚乎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只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人拉韁繩，不亂才怪。

主席說，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爲甚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裏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

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我們沒有搞「抽樣調查」，英國元帥搞了，一搞，發現了問題。中國一些群衆也沒有捅破這層紙。這位元帥講了三原則，又對中國友好，就讓他來捅，捅破了有好處，讓國內國外都能看清楚。甚麼長生不老藥！連秦始皇都找不到。沒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這位元帥是好意，我要告訴他，我隨時準備見馬克思。沒有我，中國照樣前進，地球照樣轉。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蒙哥馬利在李達上將等陪同下，從北京坐專機抵達武漢，住在漢口勝利飯店。晚上六時半，毛主席在東湖會見他，並共進晚餐。蒙哥馬利贈送毛主席一盒555牌香煙，提出許多問題，其中包括：一九四九年建國時，毛主席主要考慮的是哪些頭痛的問題，現在考慮的又是哪些問題，對解放以后的中國怎麼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是否還適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何區別，對他提出的三原則有何意見，等等。

毛主席逐一回答。談到九時半，蒙哥馬利說：今天的談話使我學到很多東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來談談？主席說：明晚我到別處去了。談話就此結束，互相道別。儘管談話中彼此問過年齡（這年毛主席六十八歲，蒙哥馬利七十四歲），但蒙哥馬利並未問及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

沒有料到，二十四日凌晨五時左右，浦壽昌通知說，主席改變了計劃，決定當天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並共進午餐。這使蒙哥馬利喜出望外。

這次追加的談話是從下午兩時半開始的。寒暄幾句後主席就說：元帥是特別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到七十三歲去見上帝。我的上帝

是馬克思，他也許要找我。蒙說：馬克思可以等一等。這裏更需要你。

主席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爺不請自己去。蒙借機提出：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主席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主席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蒙說：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現在不能離開這條船放下不管。

主席說：暫時不離，將來學丘吉爾的辦法，隨時準備滅亡。接着主席講了五種死法：被敵人開槍打死；坐飛機摔死；坐火車翻車壓死；游泳時淹死；生病被細菌殺死。主席說：這五條，我都已準備了。主席還說，人死後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裏喂魚。

談到下午五點，主席邀蒙哥馬利坐船，看他在長江游泳。主席游了近一小時，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馬利送到漢口勝利飯店，又談了近一小時，並把他事先寫好並署名的《水調歌頭·游泳》詞一首，贈蒙哥馬利元帥，作爲那盒「555」香煙的答禮。㉜

蒙哥馬利此行的目的，是要打探毛澤東的接班人情況。要令蒙哥馬利與西方世界釋疑，不僅需要明確接班人是劉少奇，更重要的是要介紹劉少奇的優點和長處，以證明劉少奇並不是馬林科夫。由於這些事情只能由毛澤東來說，因此周恩來特意安排了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會見。

奇怪的是，在九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會見中，賓主都沒有提到接班人的問題，而且當蒙哥馬利提了

要求「明晚再來談談」時，毛澤東回答「明晚我到別處去了」，拒絕了蒙哥馬利的要求。同時，儘管當時只是九時半，時間並不是很晚，會見也只進行了三個小時，毛澤東也並沒有挽留蒙哥馬利，從而使會見就此結束。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的政治目的並沒有達到。

毛澤東是在二十四日凌晨改變主意，決定當天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的。這樣的一段小小的曲折，清楚地反應了毛澤東心中的猶豫。

毛澤東向一位英國人談論自己的「接班人」問題，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當時，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和政治上的封鎖，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絕大多數的國家，也與中國吵翻臉，圍攻中共和中國。與此同時，印度乘火打劫，挑起領土糾紛，迫使中國發動自衛反擊戰爭。中國處於多方面的敵對國家的包圍之中。在國內，又面臨着國民經濟的崩潰，史無前例的災難。在這種情形下，蒙哥馬利代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戰略觀察」，想了解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是否穩定。面對着這種挑戰，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馬，談論「接班人」問題，以釋蒙哥馬利及世界各個國家的疑慮，鞏固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對毛澤東來說，這是責無旁貸的事。

通觀毛澤東的講話，有兩點值得人們的注意。

在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上，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這篇談話，一直被視爲是毛澤東信任劉少奇、毛劉關係融洽的鐵證。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正如鄧小平在一九五三年所說，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中共第二把手的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的，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公認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毛澤東或那個人敕封、欽賜的。對於這一點，毛澤東不得不承認，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不以毛澤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事實。因此，毛澤東

不講「接班人」則已，要講就必須提劉少奇。否則在中共黨內通不過，在全國人民中也通不過。在當時的形勢下，毛澤東還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因此，不管毛澤東心中願不願意，毛澤東都必須向蒙哥馬利提出劉少奇是自己的「接班人」。

那麼，在毛澤東的心底裏，將劉少奇作爲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是由衷的，心甘情願的呢？對劉少奇這位「接班人」，毛澤東是否很滿意，覺得自己選擇正確，黨和國家後繼有人而欣慰呢？從毛澤東與熊向暉和蒙哥馬利的談話中，完全看不到這一點。

於是，在整個談話中便出現了一個大破綻，那就是毛澤東講接班人問題，只回答了自己的選擇，而沒有講爲甚麼這樣選擇。爲了使西方國家釋疑，毛澤東不但要提出劉少奇是接班人，更重要的是要介紹劉少奇，說明劉少奇是一位出色的、有能力的接班人，並不像斯大林選擇的馬林科夫，而中國也不會出現蘇聯的混亂局面。這本是題中應有之議，然而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毛澤東介紹接班人的事情，似乎只做了一半。毛澤東向外人，尤其是外國人談論自己的接班人，竟沒有一字一句的評價，沒有只字片語的讚揚，這是十分不正常的。是毛澤東的疏忽嗎？不是，像毛澤東這樣的老練而富有經驗的政治家，不會犯有這樣的過失。是毛澤東不願意講對劉少奇讚賞的話，毛澤東不願爲劉少奇唱讚美歌。因此才出現毛澤東提出劉少奇是「繼承人」，但又沒有向蒙哥馬利介紹劉少奇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矛盾的現象。

毛澤東的這種矛盾的複雜的心理狀態，明確地表現了他對劉少奇及其接班人地位的不滿意。爲甚麼不滿意？是劉少奇的能力、水平、威望資歷不夠嗎？不是。在當時，劉少奇在這些方面都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態。毛澤東的不滿意，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劉少奇與毛澤東不夠「親」。建國後，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期後，毛澤東「任人唯親」的傾

向已十分明顯，處理彭德懷及任用林彪，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劉少奇雖然是旗手，但自建國以來，他對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及「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跟得不夠貼，不夠緊，思想不夠「左」，對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諸多抗拒。建國初發生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將山西省的發展農業合作視爲「空想的、反動的農業社會主義」，以及後來的「反冒進」，都表明劉少奇的思想與毛澤東距離頗大，每逢歷史轉折的關頭，劉少奇都不能理解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跟不上毛澤東的前進步伐，每每都需要毛澤東大喝一聲，猛推一把，劉少奇才踉踉蹌蹌地跟上來。對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也是一樣，劉少奇從湖南調查回來後，其認識明顯地偏離毛澤東，其程度更超過彭德懷。對此毛澤東感到強烈的不滿。

其二，是劉少奇的權勢已過於強大，毛澤東已感到嚴重的威脅，擔心這位接班人會超過自己，壓倒自己。一九五八年武昌會議上關於國家主席提名問題發生的不正常現象，便明顯地表露了毛澤東的這種心態。

出於這兩點原因，毛澤東在與蒙哥馬利的談話，自然是有所保留了，於是說一半，留一半，呈顯出矛盾與複雜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並不滿意劉少奇這位接班人。

①②：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二二三頁

③：同上，三九四頁。

④：謝春濤《毛澤東和中國的一九五八年》

⑤：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⑥⑩：權延赤《領袖淚》二七——三二頁。

⑦⑧⑨：同①。

⑪⑫：引自逄先知《毛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三七——四一頁。

⑬：同①三七六頁。

⑭⑮⑯⑰⑱：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⑲：鄭謙、韓鋼《晚年歲月》一四九頁。

⑳㉑：同⑪。

㉒㉓：《劉少奇年譜》。

㉔：王光美《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㉕：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

㉖：劉少奇《同炭子沖農民的談話》（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㉗：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辦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㉘：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二〇一頁。

㉙㉚㉛：引自《劉少奇年譜》。

㉜：引自《世界知識》一九八八年第二十期。

第四章　毛劉分裂：「七千人會議」

一、國民經濟繼續惡化

一九六一年過去了。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自一九六〇年七月的中共北戴河工作會議通過以後，實施已一年多，但見效不大。一九六一年的國民經濟，仍然大幅度滑落，危機越發深重：

糧食產量只有二九五〇億斤，只及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糖、煙、痲、茶等經濟作物繼續大幅度減產；

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二；其中：

鋼產量只有八七〇萬噸，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三·二；

輕工業全年總產值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一·六；

國家財政收入，比上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八。①

糧食和副食品繼續嚴重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極度緊張，人民獲得的糧食、食油、棉布的定量分配品，比上年繼續減少，城鄉居民仍有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經濟的困難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工作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說：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雖然已經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一直没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不能有效地進行。我們已經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就堅決退下來，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既不能上，又不願下，我們的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更被動、更嚴重的局面。」②

之所以造成調整工作不見效，形勢繼續惡化的原因，主要是毛澤東的遮丑護短，文過飾非，從而導致中共黨內思想認識不一致，與國民經濟的嚴峻現實很不適應。有些人認爲「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是一個指頭」，不應將困難看得過多過重，「氣可鼓不可泄」，認爲只要再有個豐收年，便可再度「大幹」，繼續「躍進」，因而不願縮小基本建設規模和降低高居不下的經濟指標。再有一種人雖然也看到了幾年來的失誤，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調整的必要性，但見於彭德懷的前車之鑑，對種種的錯誤、問題不敢想，也不敢提；而更多的人對當前的形勢表現迷惘，不能理解、信心不足、不知所措，因而在實際的調整工作上躊躇猶豫，遲疑不決。還有許多黨員和幹部，對「大躍進」特別是「反右傾」以來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上級領導缺乏民主作風，下面不敢講眞話、不敢提意見的狀況意見極大，上下級之間、同志之間關係緊張，許多人牢騷滿腹，懷有嚴重的埋怨情緒。

這一切都嚴重地影響了調整工作的貫徹執行。

在這種形勢下，從中央到地方，廣大黨員幹部迫切希望中共中央總結經驗，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行

動，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克服困難，走出災難的深淵。

出於這種迫切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二、「七千人會議」：毛澤東「捂蓋子」

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以及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解放軍的一些負責人。規定全國縣委有二人、地委有三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委有四人參加會議，共有七一一八人。因此又稱「七千人會議」。這是中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工作會議。

會議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開幕。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和通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對會議所做的報告。

劉少奇的報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劉少奇負責起草，參加起草的還有鄧小平、彭眞、陸定一、吳冷西、姚臻等人。據吳冷西回憶：

> 劉少奇同志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報告的主旨是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作風，無論總結四年工作，分析當前形勢，提出克服困難的方針政策，都要實事求是。在報告初稿的起草過程中，他對參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反復強調這個思想。在報告的整個起草和修改過程中，以至整個大會過程中，少奇同志都身體力行，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出來以後，先送給毛主席看。原先設想，毛主席看過並認爲大體可用以後再提交政治局討論。過了兩天，小平同志告訴我們，毛主席的意見是不要等他看了，也不等政治局討論了，就把初稿直接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請大家提出修改意見。③

在毛澤東的控制下，這個報告自然不能深入地檢查「大躍進」以來的失敗教訓。劉少奇的觀點未能在報告中體現。

果然，當劉少奇的書面草稿發到與會代表時，下面議論熱烈，意見紛紜。例如在報告草稿中，爲了免給「三面紅旗」抹黑，而把困難的原因說成主要由於三年自然災害，從而引起許多代表的不滿。而在列舉四年來工作上的錯誤缺點時，有些人說「講得不深不夠」。

有見於此，中共中央便決定以劉少奇爲主，成立一個成員規格更高的報告修改小組，其成員除了鄧小平、彭眞、陸定一等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外，還包括政治局委員，各中央局和主要省市的書記及中央主要部門的負責人，其二十一人。小組深入各省市的討論會議，傾聽及收集代表們的各種意見，進行補充修改。

會議原定在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劉少奇的報告後結束，以便讓代表們各自返家過春節。而毛澤東也不打算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然而劉少奇書面報告的修改拖長了時間，直到一月二十七日，報告的修改稿才發到代表們的手上。於是會議又決定一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結束，代表們三十一日晚便可離京返回各地。

報告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之名印發的。劉少奇的《報告》分為三大部分：

一、目前的形勢；

二、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

三、黨的問題。

由於這個《報告》是在毛澤東的把持下起草和修改的，因此《報告》在總的方面體現的是毛澤東的捂蓋子和文過飾非的主導思想。

例如在「目前的形勢」這一部分，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成就，列舉了十二條，對「大躍進」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而對四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則只列舉了四條：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比例失調；在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變動過急，刮「共產風」；權力下放過多，造成分散主義；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應和農業生產的困難。

關於造成目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報告》只是泛泛地論述，如「經驗不夠」，「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的傳統作風」等等。劉少奇提出和堅持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觀點，起先在起草委員會，後來在中央政治局都得到了一致的贊同，只是在最後定稿時遇到毛澤東的反對，沒有能夠寫進去。

劉少奇提出的「大躍進」以來「缺點是三分，成績是七分」的另一個「三七開」的觀點，也沒有能夠寫進《報告》裏去。《報告》說：「三面紅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正確的。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性質，不是路線性的錯誤，而是具體執行中的問題」，這幾年「成績是偉大的，缺點和錯誤是第

二位的，而決不是相反」。

《報告》中的這些重要觀點，都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因此《報告》遂得以通過。尤其重要的是，《報告》對目前形勢的估計是：「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這種判斷掩蓋了「大躍進」錯誤的嚴重性和災難性的眞相，使人們眞以爲「錯誤只那麼一點」，從而減輕了「始作俑者」的責任。這是毛澤東特別看重這一論斷的原因所在。

《報告》沒有也不可能有對「大躍進」進行認眞的檢討，也談不上總結經驗教訓。很顯然，這只是毛澤東在壓力面前向全黨和全國做的門面功夫。

《報告》上寫的是劉少奇的名字，打上的卻是毛澤東的烙印。

三、劉少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劉少奇的即席講話。

據吳冷西回憶：

少奇同志的報告稿在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通過以後，毛主席建議，這個報告幾易其稿，多次討論，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照本宣科了，可作爲書面報告印發，另由少奇同志在大會上作補充説明和解釋。少奇同志當天親自通宵草擬了一個講話提綱。第二天（一月

二十八日）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聚在後台休息室（原北京廳），少奇同志把講話提綱交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就一頁一頁地傳給其他常委看。提綱一共有十幾頁，因爲字寫的很大，很快就傳看完了。⑤（劉少奇是在一月二十七日發表即席講話，吳冷西在時間上恐有誤——作者注）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全體大會，這時，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人民大會堂內坐定。毛澤東與中央常委們在一片掌聲中走上主席台。毛澤東隨即主持開會，宣布由劉少奇講話。這就是對中國的政局發生巨大而深遠影響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吳冷西（曾長期任《人民日報》社長、新華社社長）說：

少奇同志素以觀點的鮮明性和尖銳性著稱，他在討論問題時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而且力求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少奇同志也素以論證充分、邏輯性強見長，他的談話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人心悅誠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難以辯駁。這些特色，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充分顯示出來了。⑥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關於對形勢的估計，「出現一個大的馬鞍形」。劉少奇說：

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爲甚麼不足？這是因爲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一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一點。一九六二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是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爲，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關於造成經濟嚴重困難的原因問題，劉少奇說：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爲甚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

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衆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甚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一九六〇年這個水塘乾了沒有？他們說：沒有乾，塘裏的水沒有車乾。塘裏有水，可見那裏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麼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關於「缺點與成績三七開」的問題。劉少奇說：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

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關於「三面紅旗」的評價問題。劉少奇說：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批評「大躍進」以來提出的一些口號。劉少奇說：

幾年來，各個地方和中央都在群衆中提過不少的口號。除了正確的口號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確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確的，有些是解釋得不清楚的。我認為，應該認真地清理一次，使我們的幹部和群衆，對這幾年來在觀念上不清楚的許多問題，弄得更清楚些。

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有一個口號叫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要向幹部、黨

員和群衆說明白。

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做「條件論」，或者叫做「唯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那種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反對重視條件，不能反對重視客觀條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要有客觀的條件，還要有主觀的條件。必要的客觀條件和必要的主觀條件，都成熟了，都具備了，問題才能解決，事情才能辦好。一切問題的解決，取決於時間、地點、條件。就是說，要具備一定的時間條件、空間條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條件，事情才能辦好。條件是可以經過人們的努力去創造和改變的，但是不具備一切必要的條件，事情是不能辦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就是重視條件的。我們不能反對、也不應該反對重視條件。但我們不是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者。我們認爲，主觀能動性在符合客觀規律性的條件下，是能夠發揮偉大的作用的。

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裏所說的「左」，是引號裏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號裏面的「左」派。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裏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衆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只有這樣的左派，才會經常是朝氣勃勃的、真有幹勁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衆的、冒裏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幹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那種「左」派不會有真正的經常的幹勁，他會由一時的狂熱突然轉入消沉。那種

「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應該受到批判。這種人就其所犯錯誤的後果來說，和右派差不多，不見得比右派好一點。有些人在犯了極左的錯誤以後，轉過來又犯極右的錯誤。所以，那種「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甚麼反甚麼。有甚麼反甚麼，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甚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這幾年，還有一種用具體的指標、數字來確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說，畝產八百斤就是左派，畝產七百斤就是右傾。這也是不正確的，在這種具體指標、具體數字的問題上，不應該聯繫到右傾或者「左」傾上去。對於生產技術的問題，也不應該聯繫到右傾或者「左」傾上去。

此外，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並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從哪裏聽了點風，聽到了一點不確切的消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

我建議，諸如此類的口號，中央還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澤東：中央書記處已經清理了一次，但是還沒有清理完畢。《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誌、廣播事業局，究竟還說了哪一些對人民不利的話？要清理一下。）我建議，關於這個問題，由各地委、各縣委提出意見，交給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釋，寫出文件來，送給中央。經過中央批准，再發下去。這些口號的清理，一律要經過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決定。⑥

劉少奇還講了彭德懷問題：彭德懷「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

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我們動不動就給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黨的大帽子，其實人家只是對某一個具體領導有意見。反對某一個人怎麼能說就是反黨呢？你反對毛主席，也只是反對毛主席個人嘛」。

從今天來看，劉少奇的講話是有局限性的，如他說「我們犯的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發生錯誤的原因，劉少奇也只總結了「經驗還很不夠」和「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的傳統作風」等。然而，從當時來說，劉少奇的講話是比較客觀、實事求是的，因而也顯得更加深刻和透徹，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劉少奇的講話代表了中共黨內的正確路線和健康、進步的力量。

不論是無意亦或有意，劉少奇講話的矛頭，處處都指向毛澤東。

劉少奇在講到缺點和錯誤已經改正時說：「比如供給制、公共食堂現在已經不辦了，高指標已經不搞了，許多『大辦』也停止了，基本建設戰線也縮短了，水利建設也不搞那麼多了。」這些東西都是毛澤東提倡和堅持的。劉少奇還說：「我們這幾年提出的過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和基本建設指標，進行一些不適當的『大辦』，要在全國建立許多完整的經濟體系，在農村中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等等」，都是缺少或沒有根據的，沒有調查研究，沒有與群衆商量，沒有按民主集中制辦事，「就草率地加以決定，全面推廣」。這些也都是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政德」。

劉少奇在講話中批評和駁斥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公式，便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批判「反冒進」時提出來的：

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赫魯曉夫背信棄義的破壞」，亦即「天災人

禍」，也是毛澤東的觀點；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也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高潮中贊同的，著名的哲學家，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認爲這是唯心主義，而與毛澤東大吵一通。

批判「唯條件論」和「左比右好」，「寧左勿右」，也都是毛澤東所欣賞的觀點；

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是毛劉分歧的核心部分。儘管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說得很委婉，說「現在都不取消」，「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似乎是仍然在堅持。然而，憑毛澤東那犀利的目光和敏銳的政治觸覺，他不會不感覺到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曖昧，有所保留，換句話來說就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抱有懷疑。「三面紅旗」是毛澤東晚年農業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對它至誠至敬，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來使之實現。而劉少奇對此竟持懷疑態度，這是毛、劉在政治思想上產生重大分歧的重要因素。

至於彭德懷問題，儘管劉少奇堅持一九五九年肅整彭德懷是正確的，但那番說話實在是尖銳，刺到了毛澤東的隱痛，犯了「大忌」。劉少奇說彭德懷所講的「不少還是實事求是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這麼一來，毛澤東當初打倒彭德懷的理由，還所剩幾何呢？這不是陷毛澤東於不義嗎？劉少奇在講話中雖然說彭德懷有「裏通外國」的嫌疑，所以廬山上批判彭德懷是正確。但查了整整三年，查不出一點證據，明目人一眼便看出，那是在羅織罪狀。如此一來，毛澤東如何立足於中共黨內？劉少奇此番話，後果嚴重，完全出了格。

劉少奇的講話中還有許許多多的「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衆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在黨內和群衆中，進行了錯誤的過火鬥爭」，以及「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等等，聽起來好似每刀每槍都是刺向毛澤東，毛澤東成了無形的衆矢之的，劉少奇這些尖銳的、不留情面的話語，不能不令毛澤東感到如芒刺在背。

劉少奇的講話必須是實事求是，必須是觀點鮮明、尖銳，才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和說服力，才能糾正黨內錯誤傾向，統一全黨思想，把調整工作納入正軌。然而這樣一來，必然會得罪毛澤東，會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對自己不利。在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之間，在毛澤東與人民之間，劉少奇選擇了後者，表現出劉少奇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崇高的政治品德。

劉少奇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在中共黨內，在同志之間，他不善於施用陰謀詭計和權術手段。在「七千人大會」以及整個檢討「大躍進」的過程中，劉少奇都沒有向毛澤東進行攻擊，追究個人責任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權力鬥爭。相反地是盡力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和尊嚴，在此方面可謂是煞費苦心。然而毛澤東並沒有領劉少奇的情，相反地卻遷怒於劉少奇，恩將仇報，以至發生後來的又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劉少奇都與常規常理「相反地」採取了行動。從這兩個「相反地」當中，人們可以看到毛、劉兩人在思想情操和政治品質方面的雲泥之別。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講話懷有強烈的不滿，這是顯而易見的。由始至終——從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第一次在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兩個「三七開」的觀點以來，毛澤東始終沒有發表同意劉少奇的這些觀點的講話，相反地，卻在不同的場合提出「錯誤就那麼一點點」和「形勢已到了谷底，開始上升」進行反擊。在「七千人大會」上，儘管劉少奇一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毛澤東千方百計地將劉少奇的觀點從《書面報告》上抹掉，使其不成爲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結論。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指示，向全黨傳

達的文件只限於毛澤東一月三十日的講話，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林彪一月二十九日的講話，以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講話。而「大會的主要精神」，即劉少奇一月二十七日的即席講話，則只限於在高級幹部範圍內傳達。毛澤東極力限制和縮小劉少奇講話的影響力。

劉少奇的講話，以鮮明、尖銳的觀點、深刻透徹的說服力，以如大河奔瀉的邏輯性，以及不可辯駁的事實，使絕大多數的與會代表心悅誠服，感到劉少奇眞正是敢於實事求是，眞正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劉少奇的報告，講出了許多人多年來想講而又不敢講的話，道出了他們憋在心裏多年的心聲，贏得了代表們的尊敬和信賴，使中共黨內正義的、進步的力量，團結在劉少奇的旗幟下。這是中共黨政軍多數的幹部都投向了「劉少奇的司令部」，而與毛澤東疏離，甚至相叛，使毛澤東處於孤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劉少奇的講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會代表們感奮不已，熱烈討論，議論紛紛，各種各樣的意見，如決了堤的洪水般湧現出來。有的代表說：

「說缺點錯誤不是路線性的，是執行中的問題，爲甚麼全國都推行錯了？這幾年造成損失，不次於三次左傾路線造成的損失。全國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這筆帳應算清。不能籠統地說三面紅旗是正確的，缺點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

「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己也不懷疑。但是，爲甚麼實際出了這麼多問題，而且這麼嚴重，這麼普遍，造成這麼大的困難？」

「『三面紅旗』是不是正確，原則上好講，實踐上難講；抽象講好講，具體講不好

講」。⑦

會議中羣情洶湧，不可收拾。到二十九日下午許多代表反映說：話還沒有講完，還憋了一肚子氣。有的小組還反映，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見於這種情況，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便又決定將會議延期至二月七日，決心讓代表們把要講的話講完，把「氣」出完。在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的會議上，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麼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有好幾個省，從五九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爲甚麼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爲甚麼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爲「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

> 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甚麼「氣」出甚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⑧

因此周恩來說：這次會議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從一月十一日開幕到二十九日上午，主要是圍繞劉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書面報告》；「第二個高潮」是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七日會議閉幕，中心就是「出氣」。

四、林彪：「毛主席是正確的」

面對着七千名代表洶湧澎湃般的批評，毛澤東一方面將會期延期至二月七日，讓代表們「出氣」；另一方面，毛澤東布置包括自己在內而劉少奇除外的中央常委向全體會議作報告，以便衝淡劉少奇講話的影響，力圖將代表們對「大躍進」以來的錯誤的認識和檢討，納入毛澤東的框框之內。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打頭陣的是林彪。這是劉少奇講話之後的第一個大會報告，時間僅在兩天之後，即一月二十九日。而林彪的講話與大會的基調「檢討總結、自我批評」是完全相反的。

林彪的講話是經過精心的準備的。據黃瑤著《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記載：

當時，（指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已決定在翌年一月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林彪要在這個會上發言，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便奉命組織一個班子爲他起草發言稿。一天，在三座門討論這個發言稿的第四稿時，葉群（林彪妻子）提出，在發言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句話意思不完備，應該加上「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天才」這幾個字。

羅瑞卿不同意。他用商量的口吻說：「現在已經不再提個人天才了呀！」。

葉羣頗爲理直氣壯地說：「個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才不提了，斯大林時代還是提的，現在對毛主席，在中國和在全世界，都可以這樣提。」

羅瑞卿站起來很嚴肅地對葉羣說：「『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句話不是我寫的，這幾個字從中南海出來的，是田家英提的」。

葉羣立即針鋒相對地說：「田家英提的不等於是毛主席提的。即使退一萬步說，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謙的意思。我們現在用這個話在客觀上貶低了毛澤東思想。」

雙方爭持不下。到第五稿時，羅瑞卿仍然堅持不加「個人天才」的字樣。發言稿送到林彪那裏，林彪十分不悅，決定撇開這個稿子，另起爐灶。⑨

林彪將準備講話稿叫做「拉條子」。就象戰爭年代準備大戰役似的，林彪在他那寬大而空曠的房子裏不停地踱步，想起幾句話或幾個字，便隨手寫在白紙條上。隨着不停的踱步，白紙條也越來越多，散落在沙發、茶幾、地上。最後，秘書們將這些「條子」收集起來，理出頭緒，編排順序，這就成了林彪

的講話稿。林彪說：

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少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⑩

林彪的講話，使毛澤東的錯誤——包括「左」傾冒險主義和個人專斷的作風，得到了很好的掩護，

使毛澤東的罪責得到開脫。

林彪的講話，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度讚賞。林彪剛講完，毛澤東便帶頭鼓掌（見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二〇六頁）。

會後，毛澤東指示羅瑞卿、王任重和田家英把林彪的講話稿在文字上作一番推敲、整理，毛澤東還親自進行了一些修改，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批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爲高興」，毛澤東要求將其「發給黨內幹部學習」。⑪

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和即席講話，毛澤東也有批示：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兩個文件（指上述劉少奇的兩個報告），均已看過，修改得很好了，即請你處理！

毛澤東二月二十三日。⑫

只要相比較一下便可發現，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評價要比劉少奇的講話高得多，而且那叫「好」聲，是由衷的，眞正發自內心的。

在同年的四月二十九和三十日，毛澤東在武漢又特地同羅瑞卿連續談了兩次話。他問羅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你能不能講出這樣一篇來？」

羅瑞卿回答：「我怎麼講得出來？我水平差得遠，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講出來。」

毛澤東大度寬容地說：「講不出來，可以學嘛！這次你們給他準備的稿子不能用，還不是他自己寫出提綱去講的。我也是這個方法，在會上邊聽邊想邊寫提綱，最後就按提綱去講一遍。」⑬

五、毛澤東避重就輕漫談「自由王國」

在林彪講話的第二天，即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向全體大會發表講話。

毛澤東講了六個方面的問題：

一、這次開會的方法；

二、民主集中制問題；

三、我們應當聯合哪一些階級？壓迫哪一些階級？

四、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五、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六、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六個方面的問題，眞正與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有關的，只是第二和第四個問題。

關於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說：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

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甚麼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衆，怕群衆講話，怕群衆批評。那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衆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衆講。越怕，就越有鬼。

他特別嚴厲地批評了黨內存在的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的現象：

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毛澤東說：

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

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够。

「民主集中制」和「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是毛澤東講話中的兩個重點，就其篇幅來說，後者比前者還要長些。

作爲中共中央主席，作爲「大躍進」的發動者和直接領導者，人們希望從毛澤東那裏聽到一套比劉少奇的講話更深刻的、全面的總結。然而毛澤東拿出來的，僅是民主集中制和認識客觀世界這兩個問題來交差，從中央領導人到地方各路諸侯，都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

「民主集中制」和「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一個是工作方法，一個是思想方法，是「大躍進」慘敗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與「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即思想意識。對此毛澤東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到「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即是「左」傾冒險主義，亦是農業社會主義），點到了要害，刺到了痛處，令毛澤東勃然大怒便是明證。

其次，毛澤東思想上的驕傲，不謙虛謹慎，政治作風上的獨裁、專橫獨斷、聽不得不同的意見，也是「大躍進」慘敗的重要原因。

可是，這些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毛澤東都沒有說，而將「民主集中制」和「認識客觀世界」這兩條拿出來搪塞，明顯地毛澤東是在避重就輕。

既使是「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批評的鋒芒主要是對着省、地、縣三級黨委的負責人，對中央尤其是中央核心領導卻只字不提。民主集中制受到嚴重的損害，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確實是「大躍進」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然而，問題的根源恰恰首先來自中共中央核心，就在毛澤東身上。自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以來，乃至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都是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的集體領導之上，獨斷專橫，聽不得不同意見，大搞個人崇拜。上梁不正下梁歪，全黨及全國各地的民主集中制才遭到嚴重的破壞。毛澤東在檢討這一問題時，對自己沒有任何的反思與自省，沒有一個字的自我批評，而是將批評的鋒芒指向全國省、地、縣三級黨委的負責人，聲色俱厲，神情憤慨。從這裏又一次暴露了毛澤東的只說不做，理論與實踐脫離，對別人一套，對自己一套的虛僞性。

毛澤東如此作法，還有轉移目標的用意。毛澤東了解到，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全國各地上下級之間，各級黨委內部之間，矛盾十分尖銳。尤其是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爲了完成任務指標，對下面採用高壓政策，其他幹部敢怒而不敢言。毛澤東在講話中對第一書記的指責，如同火上加油，將各地的矛盾挑開了。毛澤東還說「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果然，毛澤東的講話在與會代表之中反應強烈，各地代表紛紛向「第一書記」開炮，代表們幾年來的怒氣、怨氣，都發洩在「第一書記」身上。而毛澤東成功地轉移了衆人的鬥爭鋒芒，站在一邊乘風納涼。

至於「認識客觀世界」，那是一個無休無止的過程，正是「活到老，學到老」。因此，由於未認識客觀世界而犯的錯誤，一般都會受到寬恕與原諒。毛澤東正是利用人們的這一弱點，在大會上提出這個

問題，避實就虛，轉移人們的注意力。

至於最令全體與會者矚目的毛澤東的自我檢討，毛澤東說：

> 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許多中共的領導人及北京出版的書刊，都不約而同地將毛澤東的這次自我批評說成是「誠懇的」，「眞誠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就說「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其實，毛澤東的自我檢討是膚淺的、虛僞的。北京的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研究權威廖蓋隆就認爲「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錯誤的認識，只是初步的，不能說是徹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比毛澤東深刻。」（見張素華等著《說不盡的毛澤東》上卷四五一頁）

如果是從總結經驗教訓出發，毛澤東應當詳細而具體地講出自己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在那些方面犯了錯誤，根源何在，造成了甚麼後果，今後應如何避免等等。然而毛澤東沒有這樣做。

很顯然，毛澤東的此番表白，只是爲了向全黨交待一下。由於只是「交待」，而不是「檢討」，因而只是籠而統之，一筆帶過，既沒有具體事實的羅列，更沒有深入詳細的分析。

既使是應付了事式的「交待」，毛澤東是不是「眞誠」的呢？

將毛澤東由衷地讚賞林彪的講話同他關於承認錯誤的話作一比較，不能不使人感到這番話的虛僞——毛澤東的內心裏並不認爲自己在「大躍進」中犯了錯誤，「三面紅旗」並沒有錯，毛澤東的檢討只是欺騙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衆的門面功夫。

「三面紅旗」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這麼嚴重的災難，死了那麼多人，作爲發動和直接領導這場運動的毛澤東，竟然沒有任何的悔意，毫不負責任，不知道此時此地的毛澤東，國家和人民在他的心中還有多少的份量，還有多少「爲人民服務」的氣味。

六、毛、劉結怨

「七千人大會」是建國後以劉少奇爲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毛澤東爲首的錯誤路線的一次重大較量，在中國現代史上佔重要的地位。

劉少奇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兩個「三七開」，表現了他的勇氣和膽識。其實，兩個「三七開」只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三年災難的一些表象，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然而薄一波說這是「難能可貴的，沒有大無畏的革命勇氣，不可能提出這種實事求是的意見來」。（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〇二五頁）吳冷西也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膽識、卓識和韌性」。（見《實事求是的榜樣》）劉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正是「一人之下而億萬人之

上」。既使如此，劉少奇要說一些公正的、比較客觀的話，亦需要「大無畏的革命勇氣」，需要「非常的膽識」。當時中國政治的黑暗，可見一斑。

格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劉少奇沒有，也不可能對「三面紅旗」的指導思想進行揭露與批評，更沒有對毛澤東的錯誤路線進行清算和批判，失去了一個爲國家爲人民除惡務盡，減少和消除禍患的機會。中國人民和劉少奇本人，都爲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劉少奇不但沒有除惡務盡，反而多方維護毛澤東。劉少奇在《書面報告》中不但沒有提及毛澤東的任何缺點錯誤，還將毛澤東描繪成正確的代表，抗災救難的英雄。爲了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尊嚴，劉少奇可謂煞費苦心。

對劉少奇的一番好心，毛澤東恩將仇報。毛澤東對劉少奇沒有與自己沆瀣一氣，掩飾「大躍進」的失敗與錯誤，是心懷恨意的。由於劉少奇揭露了造成災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錯誤無所遁形了，毛澤東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損害。

經此一役，中共中央和全黨接受了劉少奇的思想，成爲全黨的主導思想。以劉少奇爲首的正確路線佔了上風，而以毛澤東爲首的錯誤路線處於下風。其標誌是，「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眞正接管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大權，國民經濟向着劉少奇等人指引的方向進行調整。而毛澤東從會後便眞正退居第二線，投閒置散到處游山玩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做了徐霞客」。不過毛澤東並不是放棄權力，而是擁權自重，當一名橫加挑剔的「太上皇」。

「七千人大會」，是毛、劉分裂的開始。對於這次挫折，毛澤東耿耿於懷。直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成功地發動「文化大革命」，才開始與劉少奇算這筆帳。用江青的話來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惡氣」。⑭

①：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②：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三九八頁。
③：吳冷西《實事求是的榜樣》。
④⑤：同③。
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⑦：轉引自鄭謙、韓鋼《晚年歲月》一六四頁。
⑧：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⑨：黃瑤《三次不死的羅瑞卿大將》二〇五頁。
⑩：同⑨。
⑪：《毛澤東文選》第六卷六二頁。
⑫：《毛澤東文選》第六卷五——七頁。
⑬：同⑩
⑭：引自廖蓋隆《關於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見《黨史探索》第一四〇頁。

第五章　對「大躍進」「傷筋動骨」的糾正

一、劉少奇：對經濟形勢要重新認識

「七千人大會」對形勢作了比較樂觀的估計，毛澤東與劉少奇都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然而，事隔不久，劉少奇及中共中央便發現，這個估計是錯誤的——最困難的時期還並沒有過去。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迫不及待地離開北京，在上海、杭州、長沙、武漢流連，做「徐霞客」。而劉少奇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落實大會的精神。大會為全黨確定了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方向，然而具體怎麼調整，計劃怎麼安排，沒有來得及研究，那麼多人在一起，也無法研究。劉少奇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這個問題。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開始舉行，會期為三天。中央常委除毛澤東與林彪不在北京外，其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都出席了會議。由於與會人數不多，只有幾十人，會場設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歷史上便稱之為「西樓會議」。

會議首先討論了國家計委和財政部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年度報告。核算下來，發現一九六二年財政收支方面將會有三十億元的赤字，細究之下，又發現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的財政預算，每年均有赤

字，而且逐年增加，四年合共爲一百八十億元。因此，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的趨勢不但沒有緩和，而且還繼續惡化。一九六二年如果不能徹底扭轉這種狀況，國民經濟不可能得到改善。在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猶如雪上加霜，形勢是十分險惡的。對此，劉少奇說：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要重新認識，看來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處在一種類似非常的時期。

陳雲在會上作了題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

陳雲指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對於存在着困難這一點，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但是，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他認爲：「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這幾年處於大變動中，大家對形勢自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取得認識的一致，需要時間，需要事實的證明。」「把各種不同的看法說出來，進行討論，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有利於使我們的認識趨於統一。高級幹部的看法統一，非常重要。」①

陳雲分析了當時嚴峻的經濟形勢，認爲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一九六一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糧食產量減少了八百多億斤，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減產也很多。糧食不夠吃，人民群衆肚子裏沒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這都是農業減產直接帶來的後果。

（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職工和城市人口增加過多，不僅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

（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

（四）城市的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

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

陳雲認爲，上述五點困難中，前兩點是最基本的，其他三點是派生出來的。這些問題，都是關係全國人民的大事，關係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如不採取果斷措施解決，將不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恢復，不利於市場的穩定，不利於經濟建設的開展，也將影響社會的安定。

陳雲提出了六條大刀闊斧的克服困難的措施。

陳雲的講話當即得到了「全場完全自發地長時間地鼓掌」，得到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和贊同。劉少奇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甚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②劉少奇的憤懣之情，躍然紙上。

劉少奇還說：「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劉少奇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和方針政策。」

國務院立即於二月二十六日召開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傳達貫徹西樓會議精神。到會的大多數是部長、副部長。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別作關於工業、財政問題的報告，然後陳雲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重申和發揮了他在西樓會議講話的內容。

陳雲說：「我看今年的年度計劃要作相當大的調整。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

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又說：「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現在我們面臨着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③

陳雲的講話，是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的補充和具體化，它衝破毛澤東劃下的「禁區」，實事求是地、具體地將「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擺在人們的面前。國務院的部長們一致反映，很久沒有聽到這樣實事求是的精彩報告了，認爲問題分析得透闢，解決的辦法切實可行，大家自發地報以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

會後，劉少奇主張立即以中央名義將陳雲的報告轉發全國，並要求在按語中說明：「對困難的估計，是有十分只講八分好，還是有十分就講十分好？困難有十分，只講七八分，講少了，工作被動；把困難估計夠，甚至估計得多一點，我們工作主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鄧小平說得更幹脆，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報告全都傳達，怎麼講就怎麼傳達。

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是以劉少奇爲代表的正確路線與毛澤東的錯誤路線鬥爭的繼續。在「七千人大會」上，「大躍進」造成的困難，沒有講夠，也沒有講透。劉少奇的講話只是大原則，沒有，也不可能具體地詳細地講。陳雲的講話補上了這一點。這就是陳雲被毛澤東忌恨，稱之爲「老右傾」的原因所在。

三月十二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爲慎重起見，劉少奇說：「我們這個會是通過了，可是毛澤東同志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

第二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了西樓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聽了匯報，又看了文件，表示同意將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等三人的報告批發到全國，但只限於給省、軍級高級幹部參閱。毛澤東仍然在捂蓋子，竭力掩飾自己的錯誤。

這是劉、毛分為一、二線後，劉少奇第一次專程向遠離京城的毛澤東進行請示匯報。劉少奇雖然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大權在握，但他不敢忘記中共的組織原則，不敢將毛澤東這個太上皇扔在一邊。

由此開始，便成為慣例：毛澤東經常離開北京，而且中共中央越是遇到重大問題，他就越是遠離北京；對具體事務不參與、不過問，但卻橫挑鼻子豎挑眼，諸多苛求；遇到緊急、重大的問題，劉少奇就必須千里迢迢飛到「御前」，請示匯報，獲得毛澤東的點頭、認可。毛澤東與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之間，一個像刁蠻的老太婆，另一個則像賢良的小媳婦，兩者變成十足的「婆媳關係」。

由於毛澤東定下了限制，劉少奇認為陳雲對經濟工作的意見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回到北京後，劉少奇要秘書鄧力羣組織幾個人，把陳雲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言論收集起來，編輯印發。陳雲的經濟言論編印好後，劉少奇也沒有忘記毛澤東，特地寫了一封信：

主席：

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只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

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是否還要發給

其他同志？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徵求陳雲同志意見。④

劉少奇從思想上、組織上以至輿論上，全力支持陳雲就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他深知，這是受命於危難之際，責任重大，工作相當艱巨，況且陳雲的身體又一直不大好。劉少奇親自登門看望，同陳雲促膝長談，交換意見。他對陳雲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四月十九日，劉少奇簽發中共中央通知，向全黨宣布了陳雲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決定。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的報告下發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反響很大，紛紛要求擴大傳達範圍。毛澤東不得不同意這一要求，中共中央於四月二十六日發出補充通知，將傳達範圍擴大到地、市級。

於是，以劉少奇爲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線對國民經濟（也就是對「大躍進」失敗的總結）的重新認識，打破了毛澤東的層層禁錮，成爲中共中央的主導思想，在全黨佔據統治地位。

二、劉少奇：「傷筋動骨」的調整

劉少奇等人對形勢重新認識的高潮，出現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會議上。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出席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各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共一〇五人。會議主要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於四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提出的

《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這是一次規格很高、內容又十分重要的大型會議。

然而，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工作會議。自一九五八年以來，中共中央總共召開了二十五次中全會或中央工作會議。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沒有參加這樣的工作會議。這是一種無聲的抵制和反抗。

會上，劉少奇發表了長篇的重要講話。他說：

財經小組搞了個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看來，可能還有一些指標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後，我們每年都調整計劃，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裏調，都是年初計劃高，年末調低。只有一九六〇年調高一次，從一千八百萬噸鋼調到兩千萬噸鋼，結果沒有完成。這一次又是調整指標，一九六二年的指標又是調低。同志們，是不是以後不再調低了？讓我們搞點低指標好不好？搞了這麼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以後計劃要這樣定：計劃定低一點，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按短線來平衡，不是按長線來平衡，而且要留有餘地，以便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這個高指標的尾巴，一直還沒有割掉，今年要把這個尾巴割掉才好。

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講了這麼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後大家才好講。我們這裏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

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危險性不大，但是對困難估計不够就危險了。我們多少年都是因爲估計不够而陷於被動。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够。對困難估計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⑤

與會者在發言中說：「現在困難很大，而調整的速度卻很慢，主要是因爲大家對困難的深度和克服困難的艱巨性認識還不一致。比較普遍的情況是：還有些盲目樂觀情緒和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農業有個好收成，明年就可以萬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觀望、等待，硬撐着空架子，不肯收攤子減人，又錯過了近半年的時間。如果繼續拖下去，不僅會加重困難，使以後恢復起來更加費勁，而且萬一國際上有個『風吹草動』，糧食進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設想。」有的反映：「現在還有些部門和地方對恢復農業的困難沒有足夠的認識，進行調整的決心不大，還是陳兵列馬，以爲只要有一兩個好麥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馬重新再上。這是同中央精神相違背的。」有的說：「要向群衆攤開困難。講明爲甚麼要退，爲甚麼要減，不要隱瞞。」「要有『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決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殲滅戰，同時忍痛割掉一些東西。」⑥

周恩來在會上的發言中也說：「這兩年的調整中，我們覺得，我們總是對困難估計不夠，總是希望好一點，好得快一點」。「前年經濟調整的時候，覺得很快就調整過來了，去年經濟調整也還是這樣想。現在看，這個調整時期要相當長。一般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甚至於還

不夠。糧食的恢復，總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區也許要超過五年。至於農業的全面恢復，包括經濟作物，農、林、牧、副、漁，都要超過五年。」⑦

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下決心對國民經濟作大刀闊斧的調整，不惜「傷筋動骨」。具體措施有：

（一）堅決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經下放一千萬城市人口的基礎上，一九六二年再下放一千二百萬。

（二）大力壓縮基本建設規模。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設投資由三八四億元減爲六十七億元，施工項目減少三分之二以上。

（三）縮短工業戰線，關、停、併、轉一批企業。全年減少企業一萬八千個。

（四）調動各行各業支援農業，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保證市場供應。

從「七千人大會」到五月中央常委會議，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以劉少奇爲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線領導對當前經濟困難及其原因的認識，再次衝破了毛澤東「七千人大會」定下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困難就那麼一點點」的框框，又產生了一個深化與飛躍，從而對形勢的認識更清醒，更符合客觀實際。在此基礎之上，中共中央實施的一系列有的放矢的調整措施，就顯得有力和切中要害。

然而，劉少奇的這一番努力，顯然是與毛澤東的「文過飾非」，摭摭掩掩的意願背道而馳的。「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多暴露一分，毛澤東的罪孽也就多增加一分。毛澤東不會喜歡劉少奇的這種「揭蓋子」、「掀底子」的作法，這無異是一種有意過不去的叛逆行爲。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與仇視，因此而又加深了。

與此同時，劉少奇還在政治領域進行大規模的調整，糾正對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科技的政策。以鄧小平爲首的書記處，實行「一攬子」甄別平反，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甄別平反達七百多萬人，還爲一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

經過各級幹部和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這次規模空前的經濟調整迅速取得了顯著成效。至一九六二年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糧食產量達三千二百億斤，財政收支在連續四年出現赤字之後，首次出現財政收支平衡並略有節餘；市場商品供應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也開始略有改善。至此，儘管還存在不少的問題，但經過四年「大躍進」百般蹂躪，已處於全面崩潰邊緣的中國國民經濟，才眞正走出谷底，脫離了險境。

國民經濟調整見效，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左」傾路線的錯誤與徹底破產，是以劉少奇爲代表的正確路線，戰勝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錯誤路線，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然而，毛澤東是不會承認失敗，也不會甘心失敗。毛澤東的反擊正在醞釀之中。

三、突破毛澤東農業底線的「包產到戶」

一九六〇年，災難、飢餓和死亡，像洪水猛獸般蹂躪安徽這塊在「大躍進」的年代裏曾經「左」得出衆的土地。宿縣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農民，得到鄉社的允許，帶着生病的兒子到山區養病和生產自救。他和家人開墾荒山十六畝，種上了莊稼。一年下來，除交給鄉社一八〇〇斤的糧食，還收穫口糧、種籽

一五〇〇斤，以及飼養豬鷄賣得六十元錢。

這位老農的事蹟，與周圍赤地千里、饑荒遍野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當地的農民得到啓發，紛紛要求包田耕種。一九六一年春，附近的全板等縣農民也提出了這種要求。一時間，「包產到戶」的要求如燎原烈火，燃遍江淮大地。

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是曾希聖。這位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得出奇的人物，給安徽省的人民帶來的災難也格外深重。這時，他抱着一種咎歉的心情，體恤和答應農民的要求。由於「包產到戶」自來被毛澤東認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爲了避嫌，曾希聖加以變通，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起，近全省百分之四十的生產隊，試行了「生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飽受災荒折磨的農民，爲了自救活命，也都紛紛自發地施行「包產到戶」。在湖南省、河南省和甘肅省，「包產到戶」的做法被稱爲「借地」，即借出一部分土地給農民耕種。在「大躍進」時代「左」得出格，後來卻「土地碱化嚴重，耕牛死亡嚴重，人口外流嚴重」的「三嚴重」的河南，除了借地外，政府還發給一把鐵鍬(共發放了一百萬把)、少量種籽，讓農民生產自救。當地農民稱這一措施爲「救命政策」。

在浙江、江蘇、陝西、甘肅、四川、貴州等地，也有不同程度地公然打出「包產到戶」的旗號，有的還甚至分田到戶。

「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對毛澤東的「一公(公有制)二平(平均主義)」的農業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一種抵制和反抗。自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包產到戶」的呼聲此起彼伏，持續不斷，毛澤東屢禁不止。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由於「大躍進」的失敗，各地出現災荒，「包產到戶」

一時又「甚囂塵上」。在「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將其壓下去。到一九六〇年以後，災荒蔓延至全國，「包產到戶」也就以烈火燎原之勢，遍布神州大地。

在「包產到戶」這個重大問題上，以劉少奇爲首的正確路線，與以毛澤東爲首的錯誤路線之間，發生了巨大的矛盾與鬥爭。

後來被稱爲「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幹將」的鄧子恢，是大力疾呼，提倡「包產到戶」最努力的一個。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對農村的災難，農民的疾苦最爲了解。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和思考，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鄧子恢大膽而觀點鮮明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的報告。鄧子恢說：「在農業生產力還處於以人畜力經營爲主的當前階段，這種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和責任心的」，「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強調建立生產責任制是「今後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根本環節。」

五月底至七月中旬，鄧子恢還先後應邀在軍委總後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高級黨校等單位做過長篇報告，分析近年來農業的形勢和經驗教訓，再次肯定了「責任田制」，認爲不能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幹，並一再在農村工作部內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共產黨員時時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丟『烏紗帽』」。⑧

劉少奇是支持「包產到戶」的。一九六二年夏，劉少奇在與中央機關派往農村工作的一批人員談話中，就強調「必須實行責任制」，他說：「我看實行責任制，一戶包一塊，或者一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問題是如何使責任制跟產量聯繫起來」。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包產到戶」有過一段曲折的認識。

田家英是不贊成包產到户的。一九六一年三月廣州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户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别是孤兒寡婦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淚寫了那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們説：『如果實行包產到户，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八個寡婦互助，爬也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甚麽包產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衆丢開不管，作爲共產黨人來説，我認爲，良心上是問不過去的。」信中還説，爲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户作爲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摇的方向」。田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毛澤東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毛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閲。陶鑄見到田家英説：「家英呀，我贊成你的意見。」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爲然，説：安徽搞包產到户，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

時隔一年，經過一段調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認真聽取和思考農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在私下多次對我説，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爲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户和分田到户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

田家英就是帶着這種矛盾的心情，同我一起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的。當時，陳雲也在上海，我們將三個點的調查報告同時送給他兩人。得到的反應迥然不同。陳雲讀後很稱讚，説

「觀點鮮明」。在這之前，田已將炭子冲大隊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劉認眞地看了，認爲很好。毛澤東卻很冷漠，大概沒有看，只聽了田的口頭匯報。毛對田說：「我們是要走群衆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羣衆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户就不能聽。」這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户問題的又一次明確表態。

我們從上海回到韶山，調查工作已接近尾聲。此時，包產到户在全國呈現迅速發展之勢，推行包產到户的呼聲日益高漲，成了黨內議論的重要話題。

我們回到北京已經是六月底。在北京聽到的關於包產到户的聲音，跟我們在下面聽到的幾乎一樣，不過這些言論更帶理論性和系統性。

回到北京後，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作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着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户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田問：「少奇同志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說：「可以。」劉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見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他爲慎重起見，並且希望能够眞正聽到「秀才」們的眞實意見，囑咐田不要說是他的意見。接着，田又向鄧小平報告關於起草《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的設想。鄧的話不多，很幹脆：「贊成。」田家英立即組織起草班子。他的指導思想就是：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户、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與此同時，田家英還向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得到一致贊同。

看來，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明定推行包產到户，還要通過關鍵的一個

關口，那就是毛澤東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覺得比較有把握，因爲中央常委的幾位同志幾乎都支持搞包產到户，至少是不反對；但是心裏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現在的態度究竟怎樣。他知道這樣的建議是要擔風險的，但他不顧個人得失，終於下決心，以秘書的身份向毛澤東進言。這時，毛正在河北邯鄲視察工作，田家英打長途電話要求面陳意見。那邊傳來電話說：「主席説不要着急嘛！」從這句話裏，我們已經微微感覺出毛的不耐煩的心情了。

過了兩天，毛澤東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見，地點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統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大意是：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農民，約佔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户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户和分田單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着，一言不發。這種情況，同劉少奇性急地打斷田家英的匯報，滔滔不絶、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完全不同。最後，毛突然向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爲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爲主？一下子把他問住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他毫無準備。毛接着又問：「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答：「是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毛没有表示意見。没有表態，這就是一種態度，不過没有説出來而已。

田家英從游泳池回來，情緒不大好。他説：「主席真厲害。」意思是説，毛主席把問題提得很尖鋭，使他當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澤東善於抓住對方談話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問

題，迫使對方無法含糊其詞，無法回避問題的實質，非把自己的觀點確定而鮮明的擺出來不可。

大概是第二天，毛澤東召集會議，田參加了，還有陳伯達。毛終於説話了，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搞甚麼包產到户、分田單幹(大意)。會上，毛指定陳伯達爲中央起草關於鞏固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六十條」好像有些偏愛，他多次説：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有了「六十條」，農村形勢就大不一樣。在他看來，有了「六十條」，再加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這一條，農村的問題，就調整生產關係方面來説，已基本上解決。以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是毛調整農村政策的最後界限，如再進一步調整，搞包產到户甚麼的，就認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⑨

鄧小平也是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的一個。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全會全體代表的講話中，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他說：

生產關係究竟以甚麼形式爲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衆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黄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

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够調動羣衆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現在要冷靜地考慮這些問題。過去就是對這些問題考慮得不够，輕易地實行全國統一。有些做法應該充分地照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和特殊情況，我們没有照顧，太輕易下決心，太輕易普及。（《鄧小平文選》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三〇五－三〇六頁）

陳雲也是大力支持「包產到戶」的。陳雲本是個慬愼寡言的人。但他在一九六二年夏天認爲「包產到戶」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並打算向毛澤東進言。七月初，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寫信給毛澤東：「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個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毛澤東從邯鄲回京後，當夜即約見陳雲。陳雲陳述了個體經濟與合作經濟在我國農村相當長時期內還要併存，當前要注意發揮個體生產積極性，以克服困難。當時毛澤東未表態。第二天傳出，毛澤東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就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陳雲聞訊後沉默不語。⑩

四、劉少奇千方百計維護毛澤東

在三年災難時期，劉少奇多方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威信，維護毛澤東提出的「三面紅旗」。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劉少奇在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有右傾思想的人，和彭德懷同志

講的差不多，他們說中央領導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表現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說太偏了。因此他們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絕對正確的好。他們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領導革命沒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穩。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領導呢？是沒有的。不發生一點偏差的羣衆運動，也是沒有的。

劉少奇還說：就是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他們的困難，他們所發生的問題，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所發生的後果，比我們大得多。我想，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絕不次於馬克思列寧的領導，假如馬克思、列寧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因爲沒有看到過他們，所以就神化了。從毛澤東同志領導以來，我們黨中央的領導是不是正確的領導，最好的領導呢？我想是的。對於這樣的領導，應該滿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個時期「左」一下，有一個時期就要偏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說過，矯枉過正，有一個時期就要偏一點，不偏就糾正不過來。但也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個時期對於某個問題，要有重點，強調某一個方面，強調得比較厲害一點，這是正常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毛主席講過，凡是犯路線錯誤的，他自己是不能糾正的，只有別人來糾正，就是要把那個領導推翻。所以，一個時候的、範圍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如同飛機駕駛員、輪船駕駛員，他那麼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駕駛員。

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一方面提出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大力疾呼要堅決糾正錯誤。另一方面又說「我們的一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總路線」。⑪

「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政策、具體工作中犯了錯誤」的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及二月二十一日的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一再地重申。

劉少奇作爲「旗手」，維護「旗幟」的威望是他的責職。劉少奇用心之良苦，處處可見。正是劉少奇的百般維護，使得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得到維護，得以逃過被徹底批判和清算的命運。

然而，劉少奇如此良苦用心，並沒有令毛澤東滿意。對於劉少奇的這些許許多多的維護，毛澤東從未作過甚麼表示，更沒有只字片語的讚揚。與對林彪講話的那種由衷的讚賞相比，眞有雲泥之別。

爲甚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劉少奇雖然是「旗手」，但也是一個有起碼良知的革命家。面對着「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劉少奇不能昧着良心，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硬說毛澤東「沒有錯誤」。劉少奇還不至於厚顏無恥到此地步。劉少奇是在承認「犯了錯誤」的前提下進行辯解的，於是，「不是路線錯誤」，是「具體政策」上的錯誤，「左」一下、右一下是正確的領導之類的話便出來了。毛澤東並不欣賞劉少奇的這種說法，「具體政策上的錯誤」畢竟也是錯誤，毛澤東不願意聽到這些話。而且一「左」一右即是搖擺不定，容易與「一貫的，長期的」聯繫起來，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這方面，林彪可就高明得多，也「厚顏無恥」得多。林彪不僅明言毛澤東沒有錯誤，是下面把好經念歪了，而且從歷史上說明毛澤東是一貫正確，「八九不離十」。林彪的講話「媚力」十足，荒謬而不符合事實。然而毛澤東卻更加中聽，直是「說到心窩裏去了」。因此「水平很高」的讚語便出來了。

這一件事，深刻地反映了毛、林、劉三人的內心世界：毛澤東的虛僞、林彪的媚骨與劉少奇的忠直。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維護的不滿，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講話可以看得出來，她說：「劉少奇

誣蔑毛主席的領導是『一左一右的領導』」，又說「劉少奇開修正主義的飛機，一左一右地飛向莫斯科」。⑫

劉少奇絕沒想到，他對毛澤東的煞費苦心的維護，換來的卻是毛澤東夫婦的仇視與自己的厄運。

---

①：引自陳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見《陳雲文選》第三卷。

②：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〇四六、一〇五二頁

③：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見《陳雲文選》第三卷

④：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三八五頁

⑤：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見《劉少奇選集》下卷。

⑥：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四二一頁

⑦：同上

⑧：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〇八三頁

⑨：逄先知《毛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六四——六五頁

⑩：同⑧。

⑪⑫：同⑥，四七七——四七九頁

第六章　毛澤東的反擊：「階級鬥爭天天講」

一、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形勢：兩種前途的選擇

一九六二年夏天，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順利地進行，全黨全國都投入這一偉大的鬥爭中。然而，人們感覺到，北京政壇上的這種景象，似乎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因爲中國政治的「風眼」——毛澤東，顯得異乎尋常的沉默。

經過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月盧山會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以及「西樓會議」幾個回合的較量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各自的陣容都亮開擺明了，在對形勢的估計、對「大躍進」以來成績與錯誤的看法、對造成災難的原因、對「三面紅旗」的評價、在彭德懷問題上的觀點、對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廣度，以及人民公社問題、包產到戶問題、甄別平反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等等問題上，兩人的分歧深如鴻溝，可以說相同點已經微乎其微了。

如果說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是不滿意的，那麼對「西樓會議」和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則是憤懣加上不安了。劉少奇所領導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令毛澤東感到巨大的威脅。

首先，對困難形勢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實際的估計，在客觀上無異是對毛澤東「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批判；對困難形勢認識越嚴重，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得越深刻，毛澤東所要擔負的罪責也就越沉重。而調整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實質上就是對「三面紅旗」的否定，調整的措施越多、越廣、越深入，對「三面紅旗」的否定也就越多、越廣、越深入。作爲久經考驗的政治家，毛澤東和劉少奇都不會不了解到這一點。

例如，取消供給制，解散食堂，將基本核算下放到生產隊，實際上使人民公社遠離了毛澤東所欣賞的「一大二公」，變得面目全非，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了五七年高級社的水平。而「包產到戶」如排山倒海般不可遏止，則已經是接近對農業合作化的否定了。甄別平反如一風吹，不但是對五八年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否定，也是對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反對意見的肯定；至於對知識分子的「脫帽加冕」和對科學、文化、教育政策的調整，實質上也是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的否定。雖然劉少奇等人還在堅持「三面紅旗」，但在實質上，「三面紅旗」已成爲空殼。

更有甚者，調整的深入使人們不再滿足於對「三面紅旗」的懷疑，而把反思的視野擴大到一九五八年以前，甚至是建國初期的歲月。其代表人物便是鄧子恢，他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次講話中說：「一九五八年以來問題很多，但事實上毛病不是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合作化以來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他又說：「爲甚麼互助組時期最好呢？那時的經營管理是個體所有，彼此互相分工，農民積極性很高。」這種將一九五八年的錯誤，同三大改造時已現端倪的「左傾」急躁情緒聯繫起來的，肯定不只鄧子恢一人。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擺在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兩種前途：

其一，是讓調整工作繼續深入發展下去，其結果將必然是觸及面越來越深廣，最後導致「三面紅旗」全面、徹底的被否定，而且還追朔根源，上綱上線，將建國以來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全部否定，使中國按照劉少奇指引的方向前進和發展；

其二是，對正在進行中的調整工作，進行有力的干擾、打擊，雖不能令其半途而廢，也起碼要扭轉其趨勢，改變其方向，不能按照現有的軌道繼續發展下去。也就是說，中國還要遵循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繼續走下去。

中國的這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斗爭，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從客觀的形勢來說，優勢在劉少奇一邊。在當時的情形下，只要劉少奇略做鼓動，振臂一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都會有大多數人站在劉少奇一邊，集合在劉少奇的旗幟下，雖不致於將在革命戰爭年代立下不朽功勛的毛澤東扔進大牢或殺頭，但起碼也可以迫使毛澤東退居「名譽主席」，用組織形式確定他不得過問朝政，使毛澤東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並清算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使中國不但可以避過另一場劫難，而且可以進入一個嶄新的健康的發展時期，中國現代史將要重寫。劉少奇如果在一九六二年採取措施結束毛澤東統治的時代，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於黨、於國、於民，均是功莫大焉，而他自己也將與馬、恩、列、斯、毛並列，名垂青史，而不會像後來那樣，落個殺身之禍的悲慘命運。

這一點，劉少奇是應該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建國後毛澤東實行農業社會主義路線，給中國帶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尤其是「大躍進」這樣全局性的錯誤，比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爲嚴重。而據毛澤東自己說：凡是犯路線錯誤的，他自己是不能糾正的，只有別人來糾正，就是要把那個領導推翻。

劉少奇應當像當年遵義會議一樣，結束毛澤東的錯誤統治，這是歷史賦予劉少奇的使命。可惜劉少奇辜負了這項使命。劉少奇沒有乘機結束毛澤東的統治，固然表現了他的正直、忠良的品德，但這也恰恰是他在政治上所犯下的一大錯誤，表現了他欠缺堅定的政治原則性，表現了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劉少奇自己就沒有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解脫出來。爲此，中共、中國和劉少奇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劉少奇和中國，都錯過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對劉少奇和中國來說，這都是極大的損失和不幸。

一九六二年夏天的形勢，毛澤東不會不清楚。爲了維護自己的權勢地位，毛澤東不能讓劉少奇領導的調整工作繼續下去，毛澤東必須反擊。

毛、劉之間的新的一輪鬥爭很快到來了。

二、北戴河會議：毛澤東突然襲擊

劉少奇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到北戴河，準備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而沒有出席五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則已於七月二十日先期到達，好整以暇地等着劉少奇的到來。

於八月六日開始的北戴河會議，是五月北京中央工作會決定召開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重點是討論和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

決定》等一批文件。也就是說，會議的主題是調整經濟工作。然而當時中國的政治氣候，正處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分岔口上，以劉少奇爲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毛澤東爲代表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正在進行較量，劉少奇雖無傷虎意，毛澤東卻有害人心。於是北戴河會議便成爲毛澤東向劉少奇反攻發難的機會和場合。

就在會議開幕的當天（八月六日），毛澤東在發言中即離開了會議原定內容，提出了幾個既出人意料，又令人震驚的問題：階級、形勢和矛盾。

關於階級，毛澤東說：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應？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關於形勢，毛澤東說：

形勢問題，也要算一算，國際問題，究竟是甚麼情況。國內形勢，究竟這二年如何？有甚麼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搞好，有許多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水利等等。有人說，農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這個說法對不對？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爲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形勢問題，我傾向於不那麼悲

觀，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關於矛盾，毛澤東說：

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的說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包產到户」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單幹之風，越到上層越大。鬧單幹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餘，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幹。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對於這次講話，毛澤東八月九日說：「我在大會只出了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只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理成章。」

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重新爲會議確定了主題，爲會議定下了以階級鬥爭爲中心的基調。而劉少奇及中共中央預先定下的經濟工作的會議主題，被扔在一邊。薄一波說：「實際上，由於毛主席提出了階級、形勢、矛盾等問題，從八月六日起，會上大部分時間是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和批『三風』，只用了很少時間研究和討論工作問題。」①

果然，在八月九日，毛澤東又發表了更加令人震驚的講話。在這一天的發言中，毛澤東的第一句話

便是：「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在這個總題目下，他又講了單幹問題、形勢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總結經驗等問題，對劉少奇爲首的第一線領導，發動猛烈的批判、攻擊。

此後，在八月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五次中心小組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揷話，繼續發揮他的階級鬥爭的觀點。連同九月二十四日開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達十次之多。

很顯然地，毛澤東是向劉少奇發動突然襲擊。事先，毛澤東並沒有將他的講話內容以及改變會議主題的事情向中共中央常委會報告，也沒有向個別中央常委透露，以劉少奇爲首的中央第一線領導，完全被蒙在鼓裏。毛澤東需要的就是這種令對手毫無防範，被打個措手不及，毫無還手之力的效果。如果讓劉少奇等人事先知道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以及改變會議主題的作法，便會在常委會上進行討論和表決，不但隱藏在階級鬥爭理論外衣下的險惡用心可能被揭穿，且一旦舉手表決，處於少數地位的毛澤東的陰謀很難得逞。

毛澤東在這裏施展的，當然不是陽謀，而是不折不扣的陰謀詭計。爲此，毛澤東不惜公然違背半年之前自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個人推翻了中央常委集體通過的決定。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大義凜然地說：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各級黨委「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

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因爲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算的道理呢？」「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②

毛澤東的話猶未落地，現在便少數不服從多數，個人推翻集體組織的決定，「個人說了算」，當「霸王」了。

三、威力強大的凶器：「階級鬥爭」

毛澤東今次選擇「階級鬥爭」作爲反擊的武器，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充分表明了他不愧是一名諳熟歷史和韜略的政治鬥爭大師。在中共的政治生活裏，階級鬥爭向來被稱爲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階級鬥爭」，一個階級鬥另一個階級，自然就是敵我矛盾性質。而凡是提出「階級鬥爭」者，都是事先佔據了「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立場，而對方自然而然就成了「階級敵人」，就可以實行「專政」。因此，「階級鬥爭」向來是一件殺傷力極大的凶器，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神聖的光芒，如同皇帝所賜的「尙方寶劍」，對擁有者來說，既是最好的護身符，又是克敵制勝、所向披靡的武器。因此提出「階級鬥爭」者，永遠是整人的，而不會被整，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同時，「階級鬥爭」是一種觀念性的抽象的東西，無形無實，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說它有，它就有；說它無，它就無；說它重，它就重；說它輕，它就輕。有與無、輕與重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而且，「階級鬥爭」只是一個總題目，它的涵蓋面包羅萬象，可以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加上具體的不同的名目，用於對付不同的對象。因此，在中共黨史上，「階級鬥爭」一向被當做政治鬥爭、黨內鬥爭的工具，誰掌握了它，誰就無往不利。而毛澤東便是將「階級鬥爭」運用得揮灑自如的超級大師。

拿近的來說，例子便是彭德懷。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說：

> 廬山會議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的。③

於是，功勛卓著的彭德懷被打倒了。

遠一點的例子，是三十年代初江西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爲了打擊和鏟除與毛澤東政見不同的以李明林爲首的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毛澤東利用「前委書記」（江西中央蘇區當時最高領導者）的職權，舉起「階級鬥爭」這把凶器，根據當時當地的情況，具體命名爲「打AB團」。毛澤東搞階級鬥爭，不搞則已，一搞就非擴大化不可。「打AB團」的擴大化之慘烈，是中共黨史、軍史上所罕見。陳毅當時

任紅二十二軍軍長兼政委。紅二十二軍官兵總共三千人。毛澤東派去「督戰」的親信李韶九（時任「前委秘書」亦即毛澤東的秘書）要陳毅在紅二十二軍中「打出五百名AB團」。陳毅對此持懷疑態度，沒有完成任務，李韶九便認爲陳毅是「AB團」，險遭殺害。陳毅雖逃過劫難，他的妻子蕭菊英卻飲恨自殺身亡。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狂風掃蕩之下，以李明林爲首的江西省委主要負責人，全遭殺害，連以江西武裝力量爲基礎組建的紅二十軍，也全部遭到消滅，紅二十軍不復存在。據有關方面估計，在肅反運動中，僅紅一方面軍三萬餘人中，被殺的達四千多人，加上地方的黨政幹部，被殺人數過萬。紅軍的力量被消滅了近五分之一。後來的調查顯示，毛澤東的「AB團」純屬子烏虛有。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共黨內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顯示出撲風捉影、憑空揑造、殺傷極大的特性，造成血債纍纍，中共至今無法結案定論。

建國後，毛澤東曾多次運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打擊持不同政見者。時至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黨內處於少數派地位，又大權旁落，「階級鬥爭」更成爲毛澤東賴以安身立命的武器。

現在，中國的專家學者都將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鬥爭，稱爲是「理論上的失誤」。是「失誤」這麼簡單嗎？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便會發覺，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所做所爲，更像是一起準宮廷政變。

如果毛澤東眞的認爲當時中國的階級鬥爭很嚴重，大有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毛澤東爲甚麼不搞陽謀，光明正大地、按組織原則規定的正常的程序，先向中央常委會提出來，而要採取那種「突然襲擊」的手法呢？毛澤東的作法明顯地表現出他的心懷鬼胎，虛張聲勢，另有圖謀，是一種不正常的陰謀詭計手段。

破綻之二是：毛澤東從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一直少露面，少講話，默默籌謀反擊。經過半年的運籌，對「階級鬥爭」這個題目，毛澤東應該是已經「熟籌」，成竹在胸。然而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像七千人大會做報告那樣，將自己已經「熟籌」的意思全部地、翻箱倒櫃地說出來，而是出個題目，放一點風。毛澤東這種閃閃爍爍，顯然是在試探空氣，窺測局勢，觀察劉少奇等中央常委的態度反應。如果遇到強烈的反對，毛澤東便將退縮，否則便放鬆韁繩，勇猛直闖了。事情果然是這樣，毛澤東在八月六日出了「階級、形勢、矛盾」的題目，「露了一點意思」後，劉少奇那邊沒有作出必要的反應，似乎是毫無準備而手足無措，於是毛澤東便於第三日，即八月九日再發表講話，這一次講得更多更重，對「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提出了猛烈的批評。然而，劉少奇等人仍沒有反應，於是毛澤東便放開了手腳，大幹一場了：毛澤東在此後接三連四頻頻發表講話，對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人的批評、指責，一次比一次嚴重。劉少奇原訂的會議的主題被推翻，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主題所取代，毛澤東的陰謀得以實現。

事實上，「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出於個人的政治需要，為了反擊調整工作帶來的對「三面紅旗」的挑戰，而用來打擊劉少奇的武器。在「階級鬥爭」這個總題目下，毛澤東大批「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矛頭所向，直指劉少奇領導的調整工作。

關於「黑暗風」，毛澤東批評說：「現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使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

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又批評說：「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有勁了，怎麼辦？」

八月九日，當有人說到：「現在有人怕講光明，講光明就感到有壓力」時，毛澤東插話說：「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

毛澤東的這一番話，清楚地說明了所謂「階級鬥爭」，就是劉少奇領導的調整，觸動了「三面紅旗」，使毛澤東的威望、權勢、地位受到威脅，毛澤東感到「受壓」，因而要進行反擊。

關於「單幹風」，毛澤東批評道：「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有人似乎認爲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衆？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行了，難道說恢復就那麼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

毛澤東又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一方面是貪汚多佔，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支部書記，一方面是破產」。「有人說，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百分之四十，還有的人說全部解散搞單幹……以上談的算甚麼矛盾，我也說不清楚。概括起來，首先是承認階級，階級是存在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嘛！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贊成的。全部鬧單幹就是退到比赫魯曉夫還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這個問題要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小資產階級專政？是走赫魯曉夫道路，還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們到底走甚麼道路？大家議一議」。

很顯然，毛澤東認爲「黑暗風」、「單幹風」等（實際上是調整工作）就是階級鬥爭與階級矛盾的表現。

關於「翻案風」，毛澤東說：「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又說「近來有股平反之風，無論甚麼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眞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的，搞對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毛澤東又說：「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也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至此，毛澤東已將他的思想全盤托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否定，就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毛澤東還說：

「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爲國際上有着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的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闢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封建主義被推翻以後，都經過幾次復闢，經過了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闢的反復，如南斯拉夫就是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

國家。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闢，要提高警惕……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④

劉少奇被打個措手不及。在毛澤東的雷霆萬鈞的攻擊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達到了以下幾方面的目的：

其一是通過宣揚「全國有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假象，誇大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製造一個危機感、緊迫感，以便轉移人們對「三面紅旗」的批評與調整國民經濟的注意力；

其二是在「階級鬥爭」的大帽子下，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扭轉調整工作的趨勢與方向，制止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對「三面紅旗」的進一步檢討。毛澤東這一招十分高明。「三面紅旗」明明出錯，用通常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很難阻止人們的批評。唯有舉起「階級鬥爭」這個凶器，才能將人們嚇住、鎮住。批評「三面紅旗」成爲「階級鬥爭」的反映，誰再批評，就是「修正主義」。毛澤東的這一招果然靈驗，劉少奇等人自然不想當中國的修正主義，於是紛紛俯首順降。

其三是扭轉了毛澤東自「大躍進」失敗後所處的政治劣勢。自從「三面紅旗」失利以來，毛澤東一直處於被動的、受批判的地位。重提「階級鬥爭」不但滅了劉少奇的威風，長了毛澤東的志氣，而且還將中國政壇的主導權重新掌握在手裏，毛澤東在經濟調整中退居二線，但在政治領域卻重返了一線。

四、劉少奇再次向毛澤東屈服

到了八月下旬，毛澤東的思想已經在北戴河會議上佔了主導的地位。十分善於利用中共的組織手段爲自己謀取利益的毛澤東趁熱打鐵，希望能通過中共組織決議的形式，將自己的意見確定下來，作爲全黨的方針路線。於是，毛澤東便提出召開八屆十中全會，繼續討論「階級鬥爭」問題

至此，劉少奇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只好服從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只有一點小小的反抗，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中心論」提出了一點無關宏旨的質疑。在八月二十日的核心小組會議上，劉少奇說：

「這次會議如何傳達？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一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聯繫很廣，傳達時要聯繫到對幹部的教育問題，講好了，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這是個複雜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階級鬥爭一聯繫，甚麼問題都聯繫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產責任制，包工包產。現在實際上是研究的問題，容易劃分不清，把甚麼都聯繫到階級來分析。」⑤

劉少奇陣營的大將之一的陣雲，受到很大的壓力，在會議初期便寫信給毛澤東和鄧小平，說因身體不好，要求請假退出會議，並表示：「七月二十四日《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

決定草案，我已看過，我完全同意中央這一決定」。⑥

陳雲不但沒有參加稍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而且從此以後長期稱病休養，不問政事，時間長達十五年，直到毛澤東去世，江靑「四人幫」垮台，陳雲才再次在中國政壇上露面。

陳雲所表態同意的《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是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拒絕陳雲和田家英關於「包產到戶」的主張之後，指定陳伯達按照他的意思起草了的文件。這個文件的主題思想，當然就不是「包產到戶」，而是要「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陳雲表態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言外之意是表示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包產到戶」的意見。陳雲「繳械投降」了。陳雲的表態使他躲過了毛澤東的點名批判（田家英沒有「表態」，因而在北戴河會議上被毛澤東點名批評）。然而，陳雲是不滿的。於是稱病退會，算是一點消極的、無聲的抗議。

會後，毛澤東說：「陳雲同志的意見是錯誤的，但他有組織觀念，守紀律，是向中央常委陳述的，沒有對外宣傳，因此在會上沒有點名批判。」

陳雲本是批判「三面紅旗」較堅決的一個，但也是最早退出戰鬥的一個。作爲主帥的劉少奇也好不了多少，在毛澤東發動第二輪進攻的兩天之後，即八月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上便作了自我批評，說：「五月會議我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一是說一九六二年夏收減產已成定局，一是說單幹在全國估計已佔百分之二十。」⑦至此，在沒有經過任何抗爭，劉少奇也繳械投降了。

劉少奇的陣營全線潰敗，而毛澤東則乘勝全面出擊。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劉少奇又一次不得不向毛澤東靠攏，並且毫無保留地同意和接受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和修正主義的理論。在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九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劉少奇作了一次重要的講

話，他說：

贊成主席的講話。我們黨在革命勝利以後，在毛主席領導下，一直是比較順利的發展，但到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爲受到天災和我們工作中有錯誤，算是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困難。問題是採取甚麼態度。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克服困難，堅持毛澤東主席、黨中央革命的道路，繼續勝利前進。這是大多數同志的態度。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後倒退，單幹，這是鄧子恢同志的態度……

毛澤東插話：名義上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說是經營方式，實際上就是單幹。

劉少奇繼續說：除鄧以外，還有許多人向中央寫信，主張單幹，鄧是代表。第三種，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馬列主義領導，這就是彭德懷、習仲勛的態度。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態度。

毛澤東插話：第二種是不懂馬列主義，是屬於認識上的，過幾年一看好些，就改了……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當時在頤年堂就批評過鄧老。

劉少奇又說：單幹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社會主義大農業才能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農業才能過關。鄧老主張單幹，就是違背了最重要的兩條，因此是香花還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

毛澤東插話：可以建議，但不能採納。……

劉少奇又說：宣傳單幹優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黨領導單幹，黨就要變質了，就不是共產黨。現在我們的困難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經過了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開始

好轉，應該繼續前進，要堅持革命的道路，但宣傳還要注意一點，還要講有困難的。今年五月會議對困難估計多了一些。如果採取第一種態度，把困難估計得多一點，就沒有甚麼問題，如果採取第二種態度，估計困難太多，就會動搖社會主義的信心，喪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壞的影響。農村集體經濟可以鞏固，單幹風大，實際單幹不多，並不嚴重，只有安徽、甘肅多一些，已經單幹了的，可以重新組織起來的。這股單幹風要打下去。

毛澤東插話：有一家就一家，幾家就幾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願意的就組織起來，不願意來的就不來，也不要罵他們是走台灣的道路……將來要來還可以來，現在不要聞風而來……。

劉少奇接着說：第三種態度，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進攻的是反動的。他們希望我們犯錯誤，對我們的困難幸災樂禍。彭、高、習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說彭的信從表面看來有些是符合事實的，他就說不是反黨綱領。是綱領，綱領不能一點事實也沒有呀！有部分是符合事實的，才能迷惑人，這次信也是迷惑人，開始有些人認爲問題沒有那麼大。

毛澤東插話：提出與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

劉少奇：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反黨集團實際上是幾支反黨別動隊，人數不多，用不着全黨去對付，我們工作不要受干擾，由少數人對付他們……廬山會議上過當。

毛澤東插話：高級幹部十幾萬人，十七級以上討論一下，不要捲入這個鬥爭。

劉少奇接着提起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中說的一大段話：「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階級鬥爭沒有結束」，「在這一方面，社會主

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眞正解決」。之後，劉少奇說：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說已經解決，這是不正確的，同列寧講的不符合。

毛澤東插話：與列寧說的相反。由於國際國內因素的存在，列寧經常講被推翻的階級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比無產階級還強大。無產階級無經驗。

劉少奇又說：兩條道路的問題未最後解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毛澤東插話：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又出了赫魯曉夫。現在看起來，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時間，我經常這樣想，要經過反復。

劉少奇說：斯大林在集體化以後講誰戰勝誰的問題國內解決了，國際未解決。在這裏還是主席講得對。

毛澤東插話：我是根据列寧的說法。列寧有預見，他是在一九二四年死的，革命勝利後他有七年實際經驗。

劉少奇：斯大林不對，痳痹了自己。

毛澤東插話：後頭又出了反革命，驚惶失措，殺了很多人，有些應該殺，有些不該殺，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

劉少奇：誰勝誰負要經過長期才能解決，蘇聯、南斯拉夫、東歐的經驗都證明了，我們要接受教訓。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闢，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形式上可能不同。

毛澤東插話：彭上台也會打着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

劉少奇：誰勝誰負問題還未最後解決……

毛澤東：至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劉少奇：我們黨要從這裏取得教訓，提高警惕，以後還會有這類事情，所以必須在黨內加強教育……

毛澤東：在英國、法國，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義的鬥爭，勝利又失敗，在法國搞了好幾次，總是不穩定的。

劉少奇：要準備資本主義復闢。

毛澤東：我們要準備五代到十代，我們算第一代，共一百年到二百年。⑧

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與劉少奇一唱一合，顯得格外的親密無間。在這裏，劉少奇完全否定了自己在半年前的立場：「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以及大力支持包產到戶。劉少奇除了極力為自己說過的話圓場、辯解外，還反戈一擊，對彭德懷及包產到戶進行嚴厲的批判。不少書刊、文章都說：會上劉少奇對「包產到戶」的批判，比毛澤東還厲害。那既是毛澤東「懷柔」的兩手策略，又是劉少奇向「左」急轉的一種姿態。一個故意示人以柔，一個有心示人以剛，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兩人都向世人顯示了他們的另一面。

毛澤東利用高超的權術擊敗了劉少奇，毛澤東預期的目標都達到了。毛澤東大獲全勝。而劉少奇則再次屈服於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路線」。

八屆十中全會之前，在力量對比、時局形勢、黨內威望，也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劉

少奇不但不比毛澤東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優勢地位。然而北戴河與八屆十中全會上鬥爭的結果，卻是毛澤東大勝而劉少奇大敗。究其原因，首先是劉少奇政治上的軟弱。

劉少奇對中國的革命建設問題的認識，雖然比毛澤東更正確、更符合實際，但他的最大的弱點，是政治上的不堅定性。他缺乏一種爲眞理而鬥爭到底的勇氣，缺乏那種爲了捍衛自己正確的信念而堅定不移、不屈不撓地戰鬥的精神。一旦遇到毛澤東的壓力，他往往輕易地退縮，放棄自己的信念，屈從於毛澤東的錯誤的思想、路線。雖然劉少奇時常是出於維護中共中央內部的團結，尊重和維護毛澤東的威望，服從黨的組織原則，然而劉少奇在這方面往往做得太過分，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則性，變成盲從，愚忠，變成失去自己的方向的追隨者。這是一個政治家的大忌。在政壇上，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即使是在共產黨內部，也是這樣。「兩軍相遇勇者勝」。在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中久經考驗的毛澤東，深明此中的道理。因此，在黨內出現分歧、矛盾時，毛澤東是又勇、又刁、又蠻、又狠，寸步不讓。而劉少奇的不堅持原則，克己相讓的謙謙君子作風，必然使他處於敗勢。

造成劉少奇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旗手」這個歷史包袱的負累。「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一個「情意結」，也是毛、劉之間建立接班人關係的重要因素。自從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方針」以來，劉少奇被中共全黨確認爲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旗手，」建國後，劉少奇擔任了《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任，親自主持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四卷。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這既是一種政治榮譽、政治資本，但也是一種政治包袱。你既然是「旗手」，你就必須處處做緊跟與「維護」的楷模，就

必須做一個「忠誠的衛道士」。當「旗手」與「紅旗」本身發生分歧與矛盾的時候，「旗手」當然就必須克己、退讓，「旗手」必須遵循「紅旗」的方向，步調一致，亦步亦趨；「旗手」當然就不能有任何的有異於「紅旗」的獨立自主，乃至於不忠不敬、異心異志。否則，就是「不孝順」，就是叛逆。正是這種歷史的因素，束縛了劉少奇的思想和手腳，從而決定了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動搖性和不堅定性，決定了他在對待毛澤東錯誤路線上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劉少奇注定了永遠只能當「旗手」，而不能成為「紅旗」。

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正是看準了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這一弱點，充分地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這一優勢，挾令劉少奇跟隨他「為虎作倀」。而劉少奇的態度又影響到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毛澤東得以在中國政壇上橫行無阻。劉少奇雖然時常抱有不滿，但又身不由己，無可奈何。

在這種複雜的現實與歷史的關係之下，劉少奇要結束毛澤東錯誤路線在中國的統治，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劉少奇的失敗，以及他自己和中國人民災難性的命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中共和中國，都是一個轉折點。繼推翻八大路線後，毛澤東再一次扭轉了中國發展的方向，中國再一次失去向良性發展的機會，被推向坎坷多難、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人民不但因此遭受了無窮的災難，中華民族也失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時間。

對劉少奇來說，毛澤東為他編織的那個令他死於非命的羅網，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六十年代初期，儘管劉少奇有幾年風光的日子，但毛澤東的陰謀的羅網已經張開了，劉少奇在劫難逃。在劉少奇被毛澤

東、江青一伙折磨至死的十年後（那時候毛澤東已壽終正寢，江青也成爲人民的階下囚，中國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春天），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所撰寫的緬懷文章中，曾悲憤地訴說：「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確，劉少奇的命運是與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連在一起的，當這位人民選出來的國家主席被毛澤東、江青折磨受難的時候，廣大中國人民也正在經歷着史無前例的劫難。而那場「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便是從八屆十中全會源起的。

毛澤東在老病交加的黃昏歲月中回首往事時，曾說過自己的一生功過是「三七開」。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給毛澤東「蓋棺論定」的時候，也說過毛澤東是「功大於過」，雖然沒有明確打分，但大概是「四六開」吧。如果沒有「八屆十中全會」，或者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謝世，那麼歷史對毛澤東的評價將還會再高些，也許有「二八開」，甚至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風光了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頭，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淪。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和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着呢。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八屆十中全會之後，便再也沒有安寧平靜的日子了。自從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後，毛澤東對這個自己一手創建、六二年後被劉少奇控制的革命先鋒隊組織，是越來越憎惡，越來越看不順眼了。經過「四清運動」、「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的風風雨雨之後，到了一九六六年，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劫難，用中共元老譚震林的話來說：「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不久，中共便遍體鱗傷，在全國範圍內癱瘓了，中共的高、中、低級幹部，絕大多數都沒有逃脫被批挨鬥的折磨。而毛澤東給中共施予的這個打擊，便是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籌謀

的。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無論是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還是面臨日本鬼子的槍林彈雨，都是前撲後繼、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從沒有被敵人壓倒而癱瘓過。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竟然出現了全國性的癱瘓，而且時間長達到三、四年！

---

①：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〇七二頁。

②：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③：毛澤東《機關槍與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④：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⑤：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心組的發言，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

⑥：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⑦：同上一〇七五頁。

⑧：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五一三——五一七頁。

第七章　從貌合神離到分道揚鑣

一、毛澤東的假想敵：劉少奇與修正主義

就像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一樣，當彭德懷尖銳地指出，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左」傾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以後，毛澤東就反過來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資產階級動搖性」的表現，是「右傾機會主義」，並且把彭德懷打倒。在一九六二年，當劉少奇對「大躍進」的「左傾冒險主義」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對「三面紅旗」表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以後，毛澤東也反過來指責說這是「右傾」，並冠以現代化的稱呼——「修正主義」。

在「七千人大會」上，爲了表示對劉少奇的不滿與憤怒，毛澤東在講話中突然提出了修正主義的問題，與整個會議的反「左」基調相左，十分令人注目。毛澤東在講了一大通民主的必要性之後，話鋒突然一轉，說：「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甚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爲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提出這些警告，是針對誰的，意圖是甚麼呢？一九六七年二月（這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

「我們黨內鬥爭，多年來沒有公開化。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就看出問題來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法西斯式國家」。毛澤東矛頭所指是劉少奇。

就是從這時起，毛澤東已經將劉少奇視爲假想敵，並置於瞄準圈內。

「修正主義」是毛澤東新的政治武器，它的出籠，大有來頭。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前後，毛澤東一邊倒，以蘇聯爲師，以斯大林爲師。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便成爲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人師法的金科玉律。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裏，沒有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創立的一套社會主義的模式，主要有四點：

一、經濟上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集體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上層建築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二、是統一的中央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

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商品經濟只限於消費領域，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生產中不起調節作用；

四、是社會主義越深入，階級鬥爭就越尖銳。

這就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基本內容與特徵。

斯大林模式中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吻合的。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向來是不盲從，不教條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然而，對斯大林的模式，毛澤東卻奉若神明，照搬照抄。

一九五六年蘇共反斯大林後，毛澤東也對斯大林模式作過檢討，發現其某些枝節的弊病是片面注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把農民挖得太苦，權力過分集中，經濟成分過於單一等等。然而，毛澤東的

這些科學的、理智的檢討，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地就被他那頑固而強大的農業社會主義世界觀所吞沒了。毛澤東與蘇共及赫魯曉夫產生嚴重的分歧。赫魯曉夫不僅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在蘇聯實行經濟、政治改革，搞「自由化」，這與毛澤東「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毛澤東認爲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挺身捍衛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模式不但沒有被觸動，反而被毛澤東發展了，如「消滅資產階級法權」，「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等，毛澤東不但沒有跳出斯大林的模式，而且越走越遠了：按照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他認爲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還不乾淨，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以及所實行的「高薪制度」，可以滋生出「新的資產階級」。毛澤東要建設更加「純潔」、「平均」、「完美」的社會主義。毛澤東不但比斯大林更「左」，而且更「空想」。

毛澤東堅持斯大林模式與堅持自己的農業社會主義是統一的。在國際上赫魯曉夫以及南斯拉夫的鐵托反對斯大林而被毛澤東打成「修正主義」；在國內，劉少奇對「三面紅旗」（也就是農業社會主義）的批評，也就被毛澤東打成「修正主義」。這就是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提出「反修防修」，並將它作爲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主題的背景。

「反修防修」的中心問題，是防止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在中國重演。因此，毛澤東最關切的課題，是防止赫魯曉夫那樣人物在中國出現。毛澤東自比斯大林，而中國的赫魯曉夫，不言而喻便是劉少奇。

隨着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的這種猜疑越來越深，越來越強烈。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只是提「修正主義」，到了六四、六五年，毛澤東便反復講「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到六六年，毛澤東就直指「睡

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在劫難逃了。

二、「四清」運動··毛劉聯盟分裂

毛澤東不是善男信女，所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當然也不是「花拳綉腿」。毛澤東需要製造一種新的形勢，用於衝擊劉少奇領導的調整經濟工作，轉移全國人民的注意力，並造成將劉少奇拉下馬的政治環境。這就是「四清運動」。

劉少奇被委任爲領導全國運動的總指揮。他不明了毛澤東的內在玄機，相信毛澤東的「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眞誠地追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表現得比毛澤東更激進、更左，將敵情估計得過分嚴重，各個試點縣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實行大兵團作戰，搞秘密紮根串連，打擊面過寬，人人過關，打人、體罰及自殺、逃跑事件屢屢發生。運動出現了擴大化的現象，被毛澤東批評爲「形左實右」。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討論劉少奇提出的關於「四清」、「五反」運動中的幾個問題，並討論起草新的文件，即《十七條》。在這個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終於爆發了。

毛、劉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毛澤東認爲前一階段運動的具體做法過「左」，認爲「四清」工作隊集中大堆人員是搞

「人海戰術」；不依靠群衆，紮根串聯，結果「冷冷清清」，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毛澤東強調要依靠群衆，清少數人，有則清，無則不清。不可打擊面過寬，要把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解放。特別是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員群衆。

很顯然，在運動的具體做法方面，劉少奇是「左」的而毛澤東是「反左」的。

其二是，在運動的指導思想方面，毛澤東卻是「左」的，而劉少奇則是不贊成和反對「左」的。在運動的性質及主要矛盾和鬥爭對象等問題上，毛、劉兩人出現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衆對他們不怎麼樣。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們頭上，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問：怎麼講主要矛盾呀？

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嘛，五大領袖嘛，你五大領袖不是當權派？

劉少奇講：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多種情況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場、經濟、組織上四不清，他們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的地富當了權的，還有已經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壞分子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甚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還引用杜甫「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詩句，說明就是要搞

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衆就怕搞不了大的。「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着手不行。根本問題在這裏。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還說過：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個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①

毛澤東結合南斯拉夫和蘇聯的「修正主義」，先後提出了中共黨內有「官僚主義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官僚資產階級幹部」，現在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步步緊逼，不斷升級。「反修防修」背後的殺機逐漸暴露出來了。

劉少奇不會看不到毛澤東的殺機。因此他不同意毛澤東的「走資派」的提法，認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稱作爲一個派，人數就太多了。因而提出：運動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有人還說有兩類矛盾交叉。情況很複雜，還是有甚麼矛盾就解決甚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甚麼都上升爲敵我矛盾。

毛澤東堅持與強調，首先要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派。

劉少奇說：還是有甚麼問題就解決甚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毫不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張時任煤炭部部長——作者注）

本來已經是弩張劍拔的空氣，突然凝固了。會場上一片寂靜。②

針對會議上劉少奇等人對運動性質的幾種提法，即「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或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毛澤東加以嚴厲的批評：「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甚麼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甚麼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

叉的教育運動。一九六二年，北京一個月，北戴河一個月，搞出一個公報，就是講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搞那個資本主義。」毛澤東又說：「從七屆二中全會以來，一直是講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從杭州會議以來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甚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還說：「不說是甚麼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甚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甚麼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甚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③

會議上毛、劉發生的爭論，有一次是毛澤東正在發言中，劉少奇插話而引起的。毛澤東認爲劉少奇這是不讓他講話，滿面慍色，爭辯了幾句後，便猛吸着煙，沉默不語。加上會議開始之前，鄧小平以爲是一般的會議，曾好意地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於是認爲鄧小平不讓他參加會議。

第二天，毛澤東手持兩本小册子來到會場，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本是《中國共產黨章程》。毛澤東揚着手中的小册子說：「我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接着，毛澤東便尖銳地批評劉少奇。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人海戰術」，其實是毛澤東同意的。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了《關於集中力量進行城鎮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建議》，說「各個縣分別搞時，一是缺少辦法，一個是縣委同下邊犯錯誤幹部有牽連。因此，建議把各縣

工作隊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一個縣可集中工作隊員上萬人，聲勢浩大。省地機關派工作隊，上下左右同時清理……」。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批復劉少奇的信說：「少奇同志：（對建議）覺得很好，完全贊成，今天（十八日）即與中央各同志商意（議），照此辦理，迅速實行。」④

然而，不到半年後，毛澤東便批評這個他當初「完全贊成」的「人海戰術」，說「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麼打，集中一萬五千人搞一個縣，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⑤這是毛澤東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另一例。

毛澤東與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還猛烈批判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參加了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的「四清運動」。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報告，介紹了工作隊進村後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進行對敵鬥爭的一整套做法，後人簡稱「桃園經驗」。劉少奇與陳伯達主張將王的報告印發各地工作隊。八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對此事批示道：「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並「請小平同志辦」。

據王光美說：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推荐給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勵表揚我，還在中央會議上表揚了劉少奇，鼓勵我到各地去講」，「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後十條》（草案）」。⑤然而劉少奇照辦後，毛澤東卻猛烈批評劉少奇是「極左」，「形『左』實右」。這是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又一例。

從毛、劉的分歧與爭論中，我們可看到，毛澤東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是反「左」的，但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和鬥爭對象等指導思想上，又是極「左」的。而劉少奇則相反。會議最後否定了劉少奇搞

的十七條，而通過了按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二十三條》。一方面《二十三條》糾正了許多「左」的偏差，在微觀上反「左」。但另一方面又認爲中國存在着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並必然要反映到黨內；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走資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而支持走資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有的甚至在中央。這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共的各級領導人，是階級鬥爭擴大化，實際上是在宏觀上的極「左」。

爲甚麼會出現這種顯然是不協調、不正常的矛盾現象？

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理論和發動「四清」運動，是打着「反修防修」的外衣，行打倒劉少奇之實。千方百計把鬥爭的矛頭引向劉少奇以及劉少奇控制下的黨政權力系統，目的在於摧毀劉少奇及其權力系統，奪回失去的權勢。甚麼運動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派」，走資派的支持者有的在中央等等，都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計謀。因此在這些方面，毛澤東顯得格外地「左」，格外的高調，出招狠重，具有極大的殺傷力。

如果確實是「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毛澤東應當像劉少奇一樣，針對基層採取嚴厲措施。然而，在具體做法上，毛澤東不願讓基層組織受過大的震蕩，從而影響與轉移了鬥爭的主要目標。因此毛澤東反對劉少奇的「左」，在《二十三條》中做了許多糾「左」的政策規定。毛澤東對基層寬鬆的同時，卻接三連四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說明了毛澤東鬥爭的重點不在基層，而是在中央，甚麼「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通通是假象。這就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四清運動」乃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虛，是掩人耳目的煙幕，打倒劉少奇才是實。

這就是毛澤東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出矛盾性的原因所在。

搞清楚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毛澤東大搞階級鬥爭及發動「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如北京的專家學者所說爲了「反修防修」，因而僅是「在理論上犯了錯誤」，還是爲了打倒劉少奇，至今仍是懸案。澄清上述事實，人們就可以衝破毛澤東製造的假象，了解到他的眞正用心：爲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大動干戈，妄顧國家與人民的利益，驅使幾億人民爲他効命，發動了那麼大規模的運動，造成了那麼嚴重的後果，此情此罪，在古今中外是空前絕後的。對此人民與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另一個證據是，自從一九六五年夏天以後，毛澤東就不再注意這個對「反修防修」且有重大意義的「四清」運動了，致使這個運動虎頭蛇尾，不了了之。薄一波說：「從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開始，毛主席對這場運動已經不太感興趣了，……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各地的四清運動已無法搞下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⑥

至此四清運動在全國只搞了三分之一。

會下，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代表中共中央找劉少奇談話，說：局面已經非常嚴重了，千萬不能跟毛主席發生矛盾，你們兩個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你要多考慮，對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

接着，開了一次中央生活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檢討，說：打斷毛主席的講話，是對毛主席的不尊重。

毛澤東說：不是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不共戴天的地步。維持了三十年之久的毛劉政治聯盟，終於分崩離析。

這次工作會議，是中共現代政治史的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與劉少奇爲首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人徹底決裂，並給他們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就是在這個時候鑄定的，而「文化大革命」這個怪胎，就是在這個時候種下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回答斯諾提問的「你甚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一時，說道：「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毛澤東的「當場劉少奇就反對」之說，是與事實不符的。曾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及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於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在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問題時說：「毛主席一九七〇年對斯諾的談話，是在世界上發表的。毛主席說，一九六五年一月，劉少奇反對『走資派』的提法。其實，劉少奇沒有直接反對，只是說，有人說，有兩類矛盾的交叉。像這樣的問題，不講不清楚，但都講又太繁了。」⑦

劉少奇「鎮壓學生」的「罪狀」，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後才發生的；「叛徒、內奸、工賊」的大帽子也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後才按上去的。那麼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時，毛澤東憑甚麼要打倒劉少奇？僅憑劉少奇不同意「走資派」的提法？毛澤東的理據是何等的薄弱。在這裏，沒有任何的劉少奇對中共、國家與人民的不忠，有的只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見，僅此毛澤東便要將黨的第二把手、國家的主席「搞掉」，毛澤東的專橫跋扈及以私利作爲依歸，在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的這些所作所爲，自然不能當作是「馬列主義」的，至於是甚麼主義，讀者可自評論之。

---

①④⑤⑦：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六〇三頁、五三九——五四一、六〇四、六〇五。

②：見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二〇六頁。

③⑥：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一三〇頁。

第八章 劉少奇風貌

生活中的毛澤東，喜歡吃辣椒、吃紅燒肉，愛好游泳和古典詩詞……由於出的書多，人們對這些都耳熟能詳。

然而生活中的劉少奇是甚麼樣的呢？他的愛好、飲食起居是怎樣的呢？至今人們所知甚少，似乎是個謎樣的人物。

一、融化在黨組織裏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克對劉少奇有以下的描述：「劉少奇是本書研究的主要人物中特徵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那些領導人物像周恩來、鄧小平及北京市長彭眞，甚至和毛（澤東）一樣，都有着強有力的個人色彩。但是劉少奇似乎緘默到了靦腆，謙虛到了不出頭露面的地步，一個受到組織大於個人原則教育的人，以至他的個性消失了」。①

在中共的高層領導中，有幾位「專家」：朱德是軍事專家，陳雲是經濟專家，周恩來是外交專家（建國前是統戰專家），而劉少奇則是公認的黨務專家。由於劉少奇長期主管中共的黨務工作，又撰寫過多篇重要的關於黨組織建設的著作，因此在一般中共黨員及民衆的印象中，劉少奇成了中共黨組織的

化身，他與黨早就合而爲一，融爲一體，他屬於黨，黨也屬於他。黨的事業，就是他的事業，而他的事業，也就是黨的事業，黨的生活也就是他個人的生活，離開黨的活動，幾乎就看不見他個人的存在。一提到黨，人們就會聯想到劉少奇，正如一提到紅軍，人們就會聯想到朱德一樣。

劉少奇自從加入中共以後，五十年來，無論是職位高低，也不論是身爲一方諸侯還是出任國家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都能自始至終自覺地將自己置於黨組織之中，他既是黨的領袖，又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尊重組織，尊重集體，尊重同志，堅持民主，是他的最大特色。

早在一九二六年，劉少奇在《工會代表會》的序言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工會的權力，應該十分集中，才能奮鬥；同時又一定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納大多數人的意見，不致爲少數人的包辦，變成專利。所謂民主集中制，就是工會的權力集中在大多數人的會議上，不是集中在個人身上，即凡事須經過大多數人的會議決定。②

這是見諸文字的劉少奇對於民主集中制的第一次說明。劉少奇對民主集中制的認識，要比毛澤東早得多，深刻得多。劉少奇一貫強調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反對黨的領袖個人獨斷專行、將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認爲這種現象是社會上特權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這種人是站在黨員群衆之上，而不是結合於黨員群衆之中；他們是站在黨的組織之上來命令黨、支配黨，而不是站在黨的組織之內來服從黨，受黨的支配，接受黨員及其代表機關的監督。劉少奇認爲，領袖的地位必須在黨組織之中，不應也不能在「黨之外」或在「黨之上」，他能領導別人，亦能接受別人的領導。如果某一領袖拒絕接受黨組織的決議，拒絕黨員及其代表機關的監督，那他就不應也不能是黨的領袖了。

劉少奇是這樣提倡的，也是這樣模範地執行的。

一九三二年，劉少奇受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打擊，被撤去了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降職為上海市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劉少奇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正確意見，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辯，另一方面又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出任上海工聯會黨團書記時，不畏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積極投身到工人運動中去，深入到滬東區紗廠從事黨的基層建設工作。

一九六一年，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中，發生了這樣的兩件事：

其一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調查中，發現公共食堂存在許多問題，全大隊一千多口人，擠在十五個公共食堂吃飯，大鍋飯加平均主義，嚴重的災難加幹部的多吃多佔，農民連吃飯都沒有自主權，吃不飽吃不好，群眾意見很大，紛紛提出解散公共食堂。劉少奇說：「食堂沒有優越性，這樣的食堂要解散」。劉少奇征求天華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的意見，這位「左」傾思想十分嚴重的總支書記卻說大多數人不贊成解散公共食堂，並與劉少奇發生劇烈的爭執與對抗，四下散布說「劉胡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子的」。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沒有利用職權向彭梅秀下命令，下指示，強制執行自己的意見，而是向彭梅秀說：「我作為國家主席，是你的領導，作為共產黨員，我們是同志，天華大隊的工作有成績，但問題也不少」。並建議由總支召集有群眾代表參加的擴大委員會討論公共食堂問題。③會議的結果與彭梅秀說的相反，大多數人都贊成解散公共食堂。根據大家的意見，總支作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群眾皆大歡喜，奔走相告。對農村中一個大隊的黨組織，劉少奇尚且如此尊重，其「不將自己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的民主作風可見一斑。

其二是，劉少奇在聽取中央調查組關於手工業問題的匯報時，與工作人員楊波發生了長時間的爭論。寧鄉縣城關鎮原有二十四個手工業合作社，在「人民公社」運動中，二十個轉為社辦工業，四個變

爲國營企業。所有制如此改變後，爲市場和人民需要的產品減少了，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都下降，成本上升，工人收入減少，不僅群衆意見很大，這些企業也面臨危機，急需盡快解決。怎樣解決？劉少奇認爲必須從所有制入手，由現在的全民所有制退回到原來的集體所有制，打破「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取酬，民主管理，自負盈虧，才能調動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而受到「左」傾思想影響的楊波，認爲把社辦工業退回去，恢復手工業合作社，那就體現不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和優越性，認爲只要健全領導，改善經營即可渡過難關，並從多方面進行辯解。劉少奇與楊波之間發生了爭論，劉少奇耐心地傾聽楊波的意見，也心平氣和地向楊波解釋自己的意見。這場爭論持續了兩個多鐘頭，使劉少奇原先定於二十三點離開當地返長沙的時間推遲了。時針已指向零時，楊波仍在堅持自己的意見。劉少奇說：「楊波同志，看來你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你，那好，我再給你五個月的時間，去搞兩個點，一個按我的辦法搞，一個按照你的辦法搞，然後再來總結，看哪個辦法好，群衆滿意」。會議結束時，已是凌晨一時，劉少奇即乘坐吉普車返長沙。④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少奇的意見是正確的，而楊波的意見是錯的。對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的不同意見尚且能夠如此對待，劉少的不專行獨斷的民主作風可見一斑。二十六年後，楊波撰文紀念劉少奇，越發爲劉少奇的偉大風格所感動。

與劉少奇相反，毛澤東自來是將自己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的。

在井岡山時代和江西蘇區早期，對上級機關，甚至是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東是合己意者就執行，否則就拒不執行；所到之處，對當地黨組織或發號施令，越權干涉，或越俎代庖，包辦代替，而且作風專橫。中共湖南省委曾爲此向中共中央多次告狀。而在紅四軍內部，毛澤東更是擅權而專制，與朱德、陳毅等人發生激烈的矛盾鬥爭。當毛澤東的意見得不到支持，處於少數時，毛澤東不是服從多數，遵守

黨組織的決議，而是憤然辭職，離開革命隊伍去「養病」。

受到王明路線的打擊後，毛澤東的家長作風有所收斂。然而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毛澤東的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的惡劣作風又有所抬頭，尤其是建國以後，更加「蔚然成風」，每當毛澤東的意見不被中共中央接受，毛澤東便往往個人推翻中共中央的決議、決定，將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取而代之。推翻中共「八大」路線，發動「大躍進」，就是十分突出的例子。

如果說毛澤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功地解決革命的戰略問題的哲學家，那麼劉少奇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共產黨員的具體要求，成功地構築中共組織的設計師和建築師。毛澤東不是將自己當作一名普通黨員，而是以「導師」、「家長」自居。而劉少奇雖然成爲中共的第二號領袖，但他始終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資態出現，始終將自己置於黨組織之中。

毛、劉本性差異之大，此是一端。

二、最重要的特徵：勤奮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克說：「劉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勤奮，不懈的努力把這個外表上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送到了高層地位。但是他是應該獲得這種地位的，因爲他很有天賦」。

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回憶錄中也說：「他話不多，性格內向。他給人的印象是慈祥長者，從不對人發脾氣，也不會跟你開甚麼玩笑。他的特點就是勤奮、任勞任怨，整天一聲不響地默默工作。他的

嗜好是抽煙和散步。散步時，如果天氣冷就圍圍脖或是把大衣領子豎起來，散步也是很少跟人聊天，他就是沈思寡言。」⑤

五十年代，毛澤東是中國的最高統帥，而劉少奇與周恩來便是他的左膀右臂。周恩來專管政府與經濟事務，而劉少奇則是專管黨務及政治事務。毛澤東掌握大方向和重大決策，具體事務則由劉少奇、周恩來執行。因此，在中國，工作最多、最勞碌的便是劉少奇、周恩來兩人。

爲了配合毛澤東的作息習慣，劉少奇也改爲通宵工作，每天凌晨三、四點，甚至七、八點鐘才睡覺，下午一、二點鐘起床。他起床後，秘書首先要向他報告當天有甚麼國務活動，並把他睡覺時收到的緊急文件、電報交給他，如有急需處理的要特意向他說明，提醒他先看。

處理完緊急電文後，劉少奇一般先瀏覽一下當天的幾種報紙，如果有重要文章，就選出來放到辦公桌上，準備另找時間看。之後吃簡單的早餐，接着開始辦公，或看文件，或寫東西，或找人談話，或出席各種會議，一直忙到下午七八點鐘左右，再吃第二頓飯——午飯。飯後休息一小時，八點鐘開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凌兩點鐘左右吃第三頓飯——晚飯。

劉少奇吃完晚飯後習慣散步，大約半個小時。既使是散步，劉少奇的頭腦也沒有閑着。毛澤東也有散步的習慣，這時他完全是放鬆休息，常常與身邊的工作人員談天說地。而劉少奇雖然是在散步，但思想卻仍然在緊張地工作，因此他不願聊天，只是一個人默默地走着。因此衛士們說他是「沉思寡言」，而不是「沉默寡言」。

散步後，劉少奇便把當天（實際上是昨天）的兩本大參考、外國報刊資料和從報刊雜誌上選出的重要文章放到床上，洗臉、刷牙後就盤腿坐在床上，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到凌晨五、六點鐘後，他服安

眠藥入睡。此時，已經朝霞初露，或者是旭日東升了。

在睡前的那兩、三個鐘頭裏，周恩來那邊不時有事。周恩來知道劉少奇是通宵辦公的，因此每天凌晨三點鐘左右要批出一些傳閱文件，特別是一些比較急的文件，機要室不敢延誤時間，秘書們便爭分奪秒地送給劉少奇看，如果秘書們一時疏忽而沒有送出，精細的周恩來事後必追查、批評。有時周恩來還親自來到劉少奇臥室裏交談。有一次跟着周恩來一起來的還有三、四個領導人，狹小的臥室裏擠不開，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就幹脆站着談。

劉少奇一般每日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忙時，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甚至「連軸轉」，幾日不眠不休。

中國的政壇，主軸心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要受其支配。毛澤東召集會議沒有固定的時間，有時上午，有時下午，有時晚上，有時凌晨，而且要求很急，毛澤東的秘書在通知的電話裏常說「現在就來」，有時劉少奇的汽車還沒到，「毛辦」那邊就又來電話催促。而劉少奇也一再叮囑秘書：「只要是毛主席那裏通知開會，不論我在幹甚麼，你們都要立即通知我，我們都要絕對服從毛主席那裏的召喚」。⑥

如此一來。劉少奇就辛苦了。有時劉少奇正在酣睡，被秘書叫醒後，因安眠藥正在起作用，他總是顯得很疲倦，很難受，連衛士爲他泡好的濃茶也來不及喝一口，昏昏沉沉地便立即坐車趕到毛澤東那裏。

由於劉少奇的住處離車庫較遠，等車浪費時間，劉少奇便吩咐：「如果我休息了，你們可以先要車，後通知我起來」。這樣就可以早一點趕到毛澤東那裏。

相反地，如果劉少奇有事要向毛澤東報告，總是先向「毛辦」詢問毛澤東是否在休息，如果已休息，劉少奇就決不去打擾毛澤東。

劉少奇的辦公桌，是一九四九年進入北京城後就使用的，一直伴隨着他到「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張普普通通的辦公桌，特點是寬大。桌面除了一盞台燈，一副台歷和筆墨紙硯外，全部是文件。這些文件一疊又一疊，摞得高高的，放得滿滿的，劉少奇批閱過的，很快地撤下去，而新送來的，又源源不斷地擺放上來，日復一日，周而復始，劉少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驟看上去，滿桌是文件，似乎雜亂無章。但劉少奇的擺放卻是井然有序。第一排的文件中，毛澤東和其他中央常委批的傳閱文件，都放在正前方。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文件，則放在第一排的左前方，第一排的右前方則是擺放秘書新送來的重要文件，緊急的就放在劉少奇隨手可及的第一排，依次還有第二排、第三排。劉少奇每天批閱多少份、多少字的電文，秘書們說不清，王光美也說不清。

劉少奇辦公時有蹺腿的習慣，辦公桌桌下的空間不夠高，時常碰着腿，秘書們便提議重做一張。但劉少奇不同意，提出在抽屜下的隔板上挖一個大洞，蹺起來的腿便碰不着頂上的抽屜了。秘書們認爲那樣不好看，但劉少奇說：「我要的是實用、方便，不像你們年輕人那樣講究美觀。要美觀就要重做，那太浪費了」。中間抽屜有一個大洞，那是劉少奇的辦公桌與衆不同的另一個特點。

劉少奇辦公時聚精會神，有時秘書有事進來，在他身邊站了一、二十分鐘他都沒有發覺。劉少奇要求辦公時秘書們盡量不要打擾他，中斷他的思路。因此，秘書們送來文件或取走文件，除非有必要，都盡量不出聲，放下或拿起就走，不必問他還有甚麼事。一些放在抽屜中的文電，就盡量在劉少奇不在辦

公時更換。劉少奇本來就少言寡語，加上聚精會神地工作，一天也說不上幾句話。秘書們說，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久而久之，連自己也變得沉默寡言了。

劉少奇對政務要求嚴格，精細嚴謹。對各方面反映、匯報的情況，他必問清楚來龍去脈，反復地從各個方面提出問題，盡量佔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要求秘書們向他反映情況、提供材料時，不允許摻雜自己的分析與評論，如有意見可以另外明確提出。一九五四年秋，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辦《情況簡報》，要求用樸素的語言如實地反映情況，不許夾雜個人的任何主觀評論。他說：你們的任務是向中央反映客觀情況，爲中央分析判斷問題提供依據，如果你們摻雜自己的意見，那就搞亂了客觀事實，中央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分析了。

新來的秘書上任時，劉少奇提出的要求是：「在我這裏工作，要如實向我反映情況，就是要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凡是需要我過問的事，你不能自做主張，更不能借我的名義去辦不該辦的事情。對外聯繫態度要和藹，要謙虛謹慎，禮貌待人，不能張牙舞爪，盛氣凌人。」

「另外，我這裏沒有甚麼節假日，這就需要任勞任怨，埋頭苦幹」。⑦

三、遵守紀律的模範

劉少奇自來是留長頭髮，向後梳成背頭，整整齊齊，顯得儒雅而有風度。然而，劉少奇在一九四〇年卻理過短短的小平頭。事情是這樣的：

在華中根據地的江北地區，新四軍四、五支隊跟日僞軍一連作戰三個多月，部隊傷病員不斷增加。然而當時醫務人員少，醫藥缺乏。爲此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發出號召，要求各連隊幹部、戰士理掉長頭髮。因爲留了長頭髮，在頭部負傷時包扎、消毒都不方便。但是這個命令卻執行得不好，很多平時、戰時都表現得十分出色的幹部、戰士，都捨不得留了多年的頭髮，便置政治部的命令於不顧。尤其是幹部不帶頭，命令便很難執行。劉少奇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召開了連隊政工幹部會議，要求人人都剪掉頭髮。他說：「我們很多同志參加革命時，決心爲人民服務，敢於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獻給人民革命事業，難道連推掉自己的長髮這樣的小事，都沒有勇氣和決心？……我也不例外，響應政治部的號召，把我從白區工作到現在留了二十多年的背頭推掉。希望全軍同志都這樣做」。會後，劉少奇馬上召來理髮員，把長背頭剪成短短的小平頭。⑧

在中共黨內，劉少奇是遵守組織紀律的模範。中國元老劉瀾濤說：「少奇同志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原則性、組織性和紀律性很強。他非常尊重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非常尊重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十分注意黨的團結和統一。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對重大事情的決定，都尊重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他指出：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他確實是身體力行，說到做到的」。⑨

劉少奇的組織紀律性，突出地表現在模範地執行黨的決議，不打折扣，不因個人私利與喜惡而有所選擇。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順從，也是組織紀律的一種表現，因爲毛澤東是第一把手，具有最後的決定權。劉少奇將毛澤東當作黨組織，而不是當作個人看待的。因此，在五十年代後，毛澤東多次推翻中共中央通過的劉少奇的正確意見，而代之以自己的意見。一旦組織做出決定後，劉少奇都會無條件地服

從，並模範地執行。在「高饒事件」中，毛澤東無理地要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檢查，劉少奇儘管內心不高興，但還是無條件地執行了。

四、勇於承認和改正錯誤

劉少奇還是勇於承認錯誤的模範。

一九四八年，劉少奇在河北省領導土地改革，某些地區出現了過「左」現象，搞「村村放火，家家冒煙」，對地主亂鬥亂殺，並且搞絕對平均主義，侵犯中農利益，連工商業也被「共產」。劉少奇發覺這些情況後，便明確地向華北局負責人指出：第一要緊急煞車，第二不要責備下面幹部，由他承擔責任。他一再說，工作中出了毛病，大家很緊張，不能光是指責。⑩經劉少奇這麼一說，幹部們感到壓力輕了。劉少奇還幫助幹部們總結經驗教訓，用以指導其他地區。這年夏天，毛澤東指示在晉察冀邊區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劉少奇自動對此作了檢討。

建國後，在許多大政方針上，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發生分歧，偏離了毛澤東的路線。並在許多時候劉少奇都是正確的，但在毛澤東批評了之後，劉少奇都會承認錯誤，並多次作了檢討。舉其大者，就有一九五四年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對農業合作化等問題的檢討，一九五九年八屆八中全會上關於「反冒進」的檢討，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關於「大躍進」的檢討，八屆十中全會上關於對形勢估計過分嚴重的檢討，一九六五年關於對毛澤東不尊重的檢討及一九六六年關於派工作組的檢討，同年十月關於歷史上執

行錯誤路線的總檢討。劉少奇的檢討都是眞誠的，並沒有文過飾非或推卸責任，諉過與人，過後也「痛改前非」，使自己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由於劉少奇的觀點往往是正確的，他放棄自己的觀點而服從毛澤東，從而也就是放棄了正確，服從了錯誤。儘管如此，但劉少奇仍不失光明磊落的本質。

與劉少奇相比，毛澤東在這方面就黯然失色，顯得虛僞與齷齪。

羅瑞卿大將（曾任公安部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女兒點點在《非凡的年代》一書中曾有如下的記述：

「以後（指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毛主席將父親叫去，以一種私下的場合裏問父親：『林彪的這一篇講話，你講不講得出來？』父親說：『我怎麼講得出來？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講得出來』。主席說：『講不出來，要學嘛！』……主席對父親說：『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要認眞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並要父親回北京後去找陳伯達，同他商量開出幾十本馬列著作的書目來。由主席圈定後請父親好好讀一下。

「父親回到北京後就去找陳伯達，開出了馬恩列斯著作三十本，其中還有一本是普列漢諾夫的，是毛主席定的。三十本書的目錄送交主席後，毛主席又做了指示說：軍隊中年以上的幹部，凡有閱讀能力的，都可以選讀幾本。還要父親去找陸定一同志，要他出線裝的，供高級幹部閱讀。並說：『印出線裝的，我也很想看。』

「後來，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會議上，林彪把這三十本書的事說成是父親故意以學馬列主義衝擊他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那時候，回擊的只有父親一人，而毛主席莊嚴地沉默着。」⑪

毛澤東的度量與政治品質，由此可見一斑。六十年代初對「大躍進」慘敗的檢討，毛澤東不僅缺乏

度量，表現出令人作嘔的虛僞與諉過與人，而且他對造成這麼大的損失、死了這麼多人的千古劫難毫無悔意，仍然認爲自己沒有錯，那已經是毫無黨性、毫無人性。對此，人民與歷史都不會原諒他。

劉少奇嚴於律己，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凡事自己帶頭，以身作則。而毛澤東則是說一套，做一套，對人一套，對己一套，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兩人的這種天差地別，在中共黨內形成鮮明的對照。

五、「高舉」是有原則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指控的最重要的罪狀，是「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澤東思想」。自從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以來，劉少奇是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都公認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旗手」，建國後又擔任了《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的主任。如此一位毛澤東思想的「守護神」，怎麼會變成「大反毛澤東思想」呢？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劉少奇與林彪同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而且，在中共黨內，劉少奇是最早「高舉」的一個。然而毛澤東對林彪的「高舉」特別受用，而對劉少奇的「高舉」（五十年代後）卻特別反感，最後在「旗手」（即「接班人」）問題上導致「棄劉而用林」。毛澤東對劉、林兩人的態度何以出現如此的天壤之別呢？

中共元老劉瀾濤在一篇紀念劉少奇的文章中說：「少奇同志對於毛澤東同志，是把他作爲黨的傑出領袖擁護，而不是作爲神來信奉的。他從來不相信世間有超人的聖人。他肯定革命領袖的重要作用，又

認爲任何領袖和英雄，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他反對誇張領袖的作用和把領袖神化的做法。他忠於毛澤東思想，同時又科學地解釋毛澤東思想。」

據劉瀾濤回憶，早在一九四七年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時邊區群衆寫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飲水不忘掘井人』等標語。我們晉察冀邊區下級黨組織某些文件中，也出現這樣的詞句。少奇同志說：人民貼出這樣的標語，是人民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們黨內的文件有這樣的詞句，也是表現了幹部樸素的階級感情，這是很可貴的。但是應當認識，救星不是哪一個人，而是我們整個黨。那種提法是不科學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劉瀾濤還說：「少奇同志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提高了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對我們幫助很大。我從和少奇同志多年接觸中感到，他對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是有高度的黨性原則的，是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的，三十多年前他能這樣解釋問題，是他高度原則性的表現，也是他眞正擁護毛澤東同志的表現。」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件事被說成劉少奇「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反對毛主席的罪證。」⑫

劉少奇作爲一位有高度政治修養和良好的理論基礎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除個別地方以外，基本上是基於科學，格守原則的。最突出的標誌是，在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的同時，劉少奇發表不少的文章、講話，爲這些評價設置「上限」。

正如劉瀾濤所說，劉少奇是把毛澤東視爲黨的傑出領袖，對黨和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領導人來擁護，而不是將毛澤東當做神來信奉。既然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他不會也不可能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因此劉少奇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了許多錯誤」。⑬劉少奇的這一句話，說明了他對毛澤東有所崇拜，但並不迷信。

由於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祇，因此在毛澤東犯有錯誤時，也可以反對。劉少奇說：「反對毛主席只是反對個人」，⑭並非是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劉少奇向來認爲，領袖既是領導者，也是普通的共產黨員，普通的黨員可以批評、反對，爲甚麼毛澤東就不可以批評反對？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動時，劉少奇說：「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寫了『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標語，大家要鬥他，工作組要保護他。現在看來，說這個學生是反革命的結論，材料是不充分」。⑮當時，正是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最熾熱的歲月，對毛澤東只要稍有不敬，就會被打成反革命，更何況是反對。劉少奇爲一名反對毛澤東的學生辯護，與當時瘋狂的極「左」的政治氣氛形成鮮明的對照。

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是劉少奇「高舉」的頂峰，從那以後，劉少奇很少發表那麼熱烈的讚美之詞，相反地，卻說了一些「冲淡」、「降溫」的話。

在「七大」上，劉少奇說：「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又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路線」，「它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劉少奇的這些論述，在當時出於樹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統一地位，有意突出與強調，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劉少奇的說法，未免存有偏見與片面。難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不能作爲中共的指導思想了嗎？劉少奇強調得過分，將話說得太絕了。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劉少奇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係擺法上，劉少奇作了必要的修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劉少奇向馬列學院學員講話中說：「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是

有世界歷史以來無比豐富的，世界上任何大的原則性問題均解決了，如民族問題、工人運動問題、秘密工作問題等等……毛主席說，馬列主義是普遍眞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馬克思的理論都可以學……有的人認爲，何必學這些東西？中國的書還讀不完，毛主席的書還讀不完呢，或至少先讀中國的書再讀外國的書吧！這個說法是不對的」。⑯在這裏，劉少奇不但強調要學習馬列主義，而且將馬列主義放在與毛澤東思想同等地位，這種情況與「七大」時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慶祝中共誕生四十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說：「全體黨員和幹部都應該認眞學習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理，學習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列主義原理，所闡明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學習黨中央制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學習蘇聯和兄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⑰

在這裏，劉少奇已是將馬列主義放在毛澤東思想的前面。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再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劉少奇對共產黨員僅提出「做馬克思列寧的好學生」。⑱毛澤東思想不但已失去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也不能與馬列併駕齊驅了。

在「七大」上，劉少奇曾說：「當着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着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⑲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時，在評價毛澤東在中共的革命作用時，劉少奇如此說：我們黨在歷史上犯過四次路線錯誤，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後，「我們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領導下，卻沒有犯過路線錯誤。這個歷史的變化究竟應當怎樣解釋呢？很明顯，這不能僅僅用黨的歷史長短，經驗多少去解釋」，「也不能僅僅用某個時期黨的領導者個人情況如何去解釋」。「從我們黨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

結論：黨的經驗多少和黨的領導人選對於黨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關係，但是關係更重要的，是各個時期廣大黨員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是否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總結鬥爭中的經驗，堅持眞理，修正錯誤」。㉑很明顯，到「八大」時，在劉少奇的思想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已由「最重要」降爲「次重要」，「最重要」的已不是毛澤東個人，而是黨的集體與組織。

劉少奇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對馬列學院學員的講話中還說：「許多問題列寧早已解決了，因爲（我們）未看《兩個策略》（列寧的著作—作者注），使中國革命勝利一下子遲了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前全黨都研究《兩個策略》，就可以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不致失敗」。㉒列寧的作用似乎也在毛澤東之上。

林彪吹捧毛澤東思想，最出名的是「頂峰論」和「最高最活」，即「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和「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對此，毛澤東十分受落。然而，作爲一個理論家，劉少奇是不同意這些說法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正當「文化大革命」正在發動的時候，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說：「（馬列主義）當然還要繼續發展，不是到毛澤東思想階段就爲止了，如果這樣看，是錯誤的，是機械唯物論」。㉓劉少奇的說法與林彪的說法顯然是針鋒相對。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六十年代初，就林彪的「頂峰」問題，中共中央內部發生了很大的分歧。以毛澤東爲首，還有康生、陳伯達等人，是欣賞和贊同林彪的說法的；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還有陸定一（中宣部部長）、羅瑞卿、羅榮桓（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彭眞（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耀邦（共青團中央書記）等人，是反對林彪的說法的，並多方設法抵制林彪鼓吹的那一套，羅瑞卿多次將「最高最活」從一些文件、文章中刪掉，便是一例。因此「頂峰論」和「最高最活」在「文化大革命」前並不多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在全會的公報上全錄了林

彪的吹捧經，這才開始在全國泛濫開來。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向劉少奇報告：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縣委，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必須認眞地學習毛主席及中央其他負責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對此，劉少奇批示道：「這些話不完全正確」。「這裏聯繫到這樣一個原則問題，就是我們應當向誰學習，是向黨內和黨外群衆中一切有眞理的人學習，不管他們的職位高低，還是向職位高的人學習，不管他有沒有眞理。我們的原則，只向一切有眞理的人學習，不只是向職位高的人學習」。劉少奇又說：「我贊成當前幹部和群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特別贊成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號」。然而劉少奇強調：「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現在黨內把毛澤東思想當成教條大有人在，已經不是你一個犯這樣的錯誤，黨內已有一部分幹部犯同類性質的錯誤。」㉔林彪的那一大套吹捧經中，劉少奇贊成的，只有「活學活用」這一句。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還有這樣的耐人尋味的一段：「在過去的某一時期內，某些教條主義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壞。這種人根本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一些馬克思列寧的術語，自以爲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維護他爲『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舉，還自封爲『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長式的在黨內發號施令，企圖教訓我們黨，責罵黨內的一切，任意打擊、處罰和擺佈我們的黨員。這種人不是眞心爲共產主義的實現而鬥爭，而是黨內的投機分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蟊賊！」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書於一九三九年。上面這一段話，是影射王明、博古等「左」傾

教條主義者。到一九六二年再版時，王明已流亡蘇聯，而博古亦已作古，然而劉少奇沒有作改動，照樣印出。這本來不足爲怪。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劉少奇描繪的這個形象套在毛澤東頭上，一致認爲劉少奇是在影射毛澤東。其實，這也難怪造反派和紅衛兵們，劉少奇描繪的那個「蟊賊」形象，對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們具有典型性，是普遍適用的，而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與三十年代的王明又極之相似，就像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

劉少奇與林彪的「高舉」，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有原則的，一個是無原則的。林彪的那些如癲如狂的吹捧，已經脫離最基本的事實，違反了最基本的科學原理，顯得荒誕不經，充滿了封建腐朽的氣味。而在中國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導致「大躍進」慘敗的毛澤東，失去了眞理，喪盡人心，正需要林彪這種無原則的吹捧。「大躍進」的慘敗引致天怒人怨，劉少奇不敢昧良心說毛澤東的領導沒有錯誤，但又不得不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因此只好說：「一『左』一右，有一個時期『左』一下，有一個時期右一下，是必要的」。而林彪則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事情才出了毛病，因此毛澤東沒有錯，錯的是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執行者。毛澤東對林彪的這種顚倒黑白的說法倍加讚賞，而對劉少奇的比較實事求是的「維護」懷恨在心，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事情的嚴重性不在於林彪的無原則的吹捧，而在於毛澤東衷心地欣賞這種無原則的、虛假的吹捧。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品質可見一斑。

六、拙於權術

劉少奇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不擅於使用權術，不擅於搞陰謀詭計，特別是在共產黨內部同志間的政治鬥爭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特出。

下面這個記述可以看出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特色。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劉少奇、鄧小平率領我國黨政代表團飛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三周年慶祝典禮，並出席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到機場迎接。

赫魯曉夫陪同劉少奇乘一輛吉斯車前往下榻的列寧山蘇共中央的別墅。當時，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已經開始公開化，並影響到國家關係。兩黨領導人見面已是：「有禮貌，沒熱情」了。

按照這種高級會晤的慣例，雙方不會馬上接觸關鍵性的實質性的問題，首先要在較低一級的接觸中去辯論解決，叫做留有餘地，以便最後能有所回旋。但是，互相大致摸個底，了解個基本態度還是必要的。這個摸底是正式談判所依據制定政策的基礎。

劉少奇穿着毛皮領大衣，戴一頂呢子制服帽，必要的寒喧之後，便仰靠椅背。從容自在地

凝望窗外的街景。

赫魯曉夫也是身穿大衣，頭上戴一頂灰白羊羔皮的土耳其帽，寒喧之後便有些躁動不安地一個勁轉動腕子上的手錶。按照慣例，往下該說甚麼？總不能一路無話。對，該各自通報一下國內情況了。他不像劉少奇本來就話不多。

「你看到的這些樓房都是新建的職工住宅樓。」赫魯曉夫打破沉默，報喜也報憂：「總的來說，我們的形勢很好。只有農業收成不太好，我們這裏主要是天氣的原因。」

蘇聯在斯大林時代是糧食出口國，赫魯曉夫執政後，有些急功近利，農業政策失調，開發西伯利亞又遭受巨大損失，使草場大面積沙化，不得不以黃金儲備去購買糧食，使蘇聯從糧食出口國變爲進口國。

中國當時農業困難更嚴重，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中最困難的一年。這與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有直接關係的。赫魯曉夫講完蘇聯農業生產遇到的困難，便意味深長地瞄了一眼劉少奇。

「我們也是嚴重歉收，困難不少。」劉少奇聲音不高，實實在在說：「我們也有天氣的原因，但主要是政策，我們正調整政策，解決這些政策。」

翻譯和衛士都發現，赫魯曉夫怔怔地望了望劉少奇，有點吃驚，有點意外。赫魯曉夫把困難推到「天災」上，劉少奇敢把困難安在自己頭上。勇氣和力量並不在顏色厲，口氣大，赫魯曉夫還是懂得這個道理的。

「關於這次各國共產黨會議，雖然經過了起草委員會的協商討論，仍然遺留了一些問

題，」赫魯曉夫轉入互相交叉摸底：「我們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相信中國同志能夠理解我們的立場。」

「小平同志講過了我們的意見。」劉少奇平平静静地說：「我們是帶着團結友好的願望來的，這個立場是堅定的。對尚存的幾個原則問題，我們的立場也是明確的，我們堅持。」

話不在多，雙方三言兩語已經初步探明了對方的立場和態度。剩下的戲就要在底下唱了。

西方一些蘇聯問題專家稱赫魯曉夫是「大策略家」。大策略家赫魯曉夫是這樣唱這出「戲」的：

他對米高揚和科兹洛夫講：「你們想得到一百，開價二百，而且要堅持到最後一刻，這是策略。」

第二天，駐蘇大使劉曉匯報情況：「赫魯曉夫不但堅持原有意見，而且把原來起草委員會會議本已達成協議的某些東西也給推翻了。」

劉少奇微笑着說：「赫魯曉夫如果想開好會議，就要有誠意。你也可以利用機會亮亮我們的底，哪些問題可以讓步，哪些問題不能讓步，開誠布公告訴他們。兄弟黨之間要光明正大，我們不玩心眼。」

劉曉同米高揚、科兹洛夫幾次接觸，真誠而嚴肅地把底告訴了他們。並鄭重宣佈：「我們決不會在這個立場上再退後一步。」

米高揚和科兹洛夫及時將這個情況向赫魯曉夫做了匯報。赫魯曉夫聽後一個勁搖頭。他信心十足地說：「這是策略，他們會退步的，我在日內瓦有經驗。」

日内瓦會議是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會議上要確定（越南的）停火線。按照赫魯曉夫所寫回憶録，十七度線是「我們的最高要求」，甚至「我們並未指望得到這樣的東西」。可是，具體談判時，赫魯曉夫並不是以「最高要求」的十七度線來開價，而是再向南移，提出以十五度線爲停火線，以便討價還價。這樣堅持到最後，當以十七度線爲界達成停火協定後，赫魯曉夫坦白地説：「我們是又驚又喜地喘了一口氣。」而英國人和法國人對十七度線協定也是「非常滿意」。

現在，赫魯曉夫把這種「你想得到一百，開價就得二百，而且要堅持到最後一刻」的經驗，用到了中國共産黨和劉少奇的身上。他堅信，這樣他就能得到他原來並未指望得到的東西。

於是，蘇共堅持在會上公開譴責中國共産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堅持要會議承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論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堅持要把蘇共「二十大」路線作爲國際共運的總路線。

中國共産黨理所當然地堅決拒絶了。會議開得激烈緊張，會下的活動也緊張頻繁。

當會議必不可免地陷入僵局時，劉少奇指示劉曉大使：「八十一國黨的會議開成功了，也就是中蘇關係改善的一個轉折，因爲有了共同基礎。你要相機行事，向他們透露，我願意直接同赫魯曉夫談關係和問題。」

劉曉很快便相機向米高揚、科茲洛夫透露了這個意思。米高揚、科茲洛夫又很快報告了赫魯曉夫。

到了定價的時候了！赫魯曉夫滿懷信心地來會見劉少奇。

「你們不要在這次會議上譴責中共，不要譴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這樣後果不好。」劉少奇誠懇勸說。赫魯曉夫用異常的眼光去看劉少奇：「並不是沒有人攻擊蘇聯共產黨啊。」確實，會議有些左派共產黨也尖銳地批評了蘇共，赫魯曉夫堅信這是「受中共指使」，是劉少奇的策略。

「現在會議上有些過左的思想，也有一些過右的思想。」劉少奇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講真話，「我們對於左派的合理意見是支持的，對於某些過左思想我們有我們的見解，我們要對他們做工作。但他們是處於一個特殊的鬥爭環境中，所以對他們的意見中蘇雙方都應予以諒解。會議中所出現的較右的思想，也不利於團結，這也是因爲他們的鬥爭條件和傳統思想所形成的，對他們也應諒解，多做工作……」。

赫魯曉夫沒興趣聽道理，也聽不進去。他是大策略家，也是「講究實惠」的政治家，直接了當問：「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的文件應該一致簽署，這樣才能表示團結。你們不讓步不好辦。」

劉少奇說：「要互諒互讓。」

赫魯曉夫說：「文件裏可以不譴責『派別活動』，我們二百讓一百，甚至可以寫上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這一句。你們呢？你們也得讓步。」

劉少奇說：「我們沒有說二百，我們說一百就是一百。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我們已經作了讓步，只可以照抄《莫斯科宣言》，不能再讓步。」

赫魯曉夫堅信，要一百的人肯定提價二百，商人是這樣，政治家也無例外。他堅持說：「《莫斯科宣言》對蘇共『二十大』的意義肯定不夠，八十一國會議要寫上世界各國共產黨一致贊成蘇共『二十大』對當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分析，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論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

「你們不能強迫各兄弟黨都接受你們一家的觀點。原則問題上我們一步不會讓。」劉少奇尖銳地反問：「那麼我們黨的『八大』通過了甚麼決議，是不是也可以提要求讓國際共運承認是路線呢？」

赫魯曉夫被噎住了。怔有片刻，惱羞成怒：「當年我們不願爲首，你們非要我們爲首不可。我們爲首了，你們又朝我們痰盂裏啐唾沫！」

「爲首不是作老子黨，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應一律平等。」劉少奇的平靜同赫魯曉夫的躁動形成鮮明對照。

沒談成，赫魯曉夫仍然堅信劉少奇是「想得到一百，開價就得二百」，堅持要等待中共讓步。

在這種形勢下，劉少奇請朝鮮、越南、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共產黨代表到中國大使館來，向他們闡明中國共產黨的觀點和態度：「蘇共不放棄他們的要求，我們無法在文件上簽字……」。

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在中蘇兩黨之間進行斡旋。特別是胡志明，非常焦慮，從會議一開始就不停地從中斡旋。聽到劉少奇的明確表態，他忙轉達給赫魯曉夫，並且有警告地提醒他：

「赫魯曉夫同志，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你不能讓我們的運動出現分裂，你必須使中國共產黨同我們一起在宣言上簽字。」赫魯曉夫没有馬上答應胡志明，但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了。難道劉少奇真是没搞任何「策略」？

在這關鍵時刻，劉少奇在列寧山別墅接待了蘇共領導人米高揚、蘇斯洛夫。他保持着一貫的誠實和光明正大的態度說：「剛下飛機我就講明了，我們是帶團結友好的願望來的。我們說一不二，我勸你們不要把事情做絶了。你們要不聽我們勸告，一定堅持做絶，破壞了這次會議，是要擔歷史責任的，要受到歷史的譴責。」劉少奇嚴重地加重語氣：「再說一遍，不要把事情做絶了！」

米高揚、蘇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從劉少奇身上強烈感受到一種認真、誠實、堅定的人格力量，回去向赫魯曉夫做了匯報，經過全面研究討論，終於判定劉少奇確實是光明正大，真誠相待。甚麼能讓步，甚麼不能讓步，說到哪裏就是哪裏，那種策略只能對付敵人，不能對付同志。

蘇聯共產黨終於採取了協商和妥協的態度，對蘇共「二十大」以及和平過渡等問題，同意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

文件簽署，會議成功。

劉少奇就是這樣以他的真誠戰勝了赫魯曉夫的「策略」。㉕

一九六〇年，中、蘇關係還未破裂，中共與蘇共還是「兄弟黨」，因此劉少奇與赫魯曉夫之間還互

稱同志。按照劉少奇的政治理念，同志之間應當眞誠相待，有問題要擺到桌面上來，而不應耍手腕，搞權術。於是便發生了上面的「劉少奇用眞誠戰勝了赫魯曉夫的『策略』」這一幕。

對兄弟黨的同志尙且如此，對中共黨內「自己家裏」的並肩作戰的戰友們，劉少奇的那分「眞誠」，就可想而知了。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的那天起，黨內的政治鬥爭便連綿不斷，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你死我活的。在這些鬥爭中，劉少奇表現得過分的眞誠、率直，過分的光明正大。對一個政治家而言，這是一大忌，也是一大愚。

事緣毛澤東爲中共規定的黨內鬥爭的一些原則，如：「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思想從嚴，處理從寬」，以及「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等等，從五十年代以後，毛澤東便都不遵守這些原則，而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取而代之了。爲了排斥異己，鏟除政敵，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爲了強行貫徹自己的錯誤路線，毛澤東將黨內的不同意見與思想上的分歧，都視爲「階級鬥爭的反應」，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且，爲了達到目的，毛澤東不擇手段，時常使用陰謀詭計，例如：翻手爲雲，覆手爲雨，隔岸觀火，設置陷阱，捕風捉影，羅織罪名，放長線釣大魚，虛虛實實，眞眞假假，已經沒有「眞誠」、「團結」可言。

對此，作爲一名政治家，作爲中共的第二把手，劉少奇不會沒有察覺。然而，對毛澤東的本性的陰險，手段的狠辣，劉少奇似乎就沒有足夠的認識，因而也就缺乏應有的防範。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在毛澤東已將鬥爭的性質改變的情況下，劉少奇沒

有及時地調整自己的鬥爭策略和指導思想，仍然以「眞誠」、「團結」相待。一方待之以誠，一方施之以奸，悲劇便由此而生。

劉少奇的「愚」，與毛澤東的「奸」，集中地表現在一九六二年後，直至「文化大革命」，毛、劉最後鬥爭的歲月裏。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受到重創。以後毛澤東會有甚麼樣的表現，將會如何動作呢？劉少奇不知道，但也沒有加以注意和防範，更沒有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措施。因此，在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當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進行反擊，劉少奇被打個措手不及，只好投降順從。重提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十分陰險的一招，然而劉少奇仍未警覺。儘管八屆十中全會上有「階級鬥爭用少數人對付」，「要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決定，但毛澤東還是在次年發動全國性的「四清」運動，當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將繩索勒緊，提出「運動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因此而與劉少奇發生激烈爭辯，毛澤東從此下決心打倒劉少奇時，劉少奇仍然相信與堅守黨內鬥爭的那一套原則，竟然沒有警覺與反應；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炮製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又肅整「彭羅陸楊」，拋出《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又直言「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的身邊」，毛澤東矛頭所指，昭然若揭。然而劉少奇還是沒有警覺和作出防範。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拋出《我的一張大字報》，數落劉少奇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四清」運動的「形左實右」，咬牙切齒地說「何其毒也！」時，劉少奇才恍然大悟。至此大勢已去，劉少奇由接班人變爲階下囚。在這一場鬥爭中，毛澤東所施用的陰謀詭計固然是高超絕倫，而劉少奇的遲鈍迂腐、後知後覺，亦令人「嘆爲觀止」。

劉少奇被罷官後，還天眞地相信毛澤東會「治病救人」，因而提出「回延安或湖南種田」。然而毛

澤東的宗旨卻是「必置之於死地，永世不得翻身」，最後安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永遠開除出黨」，被嚴密囚禁。至此，劉少奇才對毛澤東失去最後的信心與希望，悲憤地喊出：「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劉少奇在喊出這句話時，其內心不僅對毛澤東，而且也對中共黨、政、軍組織以及黨章、憲法表示了徹底的絕望，但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養育他的人民身上。

「劉少奇現象」，是中共黨史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十分悲壯的一幕。從這裏，人們不難獲得豐富的教訓與啓迪。

七、廉潔與清貧

劉少奇的廉潔與清貧，是中共領袖中最突出的一個。

先說廉潔奉公。

劉少奇經常外出巡視、檢查工作，五、六十年代，每年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不在北京。

劉少奇規定外出時間有四不准：不搞迎送，不請客吃飯搞鋪張浪費，不准收受禮物，參觀時不搞前呼後擁。每次出發前，劉少奇一定要向隨行人員說明，到任何地方都必須遵守這四條。劉少奇將這四條當作組織紀律，以身作則，模範地執行，尤其是第二、三條，已經到了「苛刻」，「不可理喩」的地步。

劉少奇的「不吃宴請」，自二十年代初領導安源大罷工時已開始。安源大罷工勝利後，工人們的生

活改善了一些，又都愛戴和感激劉少奇爲工人辦了件大好事，按照當地的風俗，都想請劉少奇吃頓飯表示心意。

一天，工人李寶堂夫婦打酒買菜，來到俱樂部辦公室請「劉主任」赴宴。劉少奇笑着謝絕道：「別的事我可以辦，這個忙我可是不能幫」。劉少奇詞婉意堅，李寶堂只好拉着劉少奇的通訊員張明生去了。

張明生赴宴回來後，問劉少奇：「劉主任，人家眞心實意買了酒菜，你爲甚麼不去呢？」

劉少奇說：「你想想，請客就得花錢，工人生活本來很困難，現在剛好一些，怎能加重他們的負擔！再說安源有一萬多工友，要是成天你請我送，那我們還有甚麼時間去工作呢？」

張明生恍然大悟，後悔自己不該去吃這頓飯。㉖

建國後，劉少奇在這方面更是嚴於律己。

一九六○年，劉少奇與王光美去四川都江堰視察。中午，當地幹部請劉少奇與王光美去吃四川的家鄉菜──「活水豆花」。到了餐桌，劉少奇看到桌子上擺滿酒菜，便立刻意識到這是用公款請客，違反了國家的財經制度。

飯吃到一半，劉少奇叫王光美當衆宣佈：「今天這頓飯的費用，全部由少奇同志付，算是請大家」。飯後，王光美立即如數付了飯錢。㉗

請客吃飯似乎是中國官場上的一項根深蒂固的陋習，儘管中共三令五申，卻屢禁不止。對此，劉少奇更多是用回絕來抗拒。

一九六四年七月，劉少奇到山東濟南視察。中午吃第一頓飯，招待處辦了一桌豐盛的宴席。當劉少

奇被當地領導幹部請到餐桌就座時，神情馬上嚴肅起來，說道：「你們搞這一桌子，夠農民吃幾天呀！快退些去吧！以後不管哪一級來人有便飯就行了。」

結果招待處只好撤下酒席，換上便飯，劉少奇方愉快地進餐。飯後，劉少奇用自帶的茶葉泡了茶，點了支自帶的「大前門」香烟，又淡淡地說了句：「那些飲料，誰吃誰付錢。」㉘

一九六〇年四月下旬，劉少奇到四川成都視察，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一住下，劉少奇便吩咐王光美到廚房打招呼說，現在國家正值困難時期，廣大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難，我們的膳食要越簡單越好，每頓以蔬菜爲主，飯裏可摻些雜糧。

服務人員看到劉少奇的伙食太簡單，擔心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便和廚師商量，給加了一個「江團魚」。誰知道吃飯時劉少奇還沒坐下便說：「怎麼多一個菜，請把魚端下去。」服務員當然不肯拿走。於是劉少奇對「江團魚」始終未動一筷。飯後，服務員收拾桌子時，對着那盤被冷落了的「江團魚」，不禁感慨萬千。㉙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到黑龍江視察，下榻在哈爾濱的花園邨。劉少奇事先已打過招呼，不要鷄鴨魚肉，只做點小米粥、窩窩頭就可以了。炊事員只好爲劉少奇準備了六個豆制品、菠菜和豆芽做的菜。當菜上到第四個時，劉少奇就不讓上了，說：「不需要了，再多就浪費了」。

一九六〇年四月，劉少奇在河南洛陽視察，住在友誼賓館。吃飯時，劉少奇只吃了點豆芽、菠菜，對桌子上的魚、鷄一點沒動。劉少奇對服務員說：「這幾個菜沒動，請轉告食堂大師傅，這幾個菜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請大師傅不要生氣，以後少端點菜，多了浪費」。第二頓開飯時，桌子上的菜不但沒有減少，還多了一條黃河大鯉魚。劉少奇站在桌邊，久久不肯坐下，說：「我已經講過了，菜多了是

浪費，這頓又端來這麼多！」一位幹部忙解釋：「這裏住的有外國專家，生活條件好些」。劉少奇說：一外國人是外國人嘛，我們是中國人，老百姓吃的甚麼?!」這時有另一位幹部進來說：「市裏的領導同志想請少奇同志吃一頓飯……」，話還未說完，劉少奇便回答：「我黨沒有這個作風，那樣不好嘛！」㉚

劉少奇不但不吃宴請，連招待的果品、烟茶也一點不動。

一九五八年九月，劉少奇到河南古城開封視察，會議桌上特意擺放了幾盤開封農民剛剛培育出來的新鮮蘋果，當地領導希望劉少奇能夠親自品嘗一下。然而自始到終劉少奇一個也沒有動。這時一名細心的服務員拿起一個又大又紅的蘋果遞給他，他卻笑着說：「放下吧！」

劉少奇所到各地，下榻的賓館、招待所裏都備有香烟、茶葉、香皂、牙膏和毛巾。但劉少奇統統不用，而用自己帶的。劉少奇在視察時經常開座談會，開會時，他也不拿公家的香烟招待與會者，而是用自己帶的「大前門」。當地的領導人多是一方諸侯，抽的都是如「大中華」等高級香烟。當他們看到劉少奇竟然只抽普通的「前門」烟，都不禁大表驚訝。劉少奇還拒收各地領導人送的各種禮物。有一次，劉少奇參觀成都市輕工業展覽，回到招待所後，有關部門派人送來幾筒展出的新產品白芙蓉香烟，劉少奇立即吩咐工作人員把烟送回去。不久，當地一名幹部又送來了兩瓶茅台酒，劉少奇堅持不要，服務員感到兩面為難，便把酒交給了劉少奇的秘書。劉少奇離去後，服務員打掃衛生時，發現那兩瓶茅台酒原封不動地放在櫥櫃裏。㉛

劉少奇嚴於律己，公私分明。

對國內各地領導人贈送的禮品，劉少奇一律拒收外，出國訪問時收到的禮品，也一概上交歸公。一

九六三年九月，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出訪朝鮮，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送給劉少奇一批禮物，除了工藝品，還有一些蘋果。回到賓館後，秘書向劉少奇請示：怎樣處理這些禮品？劉少奇只有很簡單的一句話：「把禮品交公就是」。

回到北京，就禮品的處理問題，秘書又請示了王光美，王光美說：「工藝美術品交公，蘋果分一點給工作人員嘗嘗，其餘送中南海托兒所吧」。而王光美自己家裏，一個蘋果也沒有留下。

劉少奇多次出國，並多次接見到訪的外賓，收到的禮品無可計數。在禮品的處理問題上，秘書們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秘書們認爲，某些東西交上去也只能當日用品，所以不必上交。而劉少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禮品，都要統統交公。劉少奇說：「我交公是我的事，人家怎麼處理是他們的事，你們要相信人家會處理好」。㉜

在那不計其數的禮品中，除了一台望遠鏡和一支獵槍是劉少奇的衛士組以「工作需要」爲借口留下外，其餘全部上交歸公。而那支獵槍，劉少奇還在一九五七年贈送給了北京地質學院的畢業生。

劉少奇出國訪問不僅不留禮品，對公家按規定發給的外匯，也一個子不花，全數交給中國駐當地使館。一九六〇年，劉少奇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蘇聯，參加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三周年慶祝典禮。公家發給劉少奇五千盧布作爲零用錢。在蘇聯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劉少奇一個戈比也沒有花，臨回國前將那五千盧布全部交給中國駐蘇使館。

一九六一年六月，陸定一、康生、王力、胡繩在北京十八所寫文章，紀念中共建立四十周年。一天，劉少奇來十八所審查文章，中午就在招待所裏用了便飯。飯後劉少奇午休。這一天驕陽似火，酷熱難當，招待所倉庫裏有溫州涼席，負責人便吩咐服務員取一張涼席給劉少奇鋪上。劉少奇起床後，只說

了一句話：「這涼席很好」。

劉少奇一向緘言寡語。話越少就越有份量。衛士把這句話告訴了管理科長，科長馬上說：「劉主席說好，你就拿回一張給他鋪上，反正我們也是扔倉庫，七、八張，沒甚麼用」。晚上，衛士把涼席拿回中南海。第二天一早又送回來，「劉主席把我訓了一頓，」衛士說，「你們快收回去吧」。

「一張涼席訓甚麼？」

「劉主席說公私不分」。

「你這個笨蛋，我們反正也沒用，既然劉主席說好，你就不會講個理由？」

「快別說了，劉主席說，我講涼席很好是大實話，我講你公私不分也是大實話。你回去跟他們也要講實話。」

在劉少奇的大實話面前，管理科長沒話說了，只好收回那一張不值幾個錢的涼席。㉞

劉少奇克己奉公，生活自然清貧。

一九六三年王光美下鄉搞四清後，劉少奇將一向由王光美掌管的劉家錢櫃交給秘書劉振德掌管。那是一個陳舊的木盒子，裏面有錢，有各種購物票證（布票、油票、肥皂票等等），但更多的是針頭線腦，各種衣服鈕扣，雜亂無章，充其量只是個雜物盒。劉振德清理了一下，裏面只有二十三元八角人民幣！

王光美還交下了一張家庭開支的帳單：

每月拿到工資後，請按下列數額分配：

一、給衛士組一百元，爲少奇同志買烟、茶和其它日用品；
二、給郝苗同志（厨師）一百五十元，全家人的伙食費；
三、給趙淑君同志（保育員）工資四十元；
四、給外婆（光美母親）一百二十元，作爲五個孩子的學雜費、服裝費和其它零用錢。
五、少奇同志和我的黨費每月交二十五元（當時少奇與王光美交的黨費比規定的多幾倍）。
六、每月的房租、水、電等費用四十多元。㉟

按這個帳單統計，劉少奇家的每月開支有四百多元，而劉少奇、王光美兩人的工資總共也只有五百元，所剩部分，劉少奇還經常用來幫助有困難的親朋好友。劉少奇之清貧如洗，可見一斑。據長年在中南海服務處工作，管理和照料中共首腦們生活的李維信說：「少奇同志生活特別儉樸，說他是中南海裏生活最儉樸的一位領袖也不爲過」。㊱

在中共首腦中，經濟上最富裕的是毛澤東。除了工資外，毛澤東有出版《毛澤東選集》的龐大稿費收入，在五十年代，稿費就滾存到一百多萬元。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超級富豪。因此毛澤東手頭闊綽，吃得也就較好，儘管毛澤東生活簡樸，但飯桌上還是有水魚等這樣的高檔食品。毛澤東還花很多錢買書，買字畫，他晚年看的大字線裝書，便是用自己的錢來印製的。在中共首腦中，毛澤東的藏書也是最豐富的，達三、四萬册，相當於一個小型圖書館。除了工資外，毛澤東自己每年要花用稿費中的一萬多元，這在當時也是個不小的數目，毛澤東還用稿費接濟親朋好友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六十年代初，毛澤

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多吃多佔，毛澤東便掏錢退賠，共兩萬多元。從毛澤東那裏挖得最多的，是江青。江青的生活奢侈豪華，吃好穿得也好，自己的工資根本不夠花，經常由毛澤東接濟，兩人分居後，江青還不時向毛澤東要錢，僅一九七四年，一次便要去三萬。

據李維信回憶，有名衛士從毛澤東那裏調來劉少奇身邊，一個月沒有沾上油水，肚子很饞。原因說來也簡單，毛澤東是有東西不吃。江青和毛澤東不在一起吃飯，她很會吃，所以灶上總還是找到油水。劉少奇和妻子王光美一道吃飯，他們子女多，又不像毛澤東有稿費，完全靠工資生活，所以，那生活不說清貧也完全可以說清淡，劉少奇性情淡泊，不講究吃穿，每餐兩菜一湯，平平淡淡，無論桌上灶上都沒有甚麼油水，這就難怪衛士饞出鬼來了。

有那麼一天中午，餐桌上突然出現了一盤紅燒鷄塊，一個月來，這是衛士頭一次感到有油水。而且他看到了希望：王光美怎麼也不吃，只是照顧着給劉少奇夾，一頓飯下來，兩個人你謙我讓，那鷄塊還是剩半盤。劉少奇回辦公室去了，王光美再沒動那盤鷄塊，只是將另一盤素菜打掃乾淨，接着就把那半盤鷄塊用紗罩罩上了。

王光美前腳走，衛士後腳進去，把那半盤鷄塊三下五除二打掃幹淨，吃得很舒服，只恨少了一點。

晚飯時，王光美端着一盅酒進來，她沒看見鷄塊，便問炊事員郝苗，郝苗說沒見剩鷄塊。衛士很驚訝：毛澤東那裏從不吃剩飯剩菜，在全黨全國，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還能吃剩鷄塊？他老實承認：「我吃了」。

王光美聽後嘆了口氣說：「唉，我本是留給少奇同志晚上吃的……」。她沒有再說下去，把那盅酒又端了回去。㊲

那個衛士絕沒有想到，在劉少奇這裏，不但剩鷄塊要留下一餐，就是普通的剩飯、剩菜，都要保留到下一餐吃。劉少奇夫婦每一天的第三頓飯，即在半夜吃的晚餐，便是王光美用上一頓剩飯剩菜燴製的，王光美由此得了一個「燴飯廚師」的雅號。

由於劉少奇家庭生活困難，「劉辦」的工作人員便提出應發給劉少奇和王光美夜餐費，因爲「劉辦」的工作人員每人都有，劉少奇也不應例外。由於怕劉少奇反對，「劉辦」黨支部決定此事不向劉少奇匯報，經向中央警衛局負責人請示後，便決定給劉、王每人每天補助五角錢，每月共有三十元。這多少可以補貼一下劉少奇的家庭經濟。

一九六二年夏，中央警衛局負責人向毛澤東反映，現在有的領導人生活比較困難，準備予以補助。毛澤東說：「可以根据具體情況辦，總司令和少奇同志、陳雲同志，靠他們生活的小孩多，應該補助，我就不需要嘛。」

補助的事後來被劉少奇發覺了。劉少奇堅持要退回。結果每個月都要倒扣三十元。這可愁壞了爲劉少奇做飯的郝苗老師傅。

劉少奇結過五次婚，因此子女也較多。他與第二任妻子何葆貞生了二子一女，即劉允斌，劉允若，和劉愛琴，與第四任妻子王前生了一子一女，是爲劉允眞，劉濤，與王光美生了一子三女，即劉源，劉平平，劉亭亭，劉瀟瀟。五、六十年代，除允斌、愛琴已工作，允若在蘇聯學習，六〇年回國外，其餘都在北京上學。

孩子多，負擔重，經濟自然不寬裕。

劉少奇的孩子上的是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吃住都在學校。那所小學，有幹部子

弟，也有平民百姓子女。在學校裏，劉少奇的孩子生活之儉樸，是出了名的，穿的衣服鞋子常有補丁，不但幹部子弟中絕無僅有，就是平民子弟中也屬罕見。孩子們假期回家，也是到中南海的食堂與工作人員一同吃飯，住則與劉辦工作人員在一起。一九五九年八月，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教師來劉少奇家作家訪，後來說：「剛才我們去看了孩子們的住處，眞沒想到國家主席的孩子的居住環境竟是那麼儉樸，簡直和我們的孩子沒有甚麼兩樣」。

有一次，王光美讓保姆阿姨領女兒去西單商場買外套，阿姨買了一件四十元的。劉少奇知道後吩咐拿去退回，換件便宜點的。一九六一年夏天，劉少奇到黑龍江省林區視察，正値暑假，便把兩個孩子也帶了去。當地的領導人發現，那兩個孩子穿的都是舊衣服，而且短小，不合身，實在看不過去，便送了當地出產的一塊亞麻布，交給秘書。劉少奇知道後，立即吩咐退回去。

王光美自己也不例外。在中南海那些夫人中，王光美是較爲年輕的一個，然而也是最儉樸的一個。除了陪同劉少奇參加一些國務活動外，平時的王光美，粗衣簡裝，騎着自行車上下班，外人很難看出這就是中國的第一夫人。

一九七九年，被關押了十二年的王光美出獄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把她安排入住一間招待所內。這一天，招待所的工作人員聚集在大廳前迎接王光美。一輛吉普車開來了，後門打開，首先看到的是一只伸出車門的穿着普通的布鞋的腳，接着，一個剪短頭髮、身穿藍色衣服的身影鑽出車門，她就是王光美。她一無所有，沒有行李，沒有箱子，沒有提包，甚至沒有一只牙具袋，身穿一套那個年代掃馬路的工人在勞作時穿着的那種再生布勞動服，已經泛白。接待王光美的招待所負責人問陪同來的中央辦公廳政治部幹部：「她的行李用具呢？」那位幹部有些尷尬，說：「她甚麼也沒有」。招待所的負責人感到王光

美甚麼都缺：生活用具，替換衣服……於是，向王光美說：「您都需要些甚麼東西，我們一定幫忙解決」。誰知王光美毫不猶豫地脫口而說：「請給我筆和紙，麻煩你盡快幫我借支筆，多拿些紙來」。

那一夜，王光美房間裏的燈光久久未熄。㊳

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送來了劉少奇家的物品，那是經過大抄家，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劫難後劉家的僅有的財產：一包舊衣服、舊鞋、舊襪子……。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期間，劉少奇的家屬、親屬都聚集到北京，住處除了安排在招待所外，吃飯就都在王光美家。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對王光美無疑是個很大的負擔。老幹部局的負責人考慮到王光美經濟困難，主動向上級匯報，建議在糧油副食品等方面給予一些補助。上級同意了。當把東西送到王光美家中時，王光美堅決拒絕了。王光美對來人說：「請拉回去，我絕對不能要，少奇同志生前是怎麼做的，怎麼要求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來人說：「可是，一下子來了那麼多人，你家的那點定量不夠維持……」。那時糧油副食品還都是定量供應。

王光美說：「你不用操心，沒吃的我可以上街買方便面！」

王光美始終不肯要公家的照顧、補助。中共中央要發給她撫恤金，她沒有要，就是不肯收。

是的，劉少奇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錢來計算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永遠欠下了劉少奇家人一筆巨大而又沉重的債項，這是一筆永遠也還不清的歷史的債項。

八、起居飲食

一九四九年剛入中南海時，劉少奇被分配住在萬字廊，那是一幢清代興建的舊式房子，共三間，一間是辦公室，一間是會客室，一間是臥室，均年久失修，十分破舊。後來，在中南海西面修建了一批樓房，統稱西樓。其中有兩幢小樓，甲樓較大，環境又較安靜，劉少奇便提出朱德住甲樓，自己住乙樓。然而朱德亦提出甲樓有會議室，劉少奇的會議多，來人也多，需要大點的房子，應住甲樓。房子蓋好了，兩家相讓不下，誰也沒搬進去。後來，朱德說：如果劉少奇不搬入甲樓，他就不搬。總司令的話如此堅決，劉少奇只好讓步，搬入了甲樓，而朱德也就搬入乙樓，互爲鄰里。

這兩幢小樓，是建國初期設計、修建的。由於缺乏經驗，設計得不合理。劉少奇的辦公室設在樓上，約二十平方米。西面的一堵牆，竟然有四扇門、四個窗。因此，這個房間上午南曬，下午西曬，夏天熱的時候，劉少奇只穿背心褲衩辦公，還熱得滿頭大汗。有一年天特別熱，實在熬不過，工作人員便在辦公桌上放塊大冰，四周置八盆冷水。而樓下則涼快得多，劉少奇說：「好地方都讓你們住上了，我要有時間非要來你們這兒避暑不可！」到了冬天，呼呼的西北風從西牆的門縫、窗縫裏鑽進來，把大窗帘吹得如同波浪一般飄動着。不管鍋爐怎麼燒，熱氣始終保不住，劉少奇凍得要穿棉鞋辦公。劉少奇遷入這所新居後，毛澤東曾來過一次，他把每個房間都看了，當看到劉少奇辦公室的西牆上有四扇門通向陽台，門上頭還有四扇窗子，整個一面牆都成了門窗時，毛澤東問：「設計這麼多門窗幹甚麼用？」劉

少奇回答：「我也不知道幹甚麼用的。」

劉少奇的家裏沒有地毯。五十年代後，考慮到劉少奇年事已高，上下樓梯易滑倒，「劉辦」便提出在樓梯及辦公室全鋪上地毯。劉少奇知道後堅決反對，說是鋪張浪費。工作人員便以身體安全爲理由，據理力爭。最後劉少奇只允許在樓梯鋪上橡膠墊，說如此又好又節約。至於辦公室裏，就始終沒有鋪上地毯。

劉少奇的辦公室裏的全部擺設是辦公桌、書櫃、文件櫃、兩個沙發、一只藤椅，此外沒有一件裝飾物品。緊挨着辦公室的，是書房兼王光美的辦公室，周圍十多個書架上放滿了書。東邊是飯廳，裏面除了一台供劉少奇吃飯時聽廣播新聞的收音機，再無別的擺設。飯廳的隔壁是會議室，中間一張長木桌，周圍擺放了二十多把普通的軟椅子，東牆上掛着一張世界大地圖，西面牆上掛着一張中國大地圖，此外再無別的東西。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許多重要會議，就在這裏召開。

在中共黨內，對劉少奇的稱呼，由始至終都是「少奇同志」。這是劉少奇規定的。

一九五四年，劉少奇當選爲全國人大委員長後，秘書楊俊向他請示工作時，叫了一聲「委員長」，劉少奇沒有吭聲，楊俊以爲他沒聽見，就又叫了一聲。這時，劉少奇抬起頭看了看楊俊，不高興地反問：「你怎麼突然叫起這個來了，不感到別扭嗎？」由於劉少奇很少批評工作人員，所以這兩句責怪的話，令楊俊感到很突然，臉上一陣陣發燙。王光美見狀出面解圍，說：「我們還是叫同志嘛」。劉少奇接着溫和地說：「以後不要這樣了，叫同志多順口啊！」從此以後，直到一九五九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一直稱呼「少奇同志」，而不是叫「劉主席」。劉少奇說：「在中央領導人中，只有三個人可以稱官銜，就是毛主席、周總理和朱總司令，我們大家稱他們主席、總理、總司令已經習

慣了，就不必改了。其他人，應該一律互相稱同志。」

有一位新來的炊事員，見到劉少奇便稱呼「劉主席」。劉少奇面露不悅，耐心地解釋說：「以後還是叫我少奇同志好，因爲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做領導工作和從事炊事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互稱同志比較合適」。

劉少奇的早餐，是西式的，而且由王光美來做。最先是一個鷄蛋。這個鷄蛋既不是荷包蛋，也不是帶皮煮熟的整鷄蛋，而是把鷄蛋洗乾淨後，放在一個搪磁缸或碗內，用開水燙一會兒，倒掉水，再摻上開水焖一會兒。經過兩次冲燙後的鷄蛋，蛋淸半熟，蛋黃不熟，食用時，不加任何佐料，打個孔吸來吃。據說這樣的鷄蛋營養沒有破壞，對身體有益。

早餐的「主菜」是面包、黃油、果醬。這種西餐的口味，可能與王光美的影響有關。

湖南人口味偏辣，毛澤東最愛吃辣椒，餐餐不離辣椒，並揚言「吃辣椒革命性強」。然而劉少奇雖然同屬湖南人，卻一點辣椒也不敢沾，炒了辣椒菜的鍋要刷好幾遍才能用來給他做菜。

劉少奇吃菜怕辣，卻不怕苦，一些帶苦味的菜，如蓋菜、油菜等，人們多用開水焯一下，除除苦味再炒吃。但劉少奇不讓這樣做，讓炊事員把菜洗乾淨後直接下鍋炒吃，他說被開水焯過的菜吃起來沒有味，有點苦味吃了敗火。劉少奇喜歡吃油渣烙餅，平時專門由西餐師傅負責製做。熬豬板油時，火不要大，油渣既不過火產生焦糊味，又不至含油太多而失去酥脆。然後同各種調料一起拌勻包在餅中間，烙成油渣酥餅。有一次，炊事員做了三個油渣酥餅，劉少奇吃了兩個，剩下一個留在晚餐吃。誰知衛士收拾桌子時，聞到香味，便三兩口吃掉。晚餐前，劉少奇要吃油渣餅，衛士嚇得跑到廚房求師傅幫忙，於是師傅又做了三個。

九、瑕疵：「吃小虧佔大便宜」

劉少奇自然不是沒有瑕疵。有時為了強調或突出某一件事而表現出了偏激、片面，說過頭話、辦過頭事，便是其一。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要劉少奇赴天津糾正在城市工作中的「左」傾的偏差。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中，出現了「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資本家現在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今天不是……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農民的痛苦在於沒有人剝削他們，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㊴同時期，為了糾正農村中過早地限制富農經濟的過「左」做法，劉少奇有「富農黨員」的說法，說黨員也可以發展為富農，也可以僱工剝削。這些過頭話，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劉少奇的罪狀。

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理論」以後，劉少奇不但附合與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而且將國內的階級鬥爭看得比毛澤東還嚴重，過分地誇大「階級敵人」的力量。劉少奇說：「領導權掌握在敵人手裏的，我看在全國最少有三分之一」，「現在有的少數地區土改不徹底，華北有三分之一，西北幾乎都是和平土改，地富統治並沒有眞正打倒。有些單位敵人打進來，拉出去；有些單位領導人，同地富資本家搞在一起，搞和平演變」。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四清」運動過「左」，打擊面擴大化；毛澤東提出要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群衆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劉少奇則提出首先要依靠第一個百分之九十五，先發動群

衆，才能團結第二個百分之九十五。對幹部沒有區別對待，搞人人過關，經濟退賠上主張徹底退賠，從嚴退賠。這些主張和做法，後來被毛澤東稱爲「形『左』實右」。

劉少奇向來肯定個人利益的存在，在「公」與「私」的問題上，主張有公有私，先公後私。而不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㊵劉少奇說：「個人利益一定要照顧，沒有個人利益就沒有整體利益」，「因此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大公有私」。出於這種思想認識，在對待革命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時，劉少奇提出了「吃小虧佔大便宜」的公式，並在著作與談話中多次引用這個公式。對「公」、「私」關係作如此的表述，確實有許多值得商討之處，亦最爲人所詬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小虧佔大便宜」這句話「風靡一時」，成爲暴露劉少奇「丑惡靈魂」的最有力的證據。

從中國革命的長河來看，與毛澤東相比，劉少奇還是比較客觀、頭腦比較冷靜的一個，在制定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然而劉少奇在決策過程中也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處，有欠於「愼言」之處。這些瑕疵被政敵抓住，大作文章，造成了廣泛的影響。然而，與毛澤東的錯誤、罪過相比，又是「微不足道」了。

---

①：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册，第五頁。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劉少奇年譜》上卷五六頁。

③：張平化《回憶少奇同志在湖南蹲點》。

④：楊波《民主作風的楷模》，見《緬懷劉少奇》三三〇頁。
⑤：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七五—七六頁。
⑦⑥：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
⑧：《劉少奇風範詞典》，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三二〇頁。
⑨：劉瀾濤《共產黨人的典範》。
⑩：劉瀾濤《共產黨人的典範》。
⑪：點點《非凡的年代》一七一頁。
⑫：劉瀾濤《共產黨人的典範》。
⑬：劉少奇一九六三年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講話。
⑭：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⑮：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
⑯⑰⑱㉒㉓：見請華大學「井岡山報」編印《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⑲：劉少奇：《論黨》。
⑳：林彪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㉑：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報告。
㉔：《劉少奇年譜》下卷六〇四—六〇五頁。
㉕：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㉖㉗㉘㉙㉚㉛㉜：《劉少奇風範詞典》，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㉝：《劉少奇風範詞典》，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㉞：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㉟：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一八八頁。
㊱：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㊲：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㊳：權延赤《生活中的領袖們》。
㊴：劉少奇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資本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㊵：劉少奇一九五九年對民建工商常委的指示。

第五篇

「旗手」悲惨殒落

第一章 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一、毛澤東的陰謀：批《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和批《海瑞罷官》，是中國現代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一樁公案。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釣出了彭德懷這條大魚，爲毛澤東除去了一個心腹大患。而中國人民卻由此而遭受了三年深重的災難。本來，由海瑞所引起的這些風風雨雨，在彭德懷倒台後應當告一段落了。然而，自從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矛盾衝突後，海瑞便又成爲一把殺人的利劍。

最先發現海瑞這把利劍的是江青。對這位自認是「毛主席的紅哨兵」的邪惡女人，著名歷史學家黎澍曾有如下的評語：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爲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爲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而回去報

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的」。①

黎澍在這裏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江青的後台老板是毛澤東。建國以來文藝界的批判風潮，都是出於毛澤東的政治需要，江青只是毛澤東的統治工具，既使沒有江青，毛澤東也會找來另一個工具。而江青的野心、邪惡，恰恰適應了毛澤東的需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將中國攪得天翻地覆，壞事做絕，也完全是出自毛澤東的支持和縱容。現在，人們只罵江青，似乎只是責備伙計，而忘了打老板的屁股，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完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後，說：「該劇存在着嚴重的政治錯誤，它是一株大毒草！」江青曾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提出要批判此劇，但被拒絕。於是，江青便去找毛澤東，說《海瑞罷官》有問題，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的大毒草。由於當時正是全國六億人民餓飯的時候，不合時宜，毛澤東沒有准予所奏。

不死心的江青又去找她的老搭檔康生。

康生說：眼下時機不成熟，全國都在餓肚子，誰還有心思來關心甚麼罷官不罷官。再等等，經濟形勢好了後，政治問題自然要提到日程上來。

老謀深算的康生果然言中了。兩年後的一九六四年，國民經濟剛剛好轉，全國人民剛吃上幾頓飽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發動的運動一浪接一浪。江青、康生認爲時機成熟了，康生便親自去求見毛澤東。

康生說：我考慮了三年，《海瑞罷官》這個戲跟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有關係，爲彭德懷鳴冤叫

屈，把彭德懷說成是包青天，爲民請命。

毛澤東神情變得嚴肅，沉吟不語。

對毛澤東的性格了如指掌的江青聽後，高興地說道：「我要找筆桿子寫文章了！」

江青先去找北京的李希凡。那是由於一九五五年批判《紅樓夢》，與「大人物」俞平伯抗了一下，被毛澤東賞識，從而聞名全國的人物。然而李希凡沒有接受。

於是，江青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到上海找「左王」柯慶施，經柯慶施引見，張春橋、姚文元便與江青勾搭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爲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吴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吴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爲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吴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録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爲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②

同年五月，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訪華團時也說：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爲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爲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③

毛澤東與江青的秘謀，劉少奇不知道，周恩來、鄧小平也不知道，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都被蒙在鼓裏。這是貨眞價實的陰謀詭計，是地地道道的違反中共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爲。

毛澤東與江青圖謀的，當然不是一個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否則也不必要如此鬼鬼祟祟、神神密密，瞞住中共中央。毛、江的矛頭所向，是吳晗背後的彭眞與中共北京市委，是中宣部和被毛澤東點名批評的北京兩個獨立王國之一的中央書記處。這些幹部和組織，都是劉少奇的權力基礎。先掃清外圍，後攻中心堡壘，這是解放戰爭時期攻堅戰的戰術，在政治權術上，就叫做「淸君側」。

毛澤東與江青炮製的重型炮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登出，震動了整個中國政壇。「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開了。

然而，以彭眞爲首的北京市委和中央書記處，嚴密地控制着北京的宣傳機器，在十八天裏，不予轉載，毛澤東下令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一本不訂。

毛澤東說：「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通。」④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下令周恩來干預此事，北京的報刊才都轉載了。毛澤東抓到了彭眞、陸定一以及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書記處「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壓制左派，包庇右派」的把柄，證實了他的「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看法。

與此同時，出於控制軍隊，爲「文化大革命」作準備的需要，毛澤東伙同林彪肅整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大將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尙昆。在肅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上，林彪妻子葉群在會上作了十個小時的主題發言，誣陷羅瑞卿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向黨伸手要權，反對林彪。她羅織罪名，危言聳聽，許多是望風捉影、莫須有的罪名。

劉少奇對葉群的指控進行反駁，說：「不可想象，難以置信」。⑤

鄧小平也說：「死無對證」。⑥

基於當時毛澤東主持的會議採取一種事先沒有向常委通報、不讓當事人辯護、聽信一面之詞的不正常狀態，劉少奇提出兩點意見：參加擴大會議的人員，常委之間要先通一通；羅瑞卿「反黨篡權」材料不夠實，不少是空談。

鄧小平也說：「同意少奇的兩點意見。讓羅瑞卿到會上發表看法。」

然而毛澤東一意孤行，最後通過了撤銷羅瑞卿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與對羅瑞卿、楊尙昆的肅整，無疑地是對劉少奇的嚴重打擊。加上工作上的勞累，劉少奇大病了一場。劉少奇在病中堅持工作，並不讓向中共中央報告。是周

恩來到福祿居向劉少奇匯報工作時，才發現他已病得奄奄一息。周恩來馬上指示通知正在搞「四清」的王光美從農村回來，並吩咐王光美：「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他！」

這時，圍繞《海瑞罷官》的鬥爭，正處於僵持階段。在彭眞的主持下，通過版面安排、學術討論、發編者按等，將姚文元文章的殺傷力減低到最低的程度。站穩腳跟後，彭眞便組織反攻。他以一九六四年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制訂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將《海瑞罷官》等納入學術討論範圍，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眞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對他們要採取嚴肅和與人爲善的態度」、「不要『不准革命』」。

《二月提綱》極力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橫打棍子的做法進行限制，必然與毛澤東發生嚴重的對立。

劉少奇痊愈後，便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主持中央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二月提綱》，並委託彭眞率領「五人小組」前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彭眞一行五人於二月八日到達武漢，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中，對提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彭眞於是在武漢即代中央草擬了一個批語，電傳北京，經在京常委同意後，於二月十二日將《提綱》批轉全國，作爲當前運動的一個指導性文件。

毛澤東與江青精心策劃的姚文元文章，並沒有攻破彭眞在北京的堡壘。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等人利用所控制的黨、政權力機構，與毛澤東進行抗衡。

北京方面的頑強抵抗，令毛澤東、江青等人氣憤而震驚。張春橋說：我們「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

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令我們感到震驚」，「不知道會觸動這麼深」，「更不知道彭眞會這樣堅決反對」。江青氣憤地說：「攻也攻不動呵」，「我的話更沒有人聽」。⑦

於是，毛澤東與江青再次策劃請解放軍這座「尊神」。那是毛澤東可以依靠和動用的唯一的力量——毛澤東的新政治盟友林彪正掌握着軍隊的大權。毛澤東指使江青去蘇州找林彪，要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指示林彪務必給予全力支持。江青說：「於是想到解放軍中請尊神，請『無產階級專政的專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⑧

部隊文藝座談會又是在瞞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下秘密進行的。最後寫出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說建國後文藝戰線是資產階級專政，要「堅決開展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得知劉少奇病愈，可以按計劃出國訪問後，便開足機器，抓緊工作。毛澤東親自上陣，指揮陳伯達、張春橋修改江青的《座談紀要》，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親自做了三次修改，重要的改動地方達十五處。並將題目由《江青同志召集……》改爲《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毛澤東不愧是個經驗老到的政治家，將標題改成《林彪同志委託》這六個至關重要的文字，頓時令《紀要》的份量增加了許多，其意義也大不一樣。⑨

在毛澤東親自出馬之下，《紀要》在劉少奇出國訪問前夕定稿，等待劉少奇出國後即送上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批發全國。

毛澤東還部署了在劉少奇離開後發動一系列政治攻擊。

二、乘虛而入 毛澤東「清君側」

劉少奇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離開北京，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

劉少奇的專機剛離開北京，即三月二十二日當日，林彪便將《紀要》批轉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澤東在杭州找康生、江靑、張春橋等人談話，猛烈批判《二月提綱》和彭眞、北京市委、中宣部。

他說：《提綱》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眞、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並說：陸定一是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我們面臨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這場大革命。⑩

彭眞與陸定一被打倒了，他們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劉少奇的得力幹部；而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也癱瘓了，它們也是劉少奇重要的權力基礎。毛澤東利用劉少奇不在國內的機會，一舉摧毀了劉少奇的兩個重要據點。

毛澤東已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而現在，毛澤東卻親臨第一線，對彭眞等人進行打擊。如此重大的問題，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是否應當等劉少奇回來才解決？毛澤東如此乘虛而入，先斬後奏，算不算是越權、擅權？毛澤東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評，並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的批准，如

此作法是否符合組織原則，這算不算是陰謀詭計？

對《二月提綱》，一個多月前在武漢毛澤東並沒有表示甚麼反對意見。現在卻嚴厲批評，大肆指責，正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也。而且《二月提綱》是中共中央集體通過的，現在毛澤東自己便一舉否定掉。

毛澤東的新政治盟友林彪，曾在私底下如此評論毛澤東：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爲己，過爲人」。

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術」。

林彪的這些評語，都是一針見血。此時此地的毛澤東，其行爲已像個「政治無賴」。

毛澤東正是利用陰謀詭計和權術，來擊敗劉少奇。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劉少奇、陳毅一行在訪問巴基斯坦等三國後，由緬甸的仰光回到昆明。

劉少奇本想在雲南作些考察，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作了準備，但中共中央辦公廳打來電話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於是，劉少奇的飛機直飛上海。由於來不及調車，只好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將他們送到杭州。

劉少奇剛住下，周恩來便匆匆趕來，向他介紹情況。原來，在劉少奇出國訪問期間，國內的形勢急轉直下。

等到劉少奇出訪回國，擺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實是：彭眞、陸定一已被打倒，中央文化五人小組被解散，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已癱瘓，而陳伯達、康生、江淸等人迅速得勢，中央文革小組已成

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經定稿。。

與此同時，在劉少奇回國之前，毛澤東還部署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準備正式通過「五·一六通知」，對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進行組織處理。會議定於五月四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請示。

在劉少奇出國訪問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趁機決定和處理了這麼多重大的事項，將劉少奇在第一線——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書記中的四名得力幹將，以及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這三個重要的組織打掉。等到劉少奇回國時，他在中共中央的依靠力量大爲削弱，只剩下鄧小平一人。

這無異是一場宮庭政變。

劉少奇被毛澤東這一輪猛烈襲擊打得暈頭轉向。王光美說：「在我們出訪期間，黨內發生了一些問題，有的事情他（指劉少奇）也接不上頭。出訪前他病了一場，沒有看甚麼文件，我們出訪剛回來就匆匆趕到杭州，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講了許多很重要的問題……」。⑪

由劉少奇回國開始，毛、劉鬥爭的新階段便開始了。

毛澤東在這一階段使用的策略，一方面是繼續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包括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時機還未成熟，毛澤東極力要穩住劉少奇，令其不生疑心，無所動作，而毛澤東則可以趁機加緊部署。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平津戰役中，毛澤東曾成功地運用過這一策略。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遼瀋和淮海戰役獲得勝利，國民黨的三大戰略集團，被解放軍消滅了兩個，長江以北全部解放。剩下的傅作義集團，孤立在華北的北平、天津一帶，是固守還是南撤，正舉棋不定。而林彪領導的東北野戰軍剛打完

遼瀋戰役，還未休整便匆匆入關，準備殲滅傅作義集團。由於兵力還未部署妥當，又擔心傅作義集團從塘沽海路南逃，毛澤東在《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一文中，對林彪指示「爲不使蔣介石迅速決策海運諸敵南下」，「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兩個星期內一般應採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辦法」，「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與此同時，毛澤東還下令淮海戰役留下一點國民黨兵殘餘，不急於消滅，留下一點尾巴，令蔣介石產生假象。毛澤東還說：「此種計劃出敵意外，在你們完成最後部署以前，敵人是很難覺察出來的」。蔣介石與傅作義果然中計，盡墮彀中。

時至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又使出這一招，仍是靈驗無比。劉少奇作夢都想不到毛澤東讓他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都是旨在打倒自己的。

劉少奇的心情是複雜的。對毛澤東的作法，他既不理解，又不滿意。他曾對人說：「你相信彭眞的問題嗎？」對打倒彭、羅、陸、楊表示了很大的保留。由於不知道毛澤東的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劉少奇在大會上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眞，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⑫

劉少奇的心情沉重，感到很大的壓力。但他還天眞地認爲仍獲毛澤東的信任，起碼是毛澤東的態度沒有改變。儘管如此，劉少奇從那咄咄逼人的形勢中，仍然感到暴風雨將至。加上自己與彭羅陸楊有着密切的工作關係，爲了消除毛澤東的疑慮，劉少奇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的大會上講了話。他講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自己的認識，主要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勢，保持晚節，革命到底。劉少奇的講話謙遜平和，沒有激烈的豪言壯語，也沒有聳人聽聞的警句。他用了相當

大的篇幅檢討了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缺點和錯誤。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同意解散工人糾察隊，講到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講話中的失言，及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一九六二年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及一九六五年不主張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這一大篇自我檢討，似是對毛澤東表態，表示自己的悔過及緊跟的眞誠意願——一個和平、謙遜、忠誠的信息。

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今後怎樣搞？毛澤東的意圖是甚麼？劉少奇一片茫然。劉少奇是消極的、被動的，處於明處；而毛澤東是積極的、主動的，處於暗處。劉少奇的悲慘下場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設陷阱　毛澤東隔岸觀火

毛澤東在這一階段使用的第二項計謀，是向劉少奇布下政治陷阱。

這時，毛澤東遠離北京，住在杭州。往年，毛澤東多在三、四月便離開南方，返回北京，以避開南方那又熱又濕的夏天。然而在一九六六年，時至六月，南方已是進入盛夏，但毛澤東還是在杭州、長沙間巡遊，拒不返京。

劉少奇只好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遠在南方，但卻時常繞開劉少奇，向他在北京的代理人康生、陳伯達等人發號施令，指使他們煽風點火，製造事端和混亂，以干擾劉少奇的工作。而毛澤東便在南方「隔岸觀火」，專門留意和挑剔劉少奇的過失和錯誤，以便「羅織罪名」，徹底摧毀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

進入六月以後，形勢再次急轉直下。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通欄大標題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號召：「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那是陳伯達於五月三十一日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後炮製出來的，社論並沒有經過劉少奇和中共中央審閱。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了一張炮轟校黨委的大字報。周恩來聞訊後，派人到北大指示：「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對聶元梓等作了委婉的批評。然而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派人要走了大字報底稿，康生立即把它密報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毛澤東還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說要廣播。⑬

毛澤東的「十分必要」，是借此可以製造天下大亂。

毛澤東繞開了劉少奇等中央常委。劉少奇是在六月二日下午從報紙上看到大字報的，劉少奇與王光美以爲是秘書們漏報了，王光美詢問機要秘書劉振德：「看到過中央關於審批廣播那張大字報的傳閱文件嗎？」

「沒有呀！」劉振德回答。

王光美說：「這麼大的事，少奇同志說他不知道，他說中央開會沒有說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也感到非常意外，他詢問周恩來：這麼大的舉動爲甚麼事先不給個通知？周恩來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

出」。⑭

正如聶元梓後來所說，大字報一廣播，「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國爆炸了！」在沒有與劉少奇打招呼的情況下，毛澤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火一燒起來，便成燎原之勢。毛澤東所企求的，正是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面。毛澤東密切地注視着北京的動態。源源不斷的情報，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毛澤東那裏。

四、派工作組 劉少奇中計

派工作組的決策過程是這樣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開會決定，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當時周恩來還當場用電話向毛澤東請示，獲得同意。爲愼重起見，五月三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合致信毛澤東，書面請示向人民日報派工作組一事，信是劉少奇親自起草的，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

陳伯遠於五月三十日進駐人民日報社。而張承先的工作組是在六月一日晚十點多進駐北京大學。進駐北大的消息於六月三日由新華社向全國廣播，其電訊稿是周恩來起草的，並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看了這條電訊稿並表示同意。⑮

事實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作法並不存在甚麼錯誤：

一、在當時的形勢下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

二、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決定，毛澤東也是同意的，完全符合中共的組織原則；

三、派工作組符合中共過去的經驗。在過往中共曾多次以派工作組的方式領導各種政治運動，如土改等。一九六七年夏，「文化大革命」發展成「全面內戰」，毛澤東便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全國各地，這其實就是工作組，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而毛澤東以此作爲打倒劉少奇，純屬羅織罪名。

六月三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出現的問題。

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匯報。他在談了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的情況之後，講了準備向學校佈置「內外有別」等八條要求，他最後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經過一番討論，會議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向各學校傳達貫徹所擬的八條要求。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學生很快的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見於毛澤東繞過中央常委廣播大字報的不尋常舉動，富於政治鬥爭經驗的劉少奇便多次提出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澤東沒有同意。劉少奇又多次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運動的問題，但也「沒曾得到明確的回復」。[16]

在這種情況之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經過商量，決定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示運動的指導方針。

六月九日，劉、周、鄧三人乘坐一架專機飛抵杭州。

會議在毛澤東的住處劉莊賓館開了兩次。出席會議的，除了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陶鑄之外，還有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增加的陳伯達、汪東興和六大區的中央局書記李雪峰（華北局）、宋任窮（東北局）、劉瀾濤（西北局）、魏文伯（華東局）、王任重（中南局）、李大章（西南局），陪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志明來杭州的康生也在座。會議是務虛性質的漫談，話題廣泛，從運動情況、教學改革、提拔年輕人、報紙版面、點名批判程序、工作組、到農業生產、知識分子、民主人士……。⑰

這正是毛澤東的特色。劉少奇這一行，是想要一個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如果說了，劉少奇回京照辦，那麼毛澤東就很難抓住劉少奇的辮子了。你想要的東西我偏不給你，讓你摸不着底細，心中無數。如此一來，無論對方怎樣行動，毛澤東都可以從鷄蛋中挑出骨頭來：我當初沒有講過，你自作主張，當然就是犯了錯誤。因此，不明確表態，是毛澤東最厲害一招，在兵書上叫做「後發制人」。

於是，劉少奇抱着滿腹的疑問而來，剛一提出，毛澤東便不着邊際地漫談起來，領着劉少奇等人遊花園，只務虛，不務實，題目換了一個又一個。

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毛澤東沒有表示反對，態度模棱兩可。

劉少奇再次提出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又是沒有明確表態，只是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毛澤東的陰謀詭計與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劉少奇一行是在六月十二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劉少奇、鄧小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傳達杭州會議精神，派工作組便在北京、全國鋪開。

由於周恩來在六月十五日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因此後來毛澤東「覆手爲雨」一時，就沒有涉及周恩來。後來所批判的是「劉鄧反動路線」，而不是「劉鄧周反動路線」。周恩來避過一劫。

北京城當時的形勢，就像一個被引爆後的大火藥庫。各大專院校，甚至中學，大字報鋪天蓋地，各校的黨委領導成了鬥爭的目標。亂批亂鬥已出現，而且迅速漫延。許多教授、專家、學者也被揪出批鬥示衆。人身污辱、打人、抄家已成家常便飯。自殺和打死人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更加嚴重的是，學生與工作組發生嚴重對立。學生們要的是無政府主義，無拘無束；而工作組的職責卻是把運動納入正常的軌道內。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利用工作組集中開會之機，設立「鬥鬼台」、「斬妖台」，擅自把四十多名「黑幫」、「反動學生」揪出批鬥。學生們給這些人戴上紙做的高帽子，臉上塗上墨汁，對他們罰跪、扭打、揪頭髮、撕衣服，肆意污辱。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聞訊後急忙趕來，嚴肅批評了這種作法。但聶元梓認爲「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爲。

六月十九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

有種種跡象表明，是中央文革支持這些少數學生反對工作組。更加嚴重的行動正在醞釀之中。

劉少奇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面可能有高級幹部」。

六月二十一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佈置對運動的領導。在匯報討論之後，劉少奇對幾個問題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甚麼人都說成黑幫，運動中

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黨委爛掉的，工作組可以代行黨委職權，不准隨便提出奪權，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禁止打人、汚辱人和變相的體罰。⑯

會議精神貫徹下去後，各地的工作組開始「反干擾」，對前階段的「冒尖」學生給予反擊，定為「反黨幹將」、「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及其同伙多次被鬥，其中一名被鬥者自殺身亡。而蒯大富則被開除團籍，並被關押了十八天。其他院校和地區，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這就是後來毛澤東所說的「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五十多天。

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從杭州移居長沙。於十七日住進「西方那個山洞」——韶山滴水洞，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住了十一天。

北京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認為，他已捉到了劉少奇的辮子。

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從長沙到武漢。

毛澤東自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上海策劃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一直在南方流連。毛澤東將劉少奇視為敵人，一方面千方百計尋找攻破劉少奇這座堡壘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又疑心劉少奇發動武裝政變，將勢孤力單的毛澤東、江青等一網打盡。於是自上年冬南來後，拒不返京，至今已八個多月，是建國以來毛澤東離京時間最長的一次。現在，找到了打倒劉少奇的突破口，毛澤東可以回北京了。

五、毛澤東的「理想社會」：「五·七指示」

奪回失去的權勢僅是第一步，接着，毛澤東就要繼續去實現那個「平均劃一」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夢想。自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失敗以後，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毛澤東又找到了實現這個理想社會的新道路與新形式。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是爲著名的《五·七指示》：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衆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衆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爲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爲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

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在信中，詳盡地描述了這套新的形式：「一大二公三純」，「亦工亦農亦文亦武」，以階級鬥爭爲綱，逐步消滅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是自給自足、封閉式的社會。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是他畢生向往和憧憬的理想社會。毛澤東將這個「五·七指示」作爲建設「新世界」的綱領。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是「第二次革命」。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澤東心中湧現一股類似「三大戰役」時的那種亢奮。他需要發洩一下，需要爲這個「第二次革命」向全中國和全世界發出一個轟轟烈烈的宣告。

毛澤東選擇了浩浩蕩蕩的萬里長江。

七月十六日，七十三歲高齡的毛澤東暢游長江，游程三十華里。這是毛澤東重返中國政治舞台的一次「亮相」，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游長江。

六、毛抓住劉的痛腳：「鎮壓學生」

毛澤東於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得知毛澤東已經回到家，劉少奇立即趕去豐澤園，想向他匯報一下工作。但門衛通報後傳出來的話是「主席要休息」。可是劉少奇發現豐澤園的門前停放着好幾輛訪客的

汽車。劉少奇感到一片茫然，只好怏怏地回去。

毛澤東的客人是康生、江青、陳伯達。他們帶來了攻擊工作組和中央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的材料，匯報了「工作組鎮壓學生」的情況。毛澤東一方面收集打擊劉少奇的材料，另一方面又與心腹們密謀召開中共十一中全會。

直到第七天，七月二十四日，劉少奇才見到毛澤東。毛澤東闢頭便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的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⑱

劉少奇感到一陣愕然。

毛澤東還說：「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衆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⑲

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並作出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織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我們都不行，我也不行。」⑳

毛澤東給劉少奇定下了「鎮壓學生運動」，犯了「方向性錯誤」的性質，毛澤東認爲時機成熟了，需要召開中央全會，來對劉少奇進行組織處理。於是，毛澤東在同一天（即二十四日）宣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讓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

工作組派出時，誰也沒有說過派工作組有甚麼不對。毛澤東沒有反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沒有反對，

劉少奇於是派出了工作組。可是江青一伙在暗中煽動和支持學生與工作組對立，這便是劉少奇所說的「後面可能有高級幹部。」劉少奇落入了毛澤東預先設置的政治陷阱中，「雞蛋裏挑骨頭」，被羅織了「鎮壓學生」的錯誤，並被上綱上線爲「方向性錯誤」。而毛澤東也再一次個人推翻中央政治局集體決定，再一次「覆手爲雨」地提出撤銷工作組。

毛澤東用陰謀詭計擊敗了劉少奇。自從「大躍進」以來，劉少奇第一次處於政治上不利的地位。毛澤東緊緊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要從組織上打倒劉少奇。

下一個回合，便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①：轉引自葉永烈《江青傳》二九二頁。
②：江青《爲人民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③：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年代》六一一頁。
④：引自葉永烈《江青傳》二九五頁。
⑤⑥：引自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二八八頁。
⑦：引自叢進《典折發展的年代》六一二頁。
⑧：江青《爲人民立新功》。
⑨：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時代》六二五頁。

⑩：同上。

⑪：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三七頁。

⑫：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黃琤《劉少奇一生》。

⑬⑭：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三〇頁。

⑮：黃琤《劉少奇的最後歲月》一三〇頁。

⑯：同上，十五頁。

⑰：黃崢《劉少奇一生》四二八頁。

⑱⑲：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四六頁。

⑳：同上，四八頁。



第二章 毛澤東換「接班人」劉少奇失勢

一、不尋常的「十一中全會」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開。

這是一次不尋常的中全會。

不尋常之一是，按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每年至少兩次」。可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四年來，中共沒有召開過任何的中央全會。

其原因，就在於毛澤東身上。

自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遭到慘敗，中國蒙受了連續三年的「天災人禍」，死了四千萬人，國民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元人民幣。對造成如此巨大災難的錯誤，作爲最高司令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否應該召開中全會，對「大躍進」的錯誤給予檢討和總結，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歷史作個交待呢？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不想做這樣的檢討和總結，因爲「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他難辭其咎。

同時，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第一線的領導人，抵制毛澤東的反對和干擾，堅決執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在這一正一反的鐵的事實面前，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當中，毛澤東的威望急劇下降，而劉少奇的威望直線上升。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召開中央全會，只能是爲劉少奇評功擺好，歌功頌德。毛澤東不願意做這種損己利人的傻事。

這就是毛澤東不遵守黨章，在四年之內沒有召開中央全會的原因。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才提出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不尋常之二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在倉促的情況下決定的。毛澤東於七月十八日由外地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四日發出開會通知，七月二十七日便開始預備會議，八月一日全會便正式開幕了。

拖了四年不開，一旦要開時又如此急切，這正是毛澤東的玄機所在。

在這種情形下，於是就出現了第三種不尋常的情況：全會還沒有召開，可是會議公報的初稿已經在陳伯達的主持下寫好了。

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驚：

第一，公報初稿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

第二，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毛主席後邊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引述了劉少奇幾天前發表的一段話。那是七月廿二日，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越南胡志明七月十七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公報初稿中引用了劉

少奇聲明中的幾句話，在送審中被毛澤東勾掉了！①

這些不尋常的情況表明：十一中全會由頭到尾都是由毛澤東密謀操縱的，大會的主題就是：打倒劉少奇。

八屆十一中全會於八月一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首先由毛澤東宣布開會，然後作了簡短的開場白：「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開五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三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現在請小平同志宣布幾件事情」。

鄧小平宣布的是出席人員的情況和議程。

爲甚麼隔了四年沒有開中全會，爲甚麼現在要開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甚麼，作爲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甚麼也沒有說。

接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的報告。報告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所做的工作。第二部分講文化革命以來的工作，並在工作組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

劉少奇講話中，毛澤東頻頻插話，對劉少奇進行指責、詰難，會場上的氣氛弓張弩拔。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正式寫了一個不要工作組的書面提議，有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的意見還是要工作組。最後我也發言，說我是主張要工作組的，工作組這個方式比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澤東：「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反駁道：「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又解釋：「當時我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組織已經癱瘓，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怎麼會中斷呢？」

兩位主席唇槍舌劍，會場上寂靜無聲。

劉少奇接着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消工作組……。」

毛澤東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厲聲說道：「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完全是錯誤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衆，阻礙群衆的作用，起了壞作用。」②

在小組會上，陳伯達、康生、江青四處煽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江青鼓動陶鑄在會上發頭炮，陶鑄不答應，結果是謝富治（公安部長）發了頭炮。

會上，很多老幹部對批判劉、鄧不可理解，許多人不是沉默不語，便是放放空炮，有的還表示了明顯的讚揚和同情，對劉少奇的處境表示不平。有一次，劉少奇到一個小組去聽取批評意見，中場休息時，中共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特意走到劉少奇身邊，親切地說道：「少奇同志，有時間我要向您匯報女工工作問題！」

劉少奇聽出這是正義之聲，緩緩地站起來，環顧周圍那些默默地注視着這一幕的人淡淡笑了笑說

道：「錯誤與同志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陳少敏強忍着的熱淚一下子湧了出來。

正是這位陳少敏，在一九六八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決江青等人炮製的劉少奇專案報告時拒不舉手。會後她也被打倒。

會議進行得並不如毛澤東預計的那樣順利，會議拖延了。毛澤東於是加重進攻的火力，更加猛烈地批判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是路線錯誤」。

劉少奇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接着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在發言中講到我們有強大的軍隊，不怕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③

這已經不是正常的，同志式的口吻了。

在毛澤東的咄咄逼人的高壓之下，劉少奇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

然而毛澤東並不滿意。因爲毛澤東並不是想讓劉少奇通過檢討而過關，而是想將他置於死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二、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劉少奇跌至第八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六月二日的《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文章的左面，寫下了《我的一張大字報》，當時尚沒有標題，落款爲「八月五日」。秘書徐業夫將它在另一張紙上謄清，毛澤東在稿上加了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後交中央辦公廳付印，準備印發與會者。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八月七日，大字報派發給與會代表。

形勢急轉直下。

八月五日下午，劉少奇照常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接見了贊比亞代表團。回到家後，周恩來打來電話，要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這顯然是毛澤東的意見。

劉少奇是在八月七日收到毛澤東大字報的打印件的。秘書們發現，自從那以後，劉少奇的生活習慣也有了變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覺之前到院子裏散步半個小時以外，其餘時間是不

出來散步的。而現在，他卻經常到院子裏或在他的辦公室門口那條狹窄的走廊裏，獨自低頭默默地走來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閉目沉思。本來就寡言少語的他，現在話就更少了。④

多年生活習慣的改變，說明了劉少奇所受打擊之強烈與嚴重。劉少奇至此才大夢初醒，原來毛澤東一直在算計他。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獲全會通過。

八月十二日是全會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進行中央領導機構的改選。中央委員們在事先印好的名單上畫圈。新選出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是：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劉少奇從第二跌到第八。

毛澤東大獲全勝。劉少奇從此走向滅頂之災。

---

①：轉引自葉永烈《陳伯達傳》三七一頁。

②：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③：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五二頁。

④：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四九頁。

第三章 批判不斷升級 劉少奇陷滅頂之災

一、徹底打倒的訊號：批判資反路線

按常理說，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已經失勢，毛澤東也奪回了對黨政軍的最高控制權力，毛澤東應當收手，毛、劉鬥爭應當告一段落。

然而，毛澤東不是常人，因而也不能用常理去衡量他。

建國以後，對待黨內鬥爭，毛澤東的方針再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除惡務盡」。其原因固然是那種陰險狠辣的特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達到了登峰造極；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建國後毛澤東執行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失去了眞理，失去了人心，當黨內鬥爭（實際上是對毛澤東錯誤路線的批評反對）發生後，毛澤東不但要將對手打倒、鬥臭，還要將其置於死地，永世不得翻身，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地位。毛澤東對彭德懷是這樣，對劉少奇就更是這樣。這正是心虛膽怯的表現。

劉少奇與彭德懷不可同日而語。劉少奇具有更加雄厚的政治資本，在全黨、全軍和全國的威望更高。對毛澤東來說，劉少奇是個更具威脅，更加危險的敵人。而且，在打倒劉少奇的理據上，毛澤東更加理虧和站不住腳，更加不得人心。對此，毛澤東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劉少奇一棍子打死。劉少奇遠非是死老虎。

毛澤東的憂慮很快得到證實。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從北京到各地，廣大幹部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及對劉少奇和工作組的批評，表示極大的不理解和不滿，進行強烈的抵制。林彪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剛才說了中間有一些頂牛，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說的，『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眞，很不得力……』一直到這次會議以前，我看還是這樣的情況。」①

「兩頭」是指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等一干人，以及紅衛兵和造反派。無論是毛澤東這一頭還是造反派這一頭，在當時都是少數派，廣大的群衆，尤其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廣大幹部，則是「很不理解」的多數派，與毛澤東和造反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頂牛」，使得「文化大革命」不能順利開展，肅清劉少奇的影響就更加談不到。劉少奇背後有這麼大的幹部和群衆力量的支持，毛澤東感到極大的不安與憂慮，以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則極爲惱火。

於是，毛澤東在十月一日提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開始向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發動總攻擊。

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操縱下，十月六日，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爲「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集十萬人，舉行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江青與張春橋親臨講話。

此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打倒劉少奇」的新階段。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爲中心內容的中央工

作會議。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中央各部委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面對着全國廣大幹部的強烈抵制，毛澤東不得不採用軟硬兩手策略，一方面指使陳伯達、林彪唱紅臉，在大會上作報告，點名攻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另一方面他自己唱白臉，發表一些安撫人心的講話，「我不是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着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毛澤東還說：「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和烯泥……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②

於是，在當時和後來，人們都說：毛澤東並不想將劉少奇一棍子打死。其實這只是假象，是地地道道的策略。

二、劉少奇的第一次「自我檢查」

劉少奇本來有份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到臨開會時，中央辦公廳又打來緊急電話說「爲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慮問題，不要去參加會了」。③

自從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處福祿居比過去安靜多了。打參加革命以來，一直緊張忙碌的劉少奇，一下子投閒置散起來。在讀書看報之餘，劉少奇便按照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中的意思，開始寫書面檢查。

九月十日，檢查寫完了。劉少奇讓秘書把檢查稿送呈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那邊很快有了回音，那是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妥一些，請酌定。④

劉少奇立即給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寫信：

恩來同志：

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並請他們提出意見，退還給我，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志在八天之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⑤

周恩來很快照辦了。劉少奇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檢查。

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會議上分別宣讀了他們的檢查。劉少奇的檢查如下：

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進行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爲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北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我這一次犯嚴重的路線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舊政協會議開過後，我替中央寫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將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對於當時時局的這種估計是錯誤的，有和平幻想。雖然，在這個指示上同時提出練兵、減租、生產三項中心工作，是不錯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會議，沒有系統地全面地解決當時分配地主土地問題，沒有能够糾正當時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如殺人過多，侵犯一些中農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糾正當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某些過份性急的情緒和作法，同時提出

消滅城市的封建把頭；但是，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沒有強調指出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以後整個歷史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錯誤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鄧子恢同志砍掉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講過的，沒有遭到反駁，事實上就批准了他的計劃，他就在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加發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我這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是和過去我所犯的這些錯誤有聯繫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用我的名義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以後我又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發言。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實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成立人民公社以來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份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已經開始逐步好轉。在這種對於當時形勢的基本估計下，不論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言中，對於當時的困難都講得過多了，過頭了，對於前途，有時也說得暗淡，對於幹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生了不好的影響。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

更嚴重的錯誤，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一九六二年的國家預算，發現了當年的預算有幾十億赤字，因而對於當時的財政經濟的困難形勢，就估計得更嚴重了。認爲「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

常時期」。陳雲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作了講話。陳雲同志的這個講話，是根據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的意見加以發揮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發了陳雲同志的講話給各省、市、區黨委，要各省、市、區黨委一級的黨員幹部「認真討論。在討論中，應當鼓勵大家發表各種不同意見，並且應當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在全國各地鼓勵了各種歪風邪氣的出籠，翻案風，單幹風都出來了，還有些人就根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就在許多地方把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減基本建設投資，對於許多已經開工的工程項目大量下馬，以至有些必須繼續建設的工程項目，例如大三線建設的某些重大項目，也錯誤地下馬了，而某些應該削減的投資，又没有削減。

由於我當時過份信任陳雲同志，並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與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陳雲同志作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毛主席此時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幾位同志到毛主席那裏匯報了北京討論的一些情況，並把已經擬好的中央批發陳雲同志的講話的文件送請毛主席批發，我後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贊成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作法的。

鄧子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説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没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後，他就在好幾處幹部會議上鼓吹包産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估計之後，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没有把他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但是

我已經感到緊張，感到形勢嚴重，因而急於請求毛主席回北京來。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到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以前，我在這段時間內所犯的這些錯誤，是一種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從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後，就着手起草「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以後又起草「關於商業工作的決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形勢、矛盾、階級與階級鬥爭問題進行了討論，九月又召開了十中全會，通過了上述兩個決定，並發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中全會公報。這樣，才把我這一次犯的錯誤糾正過來，把當時的局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之後，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親自領導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個十條）之後，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擬出了「第二個十條」（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於十一月十四日發出。這「第二個十條」是怎樣擬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個十條」出來後走了七個省，回來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第二個十條」是基本上根據彭真在這個報告中的思想擬出來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覺得「第二個十條」中有些規定不利於放手發動群衆，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發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華東幾個省市，中南各省和雲南都講過話，在北京也講過話，在這些講話中，我強調了要各級領導同志到農村去蹲點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本來是對的。但是強調得過份，有些絕對化，這就是錯誤的。此外，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在這時以前的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敗的。對當時各地方許多單位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對幹部中犯四不清錯誤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因而對於當時工農業生產形勢好轉的原因的某些解釋也是錯誤的。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應當在蹲點、發動群衆鬥爭的過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況，才能把情況調查清楚，認爲照毛主席以前所說的開調查會的辦法不够了，有的時候又說不完全適用了。這在事實上就否認了毛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這是十分錯誤的，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在這段時期中，我過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個大隊蹲點的經驗，讓她在幾個地方作了介紹，並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薦聽聽她的介紹，後來又把她的講話記録批發到全國，這就給許多同志以極不好的印象。其實，桃園蹲點工作隊的做法，在當時就是有一些錯誤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的上述錯誤並没有改正。我在這次會議上說過，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說是黨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條上所說的，這兩種提法，没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今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只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是同毛主席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居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階級矛盾，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我正是在這種時候，忘記了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這就是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錯誤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我的這次錯誤，也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二十三條」之後，才糾正的。「二十三

條」上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把打擊對象縮小到少數人身上。

由於我在過去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特別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傾錯誤，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爲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又是從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後，由毛主席親自糾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討論後，在七月二十四日決定撤退各學校和一些機關的工作組。隨後，召集了有各地方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八月一日召開黨中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公報，在全會後期，討論了關於我的錯誤問題，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新的選擇，全會一致決定：由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爲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一些改變，是完全必要的，對全黨全國有極爲深遠的歷史意義，對世界革命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完全擁護黨的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的變動。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黨內其他許多同志也遠比我高明。我對十一中全會和毛主席的一切決定，決心嚴格遵守，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所應當遵守的紀律，決不在任何人面前搞兩面派。⑥

劉少奇雖然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但會議的一些情況還是隱隱約約聽到。如毛澤東所說的「也不

能全怪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劉少奇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等等傳到福祿居後，「劉辦」的秘書們由衷地感到高興，大家議論紛紛，認爲「聽毛主席的口氣，少奇同志沒有路線問題了」，「對少奇同志的問題，毛主席可以一錘定音的」，大家堅信「少奇同志可以過關了」。

「然而，我們天眞的幻想，很快就被無情的事實撕得粉碎。發給我們的少奇同志的檢查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批語，更沒有傳達毛主席的講話。

這是爲甚麼呵？困惑和疑慮重新籠罩在我的心頭」。⑦

由於劉少奇仍是中央常委，自八月十八日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劉少奇都有參加。在八月十八日那一次，休息時劉少奇坐在靠邊的一張藤椅上，默默地抽煙，一面拿起一張報紙隨意翻着。這時，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走過來向劉少奇打招呼，攀談了幾句後，劉少奇指着報紙說：「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爲甚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重大（毛澤東將聶元梓的大字報比做「巴黎公社宣言」——作者註）」。伍修權無法作答，笑了笑走開了。⑧

在十一月三日第六次接見那天，休息時劉少奇遇到了鄧小平。

劉少奇問：「小平同志，你怎麼樣？」

鄧小平笑了笑說：「橫直沒有事。」

劉少奇也笑了笑說：「沒事，學習。」

自一九五三年鄧小平由四川調到中央工作後，便與劉少奇共事。「八大」以後，劉少奇負責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鄧小平負責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兩人的工作交往相當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兩人又

同時成爲「天涯淪落人」。誰也想不到，這次短暫的面晤，竟是他們最後的一次談話。

三、「大批判」與劉少奇的第一次答辯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社會上、中南海裏對劉少奇的批判有增無減。每天，劉少奇仔細地閱讀孩子們從外面帶回來的紅衛兵小報、傳單，上面滿是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尤其是「中央文革首長」如江青、陳伯達、戚本禹等人的講話，更是字字見血，句句着肉。

面對着江青、戚本禹一伙策劃中南海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的攻擊和誣蔑，劉少奇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將信將疑。於是便決定召開黨支部會議（劉少奇隸屬「劉辦」黨支部），要求劉少奇解答工作人員的提問。

劉少奇也預料到工作人員開會的目的，於是在坐下後便說：「前一段因爲忙，沒有機會聽你們的意見，現在我希望你們坦率的同志式的給我提意見。丟掉缺點錯誤不可惜，今後可以更好地工作」。劉少奇顯得很平靜。

「劉辦」黨支部書記劉振德首先發言，他說：

我們在你身邊工作了這麼多年，看到你總是廢寢忘食地工作，大家對你很敬佩。你現在犯了錯誤，我們感到很難過。外面傳說很多，許多事情我們都不清楚，想請你解答一下。

「可以！」少奇同志回答得很堅決。

問：「我們現在只知道你的錯誤是因爲派工作組，派工作組怎麼不請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點燃一支煙，答：「請示也會犯錯誤，我没想到派工作組會犯錯誤。同意派工作組的同志們也没想到會犯錯誤。這是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問題。」

問：「你們在杭州開會，談過派工作組的事嗎？」

答：「談過。毛主席委托我和鄧小平同志相機處理。毛主席説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因爲我心中無數，感到很難領導運動，請求毛主席回來主持工作，毛主席説暫時還不準備回來。」

問：「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線工作，怎麼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麼個搞法？」

答：「這個問題在撤出工作組時，我就講過了，不曉得就是不曉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評有人對文化大革命很不認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評我的。正是因爲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組嘛。」

有位同志説：「中央發表的社論説，犯了路線錯誤的人，也還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堅持錯誤，矛盾就要起變化。我們希望你趕快改正錯誤，毛主席不是説改了就好嗎？」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説：「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錯誤，首先需要弄清錯誤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給我時間，現在還没有看到一篇説清楚爲甚麼派工作組就是路線錯誤的文章，我將努力去認識。」

問：「毛主席在大字報中説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評過的包産到户問

題？我記得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說他革了一輩子命，革來個包產到户。」

答：「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後，陳雲同志提出了農村包產到户的建議。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陳雲的建議。毛主席回來後批評我不頂住。」

問：「你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對你犯錯誤的處理？」

答：「八居十一中全會，中央常委作了變動，我没有意見，再變動我也没有意見。我是四平八穩，求穩怕亂，所以没有資格領導文化大革命。歷史將證明，這次文化大革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這樣，在沉悶的一問一答中，時間已過了一個多少時。這時，光美同志說：「少奇同志很疲勞，今天是不是就談到這裏。」⑫

四、劉少奇的第二次答辯

時隔不久，對劉少奇的「批判」越來越升級，大字報鋪天蓋地，抄大字報便成了劉振德等工作人員的一個任務，大字報中捎帶着對「劉辦」工作人員的冷嘲熱諷，還有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大家感到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

根據多年的政治經驗，劉振德等人將中南海的這一切與毛澤東聯繫起來。正是「風起於斯，亦止於斯」。劉振德等人熱切地盼望毛澤東的表態，因爲只有毛澤東才能扭轉和制止目前的局面。然而，等來

等去都聽不到毛澤東的聲音。

在中南海造反派的壓力下，「劉辦」黨支部召開了第二次「答辯會議」。下面是劉少奇的答辯：

問：「大字報上說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聽後沒有馬上解答。他緩慢地抽着煙，會議出現了短暫的冷場。

我們理解他的心情，對這些被斷章取義、肆意歪曲了的現西，他無法回答。但他也不願意拒絕大家的提問。

少奇同志往煙缸裏彈了煙灰，說：「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幾十年，不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遇過多次很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在這十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由於大家都缺少經驗，在一些事情形成決議之前，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甚至爭論。這種不同意見和爭論是正常現象，不能說成是誰反對誰，也不能叫不尊重。儘管我們有意見，但最後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辦事的。」

「大字報上說你在最近的中央會議上，頂撞毛主席，不讓毛主席講話。」一位同志追問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幾十年從沒有爭吵過，更沒有不讓人講話的事。」少奇同志氣憤中夾帶着不耐煩。

問：「大字報上說，你當國家主席是奪了毛主席的權。報紙上登你照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禮，是貪天功爲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會兒，説：「從當委員長到當國家主席，我都推辭過多次，好讓別人當。但最後中央已經定了，我只好服從。在商量國家主席人選問題時，毛主席説，當國家主席有點名氣，但是個苦差事，外事活動多，送往迎來，不自由，干擾讀書和研究問題，他不當了。爲了讓毛主席專心研究問題，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見。這就是事情的經過，怎麼能説是奪權呢？」

他吸了一口煙，又説：「在報紙上登我的照片，當初我是不同意的。因爲我們是黨領導一切，毛主席是黨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出這裏面有個對外的問題，當時毛主席也説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議登我的照片時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點，毛主席馬上説，爲甚麼要小一些，一樣大，這事就這樣定下了。當時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現在斷章取義的傳出來，不知道是何用意？」

問：「大字報上説，你一九四九年春天到天津去宣揚要發展資本主義，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和剛開過的七届二中全會唱對台戲，你去的時候，也没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當時我受中央的委託到天津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同許多幹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談過話，我講的就是二中全會的精神，絶不是唱對台戲。你們可以看看二中全會文件和我的講話記録。因爲這些話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談會上即席講的，不可能逐句逐字去推敲，後來覺得有些話不那麼準確，有些話也可以不那麼説。」

「你説過『剥削有功』嗎？」有人問。

答：「我是從一個歷史的角度説的。」

看到大家驚訝和不解的樣子，光美同志說：「現在年輕人一聽要發展資本主義，就說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但要了解到講話時的歷史背景，就不難理解了。那時，我們黨還允許民族資本家存在，允許僱工。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話：「這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六字方針」。）我還記得少奇同志對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說，你們不僅要趕快恢復生產，還要發展生產。還鼓勵他們多辦工廠，辦一個好，辦兩三個更好，如果說剥削有罪，他們一個工廠也不會開辦了。」

少奇同志接着說：「表達不够恰當的話，我早在一九五四年就作了自我批評，我在天津的講話，在其它一些城市也傳達了，並沒有造成壞影響，也並沒有因爲我的講話，使天津的形勢變壞，而是好起來了。好在這些事情都不難弄清楚。」

在被問到光美同志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問題時少奇同志說：「那天，中央幾個領導同志在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主席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少奇同志的司機站起來說，是我從大會堂回來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會堂講了以後，大家認爲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主席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桃園經驗在當時是比較好的，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問：「大字報上說林彪在東北期間，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這樣？」

答：「有支持不够的時候，不能說不支持。林彪同志在東北工作期間，不是同我個人關係。不論表揚，還是批評他，都是由中央書記處集體討論決定的。對他有些批評，是正常的。總不能支持錯誤的東西吧。對他在東北期間工作的評價，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曉得

現在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甚麼意思？」。

問：「大字報上說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右傾投降主義？」

答：「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舊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決議。在一月十日我黨的停戰會上，就有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內部指示，說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我提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同在此之前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沒有原則區別。後來只有高崗攻擊過這個提法，毛主席批駁了他。」

問：「大字報上說，在重新發表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中，你只提出做馬列的好學生，既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學生，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說你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同林副主席唱對台戲。這和毛主席在大字報中批評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有關嗎？」

少奇同志回答說：「關於一九六二年發表那篇文章的一些過程，外面的人不知道。還是在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就曾建議編輯出版我的選集。當時我不同意。我說除了編輯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編個人的選集了。我建議可以編輯出版中共中央文集。這種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後來毛主席又多次提出要出版我的選集的事。爲此，中央書記處還作了決定，又組織了編輯小組，我只好同意。」

他說到這裏轉過頭來問我（即劉振德）：「這事你知道吧？」

我答：「知道」。

「我們在湖南蹲點時，編輯小組的同志還到長沙向少奇同志匯報了選目問題。」光美同志插了一句。

我補充說：「機要檔案處的一個同志也去了，他是編輯小組的工作人員。」

光美同志又說：「當時少奇同志表示，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不能不把精力集中研究和解決當前的問題上，沒有時間去看自己的稿件。」

少奇同志說：「這件事一直拖到一九六二年。他們說可以先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篇，先是編輯小組的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也作了一些修改，中央書記處也同意了。」（我插話說：「是在北戴河修改的。」）

「這篇文章是我在一九三九年寫成的。即使修改，也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去加一些當時還沒有出現的事。」少奇同志繼續說。

會後，我們把記錄整理一下，起了個題目：劉少奇同志的答辯。然後寫在幾十張紙上貼了出去。但很快被撕了，並貼上了批駁我們的大字報，說我們被劉少奇利用了，是爲劉少奇放毒。

因爲有的造反派，已把少奇同志當作敵人了，所以在批鬥會上不論少奇同志說甚麼，都不被接受，不是說他狡辯，就是說他放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次，造反派還念了毛主席的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會後，光美同志痛心地說：「我們不能說話了，說誰不好，誰就成了好人，說誰好，反而害了人家。既然剝奪了我們的發言權，還質問我們幹甚麼？」⑩

五 匿名信與宋慶齡贈書

在劉少奇被攻擊、批判的同時，「劉辦」不時收到社會上寄來的匿名信，表示對劉少奇的支持和同情，對「文化大革命」的強烈不滿，說「毛主席被奸臣包圍了」，「千古奇冤，民族大難」，「我們對您非常同情，您不理解，我們更不理解」。

有一次，從外面寄來了一卷紅衛兵小報，外面是張「百丑圖」，畫的是以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爲首的「走資派」抬轎子，吹喇叭，而轎子中坐着的是劉少奇。裏面夾着一封信，信中支持劉少奇，痛罵林彪、江青之流外，還說：「我們還年輕，將來爲您翻案！」⑪

那張「百丑圖」劉少奇看了後，在辦公桌上放了好幾天。

工作人員們抄來的大字報，以及孩子們從外面帶回來的紅衛兵小報、傳單等，成了劉少奇唯一的消息來源，他看得十分仔細，有的還看了許多遍，極力想從字裏行間捕捉到「旗幟」毛澤東的訊息。

當時，抄家已成風。劉少奇的家被抄已是早晚的事。於是劉振德向王光美建議，將收到的那些群衆來信妥善處理，「寫這些信的人是冒着很大風險的，要注意保護他們」。王光美於是將這些來信撕碎，扔在馬桶裏衝掉。

不久，外面寄給劉少奇的信都被拆看，再也收不到那樣的支持信了。

隔不幾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戚本禹的支使下來抄劉少奇的家。除了一些紅頭文件外，他們想要的材料一點也沒有抄到。

時近一九六六年的歲末，天氣越來越冷，對劉少奇的批判也越來越升級。正是烏雲壓頂、寒流滾滾，劉少奇已陷入危境，許多平時同劉少奇要好的人怕受牽連，都躲得遠遠的。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卻派秘書給劉少奇和王光美送來剛出版的《宋慶齡選集》，還附有一信，信封上親筆寫着「敬愛的劉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收」，書的扉頁上也赫然寫着：「請劉主席、光美同志審閱指正。」同時，宋慶齡還給劉少奇的孩子送來了賀年卡、日記本和糖果等新年禮物。

正是「患難見眞情」，宋慶齡既不怕國民黨蔣介石，也不怕共產黨毛澤東。王光美不禁爲宋慶齡的這股眞情和凜然正氣感動得熱淚滾滾。⑫

懾於毛澤東的淫威，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內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得到社會上和中共黨外人士的同情與支持，正是公理自在人心中。這是劉少奇在最後的歲月裏所得到的一點安慰。

六、「智擒王光美」與揪鬥劉少奇

踏入一九六七年，劉少奇的處境更加險惡了。

一月一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劉少奇的住處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似是送給劉少奇的「新年禮物」。

一月三日，在戚本禹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與此同時，北京建工學院的紅衛兵與造反派要劉少奇去作公開檢查。

一月五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說：「北京建築工業學院井崗山紅衛兵總部來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時以前到該院作公開檢查。另有該院八一團紅衛兵來信，也要我到該院作公開檢查。我是否到該院去作檢查？請主席批示。」⑬

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周恩來：「總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⑭

周恩來於七日凌晨接見該院學生代表，制止他們逼迫劉少奇到該院作檢查。

一月六日，發生了清華大學造反派揪鬥王光美（紅衛兵小報稱之爲「智擒王光美」）事件。王光美曾參加派往清華大學的工作組。

該日下午，劉少奇的衛士組接到一個自稱是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人打來的電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車軋斷腿，需要馬上截肢，家長必須到我們醫院來簽字，手術枱都準備好了。

因爲周恩來一再叮囑劉少奇夫婦不要走出中南海，因此秘書們認爲先讓劉源源和劉亭亭到醫院去看看，如確需動手術，他們也可代表家長簽字。

源源和亭亭沒有回來，也沒有電話。這時，醫院又打電話來催促，秘書們只好把事情告訴王光美，她聽後驚呆了，連話也講不出來，雙眼含着淚水直瞪瞪地看着劉少奇。劉少奇立即決定：「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

王光美說：「總理不讓我們出中南海！」

劉少奇堅決要去醫院，衛士組馬上通知中央警衛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那兩方面還以爲劉少奇需要住

醫院。

衛士組陪同劉少奇和王光美一起到了醫院。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布下的騙局。他們抓住劉平平爲人質，目的是抓王光美到清華大學去批鬥。劉源源和劉亭亭去後也被他們扣押。這些穿着白大褂、僞裝成醫生護士的人，萬萬想不到劉少奇也來了。當他們遇到劉少奇那憤怒的眼光，頓時驚慌失措。王光美明白了一切，便挺身而出，說道：「那好，除了我，你們都走！」

這時造反派中有人喊道：「把劉少奇也扣下！」

衛士們和公安人員立刻擁簇着劉少奇上汽車。

王光美憤怒地向造反派們說：「我抗議你們製造的這種騙局！」

造反派們回答：「抓你是江靑的指示，辦法是我們想的」。

王光美被押到清華園批鬥，後來在周恩來的干預下被釋放。

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在釣魚台十六號樓召集中央辦公廳一些造反派開會，說：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爲甚麼不去鬥他們？

當晚，中南海的造反派「紅色造反團」一百五十多人蜂擁到劉少奇的住處福祿居，要衝進來揪鬥劉少奇。在大門口，哨兵擋住了他們，造反派便硬要往裏衝。警衛劉少奇的解放軍戰士都出來了，雙方撕打起來。劉少奇的秘書打電話報告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樹槐，衛士組也報告了警衛局。然而他們得到的答復卻是：把大門打開讓他們進去！

劉少奇、王光美被拉到院子裏批鬥。劉少奇被迫彎腰，王光美則被迫站在一張三條腿的桌子上。

造反派們先高呼一陣口號，然後便逼問：

「你爲甚麼反對毛主席？」

劉少奇回答：「我過去不反，現在不反，將來也不反。」

「你帶毛主席語錄沒有？」

劉少奇從口袋裏拿了出來。

「第一頁是甚麼？」

劉少奇翻開認眞地念了一遍。

「不要念，你給背。」造反派發難。

「要我背，背不出來。你們可以問我毛主席的哪一篇文章是甚麼內容，毛主席當時爲甚麼要寫這篇文章。我是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毛主席的每篇文章我都看過多次。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領會它的精神實質，我不贊成背個別詞句的學習方法。」

劉少奇的這番話，又招來了麻煩。造反派有人喊：「你口口聲聲說不反對毛主席，可是你明目張膽地反對背毛主席語錄、明目張膽地和林副主席唱對台戲。」

劉少奇還是不急不躁地回答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毛主席是針對甚麼寫的，在當時起到了甚麼作用，在理論上有甚麼新的創見，這些才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你現在沒有資格給我們講理論，不是你教訓我們的時候了。背誦語錄是林副主席提倡的。」

這時，又有人喊：「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這群烏合之衆亂哄哄鬧了一陣就散去了。⑮

從此以後，福祿居就成了市場似的，誰都可以進來，進來了後又可以四處亂竄，可以隨心所欲，包

括貼大字報、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失去了人身自由。

七、毛劉最後一次會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給劉辦打來電話，說：「主席叫我去接劉少奇同志來大會堂談一談。我坐華沙牌小車去，你們就不要給他要車了。告訴你們的哨兵，不要擋我。」劉少奇的秘書將來電的內容告訴了劉少奇，但他沒聽明白，說道「再說一遍，我沒聽懂」。王光美將秘書的話重複了一遍，劉少奇才明白過來。⑯

使劉少奇感到困惑的，是這種安排的方式。此時此地，劉少奇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乃享有中共中央規定的各種生活待遇和保安措施，包括自己的座駕和司機。按正常的安排，毛澤東那邊打電話通知，劉少奇這邊便調車前往，既不需要徐業夫，也不需要「華沙」。

在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座駕，最高級的是斯大林當年贈送的「吉姆」牌轎車，有防彈設備，爲數又少，只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幾位最高領導人使用。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擁有自己的「吉姆」。物以稀爲貴，「吉姆」便成爲最高檔次的座駕。次一等的是中國長春汽車製造廠自製的「紅旗」牌轎車，是專爲中共領導人特製的，一律是黑色，車身較長，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再次一等的是從波蘭進口的「華沙」牌轎車，那是中共三流人物和一般工作人員普遍的座駕。徐業夫與「華沙」，顯然是毛澤東安排的。毛澤東本不需要派徐業夫來接，既使是要派自己的車來，也應該是派「吉姆」，而不是「華沙」。

因此，在這次安排中，是多了一個「徐業夫」，而少了一個「吉姆」。

由於沒有考慮的餘地，劉少奇站起來便作準備。由於毛澤東當時的住所人民大會堂與中南海僅是咫尺之遙，徐業夫說到便到，向劉少奇說道：「主席請你到他那裏談一談，跟我一起坐車去吧」。又向劉少奇的秘書解釋：「少奇同志的車子目標大，不安全」。

劉少奇順手拿起香煙和火柴就走出來，王光美跟在身後用手捋劉少奇剛穿上的衣服，又把上衣抽一抽，看得出她是在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

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毛澤東一見到劉少奇，便說：「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回答：「沒這回事，是個騙局」。

接着，劉少奇便主動地檢討自己的錯誤，之後，鄭重地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已不適宜擔任領導職務。提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子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聽罷沉吟不語。過了好一會才說：建議劉少奇認眞讀幾本書，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羅法寫的《機械人》及中國的《淮南子》。

毛澤東起身爲劉少奇送行，一直送到北京廳的門口。分手時毛澤東說：「回去後好好看書學習，保重身體」。⑰

這是毛澤東向劉少奇說的最後兩句話，而這一次會見，也是兩人自一九二二年結識以來的最後一次

見面。

偽善的毛澤東，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已秘密成立了置劉少奇於死地的專案組。公安部部長，中央文革成員謝富治在宣布這一決定時說：這是中央的決定，專案組的負責人是江青。同日，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秘密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授意他公開炮轟劉少奇、鄧小平，「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根據張春橋的授意，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徹底打倒以劉、鄧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聯合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參加者達十萬人；

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組代組長江青帶着其成員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堅決支持」；

與此同時，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公開宣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康生則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講話中公稱「劉少奇是赫魯曉夫」。

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的那兩條意見，既是「以退爲守」，又是向毛澤東的試探。毛澤東拒絕了劉少奇的要求，拒絕給劉少奇放一條生路。

作爲一個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和對毛澤東有深切了解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似乎從這次召見中預知了自己的命運。從人民大會堂回來後，劉少奇顯得平靜，有意地向正在焦急等待着他的王光美及孩子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眞學習，保重身體」，使那些缺乏世故的孩子

們「懸在心中的石頭一下子落了下來，心中暗想，情況也許會好起來。」

然而，劉少奇的秘書發現，第二天王光美神情諳然，完全沒有那種「心中的石頭落地」的喜悅。⑱

---

①：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〇九——二〇頁。

②：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〇八、一一四頁。

③：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五一頁。

④：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六〇頁。

⑤：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四四七頁。

⑥：台灣出版《劉少奇資料匯編》六二一頁。

⑦：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五一頁。

⑧：伍修權《往事滄桑》二七四頁。

⑨：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五二——二五五頁。

⑩：同上二五九——二六五頁。

⑪⑫：同上，二六六——二六九頁。

⑬⑭：《劉少奇年譜》六五三頁。

⑮：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八〇頁。

⑯：同上，二八二頁。

⑰：劉平平《勝利的鮮花獻給你》，見《緬懷劉少奇》四三九頁。

⑱：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八三頁。

第四章 羅織罪名

一、毛澤東的政治需要

在劉少奇、王光美遭受批鬥的同時，毛澤東正忙着指揮一場大戰役，那就是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革命」：不但奪了上海《文匯報》的權，而且還奪了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黨、政大權。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准了上海市的奪權，上海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①

毛澤東對於「文化大革命」怎麼革法，事先並沒有一套具體的計劃和步驟，而是「走着瞧」。爲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不能依靠劉少奇控制下的黨、政組織系統，只有發動群衆起來「造反」，「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得全國各級黨、政權力機構癱瘓了，天下開始大亂，生產出現停頓（上海便出現了停水、停電、停交通，造成巨大威脅，毛澤東才下令張、姚奪權）。毛澤東要堅持「文化大革命」，又不能長期地無政府、無領導，使全國生產停頓，於是只好破釜沉舟，全面向「走資派」奪權。這是毛澤東無奈之下的唯一的出路。在這種政治格局之下，劉少奇作爲

「走資派」的總代表，其徹底覆滅的命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澤東爲了打倒劉少奇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要堅持「文化大革命」，又必須打倒劉少奇。因此，打倒劉少奇，旣出於毛澤東的需要，又出於「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於是，在一九六七年開始，劉少奇的命運急轉直下。

就在毛澤東接見劉少奇的兩天後，中南海的造反派又一次衝進福祿居批鬥劉少奇、王光美。

一月十六日深夜，也就是毛澤東批准上海奪權的那一天，周恩來打電話給王光美，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

第二天，即一月十七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再次衝進來，要撤掉劉少奇的電話。劉少奇上前阻攔，說：「這是政治局的電話，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批示，你們不能撤，也無權撤！」②

一月十八日，造反派們又氣勢洶洶地闖進來，二話不說便將劉少奇的電話線扯斷，電話機也拿走了。從此劉少奇斷絕了與外界的直接聯繫。

劉少奇久久地站在那裏，像座雕像似的一動不動。劉少奇預感到，更險惡的日子來臨了。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陷害，欲置之於死地，中共黨內（包括上層領導）沒有人敢爲劉少奇鳴不平。倒是黨外人士章士釗大義凜然，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初上書毛澤東。章士釗對女兒章含之說：「這個運動再搞下去，國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劉少奇！這些傢伙要把中國毀掉」。「我要給毛主席寫信，請他制止打倒劉少奇，毛劉分裂就會使國家分裂。」

章士釗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象徵。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

章士釗一片正義、誠懇之心，躍然於紙上。

然而，章士釗太不了解毛澤東了。毛澤東於三月十日給章士釗回了這樣一封信：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爲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情況複雜，一切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吉安。

毛澤東三月十日

三月間，毛澤東還派人把當時江青整理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章士釗看後，接連數日，情緒低落，對章含之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係蓄意致他於死地！」③

二、欲加之罪：「招降納叛」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在黨內黨外、全國上下不得人心，引起了廣泛的抗爭與對立。那就是「三老」

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和「四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與中央文革發生嚴重衝突的「二月逆流」事件。

毛澤東心中很清楚，光憑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寫的那張《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那幾條，不但難於令廣大黨員、人民信服，而且在歷史上也根本站不住腳跟。要打倒劉少奇並且要令其永遠不得翻身，還得想出其他的辦法。

秉承毛澤東的意旨，江青一伙在專案組中首先搞了個「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大特務」的假案。

接着，毛澤東伙同康生、江青又搞了第二樁假案——「六十一人案件」。

關於一九三六年劉少奇經請示中共中央批准，決定讓國民黨獄中的六十一名共產黨員辦理自首手續出獄的經過，本書上文已有所述。此事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與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毛澤東商量、研究過後，才決定、批准的。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及當事人之一的薄一波都有證明。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首先是康生將此事翻出來，進行鼓噪和陷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康生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啓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隨信並附上一九三六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④

當時由於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等人已被造反派揪出來，「六十一人自首出獄」事件早已傳到社會上。然而，由於此事毛澤東當年有份參與決定批准，深知事情根本不是康生所說的那麼回事，因此沒有同意康生的說法，而批准了周恩來親擬的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四日對西北局關於紅衛兵追查劉瀾濤出獄問題的請示的批復，周恩來送審批復時給毛澤東的信說：「當時確爲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

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⑤

周恩來在批復中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⑥

然而，時至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的思想變了。出於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政治需要，毛澤東伙同康生、江青一伙重新撿起「六十一人事件」，作爲誣陷劉少奇的彈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經毛澤東審閱批准，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批示中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幹的」，劉少奇與張聞天作出了「叛賣的決定」。「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爲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⑦

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打成「叛徒」，便可順理成章地給劉少奇安上「招降納叛」，「拼湊資產階級司令部」，「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抗」的罪狀。問題在於，康生、江青等人這樣做，人們不難理解，而當年親自參與研究、決策，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的毛澤東，竟顛倒是非、栽贓陷害，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丑惡的行爲之一。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對訪華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甚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⑧

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康生派人對張聞天說：「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爲甚

麼承認是你批准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張聞天堅決拒絕康生的說詞，遭受迫害，被囚在小屋子中長達五百二十三天！⑨

康生還派人以「中央委員」的官位爲誘餌，要安子文證明「劉少奇是叛徒」。安子文寧可坐牢也不寫此假證明。⑩

康生等人還不許薄一波、劉瀾濤等人如實寫出毛澤東清楚知道他們一九三六年出獄之事，但他們還是寫了。

三、劉少奇最後的答辯

劉少奇問題再次升級的標誌，是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澤東下令批判劉少奇的代表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說：「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⑪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本書推崇備至，親自將它列爲整風運動的主要文件。當時，毛澤東正在爭取登上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寶座，正在圖謀建立由他控制的黨內的一統江山。劉少奇在這本書中宣傳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要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加強各個方面的自我修養等論點，正正符合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因此下令立即公開發表，並給予極高的評價。現在，爲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便又將這本書說成是「大毒草」，「蔣介石也可以接受」。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翻手爲雲，覆

手爲雨」也。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指示戚本禹泡製了批判劉少奇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批准，發表在一九六七年《紅旗》雜誌第五期上。文章宣稱：「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並將「帝國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帝國主義買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革命宣傳的應聲蟲」等等罪名加到劉少奇的頭上。

文章的末尾，還向劉少奇提出了八個「爲甚麼」，並提出了答案：

爲甚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爲甚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爲甚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爲甚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爲甚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爲甚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

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爲甚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爲甚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⑫

三月二十八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敍述了自己當時看這部電影的經過，駁斥張春橋的誣蔑，說明自己「根本沒有《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種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說出《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類話，要求中共中央調查。⑬

可是，信寄出後如石沉大海。當戚本禹的長文刊登出來後，劉少奇極度憤怒，神情恍惚，茶飯不思。

在外界的壓力下，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成立了中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戚本禹的長文發表後，工作人員要求劉少奇回答戚本禹提出的問題。這是劉少奇的第三次答辯。

一位同志說：「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條罪狀。」剛一說到這裏，少奇同志立即就激

動起來。他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說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說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對我說過它是賣國主義的？我又甚麼時候說過要當紅色買辦？他們要是光明正大，可以來和我辯論嘛；不是講大辯論嗎？戚本禹爲甚麼不來同我辯論？誰罷了我的國家主席職務？爲甚麼要剝奪我的發言權？憲法成了廢紙，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如同火山爆發，他將心中的疑慮和憤慨都倒了出來，我看見他那雙手的指頭都有些顫抖。

光美同志也氣憤地說：「用造謠、中傷、污蔑、栽贓的手段定人的罪，誰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問：「有人說八大報告中有些話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問題的提法等。報告不是大會通過的嗎，怎麼毛主席不同意就通過啦？」

少奇同志順手從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報告，語氣比較平靜的說：「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當問到「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八大報告爲甚麼沒有提」時，少奇同志說：「八大報告中寫不寫毛主席思想，在議論時意見也不統一。不主張寫的人佔多數，他們認爲毛主席曾多

次從宣傳文章中刪去這個提法，看來毛主席並不主張到處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那時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還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寫進報告也不會影響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是都在宣傳嘛，只不過沒有像現在這樣宣傳就是了。」

當問到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時，少奇同志的聲音雖然稍大了點但還是比較平靜的，他說：「一九三一年前後，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幹部，由於國民黨的搜捕和叛徒的出賣，被捕入獄，一直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我想：要設法營救他們，如果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就不好辦了，很有可能會把這批人給殺掉。九一八事變以後，在瀋陽獄中的共産黨員不是就被全部殺害了嘛。因此，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了黨中央，請中央決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復：同意這樣辦。」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了，並怒氣衝衝地站起來去拉他辦公桌的抽屜，嘴裏說着：「這個事我已向毛主席寫了申訴。」

這時，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說：「你是寫給毛主席的，在這裏拿出來也沒有用。」他才扭過身子，靠在抽屜那裏。但怒氣未消，「這批人出獄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論，幾十年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現在說成是叛徒集團，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說毛主席不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中央名義答復的，還是以個人名義答復的？」有人又問。

少奇同志很不耐煩地大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去問文革小組的人，去問戚本

禹！」

光美同志忙解釋：「當時毛主席不是總書記，可能不知道。」

後來，少奇同志在書面答復中，說是張聞天同志簽的字，還提到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

少奇同志穩定了一下情緒說：「這批人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難道這六十一位同志讓國民黨反動派都殺了我們就舒服了！現在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集團，將來，我們黨的歷史怎麼寫？」這簡直是血與淚的控訴啊！

過了幾天，少奇同志寫出書面答復，我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並罵我們「這樣做是爲劉少奇開脫罪責。」⑭

四月七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送上對八條問題的答辯。然而，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答辯完全置之不理。劉少奇就像一隻被扔進狼群的羊，孤立無助，求訴無門。

四、致劉少奇於死地的「叛徒、內奸、工賊」

爲劉少奇製造了「招降納叛」的罪狀以後，江青一伙還覺得不夠勁。要將劉少奇置於死地，還必須

有更加厲害的武器。江青認為最好是給劉少奇本人也戴上一頂「叛徒」的帽子。於是，江青指示專案組仔細捉摸劉少奇的歷史。專案組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劉少奇一九二五年曾在長沙及一九二九年曾在瀋陽被捕。就這樣，「叛徒」的帽子便「自然而然」地戴到劉少奇頭上。

為了取得「證據」，專案組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將與劉少奇一同被捕入獄的孟用潛「隔離審查」，在專案組一連七天的連續威迫審訊之下，孟用潛違心地講了劉少奇被捕後叛變的話，但第二天就申訴推翻了。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孟用潛共寫了二十次申訴，否定自己被迫而講的話，但江青不予理會。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潛寫的申訴信中說：「一九二九年在瀋陽被捕，我沒有叛變，在隔離審查過程中，我確實也交待過劉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後的叛變罪行。但是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

除孟用潛外，當年在滿州省委工作的幹部及一些與劉少奇有關係的人（甚至保姆、炊事員）也受到株連，拘捕，受審，逼他們作偽證。被專案組直接關押的有六十四人，「至於因專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關部門，單位收審的，那就更多了」，「關押人用了逮捕、拘留、監護、隔離審查、辦學習班等不同名義，但目的都是一個，就是要從這些人身上逼出能將劉少奇定罪的口供。他們將人抓來後，採取勒令交代、長期隔離、日夜審訊、輪番批鬥、軟硬兼施等手段，編造假情況，拼湊假證據。」⑮另據王光美在上海文匯報記者一九八〇年五月採訪的文章《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中披露，為了收集劉少奇的「罪證」，江青一夥「動員了四十萬人，查閱了四百萬卷敵偽檔案」。⑯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個專案組會議」上說：「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鬥，集中火

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鬥。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爺請他喝燒酒！」

經過如此二年的「苦鬥」，江青（當然包括毛澤東）給劉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三頂帽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上批示：「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廳在審問江青時，有如下記錄：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裏。」

法庭宣讀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法庭兩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見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講話録音。其中有江青說：「我現在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太惡劣了……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剮，萬刀割……」。

被告人江青聽了播放的録音後說：「沒有甚麼要說的。這是我對藝術家們談別的問題，大

概插了這麼一段。」⑱

---

①：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②：引自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五五頁。

③：詳見章含之《我與父親章士釗》，《文匯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④：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二二四頁。

⑤⑥⑦⑧：同上，二二六頁。

⑨：劉英《身處逆境的歲月——憶聞天》。

⑩：見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載安黎《須待歷史證明的話》。

⑪：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及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合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二五一頁。

⑫：《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⑬：引自黃崢《劉少奇一生》四五七頁。

⑭：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九一——二九四頁。

⑮：引自黃崢《劉少奇的最後歲月》一八四——一八五頁。

⑯：同上，第十一——十二頁。

⑰：以上引自葉永烈《江青傳》。

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第五章　劉少奇最後的苦難歲月

一、人身迫害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劉少奇獲悉清華大學造反派第二天要召開三十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還有彭眞、薄一波等三百人陪鬥。劉少奇女兒們在《勝利的鮮花獻給你》一文中說：

爸爸一聽，立即震怒了。他推開飯碗，大聲激昂地說：「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爲甚麼讓她代我受過？要檢查，要挨鬥，我去！我去見群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衆？」爸爸胸中的激憤終於像火山似地爆發了。

媽媽急切地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當然應該是我去向群衆檢查……」

「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動地說，「我絕沒有反過黨，沒有反過毛主席。別人反對過毛主席，林彪反過，江青也反過，我一直是擁護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幾十年裏，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有，但沒反過。工作錯誤有，但都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的。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爸爸說到這裏，把手中湯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顫抖了。「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

分爲二。爲甚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

爸爸繼續說:「去年八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衆鬥群衆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這麼多幹部都被打倒了,將來的工作誰去搞?生產誰來抓?」

我們凝神靜聽,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樣坦蕩,那樣光明磊落。爸爸神情嚴肅地望着我們,語氣堅定地說:「有人要逼我當反革命,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不論過去和現在,就是將來也永遠不反毛主席,永遠不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個革命者,生爲革命,死也永遠爲共產主義事業,一心不變。」

爸爸停了一下,長出了一口氣,似乎他的話已經說完了,激動的情緒也安靜下來,恢復了以往的安詳神態,親切地望着我們,緩慢地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裏,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媽媽哭了。她泣不成聲地說:「還不知道孩子們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會把骨灰給你們的。」爸爸語氣堅定地對我們說,「你們是我的兒子、女兒嘛!這一點無論甚麼人還是能做到的。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鬥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衆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着黨,永遠爲人民。」我們幾個孩子眼淚早已流盡,瞪大着眼睛,仔細靜聽,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記在心

裏。爸爸說完，站了起來，堅定而又響亮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說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間去了。

第二天清晨，王光美果然被清華大學造反派拉走，被揪到大操場批鬥。造反派強迫她穿上旗袍，戴上一串乒乓球做的「項鏈」，還對她拳打腳踢，施以種種人格汚辱。王光美在武力面前不屈服，堅持說理鬥爭。她嚴詞回答造反派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你們要是不擺事實不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鬥吧！」

王光美被鬥回來後，向劉少奇傾訴了滿腔的憤恨和冤屈：「他們打人罵人、侮辱人都幹了，他們批鬥我，爲甚麼還要彭眞、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老同志去陪鬥，這那裏是政治鬥爭，分明是在侮辱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呵！」王光美決定給毛澤東寫信。

劉少奇一直沒有出聲，他神情黯然，兩眼發直。那天晚上，他一口飯也沒有吃。從那以後，劉少奇的心情更加沉重，時常煩躁不安。有時廚師郝苗把飯擺好了，叫他去吃，他像沒有聽見似的，不說話，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給他煮了兩個鷄蛋，他發脾氣說是生的。郝苗耐心地剝開蛋殼，說：「跟平常一樣，不生」。過了一會兒，劉少奇突然醒悟過來，說道：「那我錯了，向你道歉。」①

五月，江青指使中共中央警衛局將爲劉少奇當了十八年廚師的郝苗抓走。罪名是「特務嫌疑」。郝苗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北平談判時爲中共軍調部當廚師時，就與王光美認識（王光美時任軍調部翻譯），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後，郝苗便爲劉少奇服務。這個生長在北京郊區農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的共產黨員，在十多年的服務中，與劉少奇一家結下深厚的感情，就如一家人一樣。「文化大革

命」中，劉少奇的孩子外出串連時，便是郝苗詳加安排，給他們糧票和生活費。將郝苗抓走，是對劉少奇精神上的打擊。

郝苗被抓走後，調來了一名廚師老馮。不久，這名廚師也被調走了。並且不再派來新的廚師。劉少奇被迫從中南海的大食堂打飯吃，有甚麼吃甚麼。由於劉少奇在革命年代患下嚴重的胃病，大食堂中的許多飯菜，劉少奇不能下咽。這是蓄意從肉體上對劉少奇的折磨。

具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的劉少奇，明白對手們的伎倆和用心。他明白自己的命運已經注定，他不能不爲自己的兒女們擔憂。他無法估計等待着孩子們的將是甚麼命運，但他確信人民群衆能夠理解和保護他的後代。他叮囑眼前幾個尙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衆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兒小小只有六歲，平時活潑可愛，是劉少奇夫婦的掌上明珠。可現在，劉少奇預料自己已經無法保護和撫養她了。他決定把小小託付給保姆趙淑君。讓這位朴實的農村婦女把小女兒帶出去，帶到群衆中去。他交待妻子說：「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一定要把她找回來。」

從一九六七年六月開始，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的造反派「八一戰鬥團」在中南海西門安營扎寨，設立「揪劉前線總指揮部」，揚言要把劉少奇揪到建工學院去批判鬥爭。接着北京上千個造反派組織和外地來京串連的造反派組織也蜂擁而來。一時間幾萬人（最多時達十幾萬人）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在中南海周圍搭起帳蓬、席棚、木屋，各自插上自己的旗幟，用高音喇叭對着中南海內日夜叫喊。有些人還試圖衝進中南海，但都被警衛部隊擋住了。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劉少奇向北京建工學院造反派寫檢查。這時劉少奇已經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寫了一半只好叫王光美代筆。結果被造反派臭罵，說是「假檢查，眞反撲」，並

將它定爲「大毒草」，在全國批判。

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回復劉少奇的「通告」，代表了那個瘋狂的年代的那種瘋狂的風格，是中外歷史上難得一見的，讀者諸公千萬要細心欣賞：

劉少奇：

你交上來的是他媽的甚麼「檢查」！又臭又長的五千餘字，無處不在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無處不在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妄圖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爲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極，混蛋透頂！

你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借檢查之名，行反撲之實，妄圖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擋車，自不量力，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劉少奇，你別白日作夢了！

你的所謂「檢查」，是實行資本主義復闢的宣言書，是鼓動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撲的動員令，我們要迎頭痛擊，徹底粉碎，不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審，我們決不收兵！

……劉少奇，我們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紅小兵不是好惹的，你這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有甚麼資格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像你這樣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

我們勒令，你必須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於本月二十五日零點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檢

查！

不得有誤！

紅代會北京建工學院

新八一戰鬥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②

正在這種硝煙瀰漫的時刻，毛澤東於七月中旬離開北京，到南方巡視。

毛澤東此舉，似乎是將劉少奇扔給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一伙，任其宰割。因爲毛澤東一離開北京，江青一伙便可爲所欲爲，而毛澤東也不必爲這一切負責。

果然，毛澤東剛離開北京，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們說：「你們爲甚麼還不揪鬥劉少奇？一點造反精神也沒有！怕甚麼？等甚麼？還看不出嗎？鬥！現在正是時候！」

於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們向中央辦公廳上書，擬於七月十八日在國務院小禮堂召開「批判劉少奇假檢查眞反撲罪行大會」。戚本禹將報告中的「少奇」兩字去掉，加上「鄧、陶夫婦」四字，報請「伯達、江青、康生決定」。③

七月十八日晚，造反派將劉少奇揪到職工食堂，把王光美揪到中南海西樓大廳，分別批鬥。福祿居中，只剩下一名秘書和一名衛士，其他的工作人員都分別跟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到了批鬥會場。

就在這時，造反派們衝進劉少奇的家，翻箱倒櫃，大肆抄掠，將劉少奇的筆記、手册、文件、通信，以及秘書們的工作日記等，裝在大包裏，統統拿走。

兩個多小時後，劉少奇在衛士的攙扶下回到家裏，只見室內物件狼藉，一片凌亂。當天晚上，造反派強行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隔開，劉少奇在前院，王光美在後院，房門口加了一名持槍的哨兵，兩人雖然只有咫尺之遙，但不能見面，不能互通消息，連子女也不能接近父母。工作人員進出也要接受監視和盤問。

這是對劉少奇精神、肉體上的進一步迫害。劉少奇從此失去人身自由。

王光美事後回憶說：對於這次突然襲擊，他們事先已有思想準備，但絕沒想到，這次竟是與劉少奇的永別。她說：事前，少奇同志一直很鎮定，曾對她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劉少奇和她永訣的話語。這句話的潛台詞是「歷史不是由毛澤東寫的！」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憤慨、絕望之情躍然紙上。

從此以後，劉少奇頻頻地被揪鬥，劉少奇的秘書回憶說：

在我看來，少奇和光美同志既是夫妻，也是同志和戰友。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身邊做秘書工作近二十年，從工作、生活到家務，對少奇同志的幫助都是很大的。

就是在少奇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鬥爭和殘酷迫害的情況下，光美同志也毫不動搖地站在少奇同志的一邊，他們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他們風雨同舟、患難與共；他們共同經受着狂風惡浪的考驗。有甚麼比這人世間真情升華的革命情操更珍貴呢？

少奇同志頭幾天不知道光美同志的下落。這對他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他心急如焚，幾天

沉默不語，飯量大減。後來他從一個孩子那裏得知光美同志就在後院時，精神狀態才有了好轉。

自從他們被隔離開後，每天只給少奇同志一份報紙和一份參考資料，光美同志則甚麼也沒有。

有一天，少奇同志拿着他看過的報紙和參考請求一位衛士說：「請你把這些送給光美看看好嗎？她看了以後再退給我。」衛士照辦了，並告訴光美同志這是少奇同志給她的。

就這樣在傳看報紙和參考資料的過程中，少奇同志了解到光美同志還沒有被抓走。雖然都失去了自由，也無法見面，但相互間卻也能得到一點安慰。

後來看守們知道了光美同志看的東西是少奇同志傳過去的，先是仔細進行檢查，怕他們之間利用報紙和參考資料傳遞甚麼信息。然後向上報告了這件事。據說江青還追查是誰替他們在中間傳送的，說這是幫助他們搞攻守同盟，還把那個衛士也調走了。

從此，門口的哨兵對進出的工作人員監視得就更加嚴格了。連大夫去送安眠藥，也要跟進去看一看。少奇同志吃飯時也要派人站在飯桌旁監視着；有時給個水果，但卻不給水果刀……殘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使少奇同志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④

在這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下，劉少奇的身體健康急劇惡化，一名衛士說：「首長骨瘦如柴，每次我幫他洗澡時，我都不忍心看着他，都忍不住掉眼淚」。

八月五日，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一周年。《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字報的全文，並

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社論。這無異是爲「揪鬥劉少奇」火上加油。這一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三百萬人的誓師大會。與此相呼應的，便是在中南海裏揪鬥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這是劉少奇第六次被批鬥。

那天，酷熱難當，劉少奇和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上批鬥台，用暴力脅迫他們彎腰低頭，雙臂後伸，即所謂的「噴氣式飛機」，達兩小時之久。因爲天氣酷熱，他的衣服全濕透了，他想擦擦汗，但剛掏出手絹就被人打掉了。只能任憑豆大的汗珠滾滾滴到地上。造反派還不斷地按頭，搞噴氣式。他向念批判稿的人提出：「我耳朵背，聽不清批判的是甚麼內容，讓我將批判稿帶回家看看，弄清楚提的甚麼意見，以便今後改正錯誤。」但這個合情合理的要求也被造反派拒絕了，並說：「你是耍花招，是裝聾賣啞」。

然後用一陣「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聲回答了他。劉少奇的答辯不僅被不停的口號聲打斷，而且還被造反派用語錄本不斷拍打。會場上頻頻響着「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一片殺氣騰騰的景象。

以下是批鬥時「造反派」們的記錄：

問：你是否說過「三自一包」？

答：沒有，那是記載文獻裏。

問：文獻是誰寫的？

……（沒有答覆）

問：爲何在「修養」中除掉了無產階級？

答：那是錯誤的。
問：甚麼錯誤？
答：違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錯誤。
問：爲何違反？
答：因爲認識不够。
問：爲何在一九六二年再次出版「論修養」？
答：有人提議出版的。
問：誰提議的？
答：康生
問：有沒有審查？
答：審查了。
問：你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答：不反對，只有一部份的事情內，在黨的事業上做了一些不利的工作。
問：爲何在「論修養」裏除掉「馬列」二字？
答：是某人刪除的。
問：審時你未參加嗎？
答：那時沒有注意到。
問：在天津是否講過「剥削有功」？

答：沒有講過。

問：是否反對毛澤東思想？

答：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問：二月提綱是否在你家裏作成的？

答：不是的，只在我家裏開過一次會。

問：談了些甚麽？

答：我甚麽也沒有談。

問：有誰參加？

答：彭真、陸定一、吴冷西。

問：是誰主持會議的？

答：我呀！

問：談些甚麽？

答：聽了大家的意見，我……。

問：爲何袒護彭真、陸定一及楊尚昆？

答：過去不了解他們。

問：爲甚麽在抗日戰爭期間大捧蔣介石？

答：這是政策呀！

問：爲何提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及兩條道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答：我的思想不大好。
問：思想不大好！是否反毛澤東思想？
答：我没有反對過毛澤東思想。
問：你反對甚麼？
答：我甚麼也没有反對。
問：爲甚麼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
答：我當時（……錯漏……），他不是向胡喬木説的嗎？我不太明瞭。
問：你爲甚麼不調查一下？
答：目前我是這種狀態，怎麼進行調查呢！
問：你爲甚麼聽信彭真的話？
答：他没有説過謊話。
問：你父親是「官僚買辦」布爾喬亞爺爺嗎？
答：我父親是民族布爾喬亞爺爺，毛主席不是提議這樣稱呼嗎？
問：你相信毛主席嗎？
答：我當然相信毛主席，若不相信他，絶不會活到今天。⑤

劉少奇的女兒們被抓去陪鬥，看到了下面驚心動魄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臉腫，鞋被踩掉，光穿着襪子。就這時，媽媽突然掙脫，一把緊緊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顧拳打腳踢，也緊緊拉着媽媽的手不放。他倆掙扎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對視。這是爸爸跟媽媽最後握手道別……幾個壞人狠狠地掰開了他們的手，媽媽又奮力掙脫，撲過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⑥

會畢，劉少奇、王光美被押到會場一角，逼迫他們向兩幅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是鼻青臉腫，他的腿被打傷，鞋被踩掉，只穿着襪子，一跛一跛地走路。當他被押回辦公室時，怒氣正盛，立即叫來機要秘書並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道：「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爲甚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的。」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劉少奇還寫信給毛澤東，書面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寫道：「我已失去自由。」⑦

二、慘無人道的折磨

一九八〇年劉少奇獲中共中央平反與恢復名譽以後，在審訊江青四人幫的日子裏，劉少奇在一九六七年以後所受到的慘無人道的迫害與折磨，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揭露，似乎是有一隻巨手，有意地將事情

壓下來了。原因是：上述情況一旦被詳盡揭露，不但有損中共的顏面，而且更有損於毛澤東，因爲劉少奇專案小組的負責人，就是江青，而江青是直接向毛澤東負責：毛澤東與中共向來的政策是「優待俘虜」，然而中共中央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遭遇，還遠不如一名國民黨的俘虜兵。

劉少奇是單獨關押的。他不知道，就在「揪劉鬥爭」如火如荼的九月十三日，他的孩子們被驅趕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獄了。他整日盼望着能看見被隔離開來的妻兒。他總是佝僂着身體，扶着窗台，拖着傷還未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時蹭到孩子們的住所，有時又蹭到他認爲關押着王光美的後院牆根。然而，回答卻是一片寂靜。不久後的一天，在劉少奇的住處連夜築起一堵高牆，把劉少奇去後院的路堵死了，也就是說，把他心底裏僅有的一點兒希望扼殺了。從此，孤獨的魔影終日伴隨着他。不幾天，有人奉命搜查劉少奇的居室，並要他把皮帶解下來。劉少奇對此表示強烈抗議，卻被來人強按在地上，不由分說地抽走皮帶。劉少奇氣得渾身打顫，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從此，劉少奇過去的警衛員被逼當了他的「看守」，並被命令對劉少奇要毫不留情。

劉少奇還被迫改變了以往夜間工作的生活習慣，加上他終於知道妻兒被逼離去，發給的安眠藥量又不足，因此，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的覺，有時甚至徹夜不眠。他漸漸感到精神和體力都難以支持，以致終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戰爭中受過傷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動更受限制，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二個小時。他那在批鬥中被打傷的雙腿，幾乎邁不開步子。距他住處三十米的飯廳，他走一趟常常要用五十分鐘甚至更長的時間。當他拖着沉重的雙腿，艱難地邁着步子，全身晃晃悠悠難以保持平衡時，跟隨他的「看守」因爲早被打過招呼，誰也不敢上前扶他一把。最後，劉少奇根本不能走動了，只好由工作人員爲他打飯。打飯的工作人員經常被別人罵爲「保皇兵」，弄得他們也不願意每餐爲劉少奇

打飯了，常常是打一次飯，吃好幾頓，有時飯裏還被人吐進唾沫。只剩下七顆牙，又患有胃病的劉少奇，既咀嚼不動飯菜，又經常吃變質的剩飯剩菜，故而時常腹瀉，身體也因此一天天虛弱下去。他的手頻頻顫抖，吃飯時飯送不進嘴裏，一吃飯就弄得滿臉滿身都是湯菜飯粒。

劉少奇生病，醫生、護士也不敢對他太客氣，都要先批鬥一陣。做體檢時，還要駡幾聲「中國的赫魯曉夫」。個別大夫還喪盡天良地用聽診器敲打他，有的護士打針時則亂扎亂捅，還停用了他需要長年服用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藥物。種種折磨導致劉少奇身體狀況日趨惡化，甚至時常神志不清，處於呆癡狀態。即便如此，當時還有人說，「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假裝的可能……」。

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劉少奇突然發高燒，由於沒有及時適當的治療，轉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等人狠毒地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着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這就不得不派醫護人員去搶救。然而，當醫生提出劉少奇要住院治療，卻被拒絕了。為了減少對病人的精神刺激，醫生提出摘除劉少奇居室裏掛滿了的大字報、大標語，也被拒絕了。

這一次，劉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人卻從此虛弱得無力起床活動。他面容憔悴，身體消瘦，頭發、胡子又長又髒，常常是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當劉少奇處於這樣一種毫無自理能力的悲慘狀況時，監視他的人仍日夜守在床邊，還說「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殺，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監護工作。」並用綳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地綁在床上，不許鬆動。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劉少奇突然兩次悲憤交加，失聲痛哭，或許是他覺得生活對他太殘酷了，太不公正了……。

以後，由於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和腦供血不足，腦軟化的症狀惡性發展，劉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飼維持生命。他時而緊攥着拳頭，時而張開十指亂抓，而一旦抓住甚麼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劃動雙手不止不休的時候，有人把兩個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中，他緊緊捏着，於是稍稍安靜一些，天長日久，他竟將兩個塑料瓶捏成了「葫蘆」形。⑧

三、十二中全會：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

打到了劉少奇，達到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標。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勝利的中共「九大」可以召開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問題，作了講話。會議認爲，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時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確的。兩年來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就在於「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爲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全會還批准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審查報告說：「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

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纍纍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衆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全會批准了《審查報告》並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舉着《審查報告》說：「不要小看這麼一本，裏面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調查工作，這個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幾乎每天都找她，搞出這一本審查報告，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劉少奇本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聽到十二中全會決議的。江青一伙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爲那日是劉少奇七十歲壽辰。

聽罷決議，劉少奇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頻頻嘔吐，血壓陡然升高到二六〇——一三〇毫米水銀柱，體溫驟升至攝氏四十度。⑨

從此，劉少奇完全明白了，任何辯駁都是徒勞的。他緘默了，甚麼話都不說，用無言表示抗議。然而，劉少奇的身體卻從此更趨衰弱，周恩來千方百計動員了北京醫院的兩名護士去護理他，可惜，他們無法治療劉少奇的精神創傷，對他的身體衰竭也就無能爲力了。

四、發配開封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古城開封，秋雨綿綿，天氣陰沉而寒冷。

晚上九時許，一架由北京來的飛機，轟隆隆地降落在開封軍用機場的跑道上。艙門打開後，從飛機裏抬出一副擔架，擔架上的人用棉被包裹着，被迅速地送進了一輛黑綠色的救護車，幾輛轎車擁着這輛救護車，絕塵而去。十多分鐘後，車隊駛進了市中心的北土街十路——原開封市人民政府大院。

擔架上的人就是劉少奇。他是以「戰備疏散」的名義，送到這裏來的。

大院的東北角，有個三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形成一座獨立的小院，小院的四周被三層高的樓房包圍着，陰沉沉地，難得見到陽光。這裏原是國民黨「金城銀行」的金庫，是一九三〇年建造的。

小院裏的每個屋門，都是用厚厚的鋼板制成，窗戶上裝着密密的比拇指還粗的鋼枝，屋裏又陰暗又寒冷又潮濕。

患着重病的劉少奇，就被囚禁在這個堡壘似的小院南屋的一間套房裏。室內只有一張小木板床，一張桌子和一張茶幾。

小院西屋的二樓住着幾名醫護人員。小院外設有監視劉少奇的「特派員」辦公室。

小院四周的屋頂上，架着四挺機關槍。

市政府大院早在劉少奇到來之前已全部搬遷，這時大院裏駐守着兩個排的解放軍，大院的進口處架

設了兩道厚厚的鐵絲網。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醫護人員共五人，兩名男護士，兩名女護士，一名姓劉的男醫生，全是從開封陸軍一五五醫院派來的。

從北京來的只有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與一名姓曹的女護士。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太和一早就來到劉少奇的房間，只見他安靜地躺在床上，頭下枕着從北京帶來的一對海棉枕頭。劉少奇微微睜開眼睛，環視着室內，他似乎想向李太和說甚麼，咀張了幾下，又合上。

上午八時，劉醫生率領護士們來到劉少奇的房間，實行「監護。」

劉醫生和護士們在劉少奇的床前排成一排，舉起「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劉醫生帶頭念：「『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劉醫生念一句，護士們跟着念一句。

劉少奇睜開了眼睛，木然地看着這一切，又閉上眼睛。

現場批判進行了十多分鐘，劉醫生才收起「紅寶書」。

這時北京來的曹護士才怯怯地走上前，送上一疊北京帶來的病歷。曹護士又向劉醫生介紹：「他原來患有糖尿病，長期服用維生素和D860，已經停用了。現在他還患有心臟病和大葉肺炎……。」劉醫生戴上大口罩，正在替劉少奇檢查，突然劉少奇睁開了眼睛，全身打了個哆嗦，隨即全身痙攣起來，雙手在被子上亂撕亂抓，喉嚨裏也「嗚嗚」地喊着。劉醫生正在發愣，劉少奇的雙手抓住聽診器，用力地

緊緊攥着。

劉醫生急忙往外拉，邊拉邊對兩名男護士喊道：「快，快幫忙拿下來！」

曹護士和李太和急忙制止他們。李太和輕輕地拍打着劉少奇的手，劉少奇漸漸安靜下來，曹護士趁機將聽診器拿開，從衣袋裏拿出兩個葫蘆狀的硬塑料瓶，塞到劉少奇的兩只手裏。

劉少奇的手便死死地抓住那兩只塑料瓶。

當晚，劉醫生在監護日記上寫道：

「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來是這麼一個病人——一個過去最高層而今處於最低層的人物！他幾乎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眞多，除了器質性的病，更多的則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經已經紊亂，出現全身痙攣，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時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剛開始睜眼睛的一剎那，我感覺到了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態和力量……。」

五、「旗手」慘死在古都

正當劉醫生寫監護日記的時候，劉少奇正在發高燒，並且劇烈地咳嗽。那是從北京來開封時，他被剝光衣服用棉被裹着，一路上又照料不善，着了涼。

衛士長李太和把男護士找來，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才將體溫表放在劉少奇的腋下。劉少奇體溫燒到攝氏三十九度。

接着劉少奇又劇烈咳嗽，並嘔吐起來，嘔吐物中還有血塊。

護士們將劉醫生找來。劉醫生來到後，先拿出《毛主席語錄》「批判」了一陣，才爲劉少奇檢查。劉少奇那瘦瘦的胸脯像風箱似的起伏着，不停地咳嗽。

劉醫生向前來的「特派員」說：「是肺炎復發了。」

特派員說：「按規定治療吧。」

特派員還向一名穿軍裝的人說：「去告訴張處長，立即給北京報告：一切均好，病情無明顯變化。」

此後，劉少奇一會清醒，一會昏迷。無論是清醒或昏迷時，他的雙手都緊緊地攥住那兩只塑料瓶。

第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全天病情無異常。

第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病人」大便乾結，護士用手摳出。

第六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爲「病人」翻身兩次。

第七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咳嗽復發。劉軍醫提出爲「病人」化驗，透視拍片建議。

第八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級答覆：可以進行一次化驗，透視拍片不行。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劉醫生爲劉少奇化驗—尿樣和血樣。他在「監護日記」上寫道：「經過化驗，總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來不是甚麼難症，只是治療不及時，才引起多種並發症。加之病人長期僵臥，造成雙腿肌肉萎縮，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過多，也被扎爛，使全身血管局部壞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還是那麼的頑強。這從醫學角度似乎是難以解釋的。」

第十天，劉醫生提出給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瘡。又準備向上級提透視拍片和會診。

第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劉醫生要用D860，但上級不准用。

第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大便乾結，護士仍用手摳出。

第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病人」咳嗽復發。劉醫生提出透視、拍片、會診建議。

第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輕度發燒。開封藥品告急，上級不准購買。

第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給「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級通知：「病人」不適宜透視、拍片、會診。以後不要再提這樣的問題。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劉醫生在「監護日記」上寫道：

「已經過去第二周了。這一周來，他的病情明顯惡化。這不能不說與藥物的減少有關。同時，他們又否決了我提出的透視、拍片、會診的建議。我算明白了，這不是一般的『監護』，而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

這一天劉少奇體溫升到四十度，全身不停地哆嗦。劉醫生組織搶救。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燒不退，繼續輸液。

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燒不退。輸液，打退燒針。

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體溫降至三十九攝氏度，繼續輸液。

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體溫降至三十八攝氏度。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劉醫生「監護日記」：

「好危險！像他這麼大的年紀，身體又那麼衰弱，高燒四十多度，已近生命的極限。可他的神志似

乎還是那麼清醒，還是那麼主動積極地配合治療……今天，他的高燒總算退了，體溫維持在三十七點二攝氏度。他又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從北京來的衛士長李太和和曹護士被送回北京。臨走時，李太和俯下身，把咀湊到劉少奇耳邊，輕輕地告訴他要走的消息。

劉少奇臉上的表情木然了，兩顆混濁的淚珠從他的眼中流出。

曹護士也將臉貼上劉少奇，輕聲叮囑：「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劉少奇又開始發燒。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劉少奇的體溫是三十九·七攝氏度。而退燒藥已用完，上級不准買，北京帶來的D860也被帶走。

第二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劉少奇不能進藥。

第二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劉少奇咀唇發紫，渾身哆嗦，體溫是四十·一攝氏度。兩瞳反光消失。特派員走到劉少奇床前看了看，說道：「發燒對他來說不是家常便飯嗎？注意觀察，情況實在危險再寫報告。」

第二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點四十分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兩分鐘後，劉醫生和護士才趕到。劉少奇是在沒有得到搶救的情況下死亡的。

當日深夜兩點，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了剛回到北京的李太和。電話裏是汪東興的聲音：「你必

須立即趕回開封去。他今天早晨已經死了。記住帶兩套乾淨衣服，還坐飛機去」。

第二天上午，李太和又來到開封市政府大院，他一眼便看到了走廊上停放着一副擔架，一張白床單嚴嚴實實地覆蓋着，李太和揭開白床單，下面正是劉少奇！

只見劉少奇僵直地躺着，蓬亂的頭髮有一尺多長，咀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有一片瘀血……。

李太和含着眼淚，用隨身帶來的刀剪，細心地爲劉少奇修剪頭髮，刮去又長又稀的胡子，而後替他換上帶來的衣服、鞋子。

解放軍的負責人和哨兵一直站在旁邊監視。

李太和走進劉少奇的病房，他發現那兩只硬塑料瓶掉在地上，被劉少奇捏成了葫蘆形。劉少奇帶着多少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

北京來了命令：遺體就地火化。

深夜，下着寒冷的小雨。

特派員派人將劉少奇的遺體用白布嚴嚴密密地包裹起來，抬上一輛北京「六九」型吉普車，車廂裝不下劉少奇那頎長的身軀，小腿和雙腳都露在外面。

開封火化場崗哨林立。

死亡登記表是這樣塡寫的：

死因：烈性傳染病。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性名：劉原

現住址：八一七二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⑪

沒有親人，沒有鮮花，沒有哀樂，也沒有悼詞，有的只是淒風苦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遺體就這樣秘密地被推進了火化爐。

劉少奇不得好死，毛澤東也沒有好活。毛澤東的勝利只是短暫的。爲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自己也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而且報應很快就出現了。

就在劉少奇魂斷開封的時候，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之間的危機也在醞釀之中。越明年，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毛澤東便與他的「接班人」爆發了尖銳而嚴重的衝突，鬥爭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再過一年，當毛澤東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準備拿掉林彪這位第二個「接班人」的時候，林彪政變未遂，倉皇外逃，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機毀人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

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喪鐘敲響了。

劉少奇臨終前說的「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也應驗了，毛澤東死後還不到四年，中共中央就在

一九八〇年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爲劉少奇平反，並在五月十五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劉少奇沒有下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因爲，「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

①：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二九六頁。

②：黑雁男《十年動亂》二三四頁。

③：同上，二三七頁。

④：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三〇五頁。

⑤：台灣出版：《劉少奇資料匯編》六三〇頁。

⑥：《緬懷劉少奇》四四四頁。

⑦：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七五頁。

⑧：同上一七六——一七九頁。

⑨：同上一八〇頁。

⑩：以上引自陳舒平《共和國元首之死》。

參考書目

《毛澤東選集》，一—五卷，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傳》，金冲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
《劉少奇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
《懷念劉少奇》，湖南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
《毛澤東與他的秘書田家英》，逢先知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橫空出世》，胡長水、李緩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民族救星》，張樹軍等者，中國青年出版社。
《立邦興國》，龐松、林蘊暉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晚年歲月》，鄭謙、韓鋼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說不盡的毛澤東》，張素華等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傳》，金冲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朱德傳》，金冲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周恩來的歷程》，江明武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我眼中的劉少奇》，郭思敏，天羽編，河北人民出版社。
《我爲少奇當秘書》，劉振德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少奇風範詞典》，中國工人出版社。
《凱歌行進的時期》，林蘊暉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走出韶山冲》，王以平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延安整風前後》，張志清等著，江蘇文藝出版社。
《劉少奇一生》，黃峥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峥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少奇謀略》嚴昌、陽雪梅著，紅旗出版社。
《青年毛澤東》，高菊村等著，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劉少奇在白區》，陳紹疇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劉少奇青少年時代》，黃祖琳編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偉人之初·劉少奇》，朱元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人民公社狂想曲》，林蘊暉、顧訓中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躍進狂瀾》，謝春濤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滑軌與嬗變》，龐松、王東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許全興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楊勝羣、田松年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
《陳伯達傳》，葉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江青傳》，葉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出版社。
《劉少奇論合作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生活中的領袖們》，權延赤著，雲南人民出版社。
《十年動亂》，黑雁男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毛澤東的人際世界》，宋一季、楊梅葉編著，紅旗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論文），王小強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刘少奇与毛泽东
作者＝冯治军著
页数＝６６５
ＳＳ号＝１０９６５６９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４月